

聂鲁达自传

一、年轻的外省人

智利的森林

.....在火山山麓，在冰川侧畔，在几个大湖之间，静穆的智利森林散发着芳香，林中树木杂陈.....我的双脚陷入枯叶中；一根松脆的树杈发出碎裂声；巨大的山毛榉树高高挺起它那向上怒张的身躯；穿过寒林飞来的一只鸟儿，扑打着翅膀，栖息在阴暗处的枝桠上。它随即从隐匿处双簧管似地鸣啭起来.....月桂树的浓香和波耳多树 的幽香扑鼻而来，弥漫了我的整个身心.....瓜伊特卡群岛的柏树阻断了我的去路.....这里是个立体世界——一个鸟的国度，一个叶片纷呈的境界.....我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揭开一个隐蔽的洞穴，一只浑身红毛的大蜘蛛死死盯着我，一动不动，大得像只螃蟹.....一只金色步行虫把臭烘烘的气息向我喷来，同时它那彩虹般灿烂的身影，像一道闪光似地消逝了.....我穿过比我高的蕨类丛林时，从它那冷冷的绿眼睛里落下 60 滴泪珠，洒在我的脸上；而它那扇子般的叶片，在我身后久久颤动.....一棵腐朽的树干是何等珍贵！.....黑色和蓝色的草类给它安上耳朵，红色的寄生植物为它缀满红宝石；另外一些懒洋洋的植物借给它胡须和幼芽；一条蛇如同一股气体，从树干的腐烂内脏里飞速喷射而出，仿佛是死去的树干逸出它的魂魄.....更远处，每一棵树都与它的同类分开.....它们高高耸立于神秘的大森林覆盖层之上，它们的枝叶有的呈线形，有的像卷发，有的多枝杈，有的呈披针形，风格各不相同，像是由一把不停剪动的剪子剪出来似的.....一道峡谷；底下，澄澈的溪水从花岗石和斑纹大理石上悄然流过.....一只柠檬般纯黄色的蝴蝶，在水色和阳光之间翩跹飞舞.....在我身旁，无数朵黄蒲包花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殷红的喇叭藤花在高处悠悠飘摆，如同从神奇森林里淌出的点点鲜血.....殷红的喇叭藤花是鲜血凝成的花朵，洁白的喇叭藤花是白雪凝成的花朵.....在树叶的颤栗中，一只狐狸飞也似地穿过那片寂静，但寂静毕竟是这些枝叶的法则.....远处隐约传来一只野兽迷惘的吼声.....一只藏匿着的鸟儿猛地往斜刺里钻过去.....树木花草在窃窃私语，直说到一阵暴风雨使大地的各种乐音齐声高奏起来的时候。

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童年和诗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物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的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

我有了丰富的阅历之后，觉得在我的故乡阿劳卡尼亚地区施加过可怖而又不可思议的威力的雨水，已经失去艺术感染力。雨水整月整年地下个不停。一根根雨丝像长长的玻璃针，在屋顶砸得粉碎；有的打在窗上，形成透明的波涛。雨中的每一幢房屋，都像一艘船，正在严冬的大海中吃力地驶向港口。

美洲南方的这种冷雨同热雨不一样，不会像鞭子那样劈头盖

脸地猛浇下来，过后又是晴空万里。相反，这种雨很有耐性，会绵绵不断地从灰暗的天空中不停地落下来。

在我家前面，那条街变成了一片烂泥的汪洋。我从窗口透过雨帘，看见一辆大车在街心陷入泥淖。一位身披厚毛黑斗篷的农民正在抽打拉车的几头牛，它们在雨水和烂泥里再也拉不动了。

那时，我们常在人行道上踩着一块块石头，顶着严寒和雨水上学去。雨伞被风刮跑了。雨衣太贵，手套我不爱戴，鞋子湿透了。我永远都记得烤在火盆边上的湿袜子和许多冒着蒸汽，像一只只小火车头似的鞋子。接着发了洪水，把河边住着最穷人家的村落冲走了。颤抖的大地也在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

特木科是一座开拓者建立的城镇，这类城镇没有往事，却有不少五金铺。印第安人不识字，于是一把大手锯、一口巨型大锅、一把硕大的锁、一把南极区用的大勺，都成了五金铺挂在街上用作招徕的标志。再远一点，鞋铺挂的是一只巨型靴子。

若说特木科是智利南疆的智利生活方式的前哨基地，那就意味着它有一部漫长的血的历史。

阿劳科人历经 300 年的战斗，在西班牙征服者的逼迫下，不得不移居到那片寒冷地区去。然而，智利人却继续进行所谓“平定阿劳卡尼亚”行动，就是说，继续打一场血与火的战争，以掠夺我们同胞的土地。他们对付印第安人无所不用其极：用卡宾枪射击，用火烧印第安人的茅屋；然后是更慈爱的方式，使用法律和酒精。律师在掠夺印第安人的田地方面，也成了专家；印第安人一表示抗议，法官便把他们送入狱中；神甫则用地狱中永恒的烈火吓唬他们。最后，烧酒也起了毁灭这个高傲种族的作用；而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所创作的长诗《阿劳卡纳》中，把印第安人的英雄业绩、勇敢无畏以及美丽动人之处，融铸在他那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中。

我的双亲是从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来的。那里——智利中部——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还没等我记事，还没等我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我母亲堂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亡故了。我生于 1904 年 7 月 12 日，在一个月之后的 8 月，我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对我国中部的小农来说，生活是艰难的。我祖父堂何塞·安赫尔·雷耶斯的地很少，子女却很多。我的几位叔叔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霍埃尔、阿瓦迪阿斯，我觉得这些都像是远方王国里王子们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很普通，叫何塞·德尔·卡门；他年纪轻轻就离开父辈的土地，到塔尔卡瓦诺港的船坞去当工人，最后在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是驾驶道碴车的司机。道碴车是什么，知道的人不多。在经常刮大风的南部地区，如果不在枕木之间填上石碴，铁轨就会被水冲走。必须把石碴装入柳条筐从采石场运出来，再倒到敞篷平车上去。40 年前，开这种道碴车的人绝对不是少数；他们来自农村，来自城镇郊区，来自监狱。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肌肉发达的壮工。铁路公司付给的工资十分微薄，对于肯去道碴车干活的人倒是不要什么资历。我父亲就是这种车上的司机；他既习惯于发号施令，也习惯于服从命令。他有时把我带在身边。我们在博罗亚挖过石头，那地方是边境地区的蛮荒的心脏，是西班牙人和阿劳科人鏖战的战场。

那里的大自然令我陶醉。各种鸟儿、甲虫、石鸡蛋把我迷住了；这些东西有的湛蓝，有的乌黑，有的闪亮，犹如猎枪的枪筒一样五彩缤纷，能在山

谷里找到它们实属罕见。这些甲虫完美得令我惊叹不已。我捉到了几只“蛇娘”，这是给一种最大的鞘翅科甲虫取的古怪名字，这种甲虫浑身黑亮，很结实，是智利昆虫中的大力巨人。在灌木、野苹果树、喇叭藤的树干上骤然见到它，会吓人一跳，但我知道它很结实，就是双脚踩上去，也踩不扁它。它既然有结实的躯壳，也就无须靠毒汁自卫了。

我的这些探险引起工人们的好奇；不久，他们开始对我的发现产生兴趣。我父亲一疏忽，他们就溜到原始森林里去；他们比我更熟练，更机灵，也更有力气，往往为我找到意想不到的宝贝。有个名叫蒙赫的工人，据我父亲说，是个爱斗殴的危险人物。他黝黑的脸上有两道很粗的线条：一道垂直的是刀疤；另一道横向的，是他微笑时露出一口白牙的嘴——他的微笑既可爱又狡黠。这个蒙赫，给我带来白喇叭藤花、毛烘烘的蜘蛛、羽毛未丰的白颈野鸽；有一次，他还为我找到喇叭藤和卢玛番樱桃树上长的亮闪闪的甲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这种甲虫，反正我只在那次见过。那是一种身披彩虹的闪电似的昆虫，它外壳上的红色、紫色、绿色和黄色，弄得人眼花缭乱。它像一道闪光从我手上逃脱，飞回了大森林，蒙赫没能为我把它捉来，因为他已经不在。我再也没有找到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幽灵；我也没有忘记我的那个朋友。父亲把他死于非命的情况告诉了我，他摔下火车，从悬崖上滚了下去。他们护送的火车停了，可我父亲告诉我，他已摔得粉身碎骨了。

我家的房子建造于 60 年前，是边境地区一种颇为独特的房子，要说清它的形状是很困难的。

首先，各家的房屋都是相通的。院子深处，雷耶斯家和奥尔特加斯家，坎迪亚家和马松家，互通有无地使用工具、书籍、生日糕点、按摩油膏、雨伞和桌椅。

一个村落的全部活动，都在开拓者建造的这些房子里进行。

堂查尔斯·马松是美国人，一头乱蓬蓬的银发，样子像美国诗人爱默生，是这一家的家长。马松家的儿女都是地道的土生白人。堂查尔斯·马松备有法典和《圣经》。他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个筚路蓝缕的创业者。这一家子并非谁也没有钱，他们开设了印刷厂、旅馆、肉铺。他有几个儿子是报社领导人，另外几个儿子却是报社印刷厂的工人。一切都随着时光流逝了，而所有的人却依然像以前那么贫穷。只有德国人继续不屈不挠地维护着他们的财产，这在边境地区显得与众不同。

当时我们那些房子有点儿像营房，又有点儿像发明家开的店铺，一进门就见到好些木桶、农具、马具和无法描述的东西。

修建房间的工程始终不能结束，楼梯总也没有完工。人们一辈子谈的都是继续建设的事。做父母的早就开始想给子孙们建造大学了。

堂查尔斯·马松家里举行过盛大的庆祝会。

命名日宴会的全部食品有芹菜火鸡、烤羊肉串和餐后吃的奶油蛋白蛋糕。我有许多年没吃过这种蛋糕了。满头银发的家长同他的妻子堂娜米卡埃拉·坎迪亚一起，坐在那张长得没有尽头的桌子头上。他背后有一面很大的智利国旗，上边用别针别着一面小型的美国国旗，其大小正好是他们血统的比例。智利国旗上那颗孤独的星，显得很突出。

在马松家的这所房子里，也有一个大厅是不让小孩子进去的。我从来不

知道那里的家具到底是什么颜色，因为在一场大火把它们焚毁之前都罩着白套子。大厅里有一本收藏着这一家相片的相册，他们的这些相片比后来蜂拥传到边区来的那种叫人受不了的着色放大相片，更为细致精美。

那本相册里有一张我母亲的相片。她是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夫人，身材苗条，神情专注。有人告诉我，她写过诗，但我只见过那张美丽的相片，她写的诗我从未见过。

我父亲早已娶堂娜特立尼达·坎迪亚·马贝尔德为继室，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

我父亲一来到，她就跟当时当地所有的妇女一样，简直变成了一个柔和的影子。

我见过有人在那个大厅里跳玛祖卡舞和四对舞。

我家里还有一个衣箱，箱里装着各种令人着迷的东西。箱底有一本印着美丽的鹦鹉的历书特别显眼。一天，母亲在翻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箱子，我为了够到那本印有鹦鹉的历书，竟头朝下地掉了进去。不过等到我长大后，我悄悄打开过这个箱子，里边有几把薄如蝉翼的珍贵扇子。

那个箱子里还有一件东西，我至今还记得。那是第一部使我入迷的爱情小说，是几百张由一位我不知道是恩里克还是阿尔韦托的人签名发出的明信片，全是寄给玛丽亚·铁尔曼的。这些明信片美极了，都是镶着小玻璃片的印有当年的大演员的相片，有的还贴着头发；还有一些明信片印着远方的城堡、都市和风景。在好几年时间里，我只能从这些相片上找乐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封一封地阅读了这些用工整的书法写就的情书。我总在想象，那位情人准是个头戴圆顶礼帽，手执手杖，领带上别着钻石饰针的男子，而他的情书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迷人的恋情。这些情书是这位旅行者从地球上的各个地点寄来的，信中妙语如珠，尽是钟情的大胆表白。我也开始爱上玛丽亚·铁尔曼了。我想象她是个傲慢的女演员，头上戴着珠冠。但是，这些情书是怎么到我母亲衣箱里来的呢？我总也没法弄个水落石出。

1910年来到了特木科城。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上学了。学校是一座很宽敞的破旧大房子，里边有几间乱七八糟的教室和阴暗的地下室。春天，从学校高处可以望见蜿蜒的、景色迷人的考廷河，两边的河岸上长满了野苹果树。我们时常逃课，以便把脚泡到从白石上流过的冰冷的河水里去。

但是，对于年方6岁的我来说，学校却是个前景广阔的场所。一切都具有神秘的可能性。不让我进去的那间物理实验室，摆满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器、曲颈甑和方盘。图书馆永远是大门紧闭。开拓者的孩子们不喜欢学知识。然而，最吸引人的地方却是地下室，那里静悄悄的，而且一片漆黑。我们点起几支蜡烛照着玩打仗的游戏。胜利者把俘虏绑在破旧的柱子上。我至今还记得特木科学校地下室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潮湿气味——阴暗角落的、墓穴的气味。

我渐渐长大，开始对书籍产生兴趣。在布法洛·比尔 的伟业里，在萨尔加里 的游历中，我的精神境界在那些梦幻般的地区得以不断扩展。我的初恋极其纯洁，是在写给布兰卡·威尔逊的情书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姑娘是铁匠的女儿；一个小伙子爱她爱得神魂颠倒，求我替他写情书。这些情书写得如何，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这也许就是我最早的文学作品；可是有一次，我与这个女同学不期而遇，她问我，她的情人递给她的那些信

是否都出自我的手笔。我不敢否认自己的作品，便慌乱不堪地承认了。她当即送我一只榅桲，我当然舍不得吃，把它宝贝似的保存起来。这么一来，我的伙伴在这个姑娘心中的位置就被顶掉了；我继续替他写没完没了的情书，也一再得到榅桲。

学校里的男生不承认也不尊重我的诗人地位。可以毫无偏见地说，边境地区就有这种蛮荒西部的奇异印记。我的同伴们名叫什奈克、席勒、奥塞尔、史密斯、塔伊托、塞拉尼。我们同阿拉塞纳家的人、拉米雷斯家的人以及雷耶斯家的人是平等的。没有巴斯克人的姓氏，但有西班牙犹太人的姓氏：阿尔瓦拉、弗朗科；爱尔兰人的姓氏：姆克·金蒂斯；波兰人的姓氏：雅尼切夫斯基。梅利比卢、卡特利莱奥这些阿劳科人的姓氏却闪烁着暗淡的光，散发出木头和水的香味。

有时，我们在关得紧紧的大棚子里用橡实打仗。凡挨过橡实的，都知道被它击中有多痛。到学校之前，我们口袋里往往装满这种“炮弹”。我本领不强，没有力气，又不机灵，总是处于劣势。每当我分心去细看那有灰色帽盖的、碧绿光滑的、奇妙的橡实时，每当我笨手笨脚地用橡实做一个后来被人夺走的烟斗时，橡实就会雨点般地扫到我头上。第二年，我忽然想到戴上一顶鲜绿的雨帽。这顶雨帽是我父亲的，同他的粗呢披风、红绿信号灯一样，都是我喜欢得着了魔的物件，我一有机会就带到学校去炫耀……这次雨下如注，再没有比这顶像只鹦鹉似的绿油布雨帽更妙的帽子了。我刚刚来到有 300 名疯狂的亡命徒正在里边奔跑的那个大棚，我的雨帽就像鹦鹉那样飞了。我追上去，每次眼看就要抓到手了，它却在震耳的喊叫声中又飞走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大的喊叫声。我再也没有见到这顶雨帽。

在这些回忆中，我弄不清准确的时间顺序。一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琐事往往把我弄得糊里糊涂，而我现在觉得，和博物学——奇怪地混淆在一起的我的第一次艳遇，就应该是很重要的事。也许爱情和大自然老早就是我的诗歌的源泉了。

我家对面那时住着两个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很胆小，而且沉默寡言，她们却很早熟，又极调皮。那次我站在自己家门口，尽力不看她们。她们手里拿一件引我注意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她们给我看一个野鸟窝，是用苔藓和小羽毛建造的，窝里摆着几个非常好看的青绿色小鸟蛋。我正要伸手拿鸟窝时，她们中的一个对我说，她们先要检查我的衣服。我怕得发抖，急忙逃走，那两个年轻的仙女高举着那个招引人的宝贝追了上来。在她们追逐之下，我逃进一条通往我父亲的空面包店的小胡同。那两个女劫匪终于追上我，开始剥我的裤子，这时恰好走廊里传来了我父亲脚步声。野鸟窝在空面包店里完蛋了，那几个非常好看的小鸟蛋就在那里摔碎了，与此同时，我们——劫匪和被劫的人——都屏息躲在柜台底下。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我家的天地里搜寻小物件和小生物，在围墙的木板上发现一个洞。从洞中看去，我看见和我家相同的一块地，但未经耕种，一片荒芜。我退后几步，隐约感到会出点什么事。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是一只和我同龄的男孩子的手。我一走上前去，手就不见了，换成一只很小的白羊。

这是一只用褪色的羊毛做的小绵羊。用来滑动的小滑轮已经脱落。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小绵羊。我回家去，带了一件礼物——一个我所珍爱的、

半张开的、有松脂香味的松塔——回来，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

我再也没有看见那只男孩子的手。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样的小绵羊，那只小绵羊在一场大火中不知去向。这些年来，甚至现在，我每次经过玩具店，都要偷眼看看玻璃橱窗。但是，看也枉然；像那样的一只小绵羊，是再也做不出来了。

艺术和雨

刚刚挣脱了寒冷、雨水和街上的泥泞——也就是美洲南部令人憎恶的和肃杀的冬天，黄色的炎夏便来到了这一带地区。环抱我们的是尚未开发的山峦，然而我很想了解大海。恰巧我热心的父亲从他铁路上为数众多的同事之一那里借到一所房屋。我那当司机的父亲在漆黑的夜间4点钟（我从来弄不明白，为什么总说是清晨4点钟），用他那只司机哨子把全家叫醒。从这一刻起，屋内顿时不安静起来，天还没有亮，我母亲、姐姐劳拉、哥哥鲁道夫和厨娘，在被四面八方钻进来的风吹得摇曳不定的小小蜡烛光焰下来去奔忙，把几个大床垫用麻布片卷成一大团，然后由几个妇女急急忙忙搬走。几张床也要装上火车。那几个床垫运往近旁的火车站时，还是热乎乎的。我生来身体虚弱，从睡梦中被惊醒，便感到恶心，浑身发冷。同时，屋里仍然忙作一团，没完没了。穷人为了度一个月的假期，什么东西都得带上；连罩在燃着火的火盆上的烘笼也要带，以便烘烤因天气不佳而始终潮湿的被褥和衣服，于是烘笼被挂上标签，装上等待运载行李的大车上去。

火车在那个寒冷的省份驶过从特木科到卡拉韦的一段路程；横越广袤的没有人烟的荒野，穿过原始森林，地震般隆隆驰过隧道和铁桥。火车站一个个孤零零地坐落在田野上，坐落在金合欢和繁花满枝的苹果树丛中。阿劳科印第安人身穿日常衣裳，面带固有的庄严神色，等在火车站上，向过往旅客兜售羊羔、母鸡、鸡蛋和编织品。我父亲买什么东西总要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每次在难以捉摸的阿劳科妇女跟前拿起一只鸡时，他的金黄色小山羊胡子十分引人注目，而那些阿劳科妇女对她们出售的货物，是半个子儿的价钱都不让的。

火车站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漂亮，差不多都取自流传下来的古代阿劳科遗物的名称。这里是西班牙征服者和最初的智利人——深深植根于那片土地的女儿们——进行过血战的地区。

拉夫兰萨是第一个车站，后面的两个车站是博罗阿和兰基尔料。这些名字带有野生植物的芳香，其音节的声音使我入迷。这些阿劳科的名字总是有某种令人喜爱的事物的含义——隐藏的蜂蜜，森林近旁的小湖或河流，以鸟为名的山峰。我们途经那个小小的因佩里亚尔村，诗人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这里险些被西班牙总督处决。在15和16世纪，这里设置过征服者的首府。阿劳科人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发明了“焦土”战术，把埃尔西利亚描绘得十分美丽壮观的城池夷为平地。

后来到达一座有河流流经的城市。火车响起欢快的汽笛声，田野上暮色四合，火车站上翻滚着大片的煤烟，钟声当当地响个不停，已能闻到在不远处入海的因佩里亚尔河的气息，这条静静的蓝色河流的河道是宽阔的。卸下了无数行李，这个小小的家庭整理就绪，便坐牛车去上汽船，汽船将沿因佩里亚尔河顺流而下；这一切都在我父亲的蓝色眼睛和铁路哨子的指挥下进

行。行李和我们都挤在把我们载往大海的小船上。船上没有客舱。我坐在靠近船头的地方。螺旋桨的桨叶推动河水的水流，小轮船的机器呼呼喘着粗气，还吱吱嘎嘎响个不停，沉默寡言的南方人分散在甲板上，活像一动不动的家具。

一架手风琴发出如怨如诉的哀叹，发出对爱情的召唤。对于一个 15 岁的少年来说，没有比在宽阔的陌生河流上航行，比在夹岸的青山之间驶向神秘的大海更能打动他的心灵的了。

下因佩里亚尔村只有一排红顶房子，背山面河，高高坐落在河岸上。从我们要去居住的房子那里，甚至更往前去，从停靠过那条小轮船的破旧码头那里，我听见远处大海的轰鸣声，这是一种遥远的震动。波涛涌进了我的生活。

那所房子是身材魁伟的农民堂奥拉西奥·帕切科的，在我们借用房子的一个月期间，他要开着他的牵引机和脱粒机，到山山岭岭和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去。他要用机器为远离沿海村落单独居住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收获小麦。他是个突然闯进我们这个铁路员工家庭的大汉，说话声音洪亮，浑身是尘土和麦秸。然后，他又吵吵嚷嚷地回到山岭上去干自己的活。对我来说，他就是南部地区艰苦生活的又一个实例。

在那所房子里，在那几条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在我周围那些陌生的存在里，在远处传来的大海的深沉涛声中，一切都使我感到神秘。那所房子有座花园，我觉得它又大又乱，当中有个被雨水淋坏的凉亭，亭子是白木料建造的，上面爬满了攀缘植物。除了我这个小人物，从来没有人走进这个阴森的荒凉地方，这里生长着常春藤、忍冬和我的诗。在那座奇特的花园里，确实还有一件令人着迷的东西，那就是一艘大船——一场大灾难留下的孤儿，躺在那没有浪涛也没有暴风雪的花园里，在虞美人花丛中搁了浅。

那座荒芜的花园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只有虞美人花，这也许是有意的布置，也许是无心造成的；所以，其他植物都远远离开了那块阴森的地方。这种花的花朵很大，白的像一只只鸽子，红的像星星点点殷红的鲜血，深紫的和黑的像一个个被人遗忘的寡妇。这么多的虞美人花，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决不会再见到。尽管我凝视这一大片花朵时满怀敬意（在各种花中，只有这些花朵引起一种迷信的敬畏），却不时掐下一朵来，它那被掐断的茎上流出发涩的白黏液，粘在我手上，还散发出一股令人难受的气味。后来，我把一片片华丽丝绸般的花瓣轻轻抚平，夹到书本里。在我看来，这些花瓣都是不会飞舞的大蝴蝶的翅膀。

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时，我不禁愕然。在维尔克和马乌莱两座大山之间，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海上不仅涌起高过我们好几米的雪白的巨浪，还有巨大的心脏的轰鸣——宇宙的搏动。

我们家在那里铺上桌布，摆好茶壶。我吃到嘴里的食物带着沙子，这种事我不太在乎。我害怕的是父亲每天要我们洗海水澡的那个恐怖时刻。除了重重巨浪，飞溅到我姐姐劳拉和我身上的海水，直如抽来的冰冷的鞭子。想到波涛的大手把我们拖到山峦般起伏的大海里去，我们就感到胆战心惊。到了牙齿捉对儿打架、周身冻得青紫、我姐姐和我手拉手准备去死的时候，铁路哨子响了，我父亲命令我们别再受罪了。

我要说说那个地区另外几件不可思议的事物。其一是佩尔什马 ；其二是三位使人着迷的妇人的家。

在那个破败的村落尽头，矗立着几幢大房子，可能是制革厂的厂房，是几个法国巴斯克人的产业。在智利南部，经营制革工业的几乎向来是这些巴斯克人。我确实不知道厂房里干的是什。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在傍晚的一定时刻，去观看一群高大的马怎样从大门出来，通过村子。

全是佩尔什马，是躯体高大的小马和母马。这些马匹身上的大片鬃毛，从高高的背脊上垂下来；腿很粗，也长着一丛毛，奔跑起来如同鸟的冠羽那样拂动。它们都很健壮，毛色有枣红的，有雪白的，有白、黑、棕混杂的。火山若能小跑和奔驰，大概也会像这些高大的马匹那样移动。它们走在尘土飞扬和满地石块的街上，造成地震般的撼动。它们发出沙哑的嘶鸣，引起地下的轰响，使静止的大气发生颤动。我终身没有再见到如此傲岸、魁伟、雕像般美丽的马匹了，只有在中国见到的除外，那是些同明陵的翁仲一样的石雕马匹。不过，这种石马使人肃然起敬，不可能造成那种叫人敬畏的活生生的动物所形成的那种场面，在我童稚的眼睛看来，这种动物仿佛从漆黑的梦境中跑出来，奔向另一个巨人的天地。

其实，那个蛮荒地区到处是马匹。智利骑手，德国骑手，马普切骑手，全都披着黑粗呢套头斗篷，在大街小巷中有的上马，有的下马。那些马匹有的很瘦，有的受到精心照料，有的没精打采，有的肌肉发达，都站在骑手们让它们呆的地方，反刍着一路上吃下的青草，从鼻孔里喷出热气。它们对主人和乡间的孤寂生活已经习惯。天色很晚了，它们才驮着粮袋或装满农具的口袋返回，走向树木茂密的高地，登上崎岖难行的道路，或是无休无止地在海边沙地上奔驰。从当铺或阴暗的小酒店里不时出来一个阿劳科骑手，艰难地骑上他那匹不动声色的马，然后走上山间的归途，一路上摇来晃去，醉得迷迷糊糊。看到那个人上路，而且一路走下去，我觉得他像是个酒精中毒的半人半马怪，身子倾斜得几将坠马落地；但每次都是我弄错了，他总是能够直起身子，然后倾斜着再次折向另一边，而且始终能恢复原状，紧紧粘在马鞍上。他就这样继续在马上一公里一公里地骑下去，直到像一只晃动的、不知为什么不受损害的动物那样，融入荒野的大自然中。

许多个夏季，我们带着一整套家庭礼仪重又回到那迷人的地方。在特木科严寒的冬日和海岸边神秘的夏季之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长大，不停地读书写作，而且萌生了爱情。

我已经习惯于骑马。走过陡峭的黏土路，走过意外的曲折道路，我的生活变得更高远、更宽阔了。我出去寻觅杂乱茂密的树木花草，寻觅幽静或大森林中禽鸟的啼啭，寻觅会开花的树木上突然的繁花怒放，这时树木像群山上一位魁伟的大主教，身穿一件猩红法衣，或是由于不知名的各种花朵发生争斗而披上银装。我还不时意外遇到野生的、桀骜不驯的喇叭藤花，犹如一滴鲜血从茂密的灌木丛上垂下。我已经习惯了马匹、马鞍、坚固而复杂的农具、在鞋后跟叮叮作响的残酷的马刺。在没有尽头的海滩上，或在树木杂生的茂密的山峦上，我在自己的心灵中，也就是在诗意和那片世上最孤寂的土地之间，开始了交流。此后过了许多年，那种交流、显示以及与空间的默契，依然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我写的第一首诗

现在，我要向诸位说一个关于鸟的故事。布迪湖上，有人用很残暴的方

法捕捉天鹅；他们坐小舟悄悄接近天鹅，然后拼命加快划桨……天鹅跟信天翁一样，起飞很困难，必须在水面滑行着奔跑，再展开大翅膀艰难地起飞。捕猎人追上天鹅，用棍棒予以活活击毙。

有人带给我一只半死的天鹅。这是一只美丽绝伦的鸟，一只黑颈天鹅，这么美的鸟我在世上再也没有见到。这是一只雪白的小船，它那细长的脖子像是套在一只很紧的丝袜里。它的嘴是橙黄的，眼睛是红的。

这件事发生在靠近大海的地方，在南方因佩里亚尔的萨阿韦德拉港。

他们把垂死的天鹅送给我。我为它洗涤了伤口，拿些小面包块和鱼填进它的喉咙。它把一切都吐出来。不过，它的创伤倒愈合了，开始明白我是它的朋友；我也开始知道，乡愁在折磨它。于是，我抱着这只沉重的鸟走过大街小巷，把它带到河边。它在我身旁游了一会儿。我要它去捉鱼，给它指点河底的小石子，指点沙砾，南方闪着银光的鱼时时从上面滑行而过。但是，它那忧伤的眼睛却望着远方。

这样又过了 20 天，我每天都带它到河边，然后再带它回家。这只天鹅大小同我差不多。一天傍晚，它更加沉入了遐想，就在我身边游，对于我指点它去捕捉的小动物，丝毫不感兴趣。它十分安静，我又抱起它带回家去。那时，当我把它抱到胸前时，我觉得有一个带子似的东西舒展开来，像只黑手臂那样擦过我的脸。这是它那细长柔软的脖子耷拉下来。我于是知道了，天鹅死去时是不唱歌的。

考廷的夏天酷热难当；天空和麦田都烤焦了。大地想从昏睡中苏醒过来。各家各户的房屋既不适宜度夏，也不适宜过冬。我到田野上去，不停地往前走。我在涅洛尔山上迷路了。我独自一人，口袋里装满金龟子；我带的一个盒子里装有新捉到的一只毛烘烘的蜘蛛。上面看不见天空。大森林永远是潮湿的，我滑了一交；一只鸟儿突然叫起来，那是丘考鸟幽魂般的叫声。一个令人惊怖的警告，从我脚下延伸开来。血滴般星星点点的喇叭藤花，勉强才能辨认出来。在高大的蕨类植物下面，我只是个矮注的人。一只野鸽从我嘴边飞过，翅膀发出干涩的声响。在更高的地方，另一些鸟发出沙哑的笑声嘲讽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路，但天色已晚。

我父亲尚未到家。他要凌晨三四点才能到。我上楼到自己房间，去阅读萨尔加里的作品。大雨如注，黑夜和大雨顷刻间就把整个世界笼罩住了。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在自己的算术本上写诗。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那时李子还是青的，我登上山冈，带去一小包盐。我爬上一棵李树，舒舒服服地呆在树上，小心地咬下一小块李子，然后蘸盐吃下去。就这样我吃了上百颗李子。我知道，我吃得太多了。

由于我们原有的房子已被大火焚毁，这幢新房子显得很神秘。我攀上围墙，朝邻居望去，一个人也没有。我举起几根棍子。除了几只可怜的小蜘蛛，什么也没有。在那里的背静处有个厕所；厕所旁的几棵树上有毛虫。杏树显示它们满是白茸毛的果实。我知道怎样用手帕逮大黄蜂，又不至于弄伤它们。我逮住大黄蜂，过一会儿就把它放到耳边；那嗡嗡声多好听哟！

在这辽阔而可怖的边境地区，一个身穿黑衣的不起眼的幼年诗人感到何等孤独。人生和书籍逐渐使我看到了难以忍受的奥秘。

我忘不了前一天夜间读过的故事：在遥远的马来亚，面包果拯救了桑多坎和他的伙伴们。

我不喜欢布法洛·比尔，因为他杀害印第安人。但是，他是个多么出色

的骑马牧人！大草原和锥形红皮帐篷何等美丽！

人们多次问我，我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写诗的灵感又是产生于何时。

我要尽力回想。很早以前，在我幼年时期，我几乎还没有学会书写，有一次我感到激动万分，便胡乱写了几行半押韵的词句，但是我觉得这些词句很奇怪，跟日常说的话不一样。我把这些词句誊抄在一张纸上，不由得忧心忡忡，这是直到那时我还不明所以的一种情绪，是一种痛苦和悲哀。那是一首献给我母亲的诗，就是说，我是这样认识我那天使般的继母的：我的童年全在她温馨的庇护下度过。我毫无能力评判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便拿去给父母看。他们都在饭厅里，正在全神贯注地低声交谈，这种谈话比一条河更无情地把小孩和大人的世界分隔开来。我把那张有横格的纸递给他们，浑身仍然因为第一次灵感的来临而颤抖。我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一边漫不经心地还给我，一边说：

“这是哪儿抄来的？”

说完继续低声同我母亲谈他们的重要往事去了。

我似乎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且就是这样第一次受到漫不经心地表达出来的文学评论。

与此同时，我像个孤独的航行者，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杂乱的书籍河流上前进。我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埋头阅读。在那个海滨地带，在那个小小的萨阿韦德拉港，我找到一个市立图书馆，还遇到一位老诗人堂奥古斯托·温特，他对我如饥似渴的文学爱好感到惊奇。“这几本书你都读过了？”他一边问，一边递给我一本新的巴尔加斯·比拉的作品，一本易卜生的作品和一本关于罗康博尔的作品。我像只鸵鸟，一视同仁地把这几本书一口吞下去。

那时，一位身材颇长的夫人来到特本科，她身穿很长的衣服，脚上是一双低跟鞋。她是女子中学的校长，来自我们的南方城市，来自白雪皑皑的麦哲伦地区。她名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我看着她身穿长及脚跟的外衣，从我们村子的街道上走过，对她有点儿畏惧。不过，等到有人带我去见她时，我才发现她是个很和气的妻子。在她黝黑的脸上，那印第安人的血统同美丽的阿劳科陶罐一样明显，她爽朗地开怀大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我那时太年轻，又太胆小，太喜欢冥想，不可能成为她的朋友。我见到她的次数很少，但每次她都拿出几本书送我，这就够了。她送的书总是几本俄国小说，她认为这是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作品。我可以断言，是加夫列拉给我灌输了对俄国小说的那种既严肃又强烈的看法，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从此，他们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

三位寡妇的家

有一次，有人请我去参加用母马脱粒的活儿。我去的地方很高，在山上，且离村子很远。我喜欢冒险独自行走，在山地找路。我想我若是迷路了，一定有人会帮助我。我骑马离开下因佩里亚尔村，和马儿一起亲密地渡过河口的沙洲。在那里，太平洋上波和灌木丛，然后我取道布迪湖湖畔。浪涛猛击着那座山的山麓。我必须利用一股波浪砸碎后退下去养精蓄锐的间隙；于是我们在又一股波浪向正在朝崎岖的山奔跑的我和我的坐骑压来之前，急急穿

过山水之间的一段距离。

走过这一段险路，向西便是布迪湖一平如镜的湛蓝湖面。海岸边的沙地连绵不断，一直伸展到距那里极远处的托尔滕湖口。智利的这一带海岸往往布满礁石和岩石，但转眼间就变成没有尽头的沙带，在这条沙带上和大海的浪花旁，你可以走上几天几夜。

海滩仿佛没有边际。它在智利的边缘形成一个行星光环般的圈，形成一个受南方大海的轰鸣紧紧追逼的环：它是蜿蜒在智利海岸一直通往南极的一条跑道。

靠森林的一侧，一棵枝叶呈暗绿色并闪闪发亮的榛树在向我致意，有的枝头挂满了一串串果实；在一年里的这个季节，榛子红得像是用硃砂画成一般。智利南方巨大的蕨类植物长得很高，从它下面走过，我和我的坐骑都碰不到它们的枝叶。我的头一旦蹭上它们的叶片，一阵露珠就会当头淋下来。在我右侧伸展着布迪湖，那是一片与远方的森林相连的、水波不兴的湛蓝水面。

最后我才看到几个人。那是些外地来的渔夫。在那个地段，大海和湖泊有的地方连在一起，有的地方互相吻合，有的地方又像在互相袭击，由于强劲的海水的推动，一些海鱼被推到海水和湖水交会的地方。尤其令人馋涎欲滴的是大花鳅——很宽的闪着银光的鱼，在那片水洼里胡乱挣扎。一个，两个，四个，五个渔夫，有的直挺挺地站着，有的在沉思默想，都在寻找不知去向的鱼儿的踪迹，突然用一把很长的三齿鱼叉猛击水中。然后，他们把鱼叉举起来，鱼叉顶端是垂死的椭圆形的银白色肉体，在阳光下颤抖并闪闪发光，随即把鱼放入鱼篓。天色渐渐向晚。我已经离开湖边，正在山上起伏的山坡间寻觅道路。天慢慢暗下来。突然，一只不知名的野鸟有如一声低沉的悲泣飞掠而过。一只老鹰或秃鹰在暮色四合的天空中似乎停住它的黑色翅膀，为了指明我的存在，跟着我慢慢飞翔。神秘的森林中奔跑如飞的红尾狐或不知名的猛兽在嚎叫，在穿越大路。

我明白自己迷路了。夜晚和森林本来都是我所喜爱的，现在却威胁着我，我心中无比恐惧。仅有一位单独的行人，在越来越黑暗的孤寂路途上忽然同我相遇了。我们彼此走近时，我停步一看，只见是个十分粗犷的农民，身穿粗劣的套头斗篷，骑一匹瘦马，时不时便一言不发。

我对他说了自己的遭遇。

他对我说，当晚我大概是走不到打谷场了。当地每个角落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打谷场的准确位置。我对他说，我不想在这露天地里过夜；我求他给我指点一个去处，使我能够挨到天明。他审慎地要我从大路拐上一条小岔道，再走两西班牙里。他说：“从远处你就能看到一幢两层楼大木屋的灯光。”

“是旅店吗？”我问。

“不是，小伙子。不过，她们会好好招待你的。她们是三位法国夫人，女木材商，在这里住了30年了。她们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她们准会接待你。”

我谢过这位农民所给的审慎指点，他便让他那匹筋疲力尽的瘦马奔跑而去。我像个游魂，继续在小径上赶路。一钩弯弯的新月，白得像一片刚刚剪下的指甲，开始从天际冉冉升起。

大约夜里9点钟，我远远望见从一幢房子里透出的明晰的灯光。在那座神奇圣堂的大门口，在阻拦我的栅门关闭之前我催马前进。我通过了作为地产权界限的栅栏，绕开锯断的树干和一堆堆锯末，来到极不寻常地湮没在孤独

中的那幢房子的白色门廊。我敲了敲门，起初敲得很轻，后来敲得响些。过了几分钟，我很担心，以为房子里没有人；可就在这时，出来一位白发苍苍的夫人，人很瘦，身上穿着孝服。她很严肃地审视我一番，然后把门打开一道缝，向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旅行者提出问题。

“您是谁？您想要什么？”她问，声音像幽灵那样轻。

“我在森林里迷路了。我是学生。我是应邀到埃尔南德斯家的打谷场去的。我走得累极了。有人告诉我，您和您的姐妹都是好人。我只希望在随便什么角落里睡上一觉，天一亮就继续赶路，到埃尔南德斯家去收庄稼。”

“请进来。”她对我说。“您到自己家了。”

她带我走进一间涂黑的客厅，亲自点亮两三盏石蜡灯。我看山那是三盏很美的“新艺术”式的灯，是用蛋白石和镀金的青铜造的。客厅里有一股潮气。红色的大窗帘遮住高高的窗子。扶手椅都罩着白护罩。防备什么呢？

那是个上一世纪的客厅，像梦境一样难以确定，令人心绪不宁。那位思乡心切的白发夫人身穿孝服，走动时我看不见他的脚，听不见她的足音，她的手在寂静中到处触及相册、扇子等一件又一件东西。

我觉得我像是掉进了湖底，在湖底深处做梦似地幸存下来，感到非常疲倦。忽然进来两位夫人，同接待我的那位夫人长得十分相像。时间已经很晚了，天气又很冷。她们坐在我周围，一位面带早年曾有过的那种妩媚的微笑，另一位用神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同为我开门的那位夫人的眼神一模一样。

交谈的内容突然远远离开了那一带遥远的田野，也远远离开了被千万只小虫的叫声、蛙鸣和夜鸟的啼声搅得人心烦意乱的夜晚。她们详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忽然提到波德莱尔，告诉她们我已开始翻译他的诗。

这件事像一朵电火花，使那三位了无生气的夫人振作起来。她们满含痛苦的眼睛和板着的面孔突然变样了，好像从她们脸上揭下了三个画着她们苍老面容的面具。

“波德莱尔！”她们大声说道。“自从有了这个世界，这块荒山僻壤里也许是头一遭提到这个名字。我们这儿有他的《恶之花》。在方圆 500 公里之内，他的精美作品只有我们能读。这一带山区，没人懂法语。”

三姐妹中有两个生于法国的阿维尼翁。最小的一个虽然也是法国血统，却出生于智利。她们的祖父母，她们的双亲，她们的所有亲属，很久以前都已亡故。她们三人早已习惯了这里的雨水，这里的风，这里锯木厂的锯末，习惯了接触这里为数极少的原始的农民和粗鲁的仆役。她们拿定主意留在那儿，留在那树木参天的山上仅有一幢房子里。

进来一个土著仆人，在最老的那位夫人耳旁低声说了点什么。于是我们离开客厅，穿过冷飕飕的走廊，来到饭厅。我感到惊讶，饭厅中央摆着一张铺有长方形白桌布的圆桌，桌上有两个插满蜡烛的多支银烛台，烛光明亮。在这张令人意外的圆桌上，银的和玻璃的餐具交相辉映。

我心中忽然感到十分胆怯，仿佛我是被维多利亚女王请到宫中进餐。我到这里时头发散乱，疲惫不堪，而且浑身尘土，而那桌饭菜似乎正在迎候一位王子。我远非一位王子，在她们看来，倒不如说是个刚把羊群丢在门口的、满身臭汗的赶牲口的人。

我以前很少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我的女主人都是烹饪大师，而且从她们祖父母那里得到法式甜食配方的真传。每一道菜都出人意外，且味香俱佳，从酒窖取来她们按法国酿酒标准贮藏的陈酒。

尽管倦意使我突然闭上眼睛，我仍在聆听她们谈论一些有趣的事。三姐妹最感骄傲的是精工细作的菜肴；这席面就是她们所致力神圣遗产，是她们所致力跨越时间和汪洋大海而远离祖国、再也不会复归的一种文化。她们自嘲似地拿出一个卡片箱给我看。

“我们是有怪癖的老太婆。”最小的那位夫人对我说。

过去30年间，到这幢偏远的房子来做客的27位旅行者，有的是为了做生意，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同我一样是事出偶然。她们保存着跟每位旅行者有关的卡片，上面记载来访的日期，以及她们每次烹炒调制的菜单，这倒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事。

“我们把菜单留下，是为了如果那些朋友有朝一日再来，不让有一道菜是重复的。”

我去睡觉，躺在一张像市场上装葱头的口袋似的床上。黎明时分，我摸黑点亮一支蜡烛，洗漱完毕，穿上衣服。一个仆人替我鞍好马的时候，天已透亮了。我不敢去向那三位和气的、穿孝服的夫人辞行。我心中暗想，这一切像是一场奇幻、迷人的梦，为了不破坏这迷人的梦境，我真不该醒来。

这件事发生在我少年时代的初期，算来已有45年了。那三位带着《恶之花》背井离乡的夫人在原始森林深处是如何度日的呢？她们那些瓶装的陈酿，她们那张用20支蜡烛照得通亮的餐桌都怎么样了？隐没在树林里的那些锯木工和那幢白房子的命运如何呢？

最简单的结果莫过于：死亡和遗忘。大森林也许早就吞噬了那些生命和在那难忘的夜晚接待过我的那几间大厅。不过，他们仍然活在我的记忆里，有加活在梦之湖的清澈湖底。这三位优郁的妇人是可敬的，她们在荒野的孤寂中，不为任何实际利益而竭力保持古老的尊严。她们捍卫的是她们的祖先亲手创造的东西，也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世界上最难通行、最荒凉的崇山峻岭的遥远边界上仅存的一点儿高雅文化。

麦堆里的爱情

我在午前到达埃尔南德斯的场院，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我曾在空寂无人的路上独自骑行，又得到一夜的酣睡，这一切使我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给小麦、燕麦、大麦脱粒，甚至用马来干。看着母马在骑手的催促的吆喝声中，围着谷堆转圈小跑，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阳光灿烂，空气像未经琢磨的金刚石，使群山发出光亮。打谷季节是金色的节日。黄色的麦秸堆成一堆堆金灿灿的小山；人人都在忙碌，到处是嘈杂声。袋子源源不断地被送去灌满麦粒；女人们在做饭；马匹在奔跑；狗在吠；孩子们像是麦秸长出的果实，随时都要人把他们从马蹄下救出来。

埃尔南德斯一家是个很奇特的家族。男人们蓬头散发不加梳理，胡子也不刮，只穿衬衫，腰上别着左轮手枪，几乎总是满身油迹、谷物灰尘、污泥，或者被雨水淋得透湿。父亲、儿子、侄儿、表兄弟，都是同一副模样。他们在发动机底下和停放脱粒机的屋顶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从不交谈。他们除吵架之外，谈什么都开玩笑。他们吵起架来简直像龙卷风，把面前的东西全部摧毁。他们也总是最先到野地去烤牛肉，去喝红葡萄酒，去弹奏如泣如诉的吉他。他们是边疆居民，我喜欢这种人。我学生腔十足，面色苍白，

同这些勤快的粗野家伙在一起，感到自己太渺小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对我很客气，一般他们对谁都不这样。

吃完烤牛肉，弹过吉他，白天的日晒和脱粒劳动累得我们昏昏沉沉，我们都得自己想办法过夜。在用新开的木板搭的棚屋内，已婚夫妇和单身女子各自在地上安顿下来。至于我们这些男子汉，都让睡在打谷场上。打谷场里麦秸堆积如山，柔软的金黄色麦秸堆可以让一整村的人都钻进去。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不知道怎样使自己舒展开身子。我把鞋子很仔细地放在一层麦秸底下，拿它当枕头。我脱掉衣服，裹上套头斗篷，钻进了麦秸堆。我跟所有的人都离得很远，他们很快就一起鼾声大作。

我仰面躺了很久，睁着眼睛，脸上和手臂上都盖着麦秸。这天夜晚是晴朗的，天气寒冷，而且冷得刺骨。没有月亮，但星星却像刚被雨水淋过似的晶莹，高挂在所有的其他人看不见的梦境之上，在天空的怀里单单对我眨眼睛。后来我睡着了。我忽然醒来，因为有个东西正在接近我，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在麦秸底下移动，向我靠拢。我很害怕。这个东西慢慢靠近。我听见了麦秸细碎的断裂声，这是被那种往前移动时谁也说不出的方式弄断麦秸所发出的响声。我全身都警觉起来，等待着。我也许应该起来，也许应该喊叫，但我一动不动地呆着。我听见耳旁有呼吸声。

突然向我伸过来一只手，一只劳动的大手，不过，是只女人的手。这只手温柔地抚摸我的额头、眼睛和整个脸。随后一张贪婪的嘴贴到我的嘴上，我还感到一个女人的身体从头到脚紧紧贴在我身上。

我的恐惧渐渐变成了强烈的乐趣。我用手抚摸梳成辫子的头发，光滑的额头，紧闭的眼睛，那眼睑柔软得像虞美人花瓣。我的手继续摸索，摸到大而坚挺的乳房，摸到宽而圆润的臀部，摸到夹着我的两条腿，手指还探到像长着山间苔藓似的阴部。那位不知名的女子一声不吭。

在一个钻着七八个人的麦秸堆里，要不出一点声响地做爱是何等困难，尽管无论怎样也不能把那几个睡熟的人弄醒。但是，我们确实干了一切可以干的事，但干得极端小心。过了一会儿，那个陌生女子忽然在我身旁睡着了，那种局面使我感到焦躁不安，不免害怕起来。我想，天马上就亮了，最早来上工的人会发现，打谷场里有个女子光着身子躺在我旁边。但是，我也睡着了。醒来时我慌忙伸手，只摸到一个有点儿热气——一个离去的女子身上的热气——的凹坑，不久，一只鸟儿唱了起来，随即整个森林里到处是啼啭声。马达响起一阵轰鸣，男人们和女人们开始在打谷场周围走动，干起活来。新的一个打谷日子开始了。

中午，我们聚集在几块长木板周围吃午饭。我一边吃，一边偷眼在女人中寻找，看看哪个可能是夜间的来访者。但是，有的太老，有的又太瘦，很多都是沙丁鱼般瘦小的小姑娘。我要找的是个结实的女子，胸部丰满，辫子长长的。突然进来一个女人，带来一块烤肉给她丈夫——一个埃尔南德斯家的人。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女子。我从桌子的一头盯着她看，这时我认为我看到那个梳着大辫子的漂亮女人向我瞟了一眼，还对我不露痕迹地微微一笑。可我觉得，她笑得比实际更爽朗，更深长，使我感到浑身舒畅。

二、浪迹城市

膳宿公寓

中学每年总是在 12 月过数学考试关，上了好几年中学之后，我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我之所以说“表面上”，是因为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书籍、梦想和诗，这些东西蜜蜂似地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骨瘦如柴，带一个铁皮箱子，穿一身必不可少的黑色诗人服，踏进夜车的三等车厢。这列夜车要运行漫长的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圣地亚哥。

这列长长的火车穿过气候各异的许多地区；尽管我乘坐过多次这班夜车，它对我始终有一种异样的魅力。身披湿漉漉的套头斗篷、带着装满鸡的篮子的农民，沉默寡言的阿劳科人，这就是三等车厢里展现的全幅生活图景。座位底下藏着许多无票乘客。查票员一出现，车厢内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消失了，有的人藏到套头斗篷底下，两位旅客马上在斗篷上假装打牌，使查票员不注意这张临时搭成的桌子。

这时，列车正从布满栎树、南美杉和湿淋淋的木屋的原野，向智利中部的杨树林和落满尘埃的砖砌建筑物飞驰而去。我在首都和外省之间往返旅行过多次，每次离开大森林，离开那母亲般召唤我的林地，我都感到窒息。那些砖房，那些经历丰富的城镇，我觉得仿佛张满了蛛网，一片沉寂。从我那时浪迹城市直到现在，我依然是个生长于恶劣气候和寒林的诗人。

我被人介绍到马鲁里街 513 号的膳宿公寓。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这个门牌号码。所有的日期，甚至年份，我都会忘记，唯独 513 这个数字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长久以来，我生怕永远到不了这样的膳宿公寓，生怕不能浪迹在人海茫茫的陌生首都。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我每天坐在阳台上凝望暮色渐渐暗淡下去，凝望飘扬在空中的绿色和猩红的旗帜，凝望市郊几乎要被火红的彩霞焚毁的破败的屋顶。

我在大学生膳宿公寓居住的那几年，过的完全是忍饥挨饿的生活。当时我写得远比以前多，但我的饮食却少得多。那些日子我认识的某些诗人，因为穷，严格限制饮食，从而送了命。我记得其中一个与我同龄的诗人，身材比我高，举止也比我笨拙，他写的精巧的抒情诗洋溢着激情的芬芳，弥漫在听到他的诗的一切地方。他叫罗米欧·穆尔加。

我同这位罗米欧·穆尔加一起，到首都附近的圣贝尔纳多镇去朗诵我们写的诗。在我们登台之前，一切都已处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赏花赛诗会上身穿白衣的金发女王和她的宫女们已经登台，镇上名流已经讲过话，当地稍有名气的乐队正在演奏；可是，等到我上场用世上最哀怨的声调朗诵起自己的诗篇时，一切都变了。群众发出咳嗽声，大声打趣，对我那首忧愁的诗，丝毫不加理会。我一见这帮粗野的家伙作出这样的反应，就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朗诵，把位置让给我的伙伴罗米欧·穆尔加。此情此景是难忘的。那位身高两米、穿着破旧的黑衣的堂吉诃德，用比我更哀怨的声调开始朗诵，全体听众一见这种情况，再也按捺不住他们的愤怒，便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诗人，滚吧！别来破坏这个欢乐的节日。”

我像软体动物从甲壳里出来那样，离开了马鲁里街的那幢膳宿公寓。我辞别了那个甲壳去认识大海，也就是去认识大千世界。那陌生的大海就是圣

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当我还往返于古老的大学校园和家庭膳宿公寓内住户寥寥无几的房间之间时，这些大街小巷我几乎去也没有去过。

我深知，在这场冒险中，往后我的饥饿会更加严重。膳宿公寓中与我略有点儿乡谊的女士们，有时会发善心帮助我几颗土豆和葱头。但是，我别无办法，因为生活、爱情、荣誉感、解放的要求都在向我发出召唤。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我在教育学院附近的阿圭列斯街，租到了第一个单独的房间。在这条阴沉的街上，有个窗口挂出一张告白：“住房出租”。前面的房间由房东居住，他是个白发苍苍的男人，仪表庄重，生就一双我觉得很怪的眼睛。他爱说话，而且很有口才。他以妇女理发师的职业为生，但他对这个职业并不看重。据他对我说，他更关心的是看不见的世界——阴间。

我从特木科带来的手提箱和大箱子里取出书本和有限的几件衣服，然后躺在床上看书、睡觉，为自己的独立和懒散而感到骄傲。

这所房子没有院子，但有一条走廊，走廊里有许多关着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在观察这所住户很少的房子的各个角落时，发现各处墙上，甚至在厕所里，贴有写着大同小异内容的字条：“你忍着吧！你不可能跟我们联络。你已经去世了。”每个房间、饭厅、走廊和起居室，到处都贴着这一类令人不安的告示。

那是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严寒的冬天。西班牙的殖民活动，给我的祖国留下了不舒适和轻视大自然严酷性的遗产（50年后，当我谈到这一点时，伊利亚·爱伦堡对我说，他从未经受过像智利这样的寒冷，而他却是来自莫斯科冰雪覆盖的大街）。那个冬天遍地是蓝幽幽的冰晶。树木在严寒中瑟瑟发抖。拉着旧马车的马儿，从鼻子里喷出大团大团的水汽。在那所房子里对阴间的不祥提示之间生活，可以说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房东——给妇女做头发的理发师和神秘主义者——用他那双疯狂的眼睛深不可测地盯着我，平静地对我解释道：

“我的妻子查里托4个月前过世了。对死去的人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还会常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看不见。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冷淡他们，让他们不要难过。所以，我给查里托贴了那些条子，使她很容易明白，她现在已经亡故了。”

不过，这位白发苍苍的人倒使我相信，他活得太好了。他开始注意我的出入，限制我的女友来访，偷看我的书籍和信件。每当我合时宜地走进我的房间时，总会遇见这位神秘主义者在检查我寥寥无几的动产，在翻我很少的几件东西。

在严寒的冬日，我还得辛辛苦苦地到充满故意的大街小巷，去寻觅可以收留我那受威胁的独立性的新住所。我在不远处的一家洗衣店里找到了这样的住所。一眼便可看出，这里的女房东与外界毫不来往。寒意逼人的院子里有一口密布绿苔的喷水池，池水凝然不动，过了这口喷水池，便是无人照管的花园。住所后面有个房间，天花板很高，窗子开在高高的房门过梁上方，这几个窗子在屋顶和地面之间为我的双眼开阔了视野。我于是在这幢房子和这个房间里住了下来。

我们这些学生诗人过的是一种古怪的生活，我保持着外省习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每天写几首时兴的诗，还要一杯接一杯地喝自己泡的茶。不过，在我的房间和我居住的那条街之外，当时作家们所描述的乱纷纷的生活，

自有其特殊的魅力。这群作家不常到咖啡馆，而常到啤酒店和小酒馆去。他们在这些地方谈天说地，还朗诵诗歌，直到清晨。我的学习因而受到了影响。

铁路公司发给我父亲一件灰色粗呢斗篷，供他在天气不好时出勤穿用，但他从来不穿。我穿着从事诗歌创作。有三四位诗人也穿起跟我差不多的二手货呢斗篷。这种服装引起正人君子们的愤怒，其中有些人并不正派。那是探戈舞传入智利的时期，随之而来的不权是它的节拍和它那剪刀铰动似的嚓嚓声，它的手风琴伴奏和节奏，还有侵扰夜生活和我们聚会的那些隐蔽角落的一伙流氓。这类爱跳舞又好寻衅闹事的歹徒，总是找碴反对我们的斗篷和我们的存在。我们这些诗人坚决进行了斗争。

在这段日子里，我意外地得到一位难以忘怀的寡妇的友情，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隐约反映出她对新近亡故的丈夫充满柔情的回忆。她的丈夫是青年小说家，其英俊的仪表颇受称道。他们俩是令人难忘的一对，她的秀发是金色的，身段优美绝伦，眼睛深蓝，身材颀长，身体健美。小说家是被那种叫做“奔马癆”的结核病摧毁的。后来我想到，这位金发伴侣也起了“奔马癆死神”的作用，当时青霉素尚未发现，这位金发伴侣又热情奔放，因而仅仅三两个月就使她那魁伟的丈夫离开了人世。

这位美貌的寡妇还没有为我脱过她那身黑、紫两色丝绸做的暗色衣服，这身衣服把她弄得像是裹在哀伤外壳中的冰果子。这层外壳是一天下午在洗衣店后部我的房间里不知不觉地脱掉的，我得以抚摸并观赏了整个火热的冰果子。当本能的冲动即将达到顶点时，我看到她闭着眼睛在我下面叹息着（也许是吸泣着）喊道：“啊，罗伯托，罗伯托！”（我觉得，这简直是一种礼拜仪式。这个贞洁的女人在举行新典礼之前，正在祈求那位业已消逝的神明。）

可是，尽管我处于情欲旺盛的青春年华，这位寡妇都使我吃不消。她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和她那火热的心，渐渐使我的元气过早受到损伤。这么大剂量的爱情，与营养缺乏是不相适应的，何况我的营养缺乏又变得日益加剧。

胆 怯

在我一生的最初阶段，也许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确实度过相当长的一段聋哑人般的生活。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像上一世纪的真正诗人那样惯常穿一身黑衣服，还模模糊糊觉得自己的相貌相当不错。但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姑娘们面前就会说话结巴或者脸红，不但不去接近她们，反而遇到她们便侧身而过，还要显出毫无兴趣的样子，其实心中满不是那么回事。对我来说，她们是一种巨大的奥秘。我情愿在这神秘的火堆里烧死，在这深不可测的井里淹死，却不敢扑向这样的水和火。由于碰不到能推我一把的人，我就在令人着迷的岸边徘徊，目不旁视，脸上更是毫无笑意。

对于那些成年人 对于那些小人物——铁路和邮局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小资产阶级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被“老婆”这个词吓坏了），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我在父亲的饭桌前听大人们聊天，第二天如果在街上遇见头天晚上在我家吃饭的那几个人，我可不敢招呼他们，为了避过难堪的时刻，我甚至走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去。

胆怯是一种心灵的怪毛病，是一个特殊的范畴，是展现孤独的一个方面。

它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仿佛有两层表皮，第二层的内皮在生活面前易受刺激而收缩。在人的各种结构中，这一素质（也可以说是这种毛病）毕竟是为人的不朽性奠定基础的熔铸体的一部分。

我在多雨地区形成的迟钝，我的长时间沉思默想的习惯，比所需的时间持续了更长久。我来到首都以后，慢慢地结识了许多男女朋友。在别人不太注意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更容易交朋友。当时，我对人类并不特别好奇。我曾心想，我不可能认识世上所有的人。尽管如此，在一定的环境里，竟有人对我这个 16 岁多一点的新诗人，这个来时无招呼、去时无送别的不能尽情吐露胸臆的孤独少年，产生了些许好奇心。况且，我身披的长长的西班牙斗篷，使我像个稻草人。谁也没有想到，我这身扎眼的服装竟是直接产生于我的贫穷。

在人海中，我找到了当时两位了不起的追求时髦的人——皮洛·亚涅斯及其妻子米纳。他们简直是过美好、闲适生活的完美典范；我很喜欢过这种生活，然而觉得比梦境更遥远。我第一次走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房子，这里有平静的灯光，有舒适的坐椅；四壁摆满了书籍，书脊五彩缤纷，犹如可望而不可即的春天。亚涅斯夫妇邀请我许多次，态度既文雅又谨慎，毫不理会我那沉默和孤独的各种表面伪装。我很喜欢他们的房子，他们看出来了，接着又来邀请我。

我在这幢房子里第一次看到立体画，其中有一幅是胡安·格里斯的作品。他们告诉我，胡安·格里斯曾是他们在巴黎的家人的朋友。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我这位朋友身上穿的睡衣。一有机会我就偷眼看它，心中惊叹不已。当时是冬天，那是一套厚呢睡衣，料子像台面呢，颜色却是深蓝的。那时候，除了囚服似的条纹睡衣外，我想不到会有其他花色的睡衣。皮洛·亚涅斯的这件就打破了一切框框。它的厚呢料子和鲜亮的蓝色，激起了一位住在圣地亚哥郊区的穷诗人的妒忌。说实话，50 年来我再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睡衣。

我与亚涅斯夫妇多年失去联系。为了一名到圣地亚哥演出的俄国马戏班的杂技演员，米纳离开了丈夫，也抛弃了柔和的灯光和美妙的扶手椅。后来，从澳大利亚到英伦三岛，她为了能与那个使她着迷的杂技演员在一起，干起了售卖入场券的工作。最后，她在法国南部一个神秘的营地，成为罗莎·克鲁斯会的会员。

至于那位丈夫——皮洛·亚涅斯，改名胡安·埃马尔，随着光阴的流逝，慢慢变成一位出色而鲜为人知的作家。我们终生都是好朋友。他沉默寡言，风度文雅，但是贫困潦倒，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写的好几本书尚未出版，但这些书肯定终将生根发芽。

我即将结束有关皮洛·亚涅斯或胡安·埃马尔（而且又要谈到我的胆怯）的时候，想起在我上大学时期，我的朋友皮洛坚持要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我说：“准保他会让你到欧洲去旅行。”当时，拉丁美洲的诗人和画家都把眼睛死死盯着巴黎。皮洛的父亲是个要人，是个议员。他住在练兵场和总统府附近的一幢又大又难看的房子里，毫无疑问，他很喜欢住在这种地方。

我的朋友们为了使我的形象更正常些，把我的斗篷剥掉，然后他们留在前厅，为我打开议员客厅的门，在我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客厅很宽敞，也许从前曾经做过大接待厅，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在客厅深处——那个房间的尽头，在一盏落地灯下面，我隐约看到一把扶手椅，议员就坐在椅上。

他正在看着打开的报纸，报纸像个屏风似地把他整个挡住了。

我一踏上那磨得很光而且不怀好意地涂了蜡的镶木地板，就像滑雪者那样滑开去。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极力要使自己停下，却只能弄得身子摇摇晃晃，还摔倒了几次。我最后一交就摔在议员的脚跟前，这时他正用冷峻的眼睛瞧着我，手里仍捏着那份报纸。

我终于坐上了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这位大人物用疲倦的昆虫学家那样的目光审视我，就像在审视别人常给他的一件标本——他不假思索就认得的一种无害的蜘蛛。他不着边际地问到我的打算。我在摔倒之后显得更加腼腆，而且比往常更加木讷了。

我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过了 20 分钟，我伸出一只小孩子般的手向他道别。我相信，我听到他用非常柔和的声音答应我，他要跟我通消息。然后他又拿起报纸，我则以进门时本该有的极度小心，转身从危险的镶木地板上往回走。那位议员——我的朋友的父亲——当然没有跟我通消息。后来不久，一场兵变（当然是又愚蠢又反动的）使他连同他那看不完的报纸，一起飞快逃离他的椅子。我承认，我感到很开心。

学生联合会

在特木科时，我当过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光明》杂志的通讯员，还在中学同学中推销了二三十份这个杂志。1920 年的消息传到我们特木科，给我的同代人打上了血淋淋的痛苦印记。“幸福青年团”是寡头政府的产物，他们攻击并捣毁了学生联合会总部。司法当局从殖民时期直到现在都尽力为富人服务，他们不去抓攻击者，却把被攻击者关进监牢。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这位智利诗坛年轻的希望之星，在一所监狱里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致死。这一罪行在一个小国的全国范围内引起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反响，与当年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格拉纳达被谋杀一般无二。

1921 年 3 月，我来圣地亚哥上大学，那时这座智利首都的人口不足 5 万人。到处闻得到汽油味和咖啡香。成千上万幢房屋住满了没有知识的人和臭虫。街上交通用的是又小又杂乱的有轨电车，它费力地驶过时，发出轮轨和铃铛的巨大响声。在独立大街和中央车站（我的大学就在该处）附近的首都的另一个车站之间，是一段没完没了的路程。

进出于学生联合会总部的是学生造反活动的最著名人物，他们与当时强大的无政府运动有思想上的联系。阿尔弗雷多·德玛丽亚、丹尼尔·施魏策尔、圣地亚哥·拉瓦尔卡、胡安·甘杜尔福等人，都是很重要的领导人物，胡安·甘杜尔福无疑是他们中最惊人的一位，他以大胆的政见和不屈不挠的勇气而令人敬畏。他把我当孩子对待，我当时也确实是个孩子。有一次，我上他的诊疗室看病迟到了，他沉着脸看我并对我说：“为什么不准时来？别的病人还等着哪。”我答道：“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表来送给我，对我说：“拿着，下次你该知道时间了。”

胡安·甘杜尔福身材矮小，圆脸，过早就歇了顶。但是，他的仪表始终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一名以好斗和剑术高超闻名的搞政变的军人，挑动甘杜尔福决斗。甘杜尔福接受挑战，用半个月时间学会了击剑，不但使对手受了伤，还大为吃惊。就在这一段日子里，他为我的第一本书《晚霞》刻制了封面和全部插图，这些动人的版画竟是一位向来与艺术创作毫无关系

的人创作的。

在革命的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青春》杂志的领导人罗伯托·马萨·富恩特斯，该杂志也属于学生联合会，但比《光明》杂志更具文集的性质，也编得更精细。冈萨雷斯·贝拉 和曼努埃尔·罗哈斯 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我看来他们是老得多的一辈人。曼努埃尔·罗哈斯在许多年之后于不久前来自阿根廷，他的魁伟身材和无意间说出的包含着轻蔑、骄傲和尊严的话语，使我们大为倾倒。他是个铸排工。我早在特木科时就已认识冈萨雷斯·贝拉，他是在警察袭击学生联合会之后逃走的。他从火车站径直来看我，火车站离我家只有几步路。他的出现，对一个16岁的诗人而言，是十分值得纪念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如此苍白的人。他的脸极其瘦削，有如用骨头或象牙刻成。他穿的是黑衣服，是一身裤脚和袖口都磨得挂了毛的黑衣服，却并不因此失去他的高雅风度。我一开始就听出，他语锋犀利，颇具嘲弄意味。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还活着，那天晚上他冒雨亲临我家，使我深为震惊，简直就跟那位民粹派革命者来到安德烈耶夫笔下的人物萨什卡·日古列夫 （当时拉丁美洲的造反青年把他视为榜样）家中一样。

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

我作为政治和文学战士加入了《光明》杂志，该杂志几乎全部由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领导；他逐渐成为同代人中我的最亲近的伙伴之一。他头戴科尔多瓦帽子，留一副大人物留的那种长连鬓胡；他举止不俗，人又年轻英俊，虽然生活窘迫，却快乐得像只小金鸟；新型花花公子的全部气质，诸如轻蔑态度、直接理解众多矛盾冲突的能力、对生死攸关的一切事物的令人愉悦的知识（以及欲望），他都兼而有之。书本和姑娘，酒瓶和航船，旅行路线和群岛，他样样熟悉，而且运用得精细入微。他在文学界的活动总是显示一种大大咧咧的作风，而且一贯挥霍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他系的领带在总体的穷酸中，永远显得富丽夺目。他不断搬家，还经常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他这种自由自在的乐趣、自发而又坚定的放浪形骸，使兰卡瓜、库里科、瓦尔迪维亚、康塞普西翁、瓦尔帕莱索等地惊奇万分的居民，开心了几个星期。他像来时那样走了，却在他停留之处留下诗歌、绘画、领带、爱和友谊。他具有民间故事中王子那样的秉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把所有的东西——他的帽子，衬衫，外衣，甚至他的鞋——都拿去送人。等到可送的东西都送光了，他就在纸片上写上几句话——几行诗或是一句幽默的俏皮话，在你动身时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神气把这张纸片送给你，仿佛交到你手里的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

他遵从阿波里奈 和西班牙极端主义者的教导，按最时兴的方式写诗。他创立过一所新型的诗歌学校，取名“咿呀”，据他说，这是人的第一个喊声，是新生儿的第一首诗。

罗哈斯·希门尼斯使我们不得不在服装、抽烟方式和书写方面赶点儿时髦。他非常巧妙地嘲笑我，帮我脱下暗色衣服。他的怀疑态度和没有节制的酗酒始终没有影响我，然而至今记起他那光彩照人的相貌，我就十分激动，他的相貌使美从各个角落涌现出来，有如使一只隐藏的彩蝶飞舞起来。

他从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那里学会叠纸鸟。他叠好纸鸟的长脖子和宽翅膀之后，吹了几口气。他把这个动作叫做给它“催活”。他发现了法国

诗人，发现了埋藏在仓库里的深色酒瓶；他给弗阴西斯·亚默笔下的女主人公写情书。他写的美妙的诗都皱巴巴地在他的口袋里流传，至今从未发表过。

他那挥霍无度的性格十分引人注目，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个陌生人来到他身旁对他说：“先生，我听了您说的话，和您深有同感。我能向您提个要求吗？”罗哈斯·希门尼斯不悦地问道：“什么要求？”陌生人说：“允许我从您身上跳过去。”诗人问道：“怎么个跳法？您的身体这么棒，我坐在这张桌上，您能从我身上跳过去吧？”陌生人低声下气地回答：“先生，我跳不了。以后等您安安静静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再从您身上跳过去。我对平生遇到的那些有趣的人，总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表示敬意：如果他们允许，我就在他们仙逝以后从他们身上跳过去。我是个孤独的人，这是我唯一的消遣。”他同时掏出一个记事本对罗哈斯·希门尼斯说：“这就是我跳过的人的名册。”罗哈斯·希门尼斯欣喜若狂地接受了这个怪主意；数年之后，在一个凭记忆所知的智利最多雨的冬天，他去世了。那天跟往常一样，他的外农留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里了；他在那个南方的冬日，仅仅穿着衬衫从城里走过，一直走到第五师范学院他妹妹罗西塔的家。两天后，支气管肺炎把我所认识的最富有魅力的人，从尘世夺走了。这位诗人走了，在绵绵细雨中带着他的小纸鸟飞上了天空。

当天夜里，为他守灵的朋友接待了一位不寻常的来客。滂沱大雨倾泻在屋顶上，雷电闪闪，第五师范学院校园里高大的香蕉林在风中摇曳，门打开时走进一位身着重孝的人，浑身给雨淋得透湿。谁也不认识他。出乎几位守灵朋友的意料，这位陌生人跑了几步就从棺材上跳了过去。随即像他来时那样，一言不发地突然走了，消失在大雨和夜色中。像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这样，最后以一个神秘仪式来结束令人惊奇的一生，谁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到达西班牙，就得到他去世的噩耗。我很少感受过如此强烈的痛苦。当时我在巴塞罗那，立即动手写我的哀歌《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在飞翔》，这首诗后来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了。

不过，我还应该举行一个同他诀别的仪式。他已经长眠在遥远的智利，在滂沱大雨把墓地淹没的日子里。在一次仪式上，我忽然想到已经不可能同他的遗体在一起，已经不可能陪伴他进行最后一次旅行了。我便去找我的朋友画家伊萨亚斯·卡韦松，同他一起到神妙的圣玛利亚德拉梅尔大教堂去。我们买了两根几乎有一人高的大蜡烛，带到那座半明不暗的奇妙殿堂里去。圣玛利亚德拉梅尔大教堂是航海者的教堂；渔夫和水手在许多世纪前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教堂，后来又用千万帧还愿画装饰了它。这座精美的大教堂的墙上和天花板上，到处是各种形状的大小船只，而且永远在扬帆航行。我忽然想到，这简直是为那位去世的诗人设置的绝妙环境，如果他见过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喜欢。在教堂当中，就在镶板式天花板画着云彩的地方，我和我那位画家朋友点燃蜡烛，坐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各人身旁放一个绿色酒瓶，心里想，尽管我们是不可知论者，那个无声的仪式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我们与亡友更加接近。在空荡荡的大教堂高处，点燃的许多蜡烛活跃而且明亮，像是那位狂热诗人的两只眼睛，从阴影和还愿画中间凝视我们，虽然他的心已经永远停止跳动了。

寒冬里的狂人

提起罗哈斯·希门尼斯，我要说说他的狂热，他那与诗歌挽臂而行的名副其实的狂热。非常理性的人大概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成为诗人；诗人要成为有理性的人，想必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理性是会在比赛中获胜的，这种以公正为基础的理性，应该统治世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非常喜爱智利，有一次他说：“那句格言我可不喜欢。‘凭理性还是凭武力’是什么意思？要凭理性，要永远凭理性。”

过去我认识几位狂热的诗人，我要说说其中的阿尔韦托·巴尔迪维亚。阿尔韦托·巴尔迪维亚这位诗人是世界上最瘦的人之一，而且脸色发黄，仿佛浑身只有皮包着骨头，一头乱蓬蓬的灰色长发，目光冷漠的眼睛上架一副近视眼镜。我们都叫他“僵尸巴尔迪维亚”。

他默默无语地进出于酒吧和文艺社团、咖啡厅和音乐会，不弄出声响，腋下夹着一小捆神秘的报纸。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边喊他“亲爱的僵尸”，一边拥抱他那没有实质内容的身躯，感到拥抱的只是一股气流。

他写了不少感情细腻的、极其温柔的优美诗篇。下面是其中的几行诗句：

黄昏，太阳，生命——一切都已离去：
邪恶必将取胜，此事无可挽回。
我那暮年的形影不离的姐妹哟，
只有你留下不去。

我们称之为“僵尸巴尔迪维亚”这个人，是位真正的诗人，我们这样叫他是表示亲昵。我们时常对他说：“僵尸，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从来没有使他不高兴。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有时还露出一丝笑意。他说的话不多，但句句有道理。他定下一种仪式，每年都要人带他到墓地去。

11月1日的前夜，就我们青年学生和文人的干瘪钱包所允许的而言，他要了一份相当奢侈的晚餐；我们的“僵尸”占坐了荣誉席。夜里12点正，撤了席面，我们排成一个兴高采烈的队伍朝墓地走去。在寂静的夜色中，有人对“已故”诗人宣读了主祭词；然后，我们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与他告别并动身离去，让他独自一人留在墓地大门之内。“僵尸巴尔迪维亚”已经接受了这个没有任何暴力的传统，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这场闹剧，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离开之前交给他几个比索，让他在墓室里能吃上一餐三明治。

两三天后，看到这位僵尸诗人又静悄悄地走进我们的社团和咖啡馆，谁也不会吃惊。他的平静肯定会保持到下一年的11月1日。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认识一位阿根廷作家，他十分古怪，曾名或现名奥马尔·比尼奥莱。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健在。他身材魁伟，手执一根很粗的手杖。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市区一家餐馆吃饭，在桌旁向我打了个请入席的手势，并用整个餐厅坐得满满的老主顾都听得见的大嗓门说道：“请坐，奥马尔·比尼奥莱！”我确实感到不快，一坐下就问他：“干吗叫我奥马尔·比尼奥莱？明摆着你是奥马尔·比尼奥莱，我是巴勃罗·聂鲁达呀！”他答道：“对呀，可是这个餐馆里许多人只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他们有不少人想揍我

一顿，我倒情愿他们揍你。”

这位比尼奥莱曾在阿根廷的一个省当过农艺师，从该省带来一头母牛，与之成为挚友。他用绳子牵着母牛走遍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他出版的几本书，总是署以与母牛有关的标题：《母牛所思》《我的母牛与我》等等，等等。国际笔会第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代表大会时，以维多利奥·奥坎波为首的作家们，想到比尼奥莱也许会带母牛赴会，都不寒而栗。他们向当局说明了即将临头的危险，警察便把普拉萨饭店周围的街道封锁起来，以阻止我那位古怪朋友带着他的反刍牲口，到达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豪华场所。一切均属徒劳。当这次集会进入高潮，作家们正在探讨希腊的古典世界与历史的现代意义之间的关系时，杰出的比尼奥莱带着那头形影不离的母牛，闯进了会议大厅；为了使会议功德圆满，这头牛“哞哞”地叫起来，似乎想加入论争。这头牛是装在一辆密闭的大行李车内，骗过警察的戒备而被运进城区的。

我还要说一件这位比尼奥莱有一次向自由式摔交手挑战的事。那位职业摔交手接受了挑战，在决斗那天晚上来到人山人海的鲁纳公园。我的朋友带着牛准时到场，把牛拴在方形场地的一角，脱下身上的华丽外衣，迎向那位“加尔各答扼杀手”。

不过，这位诗人斗士的牛和华丽衣着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那位“加尔各答扼杀手”扑向比尼奥莱，两下子就使他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而且为了侮辱这头文学牛，把脚踩在他的脖子上，残忍的观众在周围大喝倒彩，要求决斗继续下去。

数月之后，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与母牛的谈话录》。我永远忘不了印在该书第一页上极其别致的题词。如果我没记错，题词是这样的：“谨以这本哲学著作献给2月24日晚上在鲁纳公园噓我并要求置我于死地的4万个婊子养的儿子。”

在最近这次大战之前，我在巴黎结识了画家阿尔瓦多·格瓦拉，欧洲人始终把他叫做智利·格瓦拉。一天，他急如星火地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我由西班牙来到巴黎，当时我们的斗争是反对那个叫做希特勒的家伙——那个时代的尼克松。我在马德里的房子已经被炸毁，我还看到许多男人、妇女、儿童被轰炸机炸得血肉横飞，世界大战在步步进逼。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我们写的书，急切劝告人们正视严重的战争危险。

我这位同胞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个十分辛勤的画家。可是，当时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当列强阻挠派兵捍卫共和派西班牙人的时候，当后来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军队打开大门的时候，战争就来临了。

我应智利·格瓦拉的召唤前去，他有要事须跟我谈。

“要谈什么事？”我问他。

“不该浪费时间。”他答道。“你去反对法西斯毫无道理。你不该去反对不存在的东西。应当直截了当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我已经找到了。我之所以急如星火地告诉你这一点，是要你不要召开反法西斯大会，要你以全副精力投身于创作。不该浪费时间。”

“得，你要谈的都谈了。阿尔瓦罗，说真的，我没有多少闲时间。”

“巴勃罗，说真的，我已经在三幕剧中表达了我的想法。我现在拿给你看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本手稿，同时他那长着一对浓眉的古代拳师般的脸，定定地盯着我。

我着慌了，便借口没有时间，说服他当面跟我谈谈他将用以拯救人类的设想。“这跟哥伦布把鸡蛋竖在桌上同样简单。”他说。“我这就说给你听。种下一个土豆，能长出几个来？”

“唔，四五个吧。”我本想说点别的话，却这么说了。

“要多得多。”他答道。“有时能长出40个土豆，有时能长出100多。你设想一下，每个人都在花园里，在阳台上，在随便什么地方种下一个土豆，结果会怎么样。智利有多少人口？800万，就会种下800万个土豆。巴勃罗，你把这个数乘以4，乘以100。饥饿没有了，战争也消灭了。中国有多少人口？5亿，对不对？每个中国人种一个土豆，每个种下的土豆长出40个，那就是5亿乘40个土豆。人类就得救了。”

纳粹占领巴黎时，没理睬这个救世构想——“哥伦布的鸡蛋”构想，更确切地说，“哥伦布的土豆”构想。在一个雾霭弥漫的寒夜，他们把阿尔瓦罗·格瓦拉从家中抓走了。他们把他送进集中营，在他手臂上刺了字，一直把他囚禁到这次大战结束。他从地狱般的集中营出来时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再也不能复原了。他最后一次来到智利，像是为了向故土告别，给它以最后的一吻，给它以梦游者的一吻，随即回到法国，在那里了却他的残生。

伟大的画家、我亲爱的朋友智利·格瓦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已经去世，你那不问政治的土豆构想，丝毫也帮不了你的忙。我知道置你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去年6月，我走进了国立美术馆。我去仅仅是为了参观透纳的画，可是我在走到大展览厅之前，看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一幅我认为跟透纳的画一样美的画，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画。这是一幅仕女图，画的是一位名叫伊迪丝·西特韦尔的名媛。这幅画就是你的作品，这是悬挂在伦敦这座大陈列馆的传世杰作之间唯一的一幅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他们以前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我并不看重地位，也不看重荣誉，打心眼里说我也不很看重那幅画。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彼此没有更多认识，没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因土豆之过，我们一生也没有彼此理解。

我已经成为一个过分单纯的人——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耻辱。我和同伴们一起夸夸其谈，又羡慕他们光艳的服饰、邪恶的态度，他们叠的小纸鸟，甚至他们的牛；也许按神秘的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些看作文学。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生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爱。甚至那些攻击我的分裂分子（他们成群地要把我的眼珠抠出来），刚刚从我的诗中汲取了营养，就至少需要我的沉默。我从来不怕在深入敌方群众时受传染，因为我唯一的敌人，乃是人民的敌人。

阿波里奈说过：“怜悯我们这些正在开拓非现实疆域的人吧！”我是在想到我刚刚讲完的那几篇故事时记起这句话的，我对故事中涉及的人物，并不因为他们脾气古怪而感到不那么可爱，也不因为难以理解而贬低他们的价值。

大生意

我们这些诗人总以为自己发财致富的了不起的智慧，是做生意的天才，只是还没有被人赏识。记得在 1924 年，我受诸如此类绝妙的小算盘的驱使，把《晚霞》那本书的版权卖给我的智利出版家，不是卖一个版次的版权，而是卖断了。我以为这笔买卖会让我发一笔财，便在公证人的公证书上签了字。这家伙付给我 500 比索，当时这笔钱还折合不到 5 美元。罗哈斯·希门尼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奥梅罗·阿尔塞在公证处门口等我，为了去举行盛大宴会，以庆祝这次交易成功。我们真的到当时最豪华的“港湾酒家”去，品尝了上等的葡萄酒、烟和烈性酒。我们事先把皮鞋擦得像镜子一样闪闪发亮。那个“酒家”、4 位皮鞋锃亮的家伙和一位出版家，都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至于那个诗人，却没有就此发达起来。

说自己在做各种买卖方面具有老鹰般敏锐眼光的，就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他的宏伟计划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只要把它付诸实现，金钱准能下雨般落到我们头上。在我们几个衣冠不整、放荡不羁的文人看来，他所掌握的英语，他那用金黄色烟叶卷的香烟，他在纽约上的几年大学，都保证他那了不起的商业才能的实际效用。

一天，他非常秘密地找我去谈，要我参加他的一项能使我们立刻发财致富的惊人计划。我只要拿出随便从哪儿弄到的有限的几比索，就可以成为拥有二分之一股份的合伙人，其余的股金由他出。那天我们自以为都成了不受上帝也不受法律约束的资本家，自以为什么都办得到。

“要做什么买卖呢？”我对金融这个领域一窍不通，怯生生地问道。

阿尔瓦罗闭上眼睛，喷出一口变成一个个小圆圈的烟来，最后用神秘的声音答道：

“皮货！”

“皮货？”我惊奇地跟着说。

“海豹皮。准确他说，是毛色很纯的海豹皮。”

我没敢再细问。我不知道海豹能有纯色的毛。从前我观察过南方海滩岩石上的海豹，看见它们溜光的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可没发现它们缓缓蠕动的肚皮上有毛的痕迹。

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自己的资财搜寻出来，不去付租金，不去付裁缝工钱，也不去付皮鞋帐单，立刻把股金交给我的商业合伙人。

我们动身去看皮货。阿尔瓦罗早已从他姑妈手里买下皮货，这位南方妇女是几个不毛小岛的主人。海豹经常在这些荒岛上举行性爱仪式。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捆一大捆黄色的海豹皮，都被那个邪恶的姑妈的雇工们打得百孔千疮。在阿尔瓦罗租用的栈房里，一包包皮子一直摆放到屋顶，以便镇住可能的买主。

“我们拿这么多这么大包的皮子怎么办哪？”我畏畏缩缩地问道。

“人人都需要这种皮货。你瞧着吧！”我们说着离开了栈房，阿尔瓦罗迸发着着力的火花，我却垂下头去一声不响。

阿尔瓦罗提着公事包到处奔波，这个公事包是用我们真正的“纯色海豹”皮制作的。包内塞满白纸，以便使他有个商人派头。我们的最后几个小钱都拿去登了报纸广告。只要有感兴趣的、有鉴赏力的商界巨子看到这些广告，这就够了，我们没准就发财了。一向讲究衣着的阿尔瓦罗，想缝制半打英国

料子的衣服。我简朴得多，做着有待实现的梦，只想弄到一把刮胡子用的好刷子；而现在，我想的已经是难以接受的秃顶了。

买主终于出现了，是个身强体壮的皮匠，矮个子，目光大胆逼人，少言寡语，但话说得非常坦率，在我听来觉得近于粗鲁。阿尔瓦罗摆出一副谨慎的淡漠态度接待他，同他定好三天后的一个合适时间，给他看我们那些惊人的皮货。

在这三天之内，阿尔瓦罗买来高级英国香烟和几支古巴“罗蜜欧与朱丽叶”牌雪茄，就在顾客快到时把它们极显眼地放在他上衣的外面口袋里。我们把外观最好的皮子，零散地摆在地上。

那家伙准时前来赴约。他没有脱下帽子，只是咕哝一声向我们打个招呼。他轻蔑地草草看了看摊在地上的皮子；然后，他那双精明而又坚定的眼睛扫向满满登登的货架。他举起一只粗短的手，伸出一根犹豫不定的指头，指了指一包皮子——一包放在最上边和最远处的皮子。那里恰巧是我们藏掖最后的皮子之处。

阿尔瓦罗抓住这一关键时刻，递给他一支地道的哈瓦那雪茄。这个不起眼的商人飞快地按过雪茄，咬掉尖头，用尖牙咬着叨在嘴上。但是，他还是那么沉着，指着他要检查的那个包。

除了让他看那包皮子，没有其他办法。我的合伙人登上梯子，像个被判死刑的人那样微笑着把那个大包扛下来。买主把这包皮子逐张仔细检查，还不时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吸阿尔瓦罗请他抽的雪茄。

这家伙拿起一张皮，揉搓它，折叠它，朝它吐上一口唾沫；随即换上另一张皮，依次抓、刮、闻一番，就把它扔到一边。终于检查完事的时候，他那贪婪的目光又从摆满我们纯色海豹皮的货架上扫过，最后直盯着我的合伙人和商业专家的脸。这是何等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时，他以坚定而又冷漠的语气说了一句不朽的话——至少对我们是如此。

“先生们，这样的皮子我可没法通融。”说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跟进门时一样戴着帽子，吸着阿尔瓦罗请他抽的那支高级雪茄，没有道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我们做百万富翁的全部美梦。

我最早的几本书

我是怀着强烈的羞怯心情躲进诗歌里去的。当时有一些新的文学流派在圣地亚哥上空翱翔。在马鲁里街 513 号住所，我的第一本书杀青了。那时候，我一天能写两三首，甚至四五首诗。傍晚太阳下山时，阳台前方每天都展现出一幅图景，对于这样的世间美景，我丝毫不肯错过。这是日落时色彩纷呈的壮丽景色，霞光万道，形成橙黄和绯红的巨大扇面。我的书中最主要的一篇名曰《马鲁里的晚霞》。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马鲁里是什么，也许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它不过是经常有令人惊叹的霞光照临的一条不起眼的街道。

1923 年，我的第一本书——就是那本《晚霞》——出版了。为了支付印刷费，我每天都遇到困难，也获得胜利。我本来就不够用的几件家具，都卖了。父亲郑重送给我的钟——他在钟上画了两面交叉的小旗——很快就送到当铺去，随后送去的，是我那件黑色诗人服。印刷厂老板冷酷无情，印刷终于全部完工，也已装上了封面，他却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行。印刷费不全

部付清，一本书也别想拿走。”评论家阿洛内慷慨解囊，拿出他最后的一笔钱，那个印刷厂老板三口两口就把它吞下去了。我扛着我的书走到街上，脚上穿着破皮鞋，欣喜若狂。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来坚持认为，作家的任务既不神秘也不可悲，而是有利于公众的个人任务，至少诗人的任务是如此。与诗歌最相似的东西，是一块面包，或是一个瓷盘，或是满怀柔情地加工过的一段木头，尽管是由笨拙的手操作的。不过，我认为没有一位手艺人在用自己的双手以搏动着梦想的迷惘心情来创作第一个作品时，能像诗人那样具有如此令人陶醉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决不可能再回来。将会有更精致、更美的书出售；这些书中的言词将像葡萄酒那样被注入其他语言的酒杯，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去歌唱，去散发芬芳。但是，这个时刻——散发出第一本书的油墨香和纸的柔情的这个时刻，传送出翅膀飞翔的声音和第一朵花在被征服的高地上开放的声音，在诗人的一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的一首诗——即那首《告别》——仿佛突然从那本稚气的书中脱颖而出，走上自己的路，至今凡我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仍然熟记在心。他们在绝难料到的地方向我朗诵这首诗，或者要求我朗诵。尽管我深感烦恼，我在集会上刚被介绍，就有一位少女高声朗诵起那些令人着迷的诗篇；政府的部长们在接见我时，有时像军人那样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对我朗诵那首诗的开头一段。

以后几年在西班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对我说起他那首《不忠实的有夫之妇》的诗所遇到的同样情况。人们向加西亚·洛尔卡表达友情的最好证据，就是一再背而这首极受欢迎的优美诗篇。我们的作品竟只有一首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功，对此我们都有一种过敏反应；这是一种健康的，甚而是一种生而有之的感情。读者强加的这种负担，是要诗人固定在唯一的一段时刻里，而创作实际上是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自觉的一种不停转动的轮子，虽然也许略欠清新和自发性。

我已经把《晚霞》抛到了后面。可怕的忐忑不安搅乱了我的诗兴。到南方的短暂旅行，使我恢复了力量。1923年，我得到一次妙不可言的体验。当时我回到特木科老家，时间已过半夜，我在上床之前打开房间的窗子。天空令我眼花缭乱。空中生意盎然，缀满点点繁星。夜色如洗，南方的星群展现在我的头顶。

凝望着繁星、苍穹、宇宙，我不禁陶然心醉。我扑向书桌，像有人口授那样如痴似狂地奋然命笔，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取了好几个标题，最后定名为《热情洋溢的投石手》。我写得十分顺手，有如在自己的水域里畅游。

次日，我满怀喜悦地阅读自己夜间写的诗。后来我来到圣地亚哥，阿利里奥·奥亚尔顺——这位魔术师惊奇地听了我的这些诗，听后用低沉的声音问我：

“你能肯定，这些诗没有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影响吗？”

“我当然能肯定。这些诗，我是在灵感冲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时我忽然心血来潮，把自己写的诗寄给萨瓦特·埃尔卡斯蒂——一位现在被不公正地忽视的乌拉圭诗人——本人。我在那首诗里看到，我想写一种既蕴含人类又蕴含大自然及其神秘力量的抱负已经实现；我要写的就是一种既摹写宇宙间难解的奥秘，又颂扬人类潜力的史诗。我开始与他鱼雁相通。我继续创作，把作品写得更娴熟，同时我又认真阅读萨瓦特·埃尔卡斯蒂写

给我这个完全陌生的青年诗人的书信。

我把那天夜间写的那首诗，寄给远在蒙得维的亚的萨瓦特·埃尔卡斯蒂，问他我的诗里是否有他的诗的影响。他很快就寄来一封珍贵的复信：“我难得读到如此成功、如此美妙的诗，不过我必须告诉您，在您的诗里确实有点儿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东西。”

这是茫茫黑夜里的一道闪光，一道明晰的闪光，我至今仍然感激不尽。这封信我在口袋里揣了许多天，揉搓得碎成破片。许多事情都处在紧要关头，尤其是我长久地沉湎于那天夜间毫无结果的狂乱中，徒然落入繁星的陷阱，徒然让自己的感情去承受南方的暴风雨。我犯了错误。我不该相信灵感，而应当让理性指引我沿着狭窄的小径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我必须学会谦虚。我撕碎了许多原稿，又走上了别的歧途。整整过了10年之后，新近完成的这些诗才重新出现，出版问世。

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那封信打掉了我经常想写一首力所不及的诗的抱负，关上了我决不可能遵循的运用浮夸词藻、减弱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能力的大门。我在追求自己更加朴实无华的特色，追求自己独有的和谐境界的同时，动手写作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二十首情诗》就是这一追求的成果。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书里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好苦的情欲，还交织着我国南方那使人不知所措的大自然。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刺心的忧伤中展现了生的欢乐。因佩里亚尔河及其河口帮助我写就这本书。《二十首情诗》是有关圣地亚哥及其有大学生走动的街道、大学校园测分享着爱情的忍冬花香味的浪漫曲。

有关圣地亚哥的段落，是在埃乔伦街和西班牙林荫道之间的街道上，以及师范学院旧楼内写的，但它的全景始终是南方的江河湖海和森林。《绝望的歌》中的码头，就是卡拉韦河上和下因佩里亚尔河上的那些旧码头：码头的破木板和圆木有如被宽阔的河流撞击的残肢；在河口，过去和现在都能不断地听见海鸥翅膀的扇动声。

在一只从一艘不知名的遇难船上来的、被弃置的狭长小艇上，我读完一整本《胡安·克里斯托瓦尔__传》，还写了那首《绝望的歌》。在我头顶上，天空蓝得我从未见过的那么刺眼。我在那只藏身于大地的小艇上写作，我认为，以前我从没有像那几天那么高远和深沉。上面是难以猜透的蓝天，手中是《胡安·克里斯托瓦尔传》和我那首诗中刚刚写下的诗句，近处是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于我诗中的一切——大海从远处传来的喧闹声，野鸟的啼鸣，像永不枯萎的黑莓那样的、永不枯竭的炽热的爱。

不断有人问我，《二十首情诗》中的女子是谁，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在这本既忧伤又炽热的诗中交替出现的两三位女子，我们可以说相当于玛丽索尔和玛丽松布拉__。玛丽索尔是迷人的外省爱神，有夜里闪现的点点繁星和特木科湿漉漉的天空般阴沉的眼睛，几乎所有的篇页里都能见到她的欢乐和明丽的形象，围绕着她的是港口的水域和露在山峦上的半规明月。玛丽松布拉是首都的女大学生，是灰色贝雷帽，是极度温柔的眼睛，是用情不专的大学生爱情忍冬花所散发的持久香气，是在城市隐蔽地点热情幽会后的肉体的宁静。

这时，智利的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智利的人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在学生和作家中寻找强有力的支持。

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领袖——精力充沛、善于蛊惑人心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而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没有用他那火一般的威胁震撼全国。尽管他的身份特殊，他一执掌政权就变成我们美洲传统的统治者。他对之进行过斗争的寡头统治集团，张开血盆大口把他的革命演说一口吞下。全国在极其激烈的对抗中继续挣扎。

同时，一位工人领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非常积极地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创办了9到10份工人报刊。大量涌现的失业问题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动摇。我为《光明杂志》每周写一篇文章。我们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在圣地亚哥街头却遭到警察的殴打。成千上万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来到首都。示威游行和随之而来的镇压，给全国人民的生活抹上一层惨淡的色彩。

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我的诗中和生活中。在我的诗中，我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我同样不可能把我这个青年诗人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关闭。

词 语

……先生，您确是什么都喜爱，可这是高歌或低吟唱出的词语……我对它们顶礼膜拜……我爱它们，依恋它们，追求它们，咬住它们不放，把它们加以融化……我对词语爱得如此之深……那些意想不到的词语，那些被焦切地期待着的词语，我悄悄窥探着，直至它们突然出现……那些叫人喜爱的词语像斑斓的宝石那样闪耀，像银白色的鱼那样跃动，它们是泡沫，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我追寻着某些词语，它们美不可言，我要把它们运用到我的诗中去……我在它们营营嗡嗡地飞过时代截住它们，牢牢捉住，清洗干净，剥去外皮，我坐在这盘菜肴前面，感受到它的晶莹、活跳、象牙的色调、植物的苍翠、油润，像水果、像海藻，像玛瑙，像橄榄……于是我把它们翻搅，摇晃，饮用，大口吞吃，咀嚼，加上配菜，然后摆脱掉它们……我把它们当作钟乳石、磨得锃亮的小木片、煤块、波浪送来的遇难船的残骸，嵌进我的诗中……词语里什么都有……因为一个词移动了位置，或是因为另一个词像小女王那样闯入一个并不欢迎她却要服从她的句子里，于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它们有阴影、透明度、重量、翎毛、毛发，它们在河上漂流有多远，移居的国度有多少，生长的根有多长，那它们吸取的东西也就有多少……它们是最古老的，又是最新鲜的……它们生活在隐藏的灵柩里，生活在初吐的蓓蕾中……我所使用的是何等优美的语言——由凶狠的征服者那里继承来的何等优美的语言！……这些征服者具有世上从未见过的贪婪胃口，大踏步地跨过崇山峻岭，越过崎岖的美洲大陆，寻觅着马铃薯、灌肠、菜豆、深色的烟草、黄金、玉米、煎蛋……他们把宗教、金字塔、部族、偶像崇拜，跟他们带在大口袋里的东西一样，大口大口地吞下肚去……他们把所过之处夷为平地。不过，从他们的皮靴里、胡子里、甲冑里、马蹄上，掉下璀璨的语词——语言在这里发出宝石般的光彩，把它留给了蛮族。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他们惊走黄金，也留下黄金……他们带走一切，也留下一切。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语词。

三、走向世界之路 瓦尔帕莱索的流浪汉

瓦尔帕莱索与圣地亚哥近在咫尺，只有草木杂生的山峦把它们分开；山峰像方尖碑那样高耸入云，长满了满怀敌意而又繁花盛开的大仙人掌。然而，瓦尔帕莱索与圣地亚哥之间又有一种永远也无法确定的距离；圣地亚哥是被冰雪高墙囚禁的城市，而瓦尔帕莱索却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儿童的眼睛敞开自己的大门。

在我们青春岁月最任性的时刻，我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总是毫无睡意，总是囊中分文不名，便突然登上一节三等车厢。我们是 20 岁上下的诗人和画家，心中满怀不顾后果的狂热，勇气十足，想去求职业，求发展，想要脱颖而出。瓦尔帕莱索这颗明星，以其具有魅力的搏动呼唤着我们。

直到许多年后，我在别的城市才又感受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那是在马德里的几年间。凌晨从戏院出来，走进一家小酒店，或者仅仅在街头漫步，蓦然间我听见托莱多——呼唤我的声音，这是它的无数幽灵、它的沉寂发出来的听不见的声音。在这夜深人静时刻，我同几位像我年青时代一样疯狂的朋友一起，到灰白色曲折幽深的古城堡去。在石桥底下，我和衣睡在塔霍河的河滩上。

在我前往瓦尔帕莱索的几次离奇的旅行中，不知为什么，一位浑身散发出从草原深处拔来的青草香气的人，深深铭刻在我心里。当时我们去送别一位诗人兼画家，他要坐三等舱去法国旅行。我们连最蹩脚的旅馆的住宿费都没有钱付，于是我们去找诺沃亚，他是大瓦尔帕莱索城内我们最喜爱的疯子之一。走到他家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没完没了的一座座小山爬上爬下，昏暗中看得见为我们领路的诺沃亚的沉着身影。

他是个威严的人，一脸的络腮胡子，髭须很浓。我们气喘吁吁地盲目登上山峦顶上时，他那深色上衣的下摆鸟翅般扑扇着。他不停地说话。他是个神圣的疯子，是我们这些诗人唯一封为圣徒的人。他当然还是个自然主义者，是个享用植物的素食者。他歌颂身体健康与来自大地的天赋才能之间的神秘关系，这只有他才熟悉。他一路走一路向我们宣讲；他那洪钟般的声音传到后面来，仿佛我们都是他的门徒。他那同夜间在荒郊出生的圣克里斯托瓦尔——一样魁伟的身影，在向前移动。

我们终于走到他家了，那里原来是一所两个房间的茅屋。一个房间里摆着我们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床；另一个房间被一把很大的柳条扶手椅占去大部分地方，扶手椅上大量交织着多余的麦秆做的圆形装饰，紧贴着扶手还有一些奇特的小格子；这是一件维多利亚风格的杰作。那天夜里，大扶手椅指定给我睡。我的几位朋友在地上铺了几张晚报，就小心翼翼地睡在新闻和社论上了。

听到呼吸声和鼾声，我马上知道他们都已进入梦乡。尽管浑身疲乏，我坐在那把大家具上却难以入眠。我听得见从高处——荒凉的山巅——传来的寂静。只有划过夜空的天狼星的几声嗥叫，只有进出港口的轮船发出的悠远的汽笛声，才使我确切感到这是瓦尔帕莱索的夜晚。

我突然感到，一股令人陶醉的奇异力量充盈我全身心。那是山岳的芬芳；是大草原的香味；是伴随我的童年生长起来，而我在城市生活的尘嚣中已经忘却的花草树木的香味。我沉浸在大地母亲的催眠曲声中，昏昏欲睡。那粗

犷的大地的搏动，那极纯洁的芬芳，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把手指伸进大柳条扶手椅高低不平的缝隙里，发现了无数小格子；我在小格子里摸到干枯而平直的植物，粗而圆的树枝，柔软或坚硬的披针形叶子。我们这位素食鼓吹者的全部有益于健康的珍藏，就是他用感情奔放、喜爱走动的圣克里斯托瓦尔般的大手，致力于收集荆棘的生活的全面写照。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在那些护身草香气的护卫下安然入睡了。

在瓦尔帕莱索的一条狭窄街道上，我在堂索伊洛·埃斯科瓦尔家的对面住了几周。我们的阳台几乎碰到一起。我的邻居早早就到阳台上来做一种隐士操，露出他那身竖琴般的肋骨。他总是穿一件素雅的宽罩衫，或是穿一件破旧的上衣，半像水手，半像天使长；他早已从航海生涯，从海关，从海员职业退休了。他每天都细致周到地刷礼服。这是件做工精致的黑呢子套服，多年来从没有人看见他穿过；他永远把这套衣服藏在旧衣橱里，和他的一些宝贝放在一起。

不过，他最引人注意、最让人动心的宝贝，却是他一辈子尽心珍藏的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他自己不拉，也不许别人拉。堂索伊洛曾想把小提琴拿到纽约去卖；为了这把出色的乐器，那里也许有人肯付给他一大笔钱。他有时从那只破旧的衣橱里拿出小提琴来，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欣赏一番。也许有那么一天，堂索伊洛·埃斯科瓦尔会动身去北方，带回来的不是小提琴，而是阔气的戒指；他嘴里缺了多年的牙，也会装上金牙。

一天早晨，他没有到做操的阳台上来。我们把他安葬在山上的墓地里，他那隐士般瘦小的身上第一次穿上那件黑呢礼眼。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弦不能为他离去而哀鸣，因为谁也不会拉。况且，打开衣橱时，那把小提琴已经不翼而飞了。也许它已飞往大海，也许它已飞往纽约，以搅乱堂索伊洛的清梦。

瓦尔帕莱索是神秘的，地势起伏，道路曲折。穷困像瀑布那样泼洒在山冈上。谁都知道住在山冈上的无数的人吃的有多少，穿的怎么样（也知道他们吃的没有多少，穿的不怎么样）。每所房子晾晒的衣服都像挂万国旗，光脚的不断增加，也揭示出芸芸众生扑不灭的爱情。

不过，在靠近大海的平地上，有些带阳台的房子却是窗户紧闭，人迹罕至。其中有一座探险家的宅子。我接连敲了好几下门上的铜环，以便让人听见。终于有轻柔的脚步声来到门前，一个满脸狐疑的人疑虑重重地把大门打开一条缝，不愿让我进去。这人就是那座宅子的老女仆，一个披着大披肩并围着围裙的影子，她的脚步声轻柔得几乎听不见。

探险家也已垂垂老矣，住在这座窗户紧闭的轩敞宅子里的只有他和那个女仆。我见识过他所收藏的偶像。走廊里和墙上到处是橙黄色的作品，白色和灰色凹纹的面具，早已不知去向的海神躯体的复制雕像，波利尼西亚人干枯的头发，充满敌意的蒙着豹皮的木盾，张牙舞爪的牙齿项链，也许在幸运的浪花上划过的小船的般桨。还有一些凶暴的刀子，银光闪闪的刀刃曾从黑暗中翻飞而出，使墙壁为之颤抖。

我看出来，男性的木头神像都被缩小了，他们的阴部用遮羞布严实地遮盖起来，遮羞布的料子跟女仆做披肩和围裙的料子是一样的。证实这一点毫无困难。

老探险家在这些战利品之间静悄悄地走动。他以半是武断半是嘲讽的语气，一个大厅一个大厅地为我讲解谁活得长久，谁在他生动描述的余辉里仍然活着。他那白扑扑的小胡子，跟萨摩亚的偶像十分相像。他拿出长铳和笨重的手枪给我赏玩，他用这些武器追击过敌人，也许还趴在地上打过羚羊和老虎。他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依然轻声细语。尽管窗户紧闭，西沉的落日似乎还是投进来一缕阳光，在偶像间像活泼的小蝴蝶般翩翩起舞。

分手时我把自己要去海岛旅行的计划，要立即前往金色沙滩的愿望对他说了。这时他张望一下四周，把他毛渣渣的白胡子贴近我的耳朵，颤颤巍巍地悄悄对我说：“可别让她发现，她可不能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也正在准备去旅行。”

他这么停了一会儿，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像是正在倾听大森林中老虎的足音。然后，大门如同黑夜降临非洲大地那样，突然悄然无声地关上了。

我问邻居：

“还有什么怪人？有值得回瓦尔帕莱索来的事情吗？”

“值得一提的事太少了。不过，您要是顺那条街走去，没准会碰上堂巴托洛梅。”

“可我怎么认出他呢？”

“您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他出门总是坐四轮马车。”

几小时后，我在一家水果店买苹果，这时有辆马车在店门前停下。车上下下来一位身穿黑色衣服、风度欠佳的高个子。

他也是来买苹果的。他肩上带来的一只纯绿鹦鹉，立刻向我飞来，而且肆无忌惮地停在我头上。

“您是堂巴托洛梅吗？”我问这位绅士。

“对，我是堂巴托洛梅。”在他买的苹果和葡萄装满一篮子时，他把斗篷里随身带来的一把长剑抽出来递给我。那是一把古剑，又长又尖，剑柄是手艺高超的银匠加工制作的，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

我跟他并不认识，后来也没有再见到他。但是，我却恭恭敬敬地陪他走到街上，然后不声不响地打开他的车门，让他和装满水果的篮子上车，还郑重其事地把鹦鹉和剑交到他手里。

瓦尔帕莱索的那些无人间津的小天地，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就像什么时候被扔在仓库深处的各种箱子似的，再也没有人来找；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它们也永远不会跨出仓库大门一步。在这些神秘的疆域内，在这些瓦尔帕莱索的灵魂里，也许永远保存着浪花、暴风雨、盐、喧嚣和闪烁不定的大海早已沦丧的权势。每人心中都幽闭着令人畏惧的大海，那是一种无法交流的声音，一种会化为梦境的齏粉和飞沫的孤独的运动。

我感到惊奇，我所发现的远离城市中心的生活，竟与那令人心碎的港市保持高度的一致。在山冈上，穷困在柏油和欢乐的喷涌声中蓬勃发展。起重机、码头、人的劳动，给沿岸地带蒙上瞬息即逝的幸福所绘制的虚假图景。然而，别的一些人既不能到山冈上去，也不能在下边的活路中绘制出同样的图景。他们把自己的无限世界和大海的碎片，藏在他们的箱子里。

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武器守护着这只箱子，这时遗忘却像云雾那样向他们靠近。

瓦尔帕莱索有时会像受伤的鲸鱼那样颤抖。它在空中摇晃，奄奄一息，死去，然后又活过来。

这里，每位市民身上都有地震留下的纪念。这就是与该城的心脏血肉相连地活着的恐惧花瓣。每位市民在降生前就已是个英雄；因为，留在港市记忆中的是临头的灾祸，是大地震动时发生的颤抖，以及从地下深处传来低沉的轰鸣声如，同一座水下和地下的城市，在连续不断地敲响自己埋在地下的一口口大钟，以知人们一切都完了。

有时，当墙壁和屋顶在灰尘和火焰中，在叫喊和寂静中旬然坍塌时，当一切都在死神手中享受最后的宁静时，高大而又气势汹汹的巨浪这只绿色大手，如同最后的恐惧似地从大海里伸出来，像复仇的高塔那样凌空而起，把它够得着的生命一扫而空。

有时，一切都开始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运动，于是入睡的人们醒来了。灵魂在梦乡与扎得很深的根，与地球深处交流；它一向想了解这些事物，现在总算了解到了。后来，在剧烈的震颤中无处可逃，因为众神都已离去，爱慕虚荣的教堂也已化为一片瓦砾。

这种恐惧，与逃避狂怒的牛的追逐，逃避刺刀的威胁，逃避江河湖海的吞噬时的那种恐惧，是绝不相同的。这是一种宇宙般巨大的恐惧，一种瞬息即逝的不安全感，世界在崩塌，在破碎。这时候，大地发出低沉的轰鸣，一种谁也没有听见过的响声。

房屋倒塌时扬起的尘埃渐渐沉落下来。这时只剩下我们和我们的死者、和一切的死者在一起，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仍然活着。

各种楼梯，有的从上往下，有的从下到上，还有的盘旋而起。有的楼梯变得其细如发，让人稍事休息之后便笔直向上。有的让人头晕目眩，有的急降而下，有的延伸，有的退缩；它们永无尽头。

有多少楼梯？有多少楼梯的梯级？踩在梯级上的有多少只脚？带着书籍、西红柿、鱼、瓶子、面粉在楼梯上走上走下所留下的脚印，有多少世纪了？把梯级磨损成一道道凹槽，雨水能在凹槽里嬉戏着或哭泣着流淌，这需要多少个成千上万的小时？

这些楼梯哟！

没有任何城市像瓦尔帕莱索这样，把自己历史上、脸上的楼梯拆散，像揪花瓣般揪下来，把它们吹向空中，然后再收集拢来。任何城市的脸上，也没有这么多让生命匆匆来去的皱纹；这些皱纹似乎永远在向上伸往天空，似乎在向下降到地上。

这些楼梯使一株开紫红花的刺蓟在半路上生长出来！这些楼梯让那从亚洲归来的水手攀登而上，去自己家中找到刚绽开的微笑，找到的也许只有令人无法忍受的空房！有的醉鬼像黑流星那样从这些楼梯上摔下去！要向山冈表达爱情的太阳，就从这些楼梯上升起！

如果走遍瓦尔帕莱索的所有楼梯，我们走的路程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周。

我痛苦的瓦尔帕莱索！……在南太平洋的荒凉角落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流星或萤火虫的战斗所发出的磷光，在灾难中幸存下来了吗？

瓦尔帕莱索之夜哟！在寥廓的宇宙中，不过是本行星上一个闪亮的斑点，

何等微小。流萤闪烁时，一只金色的马蹄铁在群山间燃烧起来了。

荒凉的漫漫长夜，确实立刻展现出万点灯火的壮观身影。毕宿五随着自己遥远的脉搏在颤动；仙后座把自己的衣袋挂在天堂大门上时，南十字座悄然无声的马车正在银河的夜之精液上奔驰。

这时，前脚腾空直立的毛烘烘的人马座掉下了什么——从它那隐而不见的腿上掉下一颗金刚钻，从它那相隔遥远的皮毛里掉下一只跳蚤。

瓦尔帕莱索诞生了，它灯火辉煌，市声喧腾；它有海浪的泡沫和娼妓的淫荡。

小胡同的夜晚，到处是黑色水仙女。黑暗中门在窥探你，手在捉住你，水手们在南国的床单上走入歧途。麋集在啤酒店的波莉安塔、特里特通加、卡梅拉、神花、穆尔蒂库拉、贝丽奈西、“甜妞”，都在守护着烟言乱语的海上遇难者，她们轮番出现或相互取代，她们舞跳得无精打采，透出我那多雨地区民族的忧郁。

最坚固的帆船出港去捕鲸。其他大船开往加利福尼亚去淘金。最后的一批船稍后横渡七海，到智利的沙漠去搜罗硝石，它像摔得粉碎的雕像所形成的大量尘土，蕴藏在世界上最干燥地区的地下。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冒险。

瓦尔帕莱索透过宇宙之夜发出闪光。为了往来于陆地之间，出现了装饰得如同难以置信的鸽子似的大轮船，透息着芬芳的船，被合恩角阻留过久的饥饿的三桅船……有许多次那些刚刚下船的人急急奔向牧场……在那野蛮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子里，几个大洋只能通过巴塔哥尼亚那条遥远的海峡彼此交往。在那个时期，不管船员们是鄙视还是热爱钱币，瓦尔帕莱索都要以此付给他们。

有一条船运来一架三角钢琴；另一条船乘载过高更的秘鲁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还有一条船，是鲁滨孙·克鲁索的原型亲身乘坐过的“韦杰号”，刚刚驶抵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还有一些船运来菠萝、咖啡、苏门答腊的胡椒、瓜亚基尔的香蕉、阿萨姆邦的茉莉花茶、西班牙的茴香……这人马怪的生锈的马蹄铁似的遥远海湾，到处不时都可闻到各种香味：在一条街上，一阵桂皮的甜香会朝你扑鼻而来；在另一条街上，南美番荔枝的果香会像一支白色的箭，把你的心灵射穿；智利所有海域的海藻碎屑，会从一条胡同里蜂拥而出与你战斗。

这时，瓦尔帕莱索已是灯火辉煌，而且呈现出一种很深的金黄色；它变成一棵海上桔子树，树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浓荫匝地，累累果实发出耀眼的光彩。

瓦尔帕莱索的重重山峰决心把山上居民赶走，使之离开建在高处的房屋，以便让那些房屋在发红的漂白土悬崖上，在金顶针般的金黄色和莽莽大自然的孤寂的绿色中摇晃。然而，那些房屋和居民却抓住高处不放，在那里缩成一团，扎进地里，在那里担心和忧愁，把自己安置在极其陡峭的地方，用牙齿和爪子把自己挂在每一处悬崖上。这个海港是大海和崇山峻岭的躲闪特性之间争斗的战场；不过，在这种战斗中，得利的却是人。无数山冈和丰沛的大海决定了城市的格局，构成了它的外形——不像一座兵营，而像春天那样多姿多彩，那样强烈的色彩对比，那样生机勃勃。城里的房屋都漆成彩色——茛红配黄色，洋红配钴蓝，绿色配紫红。瓦尔帕莱索就这样履行着它

那真正的海港的使命，履行着它那虽已搁浅然而仍十分活跃的船只的使命，履行着它那旗帜迎风招展的船只的使命。太平洋的风是值得吹向一座挂满旗帜的城市的。

我在这些馥郁而又伤痕累累的山冈之间生活过。这是些丰腴的山冈，这里的生活与无边无际的郊区，与深奥莫测的贫民蜗居，与喇叭般蜿蜒曲折的河川、道路发生碰撞。在螺旋形地段等待你的是一架橙黄色旋转木马；一位修士从高处走下来；一个光脚的女孩子在埋头吃西瓜；一群乱烘烘的水手和女人；一个货摊在出售锈得一塌糊涂的金属器皿，一个小马戏团的帐篷，只容纳得下驯兽师的小胡子；一个楼梯伸向云天；一架载洋葱头的升降机向上升去；7头公驴在运水；一辆消防车正在从火警现场驶回；一个橱窗里装着生命的瓶子和装着死亡的瓶子摆在一起。

不过，这些山冈都有意味深长的名字。在这些地名之间游览，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游，因为瓦尔帕莱索之旅不仅其地面没有尽头，其文字也没有尽头。欢乐山，蝴蝶山，波朗科山，医院山，小桌山，拐角山，母狼山，索具山，陶工山，胭脂虫栎山，蕨山，漆树山，磨坊山，杏林山，包子山，鹌鹑山，阿塞韦多山，针茅山，牢狱山，狐狸山，堂娜埃尔维拉山，圣埃斯特万山，阿斯托加山，翡翠山，杏树山，罗德里格斯山，大炮山，牛奶贩子山，康塞普西翁山，墓园山，起绒草地山，杂树山，英国医院山，棕榈山，栎树山，圣胡安德迪奥斯山，波库罗山，小海湾山，羊羔山，比斯开山，堂埃利亚斯山，岬角山，芦苇山，瞭望台山，帕拉西亚山，槲寄生山，公牛山，佛罗里达山。

我不可能走遍这么多地方。瓦尔帕莱索需要一个新的海怪——一个能跑遍各个角落的八足海怪。我享用了它的辽阔，它那亲切的辽阔，但是我却无法把它五彩缤纷的右侧，它新出现的左侧，它的高山和深谷尽收眼底。

我只能通过它们的晚钟、蜿蜒起伏的地形和名字，去加以追寻。

特别是通过它们的名字，这些名字里有主根和小根，有空气和油，有历史和歌剧，因为它们的音节里流淌着鲜血。

派驻小洞的智利领事

一项大学生文学奖，我的几本新书的颇受欢迎，以及我那件闻名的斗篷，使我在文艺界之外赢得受人敬重的小名气。但是在20年代，除了有数的几个极端例外，我国的文化生活完全从属于欧洲。在我们的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世界主义的“精英”在活动，而依附于寡头统治集团的作家们却住在巴黎。我们的大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不仅用法文写作，连他的名字也改了，有时“比森特”给改成了“樊尚”。

确实，我年青时刚刚有点小名气，街上人人都问我：

“嘿，您待在这儿干什么？您真该到巴黎去。”

一位朋友把我推荐给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他立即接见了。他早已知道我的诗。

“我也知道您的抱负。请坐在这把舒服的扶手椅上。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广场，看到广场上的集市。您看看那些小汽车，全是空的。您是个青年诗人，这太幸运了。您看见那座宫殿了吗？那原是我家的。如今我竟待在这里，待在这猪圈般的地方，浑身都裹着官僚气。这种时候，唯一有价值的东

西就是精神了。您喜欢柴科夫斯基吗？”

他跟我聊了一个钟头艺术之后，伸手与我握别，对我说别为求职的事担心，说他是领事司司长。

“您现在可以认为自己已被委派在驻外的职位上了。”

在两年期间，我不时到这位彬彬有礼的领事司司长办公室去，他的态度越来越殷勤周到。他一见我来，就冷冷地把他的一位秘书叫来，皱着眉头对这位秘书说：

“我现在谁也不接见了。让我把日常的乏味谈话忘了吧。这位诗人的来访，是本部仅有的与精神有关的事情。但愿他永远不要抛弃我们。”

我确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随即不停地限我谈起良种狗。“不爱狗的人，也不会爱孩子。”接着谈到英国小说，然后转而谈到人类学和招魂术，一直扯到纹章学和谱牒的问题上去，这才打住。我告辞时，他像提及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可怕的小秘密似地再次重复说，我在国外的职位十拿九稳。尽管我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这天晚上上街时我却气粗得像个外交官。我的朋友们问我我在干什么时，我就煞有介事地答道：

“我在准备去欧洲旅行。”

这件事一直拖到遇见我的朋友比安基。智利的比安基家族是个名门世家。画家、通俗音乐家、法官、作家、探险家、安第斯登山运动员，给所有的比安基成员披上不安静和才思敏捷的色彩。我的这位朋友当过大使，了解外交部的种种秘密，他问我：

“你的任命还没通过吗？”

“据一位在部里工作的艺术保护人向我保证，我随时都可能拿到委任状。”

他笑了，对我说：

“咱们到部里瞧瞧去。”

他握住我一只手臂，我们便登上大现石楼梯。勤杂人员和雇员赶忙躲到一旁，给我们让路。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外交部部长。这位部长个子很矮，为了掩饰这个缺点，他一跃坐在办公桌上。我的朋友对他说，我急切希望离开智利。部长按了按他的许多电铃之一的按钮，我的那位精神保护人马上出现了，使我更加不知所措。

“领事人员有什么空缺吗？”部长问他。

这位现在不能闲聊柴科夫斯基的衣着讲究的官员，报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城市的名字；在这些名字中，我只捕捉到“仰光”这个从未听说过也从未读到过的名字。

“巴勃罗，您想去哪儿？”部长问我。

“去仰光。”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给他委任书。”部长给我的保护人下了命令，他急急跑开，随即带着指令回来。

外交部大厅里有个地球仪，我的朋友比安基和我在上面寻找仰光这个毫无所知的城市。这个旧地球仪的地图上，在亚洲地区有一道很深的凹痕，我们在这个凹陷的地方找到了仰光。

“仰光，仰光在这儿。”

几个小时之后，我遇到几位诗人朋友，他们要庆祝我的任命，结果我却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只能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明，我已

被任命为驻神奇的东方的领事，而找将要被派驻的地方，就在地图上的一个小洞里。

蒙帕尔纳斯

1927年6月的一天，我们动身到远方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拿我的头等船票换成两张三等船票，便登上“巴登号”轮船起程了。这是一艘德国轮船，看来只有一种舱位，而且这个“唯一的”舱位该是五等舱。餐券分为两种，一种是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供应快餐用的；另一种是供其他形形色色的旅客，尤其是供给从拉丁美洲的工厂、矿山归国的德国人就餐用的。我的旅伴阿尔瓦罗是个很活跃的色鬼，立刻对女客进行分类；他把她们分为两类：进攻男人的一类和服从鞭子的一类。这种公式不是永远都适用。两种餐券他都有，用以博得女士的爱情。每当甲板上出现几个令人感兴趣的女客，他就急忙抓起我的一只手，摆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假装给我看手相。这几个散步的女客走到第二圈时就停下来，要他给她们算命。他立刻爱抚备至地拿起她们的手，而且总是在我们的客舱的一个地方，由他滔滔不绝预言她们的未来。

这次旅行对我来说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去看那些为了永远不变的土豆餐而大声抱怨的旅客，不再去看世界和单调的大西洋，而只盯着一位巴西姑娘——地道的巴西姑娘——的大的黑眼睛，她是在里约热内卢同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一起上船的。那些年里斯本是愉快的，街上到处是渔夫，萨拉查还没上台，这使我大为惊讶。小旅馆里伙食可口；桌上摆着几大托盘水果。房屋是五颜六色的；古老的王宫大门上建有拱门。奇形怪状的大教堂像蛋壳，上帝准已在好几世纪前就离开那里，住到别的地方去了。旧王宫内有几处赌场；林荫道上的人群好奇得像儿童；精神错乱的布拉于萨女公爵神情庄严地走在铺石的街上，身后跟着成百个吃惊的流浪儿——这便是我进入欧洲的地方。

然后是马德里，市内的咖啡馆座无虚席。好心人普里莫·德·里维拉正在给一个国家上独裁统治的第一课，这个国家以后还要受到独裁统治的全部教训。我收进《地球上的住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韦蒂、洛尔卡、阿莱克桑德雷、迭戈·加西亚·洛尔卡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对我来说，西班牙也是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火车，而且三等车厢是世上最叫人受不了的地方，可就是这列火车把我们带到了巴黎。

我们消失在蒙帕尔纳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在阿根廷人、巴西人、智利人中。委内瑞拉人当时被埋在戈麦斯独裁王国下面，还不曾梦想在这里出现。而更远处，有身穿长袍的最早到来的印度人。我邻桌的女士的脖子上盘着一条小蛇，以令人感伤的缓慢速度在喝一杯牛奶咖啡。我们的南美洲侨民喝着白兰地，跳着探戈舞，等待找寻事情的原故，准备大闹一场，并且赔上半个世界的代价。

对我们这些来自南美洲的土气十足艺术家来说，巴黎、法国、欧洲，只不过是占地200米和有两个街角的蒙帕尔纳斯区、拉罗通德餐馆、勒多姆餐馆、拉库波勒餐馆，外加三四家咖啡馆。有黑人歌星演唱的夜总会刚刚流行。在南美洲人中，阿根廷人人数最多，最爱吵架，也最富有。随时会出现混乱

局面，而阿根廷人就是几个小伙子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会从几张桌上腾空而过，沉重地落到大街上。我们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堂兄弟，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粗鲁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弄皱他们的裤子，更严重的是会弄乱他们的头发。发蜡乃是当时阿根廷文化的关键部分。

事实上，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些日子，时间过得飞快，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法国人，任何一个欧洲人，任何一个亚洲人，更没有认识任何一个非洲人 and 大洋洲人。从墨西哥人到巴塔哥尼亚人这些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互相数落缺点，彼此贬低，可是谁缺了谁都活不成。一个危地马拉人宁愿与一个巴拉圭浪子为伍，以便在巴斯德方式之前，以绝妙的方式消磨时光。

在那段日子里，我结识了杰出的印欧混血人塞萨尔·巴列霍。他是个写皱皱巴巴的诗歌的诗人，他的诗像野兽皮那样摸着不舒服，不过他的诗是壮丽的，而且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确实，我们刚一认识就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事情发生在拉罗通德餐馆。我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他与我寒暄时用纯正的秘鲁口音对我说：

“您是我们所有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只有鲁文·达里奥可以和您相比。”

“巴列霍，”我对他说，“您如果要跟我交朋友，请永远不要对我讲这种话。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像作家那样交往，那我不知道我们的交情什么时候就会完结。”

我意识到我的话使他感到不快。我所受的反文学教育使我不讲礼貌。他则不然，比起我来他属于一个更古老的家族，身份高贵，而且彬彬有礼。一看出他的不快，我立刻感到自己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乡巴佬。

不过，那件事像一小片阴云那样飘走了。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诚的朋友。几年后，当我在巴黎逗留更长久时，我们天天见面。那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了。

巴列霍个子比我矮，身体比我单薄，也比我瘦。他较之我更像印第安人，眼睛乌黑，前额很高，天庭饱满。他生就一副俊秀的印加人面孔，由于确凿无疑的庄严神态而显得忧伤。他跟所有的诗人一样爱虚荣，喜欢听人对他说起诸如此类的土著特征。他扬起头让我赞美，并且对我说：

“我真有点儿那种特征，是吗？”说完自己不出声地笑了。

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与巴列霍恰好相反，他对类似的事情有时流露出十分不同的热切心情。维多夫罗让一绺头发垂在前额，把手指插在背心里，挺起胸膛问道：

“你们看出来我像拿破仑·波拿巴啦？”

巴列霍仅仅表面上阴郁，像个站在昏暗中过久而被忽视的人一般。他生性严肃，他的脸有如一具呆滞得近乎刻板的假面。然而他内心的真实感情却并非如此。我见过他多次（尤其是当我们设法使他摆脱他妻子——一个又专横又自负的法国女人、看门人的女儿——的控制时），他高兴得像小学生似的又蹦又跳。过后他便恢复了原有的严肃和谦恭。

我们曾经一直在等，可总也等不到的那位文艺保护人，突然从巴黎的阴影中出现。他是个智利作家，是拉斐尔·阿尔韦蒂的朋友，是法国人的朋友，是许多人的朋友。还有更重要的是，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他还以出手大方著称。

刚刚自天而降的这位救世主想招待我，就把我们大家带到一家名叫“高加索酒窖”的白俄夜总会去；那里的墙上点缀着高加索的服装和风景画。我们立刻被身穿山村农妇服装的俄国女人或假装的俄国女人团团围住。

我们的东道主名叫孔东，看来像是最后一个没落的俄国人。他是个意志薄弱的金发男子，不停地要来香槟酒，而且模仿他从没见过的哥萨克舞蹈动作，发疯似地跳着。

“香槟，再来香槟！”我们脸色苍白的百万富翁东道主说着突然晕倒了。他倒在桌下，睡得昏昏沉沉，像一具被熊咬死的高加索人没有血色的尸体。

我们身上一阵寒颤。无论是用冷敷，还是在这个人的鼻子前放上打开盖子的阿摩尼亚瓶子，都不能弄醒他。看到我们无依无靠，惊慌失措，除一人之外所有的舞女都置我们于不顾。在我们东道主的口袋里，我们只找到一册装帧精美的支票本，但在他死人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签字。

夜总会主事的哥萨克要求立即付款，下令关上大门，防止我们溜走。为了不致于被扣留，我们只好把我崭新的外交护照押在那里。

我们背着气息奄奄的百万富翁离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他到出租汽车跟前，把他塞进车里，然后把他卸到他居住的豪华饭店去。我们把他交到两名身穿红色制服的高大的看门仆役手里，他们抬他就像抬一位倒在自己舰只甲板上的舰队司令。

在出租汽车里等我们的那位夜总会的姑娘，是在我们倒霉时没有扔下我们不管的仅有的一个人。我和阿尔瓦罗请她去巴黎中央菜市场喝清晨的葱头汤。我们在市场里买花送她，为感谢她的善行，我们亲吻了她；我们还发现她有相当的吸引力。她不漂亮也不丑，不过，她那只往上翘的鼻子确是巴黎姑娘所特有的。于是，我们邀请她到我们寒碜的旅馆去；她跟我们去时，没有任何复杂的念头。

她同阿尔瓦罗一起去他的房间。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但是突然感到有人在使劲摇晃我。这是阿尔瓦罗；他的脸色极不平静，我感到很奇怪。

“告诉你一件事。”他对我说：“这个女人有点特别，很不平常，我没法跟你说明白。你得马上去试试。”

几分钟后，那位陌生女子困乏而宽容地钻到我床上。在同她做爱时，我证实了她那妙不可言的天赋。从她身体深处涌现的东西，非笔墨所能形容，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欢乐的根源，追溯到高潮的产生，追溯到美与爱的女神的神秘的繁育。阿尔瓦罗是对的。

第二天吃早餐时，阿尔瓦罗讲西班牙语提醒我：

“要是不马上离开这个女人，我们的旅行就要告吹了。我们也许不至于在大海上沉船，却要在深不可测的性的洗礼中灭顶。”

我们决定送给她许多小礼物——花，巧克力糖，我们剩下的一半法郎。她向我们承认，她并不在那家高加索夜总会干活；前一天晚上她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上那里去。然后我们带着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司机正在开过一个不熟悉的街区时，我们要他停车。我们跟她深情吻别，把她留在那里，她显得迷惘，但面带笑容。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我忘不了把我们载往马赛的那列火车，它像装舶来水果的筐子，载着农妇、水手等形形色色人物，载着手风琴声和全车每个乘客伴唱的歌声。我们正在奔赴地中海，正在奔赴光明的门户……那时是 1927 年。马赛具有商业的浪漫精神，而且这一历史悠久的港口，张着由独具诡秘的动荡特点而猛烈摇晃的船帆构成的翅膀，这些把我迷住了。不过，我们搭乘前往新加坡的那艘法国邮轮公司的轮船，却是漂在海上的一片法国领土，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迁移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占领一席之地。在航行途中，船员们发现了我们的打字机和一大堆手稿，就要求我们用打字机替他们打书信。我们打下了船员们口述的不可思议的情书，是写给他们在马赛、波尔多和乡下的未婚妻的。实际上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是，他们信上写的都像是特里斯坦·科比埃尔的诗，全是直率而充满柔情的信。地中海把它的大门、地毯、商人和市场逐渐展现在我们船头。在红海上，吉布提港给我留下印象。那里有阿尔蒂尔·兰波来回走过多次的烤焦的沙地，有挎着水果篮子的雕像般的黑人妇女，有原始居民的贫寒草舍，有被那使人产生幻觉的直晒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咖啡馆里乱糟糟的景象……那里可以喝到加柠檬的冷冻茶水。

重要的是应该去看看夜上海发生的事情。那些令誉不佳的城市，就像居心不良的女人那么诱人。上海朝我们两个世界的乡巴佬、钱不多又有可悲的好奇心的三等旅客，张开了黑夜的大嘴。

我们从一家大型夜总会走进另一家大型夜总会。那是平日的夜晚，夜总会里冷冷清清。宽敞的舞池建造得可供几百头大象跳舞，眼看这些舞池里没人跳舞，未免令人感到沮丧。从昏暗的角落出来几个骨瘦如柴的白俄妇女，打着哈欠要求我们请她们喝香槟酒。我们就这么跑了六七处堕落场所，唯一损失的是我们的时间。

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返回轮船需要走很长的路，需要走过这个港口纵横交错的小巷。我们各坐一辆人力车；我们对这种以人为马的交通工具很不习惯。在 1928 年，这些中国人不停地拉着小车跑了很远。

那时已经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们的人力车夫小心翼翼地停下车。他们用一块油布把人力车前部仔细挡住，不让一滴雨淋到我们的外国鼻子上。

“多么仔细、周到的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没有白白丢失。”阿尔瓦罗和我各自坐在滚动的座位上这么想。

可是，有一种情况使我不安起来。我被关闭在防护周密的框子里什么也看不见，隔着油布却可以听见拉车人含糊的说话声。接着，另外几双光脚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奔跑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跟他们光脚的脚步声汇成一片。脚步声终于减轻了，说明马路已到了尽头。很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外，正在荒地上前进。

我坐的人力车突然停下；拉车人熟练地解下给我们挡雨的油布。在那荒无人烟的郊区，连轮船的影子都没有。另一辆人力车停在我旁边，阿尔瓦罗茫然地从座位上下来。

“给钱！给钱！”围着我们的七八个人无所顾忌地说了又说。

我的朋友做出往裤袋里找武器的样子，这个动作足以使我们两人的脖颈上各挨了一下。我们仰面摔倒，不过中国人为了不致撞伤，在半中间托

住我的头，还轻轻地把我放倒在湿漉漉的地上。他们飞快地翻遍我的口袋、衬衫、帽子、鞋子、袜子、领带，熟练得如同杂耍演员。他们搜遍了每一厘米衣服，不给我们留下仅有的一点钱。上海强盗有传统的观念，倒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的文件和护照。

等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我们朝远处看得见的灯光走去。不久我们就遇到几百个夜出活动的中国人，不过他们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人会讲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只是他们都想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而且想方设法把我们领到我们焦切盼望的、天堂般的三等舱去。

我们来到日本。我们等待着的从智利汇来的钱，早该送到领事馆了。在等待期间，我们住宿在横滨的一家水手收容所里。我们睡在破旧的榻榻米上；一块窗玻璃破了，天在下雪，寒气透骨。谁也不理睬我们。一天清晨，日本海岸外有一艘油轮断成两截，收容所里住满了遇难油轮的水手；其中有个巴斯克水手，除了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什么话都不会讲。他对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惊险遭遇：他在一截船身上漂了4天4夜，周围是一片燃烧的石油火海。遇难油轮的水手都得到被单和粮食供应，那个慷慨的巴斯克小伙子成了我们的保护人。

智利总领事——好像不是叫德·拉·马里纳，就是叫德·拉·里维拉——却完全不同，接见我们时显得趾高气扬，尽力要我们明白自己落难者的卑微。他安排不出时间：他必须和由布伯爵夫人共进晚餐；皇室已邀请他去喝茶；或者他正潜心钻研当政的皇朝；还说出“天皇真是再高雅不过的人了”之类的话。

是的，他可没有电话。在横滨何需装电话？打电话来的都只会讲日语。至于我的钱的消息，他的密友银行行长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很遗憾，他得走了，有人在盛大的招待会上等他；再见啦。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们离开领事馆时总是冷得发抖，因为我们的衣服在那次路劫中减少了，身上只穿见件遇难油轮的水手送给我们的破旧绒线衫。最后一天我们才了解到，我们的钱早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汇到横滨。银行给领事先生送过三次通知。而这个自负的傀儡和高高在上的官员，根本不会发现这一类比他身份低很多的小事（每当我在报上看到某些使节被气得发疯的同胞刺杀的消息，总是怀着乡愁想起这个挂勋章的杰出人物）。

当晚我们就到东京最好的咖啡馆——银座的“小乐咖啡馆”去，吃了当时东京最好的东西；此外，忍饥挨饿的一周也使食物更加味美可口。我们在付人喜欢的日本姑娘令人愉快的陪伴下，为一切受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不近人情的使节怠慢的不幸旅客们，干了好几次杯。

新加坡。我们以为仰光近在咫尺，结果却是苦涩的失望！地图上几毫米的距离，竟变成令人恐惧的深渊。我们还要坐几天船，然而仅有的可以乘坐的班船，已在前一天开往仰光。我们已经没有钱住旅馆和买船票了。新汇来的款子正在仰光等我们。

对了，我的同事——智利驻新加坡领事——准是为了某种需要才存在的吧！曼西利亚先生风风火火地来了。他的笑意逐渐消退，直至完全消失，而化成一脸苦笑。

“我帮不了你们任何忙。你们找外交部去吧！”

我搬出驻外使节要团结的话，但无济于事。此人长着一副冷酷无情的狱吏的脸。他拿起帽子急急刺大门走去，这时我的脑海

里闪过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念头，便说：

“曼西利亚先生，我不能不举行几个关于我们祖国的讲座，以收费门票筹集旅费。请您给我提供一个场所、一名译员和必要的许可。”

此人脸都白了，说道：

“在新加坡举行关于智利的讲座？我不允许，这是我的权限，除了我，谁也不能在这里谈论智利。”

“别激动，曼西利亚先生。”我答道。“谈论我们遥远祖国的人越多越好。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发火。”

我们终于在这一表面上像是爱国主义的讹诈的荒唐谈判中，达成了谅解。他气得浑身发抖，让我们签了十张收据，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我们点钱时发现，收据上写的是更大的一笔钱。

“那是利息。”他对我们解释道。

（10天之后，我从仰光寄了一张还债的支票给他，不过，当然没付利息。）

轮船抵达仰光，我从甲板上看见高高耸立着瑞光大金塔的巨大漏斗状金顶。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服装使它们的强烈色彩呈现在码头上。一条又宽又脏的河从那里注入马达班湾。这条河在世界所有的河流中有一个最美的名字：伊洛瓦底江。

我在这条河的河边开始了新的生活。

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是个捣蛋鬼.....他现在名叫阿尔瓦罗·德·席尔瓦，住在纽约.....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纽约丛林中度过.....我想象他总是在令人反感的时间里吃橙子，总是用火柴点燃香烟纸，总是向许多人提恼人的问题.....他始终是个没有条理的教师，有超绝的才华，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才能，除了纽约之外不可能把他带往任何别的地方。那是在1925年.....他带着几乎从手里丢掉的香堇菜花，跑到一个过路的素不相识的女子跟前，想马上同她上床，既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他还不停地阅读乔伊斯的作品，向我也向别的许多人披露住在这座城市的、住在其藏身处的大人物的不可怀疑的意见和观点；他还出去探究音乐、绘画、书籍、舞蹈.....他总在吃橙子、削苹果，他的饮食要求叫人受不了；令人惊奇的是他样样闲事都爱管，我们终于看到梦境中的那种温文尔雅的乡巴佬，在梦境中我们这些乡巴佬都希望手提箱上不贴旅行标签，而希望箱子里装的是国家和音乐会、早晨喝的咖啡、屋顶盖满雪花的大学之类的混合物.....他一来，就弄得我难以生活下去.....每到一处，我都要做一场树木花草之梦，我定居一地，就力求扎下根，以便思考，以便生存.....阿尔瓦罗总是从一种突然产生的强烈兴趣，转到另一种突然产生的强烈兴趣上去，如果我们有可能参加工作的电影吸引了他，他便立刻让我们穿上穆斯林服装到电影制片厂去.....当我们前往杜姆-杜姆电影制片厂，看看他们是否聘用我们时，我身边就有几张我穿孟加拉服装的相片（如果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加尔各答的一爿烟店，他们准以为我是

泰戈尔家族的人).....不久,我们不得不悄然离开基督教青年会,因为我们没钱付房租.....护士们都爱我们.....阿尔瓦罗做起了大买卖.....他想贩卖阿萨姆邦的茶叶、喀什米尔的布匹、钟表、旧珠宝.....很快一切都赔光了.....剩下喀什米尔布匹的样品,桌上、床上尽是小包的茶叶.....他早已提着箱子到了别的地方.....在慕尼黑.....在纽约.....

我见过许多坚持不懈的、毫无缺点的、多产的作家,阿尔瓦罗却是最了不起的一位.....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作品.....我实在弄不明白.....在早晨,他还没下床就把眼镜架到鼻梁上,在打字机上劈劈啪啪打起字来,用完了成令的各种纸张,用完了成令的他所有的纸张.....可是,他的不能持久,他的批判主义,他的橙子,他的周期性转移,他在纽约的老窝,他的香堇菜花,他的纠缠不清的事,看来样样都十分清楚,而他十分清楚的事却乱得理不出头绪来,这些影响了他.....他一直在期待的作品,始终没有写出来.....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写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写不出来.....因为他太忙了.....因为他太闲了.....不过,他知道一切,他用坚定无畏的蓝眼睛注视着各洲的一切,用他那灵敏的感觉,不让时间的沙粒从他的手指间溜走.....

四、灿烂的孤独 大森林印象

我准是沉湎于这些回忆中时突然被惊醒了，惊醒我的是大海的喧嚣。我在瓦尔帕莱索附近的黑岛海岸上写作。沿海肆虐的强劲大风，刚刚平息下来。大海——我从窗口看它，它却用千百只泡沫的眼睛更注意地看着我——在波涛中仍然保留着风暴式可怕的固执。

多么遥远的年代！再现这些年代，就像再现现在断断续续传入我内心深处的涛声一样，它有时哗啦啦地弄得我昏昏欲睡，有时又像一柄宝剑似的蓦然间寒光闪闪。我将捡起这些如同起落不定的浪花般没有年代次序的印象。

1929年。夜晚。我看见许多人群集在街上。那天是个穆斯林节日。他们在街当中挖一条长沟，沟里铺满火炭。我走上前去。火炭堆在一起烧得很旺，形成一条红彤彤的带子，上面薄薄盖一层灰，火炭的热气烤我的脸。突然出现一个怪模怪样的人，脸上涂成红白两色，由四个穿红衣的男子扛来。扛的人把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放下来，他便开始招摇晃晃地从火炭上走过去，边走边喊：

“真主！真主！”

一大群人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个场面，惊讶不已。巫师已经从那条长长的火炭带子上走过，安然无恙。这时有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脱掉凉鞋，光着脚，也从火炭上走过。自愿者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有些人在火沟的半路上停下，以便在火上跺着脚喊：“真主！真主！”吼叫着做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相，同时把眼睛望着天空。还有一些人拉着自己的孩子走过去。没有人烫伤；也许有烫伤的，可我一个也没看到。

在圣河边上矗立着时母（死亡女神）神庙。我们混在千百个香客中走进庙去祈求神的恩典，这些香客都来自印度的穷乡僻壤。这些诚惶诚恐的衣衫褴褛的人被僧侣催着往前走，每走一步，僧侣们都要为点什么向他们要钱。僧侣们祭起那位可怜的女神的七个幢幡之一，每举一下就敲一下锣，锣声响得像要把世界震塌。香客们纷纷跪下，合掌行礼，用前额叩地，接着走到下一个幢幡前。和尚把他们领进一个院子，院子里正在杀牲——一斧头就砍死一只羊，而且又要收供品。受伤牲口的咩咩叫声湮没在敲锣声中。鲜血溅在肮脏的灰墙上，一直溅到顶棚。女神是个黑脸雕像，眼睛是白的，血红的舌头有两米长，从嘴里直垂到地面。她的耳朵和脖子上都挂着头骨和死亡标志串成的项链。香客们在被赶到街上之前，交出了他们的最后几个钱币。

围着我对我吟唱自己的歌曲和诗句的侍人，与那些恭顺的香客十分不同。他们身穿白色长袍，蹲在草堆上，用自己的小鼓伴奏，每人都发出若断若续的暗哑呼喊，还从他们口中听到渐渐升高的歌声，这歌是诗人按同样形式和年代久远的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不过，这些歌的感情有了变化；这些不是淫荡、享乐的歌，而是反抗的歌，是反饥饿的歌，是写于狱中的歌。印度到处都能遇到许多这种青年诗人，他们忧郁的眼神令人难忘。他们刚刚出狱，也许明天就要到监狱的大墙里去；因为，他们力图奋起反抗贫穷和神明。这是我命该在其中生活的时代；这也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新诗受到围剿时，成百万人夜夜睡在孟买郊区的路旁；他们睡眠，出主，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食，没有医药。文明、骄傲的英国使她的殖民帝国处于

这样的条件之下。她离开自己原有的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业、住房、医院，却留下监狱和堆积如山的空威士忌酒瓶。

对兰戈猩猩的回忆，是波涛送来的另一温馨的印象。在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我几次敲过那座破败的植物园的大门，每次都是他来给我开门，这使我惊奇万分。我们手拉手走过小路，一直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他用双手双脚敲打着。这时出来一个侍者，给我们端来一罐啤酒，罐子不大不小，装的酒正好够那只猩猩和本诗人喝。

在新加坡动物园，我们看见关在笼子里的琴鸟，它闪着幽光，怒气冲冲，如同刚刚飞出伊甸园的鸟儿那样光艳照人。不远处一只黑豹在笼子里走来走去，仍然散发着新近离开的那座大森林的气息。它是满天星斗之夜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断片，是一条不停活动的磁带，是一座要毁灭世界的灵活的黑火山，是一台起伏行进的产生十足动力的发电机；它的一双黄眼睛像两把准确的利剑，用那火一般的目光探索着，对于监禁和人类都毫无了解。

我们来到槟城郊外奇特的蛇神庙，该城就在从前叫做印度支那的地方。

早已有许多游客和记者对这座神庙反复描写过。它经历了那么多场战火，那么多次毁坏，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风吹雨打，已经倒塌在槟城街头，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一座深褐色的瓦顶矮房子，在密密匝匝的大芭蕉叶间遭受热带雨水的侵蚀，散发着潮气，闻得到鸡蛋花香。走进神庙时，我们在昏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一股浓烈的香火气味，那边有东西在动；那是一条蛇在伸懒腰。我们渐渐看到还有几条蛇；后来我们看出，也许有几十条。再往后，我们才明白那里有千百条蛇。有的蛇很小，盘在枝形烛台上；有的蛇是暗色的，金属般的，很细，都像睡着了，而且吃得很饱。实际上，到处都看得到很精致的大瓷盘，有的装满牛奶，有的装满鸡蛋。那些蛇看都不看我们。我们紧挨着这些蛇走过神庙里狭窄的曲径，它们有的从金碧辉煌的建筑物上垂到我们头上；有的在石砌建筑物上睡觉，有的蜷缩在祭坛上。那边有吓人的拉塞尔蝰蛇，它正在吞下一只蛋；近旁有十几条珊瑚蛇，身上血红的环状斑纹表明它有瞬息致命的毒性。我能区别矛头蛇、各种巨大的蟒蛇。厅堂里到处是绿蛇、灰蛇、青蛇、黑蛇。一切都静悄悄的。不时有身穿藏红僧袍的和尚在阴影中走过。色彩鲜明的长袍使他们看起来更像在找蛋或找牛奶盘的移动的和懒洋洋的蛇。

是谁把这些蛇弄到这里来的？它们是怎么习惯的？他们笑了笑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这些蛇是自己来的，什么时候想走也会自己走。确实，门是洞开的，没有装格栅或玻璃，也没有任何东西硬要把蛇留在庙里。

汽车离开槟城，必须穿过印度支那的大森林和村庄，才能到达西贡。没有人懂我的话，我也不懂别人的话。我们的汽车在原始森林拐弯处没有尽头的大路上停下，旅客——沉默严肃和眼睛斜视的身穿奇特服装的农民——纷纷下车。在炎热的夜幕下，这辆嘎吱作响的、眼看就要解体的、沉着的破车里，只剩下了三四个人。

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要在陌生人中间度过这漫漫长夜？想到这些，我突然怕得要命。我们正在穿越老挝和柬埔寨。我观察最后几个旅伴不露声色的脸；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觉得他们一脸凶相。

毫无疑问，我已身陷东方故事所描述的典型强盗中了。

他们交换了会意的眼色，便偷眼观察我。就在这时，汽车正静静地停在大森林深处。我选好了赴死的地点。我将不允许他们把我带到那种不知名的树下去处决，那种树的黑影把天空遮蔽了。我要死在那里，死在快散架的汽车的板凳上，死在菜篮、鸡笼这些在那恐怖时刻让人感到亲切的仅有的一些东西中间。我将环顾四周，决心对付刽子手们的凶残，我想必会看到，这样一来他们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等了很久，孑然一身，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浓浓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能知道我即将死去。我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爱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

突然出现一盏灯，接着又一盏灯。路上到处是灯。鼓声冬冬；忽然传来柬埔寨音乐刺耳的乐声。笛子、鼓和火把，使路上显得又亮堂又热闹。一位男子上车来，用英语对我说：

“汽车坏了。恐怕要等很久，也许要等到天亮，这里又没有睡觉的地方，旅客们找来一个音乐舞蹈队让您消遣。”

在我已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的那些树下，我观看了几小时神妙的敬神舞蹈，它产生于一种崇高的古老文化，路上随处可闻的悦耳乐声，我一直听到红日东升。

诗人不能惧怕人民。我觉得生活给了我一个忠告，还给了我一个永远值得记取的教训，那就是：关于不显示荣耀的教训，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友谊的教

训，关于在黑暗中开花的美的教训。

印度国民大会党

今天是个光辉的日子。我们出席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代表大会。一个民族正在全力争取自己的自由。走廊里有几千名代表。我见到甘地本人。我还见到潘迪特·莫蒂拉尔·尼赫鲁/，他也是独立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我也见到他的儿子——英俊、年青的贾瓦哈拉尔，他刚从英国回来。尼赫鲁主张独立，甘地却坚持认为单纯的自治是必要步骤。甘地长着一张机灵的狐狸般清秀的脸，是个实干家，一个类似于我们土生白人老一辈领袖人物的政治家，是委员会的决策人，孜孜不倦的策略高手。无数群众形成一条没有尽头的人流，崇敬地触摸他身上白色长袍的边，并且高呼“甘地先生！甘地先生！”这时他没有摘下眼镜，很随便地致礼和微笑。他收信并读信，答复电报，做什么都从容不迫；他是个不会耗尽精力的智者。尼赫鲁是他们的革命的智慧教导者。

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 是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人物，他是个容易冲动的鼓动者、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者，是他祖国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政治人物。在1914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期间，他与日本人团结一致，反对英帝国。许多年后，就在印度，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新加坡这个据点是如何陷落的：

“我们是有对付日本围攻者的兵力的。我们忽然自问……这是为什么？于是我们让我们的士兵转过身去，把枪瞄准英国军队。这太简单了。日本人是短暂的侵略者；英国人看来是长久的侵略者。”

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被捕了，受到印度英国法院的审讯，并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拥护独立的人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浪潮。经过许多次法律斗争，他的律师——尼赫鲁本人——使他获得特赦。从此他成了人民英雄。

卧 佛

到处是佛像，佛陀的像……庄严的、直立的、被蛀蚀的佛像，镀金的，具有野兽那样润泽的金色；剥落的，像是风造成的损坏……在脸颊上，在长袍的褶子间，在肘上、肚脐上、嘴上和微笑中，都出现了小小的污斑，那是真菌、小洞、大森林中鸟兽粪便的痕迹……这里还有卧佛，巨大的卧佛，40米长的苍白石像——砂质花岗岩石像——横陈在簌簌作响的枝叶间，出人意料地显现在大森林的一个角落，显现在周围的某个可以安放的台子上……睡着的或者没有睡着的，在那里经历了一百年，一千年，千百万年……不过，他们是柔和的，面带一种人们熟悉的关于来世的难以捉摸的神态，有的渴望留下，有的渴望离去……但是，那十分柔和的石头的笑容，那无法估量的庄严，却是用坚硬的、不朽的石头雕成的，在这血染的大地上他们对谁笑？对哪些人笑？……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有逃亡的农妇，有从水深火热中出来的男人，有乔装打扮的士兵，有虚伪的僧侣，有什么都想看的旅游者……而那尊佛像——那有膝盖的、石头长袍上有褶子的、目光消失但又存在的巨大石像——留在那里，它完全没有人的感情，但在一些方面又有人的感情；在大森林的黑鸟的聒噪声中，在大森林的红鸟的扑扇翅膀声里，那尊石像在形式或矛盾方面，既是又不是神，既是又不是石头雕成的……我们不由地想到可怕的西班牙基督像，那些像使我们继承了全部伤口，全部脓疮，全部疤痕，教堂里的蜡烛气味、霉味、关闭的房间的气味……那些基督也拿不准是人还是神……为了把基督塑造成人，为了使之更接近于受苦的人——产妇和被斩首的人、瘫痪患者和吝啬人、神甫和教徒，雕刻家们总要给他们加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伤口，把那一切变成受苦的宗教，变成犯罪要受苦，不犯罪也要受苦，活着还是要受苦，毫无跳出苦海的脱身之计……这里却不是如此，这里连石头都是宁静的……雕刻家们不遵从关于受苦受难的教规，于是这些有大仙的脚的巨大佛像，在石雕的脸上露出人的安详笑意，并没有多少痛苦……他们散发出来的不是陈尸房的气味，也不是教堂圣器室和蜘蛛网的气味，而是长满树木花草地方的清香，而是无边的火森林里骤然刮起的一股羽毛、树叶、花粉的飓风般的气息……

不幸的人类家庭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的诗的文章，说我在远东的逗留，对我的创作的某些方面产生了影响，对《大地上的住所》这部诗集影响尤深。诚然，我在那个时期写的只有收入《大地上的住所》中的那些诗，不过，我不敢断然坚持这一点，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关于产生影响的说法似乎是错误的。

东方各国的哲学都很深奥，可是一旦面对真实生活，便会衍生出不安、神经官能症、迷惘和西方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会衍生出资本主义基本现象之一的经济危机。在那些年代，印度还没有多少地方能让人看到其深刻的核心问题。残酷地追求物质的生活，以最真诚的卑劣为基础的殖民地条件，每天

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由于人口众多和工业不发展而失去平衡的封建社会结构，这一切都给印度的生活打上极度野蛮的印记，它的神秘面纱因而也就消失无遗了。

神智学的核心几乎一直控制在西方冒险家手里，其中也不乏北美人和南美女人。他们中当然也有好心人，但是大多数都利用廉价市场，批发护身符和裹上一层低劣的玄学色彩的奇形怪状的偶像。这种人满口都是“法”和“瑜伽”。渗透着空虚和连篇废话的宗教体操，使他们入迷得如醉如痴。

因此，东方留给我的印象是像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我在心里没有给他们的宗教仪式和神明留下位置。我认为，我在那个时期写的诗，除了反映一个外地人移居到野蛮而又奇怪的世界所感受的孤独之外，并没有反映别的东西。

我记起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游客，是个素食者和大学讲师。他身材矮小，已届中年，光溜溜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敏锐而且无所顾忌，名叫鲍尔斯。他来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个佛教徒；他每次总是以下述饮食劝告来结束他的讲座：“你们要像洛克菲勒所说的那样，每天吃一个橙子。”

这个鲍尔斯以其令人愉快的无所顾忌，使我产生好感。他会讲西班牙语。在他讲座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大啖洋葱烤羊羔。他是个佛学学者（不知道是否正统），有比他的讲座内容更真实的口腹之欲。

一个迷上他的常礼服和理论的混血姑娘，很快就把他俘虏了。她是个虚弱的小姐，眼神痛苦，把他奉为神明，奉为活佛。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次恋爱经过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来找我参加他的又一次婚礼。他在一家商行当冰箱推销员，我们骑着商行供他使用的摩托车，把树林、寺院、稻田飞速抛到后面。我们终于到达一个中国人建造和居住的小村。他们用花炮和音乐迎接鲍尔斯，这时年青的新娘脸上搽得像个偶像那么白，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比别人坐得更高的椅子上。我们在音乐声中喝各种颜色的清凉饮料。鲍尔斯任何时候都不跟他的新妻子说话。

我们返回城里。鲍尔斯对我说明，只有新娘参加这个出嫁仪式。仪式将继续举行，不需要他在场。稍后他再回去同她一起生活。

“你没意识到，你这是在搞一夫多妻吗？”我问他。

“我的另一个妻子知道这件事，她会很高兴的。”他答道。

他说的这句话，跟他说的每天吃橙子的事一样真实。我们一到他家（他第一个妻子的家），就发现他的这个妻子——一个痛苦的混血女子——已经命在垂危，单腿小圆桌上放着她服毒用的杯子和一封诀别书。他黝黑的身上一丝不挂，一动不动地躺在蚊帐里。她的弥留状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尽管我已开始对鲍尔斯反感，但是因为他显然很痛苦，我就陪着他。这个无耻之徒的精神垮了。我同他一起去参加葬礼。廉价的棺木放置在河岸边小山似的柴堆上。鲍尔斯用火柴点燃碎柴，嘴里喃喃地念着梵文的送灵词。

几个身穿杏黄色长袍的乐手单调地唱着，或者吹着悲切的乐器。这一大堆柴禾烧了一半就灭了，必须用火柴重新点燃。那条河在河道里漠不关心地流淌。东方那永恒的蓝天也显出绝对的无动于衷，对一个可怜的弃妇的孤独而凄凉的葬礼，显得十分冷漠。

我的外交官职权，每3个月只行使一次，这时候有一艘载运硬石蜡和一

大箱一大箱茶叶到智利的轮船，从加尔各答开来。给文件盖章和签署文件的速度，都须发烧似地加快。随后而来的是无所事事的另外3个月，隐士似地独自观赏市场和寺院。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街道成为我的宗教。缅甸的街道，唐人街里有他们的露天戏台、纸龙灯和亮闪闪的灯笼。印度人的街道非常简陋，有作为一个种姓做买卖场所的寺庙，穷人们都在寺院外的烂泥地上跪拜。市场里槟榔叶堆成孔雀石山似的绿色金字塔。鸟店是出售野兽和野禽的地方。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有嘴叼长烟卷的、婀娜的缅甸妇女走过。这一切吸引了我，使我渐渐被真实生活的魅力迷住了。

种姓把印度人分成等级，就像有平行六边形楼座的剧场，楼座一层比一层高，在最高一层就座的是神明。英国人也保持着他们的等级制度，从小店员起到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然后是出口商，最后才是舒舒服服坐在这个制度的屋顶平台上的文职人员委员会的贵族们和帝国的银行家们。

这两个世界互不接触。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英国人使用的地方，英国人过的生活与当地的动荡也毫无瓜葛。这样的处境给我造成了难题。我的英国朋友总是坐一种马车来看我，这种马车专供流动性的短暂幽会使用，有人亲切地提醒我说，像我这样一位领事，无论如何都不该乘坐这种马车。有人还老实不客气地叫我别到一家波斯餐馆去坐，我在这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用透明的小茶杯喝了世界上最好的茶。这是他们的最后忠告。后来他们就不跟我打招呼了。

他们的抵制使我感到高兴。那些偏见很深的欧洲人并没有什么兴趣跟我说话，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我相当深入到那里人民的心灵和生活中去，我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她的衣着像英国女子，在街上自称乔丝·布莉斯。不过，在他家的亲人中——不久我就得以分享——她脱下英国服装，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纱龙；她不用街上的名字，而用保密的缅甸名字。

《鰥夫的探戈》

我的私生活产生了麻烦。温柔的乔丝·布莉斯爱得钟情而且热烈，终于患了忌妒的毛病。若没有这个毛病，我也许会永远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喜爱她的裸足，喜爱插在她黑色秀发上粲然的白花。但是，她的性格驱使她突然变得野蛮起来。她对远方给我的来信又忌妒又反感，给我的电报，她不开封就藏起来；连我呼吸的空气，她都要恨恨地加以监视。

有时我被一道光线惊醒，蚊帐外面有个幽灵在移动。那就是他，身穿白衣服，挥舞着当地锋利的长刀子。她整整几个小时在我睡的床周围走来走去，下不了决心杀死我。她对我说：“你一死，我就不担心了。”第二天，他举行了神秘的宗教仪式，以保证我不变心。

她终究会杀死我。幸亏我收到一封公函，通知把我调往锡兰，我暗暗进行旅行的准备，一天我扔掉衣服和书，像平常一样离开家，登上了把我带往远方的那艘船。

我非常痛苦地扔下了乔丝·布莉斯这个缅甸母豹。轮船刚刚开始拉湾的风浪里颠簸的时候，我就动笔写《鰥夫的探戈》那篇长诗了。我那篇

长诗的悲剧段落，另的是我失去她、她也失去我的那个女人，因为在她汨汨流动的血液里，愤怒的火山是不会止息的。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

鸦 片

.....有几条街整条都是做鸦片买卖的.....鸦片烟客躺在低矮的木板台子上.....这是印度真正神圣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奢侈品，既没有壁毯，也没有锦缎靠垫.....未上漆的木板、竹烟枪和中国瓷枕头，就是全部物品.....浮动着寺院内所没有的庄严和简朴的空气.....昏昏欲睡的男人不动也不出声.....我抽了一泡烟.....没有任何感觉.....那朦胧的烟是温暖的、乳白色的.....我抽了4泡烟，生了5天病，脊髓里冒出的恶心感觉，从脑子里降下来.....还产生一种对阳光和生存的反感.....这是鸦片的惩罚.....不过，这并不是全部感受.....说过那么多话，写过那么多文章，在海关里把大大小小的手提箱翻了又翻，力图搜获毒品——这种著名的神圣毒品.....我必须克服恶心.....我必须熟悉鸦片，深入了解鸦片，以便提出我的证词.....我抽了许多泡鸦片，直到我熟悉它.....没有产生梦幻，没有出现幻像，也没有突然的发作.....只有气力逐渐减弱，像无限柔和的音乐旋律在大气中延长.....内心深处一片昏昏沉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肘部和脖子有轻微的动作，听到远处传来的车子滚动声、汽笛声和街道上的叫喊声，渐渐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变成一种静止的愉快.....我明白了种植园的壮工、临时工、整天不停拉车的人力车夫，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昏昏沉沉地、一动不动地躺到那里去.....鸦片并不像有人向我描绘的那样，是爱好异国情调的人的天堂，而是被剥削者摆脱痛苦的避难所.....所有那些鸦片烟客都是可怜虫.....那里没有带花边的靠垫，没有任何少量财富的痕迹.....那里的环境中，甚至那些鸦片烟客半睁半闭的眼睛里，没有任何闪光的东西.....他们休息了吗？睡着了吗？我永远也无法知道.....没有人说话.....永远没有人说话.....那里没有家具、地毯，什么都没有.....破旧的木板台子经人反复触摸而显得十分光滑，上面看得见几个小木枕.....除了寂静和极其令人反感的、浓烈的鸦片烟味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有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商业巨头的鸦片，殖民主义者的鸦片，是供被殖民者使用的.....鸦片烟馆门口挂着他们载有法定供应量和号码的执照.....烟馆内笼罩着阴沉的无边寂静，笼罩着能缓和不幸和消除疲乏的静止不动.....一种朦朦胧胧的寂静，无数破碎的梦的残片在这里找到了平静的安身之所.....那些眯着眼睛进入梦乡的人只要沉浸在海底一个小时，便会一整夜生活在山冈上，为美妙、愉快的休息而心情舒畅.....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去鸦片烟馆.....我已经深入了解了.....我已经熟悉了.....我已经体会到远远隐藏在鸦片烟雾后边的.....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

锡 兰

锡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岛，大约在1929年就有了和缅甸及印度相同的殖民地结构。英国人呆在自己的居住区和俱乐部里不与外界来往，围绕着的是一大群乐师、陶工、编织工、种植园奴隶、身穿黄僧袍的和尚和雕

在石山上的巨大神像。

处在每晚都穿无尾常礼服的英国人和身材高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时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不过，我记得那也是最灿烂的时期，好像是停在我窗前的一道特别耀眼的闪光，以便把我的命运里里外外照个通亮。

我住在韦过瓦特郊区新建在海边的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里。那是一个烟稀少的地区，海浪不断地在近处的礁石上砸得粉碎。海上音乐夜间更响亮了。

清晨，那刚刚清洗过的大自然奇迹令我惊奇。我一大早就跟渔夫在一起。配备有长浮筒的船只像一只只海蜘蛛。人们把色彩鲜明的鱼拉上来，这些鱼就像无边的大森林里的鸟，有的像绷得很紧的活的天鹅绒，闪着深蓝色的鳞光：有的形状像跑了气的带刺气球，变得像可怜巴巴的有刺的小口袋。

我恐惧地凝视着屠杀海中珍宝的场面。鱼被切成块卖给穷人。屠宰人的砍刀把大海深处的神圣物质切成小块，把它们变成血淋淋的商品。

我沿海岸走到大象洗澡的地方。有我的狗同行，我不会迷路。从平静的水里冒出一个一动不动的灰色蘑菇，它随即变成一条蛇，然后变成大脑袋，最后成了带象牙的山。世界上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大象在路上干活。现在在远离马戏场和动物园围栅的地方，看见它们像勤劳、魁伟的短工那样，把木材从路的一侧搬到另一侧，感到十分惊奇。

我的狗和獾是我仅有的伙伴。刚从大森林来的獾在我身边成长，在我床上睡，在我餐桌上吃。谁也想象不到一只獾的温情。我的小动物知道我的每一分钟生活，在我的稿纸上散步，整日跟在我身后奔跑。午睡时刻它蜷缩在我的肩膀和脑袋之间，也在这里睡觉——野生动物那种警醒和快速的睡眠。

我驯养的獾在我居住的郊区很出名。由于獾总是勇敢地对可怕的眼镜蛇进行坚韧的斗争，它享有一种神话般的声望；看过几次獾跟蛇的搏斗之后，我认为它们战胜蛇，是靠灵活和身上那层又像盐又像辣椒那种颜色的厚毛，因为这层厚毛使蛇上当，还把蛇弄糊涂了。那里的人认为，獾在跟有毒的敌人搏斗之后，就出去找解毒的草。

我的獾每天陪伴我长时间地在海滩上散步，有一天下午，它的声望确实使我居住的那个郊区的所有孩子，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我家来。街上出现一条大蛇，他们来求我的著名的獾基里亚去对付，而且准备好为它庆祝确定无疑的胜利。我抱着我的獾走在武士队伍前头，跟在后边的是我的崇拜者——一大群身上只有一块遮羞布的泰米尔族和僧伽罗族的孩子们。

那条蛇是一种可怕的黑环蛇，或是拉塞尔蝰蛇，有致命的毒性。它在草地一个白色管道上晒太阳，就像雪地上一根鞭子那么显眼。

跟随我的人都静悄悄地停在后面。我顺着管道往前走。在离那条蝰蛇大约两米远的地方，我把獾放出去。基里亚在空气中闻到危险的气味，慢慢向蝰蛇爬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屏住呼吸。一场激战就要开始。那条蛇卷成圈，把头高高抬起，张开大嘴，把它那催眠的视线盯着小动物。獾继续前进。但是在距那只怪物的大嘴几厘米远的地方，它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于是高高一跃，便朝相反方向一溜烟地跑了，把蛇和观众扔下不管。它一直跑到我的卧室才停下。

30年前在韦拉瓦特郊区，我的声望就这样扫地以尽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妹妹带给我一个笔记本，本子里抄录的是我写于 1918 年和 1919 年的最早的诗。阅读这些诗的时候，我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痛苦，对我青年时代写的全部作品所散发的文人的孤独感，不禁哑然失笑。青年作家没有这种孤独的震撼（虽然也许是虚假的），就不可能写作；成熟的作家若没有人际交往和社会体验，也写不出东西来。

在韦拉瓦特度过的那些岁月，我才尝到了真正的孤独。我那时一直睡行军床，像个士兵和探险家。与我为伴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的工作，我的狗，我的獐，还有白天侍候我、晚上回自己村子去的那个仆人。确切地说，这个仆人不是伙伴；东方仆人的身份迫使他显得比影子还要安静。他曾名叫或者仍然名叫布拉姆皮。根本无需对他发号施令，因为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的饭已经摆在桌上，我的衣服刚刚熨好，威士忌酒瓶已放在走廊上。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讲话，只会露着大板牙笑。

在这种情况下，孤独可不是什么文学主题，而是像监狱的大墙那样坚固的东西，你撞上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即使大哭大喊也不会有人来。

我明白，透过蓝幽幽的空气，跨过金灿灿的黄沙，在原始大森林以外的地方，在蝰蛇和大象以远的所在，有千千万万人在水边歌唱和劳动，他们把火点燃，制作水罐；那里还有热情的妇女，在繁星照耀下一丝不挂地睡在薄薄的草席上。但是，我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

我渐渐了解了这个岛。一天夜里，我走过科伦坡所有的黑暗郊区，去参加一个盛宴。从一所黑黢黢的房子里传来一个男孩（也许是个女子）唱歌的声音。我让人力车停下。在简陋的大门口，一股气味向我扑来，这是锡兰所特有的香味——茉莉花、汗气、椰子油、鸡蛋花和洋玉兰花混合在一起的香味。一张张黝黑的脸同夜的色彩和气味混成一片，他们请我进屋。我静静地坐在草席上，这时使我驻足不前的神秘人声——男孩的、也许是女子的声音——仍然在黑暗中如泣如诉地颤动；这声音升高到难以置信的高度，便戛然而止，随即降低到像阴影那样黑暗，融汇到鸡蛋花香气中去，盘绕成阿拉伯图案，而且像已经高高喷到空中的泉水那样，突然带着它全部晶莹的重量落下来，以便立刻散落在茉莉花丛间。

富有魅力的鼓声和迷人的歌声，使我一动不动地在那里流连了很久；然后，我才继续上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谜似的激情和从那一整片大地发出的神秘旋律，弄得如醉如痴。这是一片萦绕着阴影和香气的充满乐声的大地。

身穿黑白两色礼服的英国人早已入席。

“请原谅。我在路上停下听音乐了。”我对他们说。

他们在锡兰已经生活了 25 年，听后都高雅地感到惊讶。音乐？本地人也有音乐？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新闻。

英国殖民者与广阔的亚洲世界之间这种可怕的距离，是永无止境的；它还始终表明一种非人道的孤立，表明一种对本地人的价值和生活的完全无知。

殖民主义之内也有例外，稍后我了解到这种情况。行业福利俱乐部的一个英国人忽然迷恋上一位印度美人；他立刻被解雇，像麻风病人那样受他同胞的孤立。当时还发生一件事：殖民者为了赶走一户僧伽罗农民，征用他们

的土地，就下令焚毁他们的茅屋。必须执行夷平茅屋命令的英国人，是个低级官员，名叫伦纳德·吴尔夫。但是，他拒绝执行，于是被撤了职。他回到英国，在那里写了一本最精彩的书之一，那就是从来没有写过的有关东方的书《丛林中的村庄》——反映真实生活和真正文学的杰作。由于吴尔夫的妻子——恰好就是那位名扬全球的主观的大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名气，使得他这部作品多少有点逊色。

那层难以穿透的硬壳渐渐碎裂，我结交了有数的几位好朋友。我同时发现，浸透殖民主义文化的青年人，谈的都是关于英国新近出版的几本书。我发现钢琴家、摄影家、评论家、电影摄影师莱昂内尔·温特，是文化生活的中心人物；这种文化生活，在帝国的临终喘息和对锡兰的纯洁价值的思考之间挣扎。

这位莱昂内尔·温特拥有一座大图书馆，而且能收到英国最新出版的书；他身上穿的衣服又古怪又考究，每周都派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运一袋书到我离城很远的住所来。于是，我在那段时间里阅读了许多英国小说，这些书排列起来可达好几公里长，其中有佛罗伦萨秘密出版的第一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作品以其诗情画意和让人注意人与人之间隐秘关系的强烈吸引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我很快发现，劳伦斯虽然才华横溢，说教的癖好却使他与许多英国大作家一样遭受了失败。D.H.劳伦斯开的性教育课，同我们学习生活和爱情的天性没有多大关系。结果使我厌烦透了，然而这并不减弱我对于他所做的探索的赞叹；他那折磨人的神秘的性探索越是无用，越是令人感到痛苦。

我还记得的与锡兰有关的事，是一次大规模的猎象行动。

一个地区大象繁殖过多，不断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沿一条大河的岸边，农民用火、篝火和铎把大象群集中起来，赶到大森林的一角。从早到晚篝火和铎声使大象不得安宁，它们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向锡兰岛东北部移动。

那天，象栏准备好了。木栅把森林的一部分拦起来。我看见第一头象通过一条狭窄通道走进，才发觉它已被围困；但已经晚了。几百头象都从这条狭窄的死通道往前走。将近 500 头大象进退不得。

最强壮的公象朝木栅走去，想把木栅弄断；可是，木栅后面伸出无数长矛阻止它们。它们于是退到围场当中，决心去保护它们的母象和小象。它们的防守和组织令人感动。它们发出马嘶或刺耳的号声似的令人痛苦的叫声，绝望中把最柔弱的树木连根拔起。

突然，两个驯兽师骑在两头被驯养的高大的大象进去了。这两头驯养的大象像普通警察那样采取行动。它们走到被俘大象两侧，用长鼻子打它，帮助制伏它，使它老实不动。这时猎人用粗索把它的一条后腿拴到一棵粗壮的大树上去。就这样，大象一头一头都被降伏了。

被俘的大象好几天不肯进食。但是猎人了解它们的弱点，让它们饿一段时间，然后把它们爱吃的植物的芽和嫩枝送来，它们在没有被俘时曾经在大森林里长途跋涉去寻找这种食物。大象终于决定吃东西了。大象就这样驯服了，而且开始学于繁重的工作。

在科伦坡，显然看不到任何革命的征兆。这里的政治气候与印度的有所不同。一切都沉浸在压抑的平静中。这个国家给英国人供应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茶叶。

这个国家分为好几个阶层或部分。英国人占据金字塔的顶端，居住在带花园的深宅大院里，他们之下是类似南美各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员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叫做自由民，他们是上世纪殖民战争期间被流放到锡兰来的布尔人——南非的荷兰移民——的后裔。

再下一等的是僧伽罗族的佛教徒居民和伊斯兰教徒居民，人数有好几百万。更下一等的是从事低报酬工种的阶层，其中包括几百万印度移民，他们全部来自印度南部，讲泰米尔语，情仰印度教。

在科伦坡雅致的俱乐部中展示华丽服装和珍贵首饰的所谓“社交界”中，有两个赶时髦的名人争强斗胜。一个是冒牌的法国贵族莫尼伯爵，他有一帮子追随者。另一个是大大咧咧的风雅的波兰人——我的朋友温策尔，她常在有限的几个沙龙里高谈阔论。此人绝顶聪明，相当无耻，对世上的事无所不晓。他的职业很怪，是所谓文化与考古珍宝保管人，有一次伴随他进行公务旅行，使我眼界大开。

发掘工作使阿努拉德普勒和波隆纳鲁沃两座宏伟的古城重见天日，这两座古城曾经被大森林湮没。圆柱和走廊重新在僧伽罗的阳光下闪现光辉。当然，一切可以运送的东西，都被妥善包装后运往伦敦的英国博物馆。

我的朋友温策尔干这项工作干得不错。他来到偏远的寺院，在佛教和尚的竭力讨好下，把奇绝的千年石雕搬到官方派来的小型卡车上，英国的许多博物馆就是这些古物的最终目的地。当温策尔在古石雕的位置放上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日本赛璐珞佛雕时，那些身披藏红僧袍的和尚无不面呈喜色。他们毕恭毕敬地瞻仰这些赛璐珞佛像，把它们安放在碧玉佛像和花冈石佛像曾经在那里微笑了几个世纪的佛坛上。

我的朋友温策尔确是英帝国的一件出色产物，就是说，是一个高雅的无耻之徒。

有件事把那些本已被太阳晒得憔悴不堪的日子给搅乱了。我的缅甸情妇——性格暴烈的乔丝·布莉斯——意外地在我家对面安顿下来。她从自己遥远的国度长途跋涉来到锡兰。她以为只有仰光有大米，来时背了一袋大米，还带来我们喜欢的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和一块卷好的长地毯。被毁灭性的妒忌折磨得憔悴不堪的乔丝·布莉斯，在大门口监视所有来找我的人，决定以后对他们进行侮辱和袭击，同时扬言要放火烧我的住宅。记得她用一把长刀攻击过一个来找我的温柔的欧亚混血姑娘。

殖民地警方认为，她无法控制的行为是平静的街上发生混乱的根源。他们对我说，如果我不收留她，他们要把她驱逐出国。我痛苦了好多天，在她的不幸爱情使我感受到的温情和我对她感到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我不能让她踏进我的家。她是个爱情恐怖分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一天，她终于决定走了。她要求我送她上船。船即将起航，我必须上岸了，这时她离开同伴，在痛苦和爱情的交并中亲吻我，洒了我一脸眼泪。她像进行宗教仪式似地吻我的手臂，吻我的衣服，她又突然弯下身去吻我的鞋，我根本来不及躲开。当她重新站直身子时，她的脸上沾着我白鞋上的白粉。

我不能要求她打消这次旅行，同我一起离开即将永远把她带走的这条船。理智阻止我这么办，但是我的心那时却留下了一道抹不掉的伤痕。那强烈的痛苦，那在沾着白粉的脸上滚滚落下的泪水，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地上的住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写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距离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开，我又无法真正进入我周围的世界。

我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仿佛悬浮于真空中，我把这些事情集中起来，使之成为这本书的天然情节，因此它“与其说是用墨水写的，不如说更是用血写的”。不过，我使自己的风格更加简洁，而且热衷于一再重复强烈的感伤。在一种力求逐渐自我毁灭的苦涩风格中，我坚持真实和讲究修辞（因为这两种面粉做的是诗的面包）。风格不仅仅是人；它也是围绕着人的一切东西，倘若空气没有进入诗的深处，这诗便是僵死的——因不能呼吸而僵死。

我在科伦坡的那个郊区孤独地生活了很久，从来没有像在那里那样读了那么多书，而且读得那么愉快。我不时回到兰波、克维多或者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去。《斯万之家》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苦闷、爱情和妒忌。我还明白，在樊特伊的奏鸣曲的乐句——普鲁斯特称之为“轻盈又芬芳的”乐句——里，不仅可以欣赏到对迷人乐音所作的精妙绝伦的描写，还可以体味到令人绝望的激情。

我的问题是在那样孤独的环境中，遇到了那样的音乐，而且听到了。在我的音乐家和音乐研究家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经过探索得知，普鲁斯特笔下的樊特伊也许是把舒伯特、瓦格纳、圣-桑、福莱、丹第、塞扎尔·弗兰克等人糅合而成的。我所受的差劲得令人难堪的音乐教育，使我对这些音乐家几乎全部毫无所知。他们的作品对我来说不是下落不明的便是打不开的黑匣子。我的耳朵向来只能辨认最浅显明了的曲调，就连做到这一点也很困难。

为了对音乐，尤其是为了对文学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终于得到一个唱片集，内装3张唱片，录有塞扎尔·弗兰克为钢琴和小提琴谱写的奏鸣曲。毫无疑问，这3张唱片里有樊特伊的乐句。这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只有文学对我有吸引力。普鲁斯特这位最伟大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关于爱与恨的奄奄一息的社会的评论性记事中，他热烈而又兴致勃勃地提及许多艺术作品、绘画、大教堂、女演员和书籍。不过，虽然他的洞察力照亮所涉及的一切，他还是回到这首奏鸣曲的魅力及其几乎未加其他描述性段落的、加强了力度的再现乐句上去。他的词句指引我去再度体验自己的生活，去再度体验由于我自己、由于我自己的离去而失落的那些久远的感情。我要在那种乐句中了解普鲁斯特极具文学魅力的描述，还要乘着音乐的翅膀去接受或被人接受。

这种乐句笼罩在浓浓的阴影中，声音渐渐暗哑，它所表达的痛苦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扩大。仿佛它的忧伤建造得像一座哥特式建筑，涡形装饰一再重复，同一个尖顶随着它的节奏不停地升高。

产生于痛苦的乐句在寻觅获胜的出路，它在向上扬起时并不否定被悲伤搅乱的根源。当那架黑色钢琴为音乐的死亡和再生反复伴奏时，那乐句仿佛缠绕成一条哀伤的螺旋线。钢琴反复弹奏，蜿蜒曲折地产生断肠的愁绪，一直弹奏到爱情和痛苦在奄奄一息的胜利中结合为一体。

我毫不怀疑这些就是那种乐句，就是那首奏鸣曲。

黑暗突然降临，像拳头一样砸在我迷失于韦拉瓦特椰林间的房子上；但

是那首奏鸣曲夜夜和我生活在一起，引导着我，萦绕着我，使我感受到它永恒的哀伤。感受到它胜利的忧郁。

仔细翻阅过我的著作的评论家们，迄今仍未看出我正在这里坦白的这一秘密影响。因为，《大地上的住所》的大部分，我是在韦拉瓦特那个地方写的。尽管我的诗既“不芬芳也不轻盈”，而是可悲地落在地上，我觉得那些一再蒙上悲伤色彩的主题，却和那种与我共同生活的音乐的亲密关系有关。

几年之后，我回到智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到3位一起赴会的年轻人——3位智利的大音乐家。我认为那是在1932年，在玛尔塔·布鲁内特家里。

在一个角落，克劳迪奥·阿劳正在跟多明戈·圣克鲁斯和阿曼多·卡瓦哈尔交谈。我向他们走去，但是他们看也不着我一眼，继续不紧不慢地谈着音乐和音乐家。于是我想露一手，向他们谈到那首奏鸣曲——我所知道的仅有一首奏鸣曲。

他们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我，而且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塞扎尔·弗兰克，干吗谈塞扎尔·弗兰克呢？你该知道的是威尔第。”他们继续交谈，把我埋葬在无知中，至今我仍未能挣扎出来。

新加坡

科伦坡的孤独确实不仅令人厌烦，而且使人麻木。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我只有有数的几位朋友。不同肤色的女友们在我的行军床上睡过，除了极短暂的肌肤接触外，没有留下更多的陈迹。我的身躯是一堆孤独的篝火，在那里的热带海边日夜燃烧。我的女友帕齐经常带她的几个伙伴前来，其中有布尔人、英国人、达罗毗荼人——血统的褐色皮肤和黄色皮肤的少女。她们与我同床共枕如同逢场作戏，而且不要回报。

她们有一个对我详述了她们去“丘梅里”做客的情景。她们是这么叫那些平房的，那里住着一群英国青年——商店和公司的小职员，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为了节省零用钱和伙食费。这个少女告诉我，有一次她曾同14个英国青年做爱，说时丝毫不感羞耻，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这事你是怎么办到的呢？”我问她。

“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举行一个舞会。他们放了留声机，我同他们每个人都跳几步舞，在跳舞当中，我们就溜进一间寝室。这么一来，大家都很满意。”

她不是妓女。更确切地说，她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幼稚而慷慨的果实。她说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我对她只有同情。

我那所孤零零的平房，与一切都市化建筑相去甚远。我租下这所平房时，想知道厕所在什么地方，但哪儿都找不到。实际上，它就在房子后面，在很远处的淋浴室里。

我好奇地把厕所仔细观察一番。它是一个木箱，当中有个洞，极像我童年时代在智利农村见过的那种用具。不过，我们的用具是架在一个深坑上，或是架在水流上。在这里，容器是一个简单的金属桶，放在圆洞下边。

这桶每天天亮时涮干净，但我不知道桶内装的东西是怎么消失的。一天早晨，我比惯常起得早些，看到经过的情形我惊呆了。

我在锡兰见过的最美的那个泰米尔贱民阶层的妇女，像一尊会走路的黑色雕像那样走进房子背后。她身披红黄两色的、料子极粗的纱丽。她的光脚

上戴着沉重的镯子。鼻子两侧闪耀着两个小红点；这也许是普通假钻石，可戴在她身上似乎就是红宝石。

她踏着庄严的步伐走向厕所，看都不看我一眼，装出一副根本不知道有我存在的样子，把那个肮脏的容器顶在头上就走，踏着女神的步伐渐渐远去。

她是那么美，虽然职业卑微，我也不介意。像一只来自热带丛林的不与人来往的野兽，她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叫她，毫无结果。后来，我偶尔把绸子、水果之类的礼物，放在她经过的路上。她不听也不看就走过去了。那段可悲的路程，被她那黑色之美转变为一位冷漠女王的具有约束力的仪式。

一天早晨，我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她的手腕，直盯着她的脸。我不会讲可以与她交谈的语言。她毫无笑意地由着我带她走，很快就脱光了躺在我床上。她腰肢纤细，臀部丰满，乳房高耸，简直跟印度南方的千年雕像一般。这是一个男子和一尊雕像显得十分蔑视。这种体验我再没有遇到过。

我吃力地看完一封电报。外交部通知我一项新的任命。我卸下驻科伦坡领事职务，前往新加坡和巴达维亚担任同样的职务。此项任命使我从贫穷的第一级圈子上升，进入第二级圈子。在科伦坡，我有权留下金额为 166.66 美元的一笔款子（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现在，我当上驻两个殖民地的领事，大概可以留下一倍于 166.66 美元的一笔款子，即金额为 333.32 美元的一笔款子（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了。这就是说，我马上就用不着再睡行军床了。我的物质要求并不过分。

可是，我拿我的獾基里亚怎么办呢？把它送给区里那些已经知道它抓不了蛇而对它有失恭敬的孩子们吗？这一点我不考虑。他们不会关心它；也不会按照它与我同桌吃饭的习惯，让它在桌上吃饭的。把它放回大森林，让它恢复原始状态吗？绝对不行。没有疑问，它已失去自卫能力，猛禽会先通知就把它一口吞下。不过，我怎样才能带走它呢？轮船是不会接受这么个特别旅客的。

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僧伽罗仆人布拉姆皮跟我一起走。这是一笔很可观的开销，而且也是一种发疯的行动，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语言，布拉姆皮完全不懂。不过，那只獾却可以藏在甲板上的筐子里旅行。布拉姆皮跟我一样了解它。问题在于海关，骗过他们由狡黠的布拉姆皮负责。

就这样，我又悲又喜地带着獾告别了锡兰岛，向另一个陌生世界进发。

智利为什么要在世界各地设立那么多领事馆，实在难以明白。蜷缩于南极附近一隅的小小共和国，向地球另一边的群岛、海岸和礁石派遣并维持许多官方代表，确是怪事。

依我看，这些领事馆实际上是我们南美洲人的幻想和自负的产物。此外，我已经说过，这些极遥远的地方给智利运去黄麻，加工船帆的固体石蜡，最多的是茶叶，许许多多茶叶。我们智利人一天喝 4 次茶；可我们不会种茶。有一次，就因为缺乏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产品，竟酿成一场硝石工人大罢工。记得有一次，几个英国出口商喝了几口威士忌酒之后问我，我们智利人拿这么大量的茶叶干什么用。

“我们拿来喝。”我对他们说。

（他们若想从我嘴里掏出什么有利可图的工业秘密，我很遗憾，让他们失望了。）

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已有 10 年。所以，我怀着 23 岁年纪给予我的自信，在布拉姆皮和我的獠寸步不离的陪伴下上了岸。我们直奔拉弗尔斯饭店。我在饭店里吩咐把我为数不少的脏衣服送去洗涤，然后坐到走廊上去。我伸直四肢，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要了一杯，两杯，甚至多达三杯当地产的杜松子酒。

在我突然想到电话簿上找一找领事馆所在地之前，一切都像萨默塞特·毛姆笔下的情景。见鬼，电话簿上根本查不到！我立刻给英国政府机构打紧急电话。他们经过一番查询，答复我说，当地没有智利领事馆。我于是打听智利领事曼西利亚先生的情况；他们不认识他。

我不知所措了。我身上的钱只够付一天的旅馆住宿费和洗衣费。我想，这个虚幻的领事馆所在地大概是巴达维亚，便决定乘上把我带来的同一艘轮船，继续旅行，这艘船正好是开往巴达维亚的，而且仍然停在本港。我吩咐把衣服从泡衣服的水池里捞出来，布拉姆皮把湿漉漉的衣服包做一包，我们就直奔码头而去。舷梯正在拉起，我气喘吁吁地登上舷梯。我原先的旅伴和船上职员都惊奇地看着我。我钻进早晨离开的那个船舱，便宜挺挺地仰面躺在双层床上，闭上眼睛；这时，轮船已经离开了这个不祥的港口。

我在这艘船上早已认识一位犹太少女，名叫克鲁齐。她金色头发，身材丰满，橙色眼睛，十分快活。她告诉我，她在巴达维亚有个好工作。在海上旅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上，我走到她身旁；在杯觥交错间，她拉我去跳舞。我跟随她笨拙地跳着当时流行的缓慢的怪动作。最后那一夜，我们在我的船舱里做爱，显得十分友好，意识到只有这么一次顺乎自然地把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她对我温存备至，她那短暂的柔情打动了我的心。

克鲁齐这时向我坦白，在巴达维亚等待她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有一个大体上是国际性的组织，把欧洲少女放到可敬的亚洲人床上。他们让她在一位王公、一位暹罗王子和一位中国富商中任选一个。她选定后者——一个性情温和的年轻人。

第二天我们登岸时，我远远看见中国商业巨子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还透过有花卉图案的汽车窗帘看见车主人的侧影。克鲁齐消失在人群和行李之间。

我安顿在荷兰饭店。正准备吃早饭时，看见克鲁齐进来了。她扑到我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要把我从这里赶走，明天就得动身。”

“可是，赶你走的是谁呀？为什么赶你走呢？”

她断断续续把自己的不幸告诉我。她刚要上那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移民局的警察便扣留了她，对她进行粗暴的审问。她必须承认一切；因为她可能与一个中国人姘居，荷兰当局认为她犯了大罪。他们要她答应两个条件之后终于释放了她：一个条件是不去找她的情夫；另一个是第二天乘坐原船返回西方。

最使她伤心的是，她使等待她的那个男人失望了；她感到遗憾的是，那辆漂亮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确实不是别人的。不过，克鲁齐还有心灵上的伤痛。她的眼泪里除了落空的利益之外，有着多得多的内涵：她感到耻辱和

受了伤害。

“你知道他的住址吗？你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我问她。

“知道。”她答道。“可是我怕他们抓我。他们吓唬我，说要把我关进牢房。”

“你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去找这个男人吧，他虽然不认识你，一定早就在想你了。你至少得跟他说上几句话。荷兰警察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去看你的中国人吧。你要当心，躲过那些欺侮你的人，你会觉得好些。我认为，这么办了，你离开这个国家时会高兴些。”

那天深夜，克鲁齐回来了。她已经见过爱慕她的笔友。她把会面情况全对我说了。那男人是个法国化的、有学问的东方人，法语讲得很地道。他已经结婚，是按照中国惯例结成的体面婚姻，他感到非常厌烦。

这个黄皮肤爱慕者早已为西方来的白皮肤未婚妻备下一所带花园的平房、防蚊纱窗、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家具和一张大床——那天夜里他们试用过。房主人伤感地带她看了为她保留的小巧的精美设施、银刀叉（他吃饭只用筷子）、有欧洲饮料的酒吧、装满水果的冰箱。

然后，他在一口紧锁着的大箱跟前停下。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那口箱子，让克鲁齐看到妙不可言的财宝。箱子里有千百条女裤，做工精细的女内裤，极短的内裤。成百上千件妇女内衣，装满了那种因为发出刺鼻的檀香味而显得很神圣的家具。各种绸缎，各种色彩——由紫色到黄色，由深浅不同的玫瑰红到神秘的绿色，由紫红色到发亮的黑色，由令人激动的天蓝色到婚纱似的白色，那里样样都有。拜物主义者把整段彩虹似的男人的色欲收集起来，无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

“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克鲁齐边说边又抽搭起来。“我从那些衣服里随手拿了几件，这几件就是。”

我也为这种人的秘密所感动。我们的中国人——一个认真的进出口商人，像捕蝶人那样搜集起许多妇女内裤。这种事谁会想到？

“留一件给我吧。”我对女友说。

她挑出一条白色和绿色的，轻柔地抚摸一番才交给我。

“克鲁齐，请你题个词送我。”

于是，她把裤子仔细展平，在绸面上写了我和她的名字，还洒了几滴眼泪，把衣服都弄湿了。

第二天，没等我见到她她就走了，以后再没有见到她。那条有她题词和眼泪的内裤，同我的衣服和书一起装在我的箱子里许多年，我不知道一个乱来的女客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样把这条内裤从我家里穿走了。

巴达维亚

当世界上还没有“汽车旅馆”的时候，那时那家荷兰饭店是很不平常的。它有一座用作餐厅和办公室的很宽敞的主体建筑，其次是一幢幢供一位旅客住宿的平房，中间都隔着小花园和高大的树木。高高的树冠上栖息着无数鸟儿，有腋膜的松鼠在枝头飞来飞去，虫子像在大森林里似地吱吱叫。布拉姆皮的任务是精心照料那只獐，它在新的住处越来越不安了。

此地确实有智利领事馆，至少电话簿上有。次日，我睡足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到领事馆的办公处去。智利的领事徽高挂在一座大楼上。这是一家

航运公司的大楼。那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领我到经理（一个面色红润、身材高大的荷兰人）办公室去。他看上去毫无航运企业经理的气质，倒更像个码头搬运工。

“我是新任智利领事。”我自我介绍道。“首先让我感谢您的帮助，我要求您让我了解领事馆的主要事务。我要立即就职视事。”

“这里只有我是领事！”他怒气冲冲地答道。

“怎么回事？”

“先得把你们欠我的钱付还给我。”他大声说道。

这家伙可能懂点儿航运，可是，他不懂用任何语言说有礼貌的话。他一边急匆匆地说话，一边忿忿地嚼着劣质的方头雪茄烟，把空气都给污染了。

这个怒气冲天的家伙不让我有一点儿插嘴的机会。他的怒气和方头雪茄烟引起他一阵阵雷鸣般的咳嗽，这时却没有漱口剂供他清除痰液。我终于能说上一句自卫的话了：

“先生，我没欠您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付给您。我明白，您是名誉领事。如果您觉得需要讨论，我认为用这种我不准备接受的大喊大叫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后来我证实，这个粗野的荷兰人倒是有理的一方。此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局的受害者，这当然不是我的、也不是智利政府的过错。引起荷兰人愤怒的是曼西利亚这个居心叵测的人物。我已得到证实，曼西利亚这个家伙从来就没有在巴达维亚履行过领事职务；他住在巴黎已经很久了。他曾经同这个荷兰人达成协议，由后者执掌他的领事职权，并按月把收到的文件和钱款给他寄去。他保证每月为后者的工作付一笔酬金，可他从未付过。因此，这个幼稚的荷兰人把他的愤怒像倒塌的飞檐般劈头盖脸地泄在我头上。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发高烧，感冒，孤独，出血。天气酷热，浑身大汗淋漓。我的鼻子开始流血，如同童年时代在特木科的严寒天气里那样流血。

我挣扎着活下来，动身去政府大厦。政府大厦在布伊滕佐格¹，坐落在极其美丽的植物园深处。官僚们困难万分地把他们的蓝眼睛离开白色文件。他们拿出也在出汗的铅笔，写上我的名字时也出了几滴汗。

我出来了，比进去时更不舒服了。我沿着林荫道往前走，终于坐在一棵大树下。这里一切都是健康、清新的；生活散发出宁静而强烈的气息。在我面前，巨人般的大树的笔直而光滑的银色树干拔地而起，直插百米高空。我在搪瓷牌子上看到了这些大树的分类说明。它们是不认识的各种桉树。从寥廓的高空飘下一股幽香，直送到我的鼻孔里。这树中之王对我怜悯有加，它的一阵幽香使我恢复了健康。

植物园内绿色的庄严气氛，各种各样的树叶，交织着的藤本植物，海星似地在叶丛间迸发出来的兰花，大海般深沉的林地，鸫鸫的啼鸣，猴子的尖叫——也许就是这一切，使我恢复了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和生活的乐趣。

我精神振作地回到饭店，坐在平房的走廊上，桌上放着稿纸和我的獐；我决定给智利政府发一封电报。我没有墨水。于是我叫来饭店的侍者，用英语要他送一瓶墨水来。他丝毫也没有听懂并表示，只是叫来跟他一样穿着白衣服和鞋子的另一个侍者，以帮助翻译我的谜语般难懂的要求。毫无用处。我一边用英语说墨水，一边将铅笔往一只想象的墨水瓶里蘸一下，早已聚拢来为头一个侍者出主意的七八个侍者，从他们的腰包里掏出铅笔，一起重复

我的动作，而且激动地用英语喊“墨水，墨水”，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像是正在学习一种新的仪式。我失望地奔往对面那幢平房，一队穿白衣服的侍者跟在背后。我从一张孤零零的桌子上拿起一只奇迹般放在那里的墨水瓶，在他们吃惊的眼睛前面晃了晃，对他们嚷道：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这时他们全笑了，齐声说：

“Tinta！Tinta！——”

我这才知道，马来语墨水就叫 tinta。

我恢复执掌领事职权的时刻到了。我争夺的遗产是：一枚磨损了的橡皮图章、一个盖印用的印台、几个装有收益及其余额的帐目的文件夹。收益余额早已进了那个从巴黎进行操纵的滑头领事的腰包。那个受骗的荷兰人嘴里不停地咀嚼方头雪茄，脸上挂着一个失望的大笨汉所具有的冷笑，把那毫无重要意义的一包东西交给我。

我不时地签署领事签征收费单，并在收费单上加盖磨损了的公章。美元就这样到了我手里，把美元换成盾，紧紧巴巴地够维持我的生活需要——付房租和伙食费，付布拉姆皮的工钱，照料我那只叫做基里亚的獾的费用（它已明显长大，每日食用三四个蛋）。此外，我还须买一件白色无尾常礼服和一件燕尾服，这使我不得不花去几个月的收入。我几乎总是独自坐在紧挨着宽宽河渠的、顾客盈门的露天咖啡馆里喝啤酒，或者喝本地产的杜松子酒。这就是说，我继续过我那绝望而平静的生活。

饭店餐厅的大米餐很豪华。10～15个侍者排成一长列鱼贯进入餐厅，每个侍者面前都高高端着一个大盘子。每个大盘子都分成几格，每格都醒目地装着不可思议的食品。那些花色繁多的食品都以大米饭垫底。我向来是个贪吃的人，且长久以来吃得很差，就在十七八个侍者端的每个大盘里都挑了一点儿，直挑到我的盘子里堆得像座小山，奇特的鱼、难以描绘的蛋、意想不到的蔬菜、说不明白的童子鸡、罕见的肉，像一面旗帜似地盖在我午餐山峰的顶上。中国人说，饮食须色、香、味三者俱佳。我们饭店的大米餐兼具色、香、味三个优点，而且还多一个优点，即量多。

就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獾基里亚丢了。它有我到哪里就跟到那里的危险习惯，步子又快又轻。跟在我后面走，就是要一下子蹿到小汽车、大卡车、人力车和荷兰人、中国人、马来人来来往往的街上去。对一只在世上只认识两个人的单纯的獾来说，世界太乱了。

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我回到饭店，一见布拉姆皮的脸，就知道发生了悲剧。我什么也没问他。不过，当我坐到走廊上的时候，獾没有跳到我膝上，它那毛绒绒的尾巴也没有伸到我头上。

我在报上登了一则寻獾启事：“丢失獾一只，它名叫基里亚。”没有任何消息。邻居都没有看见它。它也许已经死了。它永远消失了。

负责照看獾的布拉姆皮感到没脸见人，很久不在我跟前露面。我的衣服，我的鞋子，都由一个幽灵照料着。有几次，我觉得我听见了基里亚的尖叫声，像是它夜间从一棵树上叫我。我开了灯，打开窗和门，仔细查看了椰子树。那不是它。基里亚所认识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大骗局；它的信任在城市这个危险四伏的森林里被摧毁了。我在愁郁中度过了很长的痛苦时光。

布拉姆皮羞惭万分，决定回国去。对此我很遗憾，不过，事实上那只獭是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一天下午，他来让我看看他新买的衣服，这样他就可以穿上好衣服返回锡兰他的家乡去。他穿着扣子直扣到脖子的白衣服，突然出现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他乌黑的头上端端正正戴着一顶很大的厨师帽。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布拉姆皮没有生气，反而对我很甜蜜地微笑着——一种原谅我的无知的微笑。

我在巴达维亚的新住宅，就在一条叫做普罗博林戈的街上。这幢房子有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我从来没有小汽车，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永远空着的汽车间。在那幢小房子里，我有多余的空间。我雇了一个爪哇厨娘，她是一个迷人而且平和的老农妇。我还雇了一个仆人，也是爪哇人，他的工作是侍候我进餐并替我洗衣服。我在这幢房子里完成了《大地上的住所》那部诗集。

我的孤独感大大加深了。我想结婚。我早已认识一位土生白人姑娘——也可以说是一位有点儿马来血统的荷兰姑娘，我很喜欢她。她身材苗条，性情温柔，对文学艺术界毫无所知。[几年之后，我的朋友、传记女作家玛加丽塔·阿吉雷曾就我的这次婚姻，写过如下的一段文字：“聂鲁达于 1932 年返回智利。两年前他在巴达维亚曾与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结婚。她以成为领事夫人而十分自豪，而且认为美洲是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她不懂西班牙语，但她开始学了。不过，她没有学会的无疑不仅是语言。尽管如此，她对聂鲁达的依恋之情却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俩总是在一起。玛鲁卡（聂鲁达这么叫她）身材很高，动作迟缓，表情严肃。”]

我的生活相当单调。我很快就认识了另外一些很可爱的人。古巴领事及其夫人由于与我语言相同，必然成为我的朋友。这位卡帕布兰卡__的同胞不停地说话，像一台自动机器。他是马查多__这个古巴独裁者的正式代表。不过他告诉我说，政治犯们的衣物——表、戒指、有时甚至金牙——会在哈瓦那湾捕获的鲨鱼腹中找到。

德国领事赫兹很喜欢现代造型艺术——弗兰兹·马尔克的《蓝马》__、威廉·莱姆布鲁克的瘦长人像。他是个敏感而且浪漫的人，是个拥有几百年文化遗产的犹太人。我有一次问他：

“名字不时出现在报上的那个希特勒，那个排犹和反共的头目，您认为他会上台吗？”

“不可能。”他说。

“怎么不可能呢？历史上连最荒唐的事都应有尽有。”

“您真是不了解德国。”他断然地说。“像那个那么疯狂的煽动者，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掌权也完全不可能。”

我可怜的朋友，可怜的赫兹领事！那个疯狂的煽动者差点儿统治了全世界。天真的赫兹连同他的全部文化和高尚的浪漫主义，准已在一个不知名的、恐怖的毒气室里完结了。

五、西班牙在我心中
费德里科__其人

在海上经过长达两个月的航行，我于 1932 年回到智利。我本来夹在稿纸里找不着的《热情的投石手》和在东方时写成的《大地上的住所》，都在这里出版了。1933 年，我被任命为智利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在当年 8 月到

达那里。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为了指导洛拉·门布里韦斯剧团演出他的悲剧《流血的婚礼》，并参加该剧的首演，几乎和我同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本不相识，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了，而且许多次一起受到作家们和朋友们的款待。确实也发生过一些令人不快的小事。费德里科有反对者；我也有过反对我的人，而且现在还有。这些反对者受人怂恿，为了使人看不见他而想把光亮熄灭。那次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人们很想出席笔会在广场饭店为费德里科和我举行的宴会，有人便整天打电话通知，说这次宴会延期了。他们是如此急不可耐，竟打电话给饭店经理、电话接线员和厨师领班，要他们不受理也不备餐。但是，他们的伎俩没有得逞，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我终于与上百位阿根廷作家会面了。

我们做了一件大为出人意料的事。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双人致词。你们大概不知道“双人致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不知道。费德里科永远是个满脑子新构想、新主意的人，他对我解释道：

“两个斗牛士可以同时斗一头牛，而且只用一件披风。这是最惊险的斗牛术表演之一，因此极为少见；在一个世纪之内只有两三次，而且只有两位斗牛士是亲兄弟或者至少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进行这种表演。这就是所谓的‘双人斗牛’。这也是我们在发表一篇致词时要做的事。”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不过事前谁也不知道。我们要起立感谢笔会主席设宴款待时，我们像两个斗牛士那样同时站起来，为了发表仅有的一篇致词。由于饭菜是摆在一张张分开的小桌上，费德里科站在餐厅的一端，我站在另一端，于是有人以为我弄错了，从旁拉了拉我的上衣，要我坐下，餐厅的另一端也有人在拉费德里科的上衣。这时我们开始同时致词，我说完“女士们”，他就接着说“先生们”，我们轮流把我们的致词说到最后一句，如同一个人那样把话说完。那篇致词是献给鲁文·达里奥的，加西亚·洛尔卡和我都不可能怀疑为现代主义者，我们因而赞颂鲁文·达里奥，认为他是西班牙语诗歌语言的富有创造性的伟大诗人之一。

那篇致词全文如下：

聂鲁达：女士们……

洛尔卡：……和先生们，斗牛表演中有一种叫做“双人斗牛”，两位斗牛士在斗牛中只拿一件披风来闪身避牛。

聂鲁达：费德里科和我被一根电线拴在一起，我们将结成一对，还要感谢这次十分执意的款待。

洛尔卡：在这一类的集会中，往往由诗人们来显示他们生动、溪亮或吉别的言词，由他们亲口向同志们和朋友们致意。

聂鲁达：不过，我们要在你们中间为一位早已亡故的人——一位与你们同桌共餐的鳏夫——设席，他比其他人死得更伟大，却被湮没在冥冥黑暗中；这位生活上的鳏夫，也有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结婚时刻，我们都要在他灼热的阴影下受到庇荫，我们都要一再呼喊他的名字，直喊到他的力量从被人遗忘中飞跃而出。

洛尔卡：在我们企鹅般温柔地拥抱过温文尔雅的诗人阿马多·比利亚尔之后，我们要把一个伟大的名字投掷在宴席上，我们敢肯定，这一定会把酒杯打碎，会使叉子跳起，朝渴望叉子的眼睛飞去，一道巨浪还一定会把桌布弄脏。我们就要说出的这位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的名字，是鲁文·……

聂鲁达：达里奥。因为，女士们……

洛尔卡：和先生们……

聂鲁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鲁文·达里奥广场在什么地方？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的雕像在哪里？

聂鲁达：他热爱公园。鲁文·达里奥公园在哪里？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玫瑰花店在哪里？

聂鲁达：鲁文·达里奥苹果树和鲁文·达里奥苹果在哪里？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的断手在哪里？

聂鲁达：鲁文·达里奥的油、树脂和天鹅__在哪里？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长眠在他的“祖国尼加拉瓜”，在一尊可怕的大理石狮子底下，而有钱人都把这种狮子安放在住宅大门口。

聂鲁达：这是买来献给狮子创造者的一只石狮子，是一尸没有星星的石狮子却献给为别人奉献了星星的人。

洛尔卡：他用形容词发出大森林的喃喃细语；他还像语言大师路易斯·德·格拉纳达__修士那样，用柠檬、鹿蹄和充满恐惧的无数软体动物作星形符号；他用快速帆船和我们眼睛瞳仁中的黑暗把我们送往大海，在天空从未有过的最灰暗的那个傍晚，铺设了一条宽阔的杜松子酒林荫道；他作为一个浪漫派诗人，与昏沉沉的南风用亲昵的话语大声问候；他怀着一切时代的嘲讽和悲哀的疑虑，把一只手放在科林斯柱式的柱头__上。

聂鲁达：在一些本质方面，诸如他那光辉的名字连同他心中极度的痛苦，强烈的犹豫不定，步下地狱的螺旋台阶，攀上声誉的城堡，他都始终保持着——一个伟大诗人应有的品德，这都是值得牢记的。

洛尔卡：作为西班牙语诗人，他以时下诗人们所缺乏的渊博知识和慷慨态度，在西班牙教导了几位上岁数的名家，也教导了许多孩子。他教导过巴列-因克兰__、胡安·拉蒙·希门尼斯__、马查多兄弟__，在可敬的语言里，他的声音是水和硝石。从多德里戈·卡罗__到阿亨索拉兄弟__或堂胡安·德·阿吉霍__，西班牙语都没有过像鲁文·达里奥的作品中那样的词藻的盛会、辅音的撞击、光彩和形式。从贝拉斯克斯__画的风景到戈雅__画的篝火，从克维多的忧郁到西班牙马略卡岛上农妇们崇尚的苹果般的脸色，达里奥如同在自己祖国那样走遍西班牙大地。

聂鲁达：潮水——北方那暖洋洋的大海——把他带到智利，大海把他留下，扔在坚硬的锯齿形海岸上，浪花飞溅、发出洪钟般响声的大洋撞击着他，瓦尔帕莱索的黑风使他浑身布满声音悦耳的盐。今夜，让我们用交织着烟雾、声音、环境和生活的空气为他塑像，这尊像有如他那交织着梦境和声音的绚丽诗篇。

洛尔卡：不过，我要给这尊空气塑像注入如同被潮水摇撼的珊瑚枝那样的他的鲜血，装上他那与相片中的光束相似的神经，安上人身牛头怪般的头颅——头颅上贡戈拉所描绘的白毛是由蜂鸟的翅膀画上去的，镶上他那对泪水盈盈的出神的朦胧眼睛。当然也要加上他的一些缺点：在帚状砾芥吞没书架的地方，响起长笛空泛的乐声；使他沉酒醉乡的白兰地酒瓶；他那迷人的俗气；还有他那大量诗歌中充满人性的、厚颜无耻的废话。除准则、形式和流派之外，他的伟大诗歌的丰富内容仍然有生命力。

聂鲁达：西班牙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我这个智利人，都不为今晚出席的朋友们对那个伟大的影子承担责任，因为他唱得比我们更激越，

他用异乎寻常的声音，向我们暂时栖身的阿根廷大地致以问候。

洛尔卡：智利人巴勃罗·聂鲁达和我这个西班牙人，我们的语言相同，我们对待这位伟大的尼加拉瓜、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的诗人的态度也相同。

聂鲁达和洛尔卡：让我们举杯为他的光荣向他表示敬意！

记得有一次，费德里科意外地支持我参加一次异乎寻常的越轨行动。一天晚上，我们受到一个百万富翁的邀请，这类人物只有阿根廷或美国才会生产出来。据说他是个有叛逆精神的人，自学成才，办一张专门登载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因而发了大财。他的房子四周是一座宽广的大花园，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暴发户的梦想的实现。道路两侧陈列着几百个鸟笼，笼里关的是由世界各国搜罗来的五颜六色的雉鸡。图书馆里收藏的全是古书，是在欧洲藏书家拍卖时打电报买下的；这个图书馆不但地方宽敞，而且藏书丰富。不过，最为壮观的则是那个轩敞的阅览大厅满铺豹皮地毯的地面，这是用豹皮一张张缝连成的一整块大地毯。我听说，此人在非洲、亚洲和亚马孙河地区都有代理人，专门为他收集豹、小豹猫、巨猫的毛皮，现在在这座豪华的图书馆里，毛皮上的斑点正在我的脚下闪亮。

这就是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公众舆论的控制者——大名鼎鼎的纳塔略·博塔纳家里的情况。席上费德里科和我紧挨主人坐着，对面是一位身材颀长的金发女诗人，身穿料子很薄的衣服，进餐中她的碧眼总看着费德里科和我，不过更多的是看我。这席菜肴有一道是烤全牛，连同炭火和炭灰一起放在一个大抬架上，由 8 个或 10 个高乔人抬上来。那一夜天色湛蓝，满天星斗。阿根廷人的杰作——带皮烤牛肉的香味，同大草原的气息，同三叶草和薄荷的芳香，同成千只蟋蟀和蝌蚪的低语声混成一片。

用餐毕，我同女诗人以及对一切都报以微笑并表示赞赏的费德里科一起起身离席，向灯火通明的游泳池走去。费德里科走在前面，不停地笑，还不停地说话。他很快活。他总是这样。快活是他的表面现象。

一座高塔耸立在明亮的游泳池旁。塔身上石灰的白色，在夜晚的灯光下发出幽幽的光。

我们慢慢登上塔上最高处的瞭望台。我们 3 个风格各异的诗人高高在上，远离尘寰。蓝眼睛似的游泳池在下面闪闪发光。舞会上的吉他声和歌声从更远的地方传来。在我们头顶上，布满点点繁星的夜空是那么近，仿佛就要罩到我们头上，使我们沉没到它的深处。

我把那位颀长的金发姑娘拥抱到怀里，亲吻她的时候发现她是个性感、结实、身材匀称、挺直的女子。令费德里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竟当他的面躺到瞭望台地上，当我动手脱掉她的衣服时，我看到费德里科眼睛瞪得大大地在近处俯瞰我们，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走开！快去，留神点，可别让人上楼梯！”我对他嚷道。

当祭祀星空和阿佛洛狄忒之夜的仪式在塔的高处举行时，费德里科高兴得跑去执行撮合山和哨兵的任务，可是因为跑得太急，加上运气不佳，竟从塔的黑魆魆的楼梯上滚下去。我和女友不得不费大劲去救他。他因此瘸了半月之久。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我任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职务没有多久。1934 年初，我被调往

巴塞罗那，担任同样职务。我的上司——智利驻西班牙总领事——是堂图略·马凯拉。他确实是我所认识的智利驻外使节中最注重礼仪的官员。他是个有孤僻名声的严肃男子，可是对我异乎寻常地亲切、宽容和热情。

堂图略·马凯拉很快就发现，我算减法和乘法错得一塌糊涂，而且不会算除法（我从来没有学会过）。他于是对我说：

“巴勃罗，您应该住到马德里去，那里才有诗。巴塞罗那这儿，尽是些叫人受不了的乘法和除法，您是不会喜欢的。我来对付这种事情足够了。”

一夜之间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智利驻西班牙首都的领事，一到马德里，就认识了加西亚·洛尔卡和阿尔韦蒂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人数很多。没过几天，我也成了西班牙诗人的一员。西班牙人和美洲人自然是有差别的。差别永远产生于各自的骄傲或错误。

和我同辈的西班牙人，比我的拉丁美洲同伴更富有兄弟情谊，更团结，也更愉快。我同时证实，我们更多才多艺，更醉心于钻研别的语言和文化。他们除了西班牙语，很少有人讲别的语言。德斯诺斯 和克勒维尔 前来马德里时，为了使他们与西班牙作家能听懂彼此的话，我得为他们当译员。

青年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加西亚·洛尔卡和阿尔韦蒂的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家乡奥里韦拉前来，穿一双草鞋和一条农民穿的灯芯绒裤子。他在家乡当过牧羊人。我把他的诗发表在我编的杂志《绿马》上，我非常喜爱他多产的诗篇所闪现的光彩和蓬勃朝气。

米格尔是真正的农民，浑身都向周围散发出泥土气息。他的脸像是土块或刚从根上摘下的并保持着地下凉意的马铃薯构成的。他在我家里居住并写作。我的描绘出另一种地平线和平原景色的美洲诗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鸟兽的土气十足的故事。这位作家来自大自然，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拥有大森林的纯真和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他告诉我，把耳朵贴在入睡的母山羊肚皮上是何等令人激动；这样能听见乳汁流到乳房的声音，除这位放过羊的诗人之外，谁都不可能听见这种神秘的响声。

另外几次他跟我谈到夜莺的歌声。他来自西班牙的莱万特地区，这个地区到处有繁花满枝的橙树和夜莺。我的祖国没有这种鸟——这卓越的歌手，为之入迷的米格尔想尽其所能向我生动逼真地表现它的歌声。他爬上街头的一棵树，在高高的树梢头用口哨像他喜爱的家乡的鸟儿那样啼啭起来。

因为他生计无着，我替他找了个工作。诗人在西班牙找工作很困难。终于有位子爵——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关心这件事，而且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读过米格尔的诗，对诗人颇为钦佩，只需诗人提出希望担任什么职务，他就给米格尔签发任命书。我兴高采烈地对诗人说：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你终于有工作了，是那位子爵为你安排的。你将是一名高级职员。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工作，他们才好给你任命书。”米格尔陷入了沉思。他那过早出现一道道深深皱纹的脸，罩上了一重疑虑神色。过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才给我答复。由于找到了解决生计难题的办法，他目光熠熠地对我说：

“那位子爵能不能让我在马德里附近管一群山羊呢？”

我无法从心底抹去对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回忆。莱万特夜莺的歌声——它们的啼鸣高塔似地在黑夜和橙花之间冲上云霄——对他来说乃是萦绕心际的往事，是他的血液组成材料的一部分，是他充满乡土气息的粗犷诗歌的

一部分；西班牙莱万特地区各种各样浓烈的色彩、香气和声音，都揉合在这种诗歌里了，它具有阳刚青年的精力和气息。

他的脸是西班牙的脸，由阳光削成，一脸皱纹，如同一块播过种的土地，略呈面包和地球那样的圆形。他那双在灼热的外表下燃烧的火辣辣的眼睛，是两道既有力又温柔的闪电。

从他说的话里，我看见诗的成分源源涌现，但是，现在由于一种新的壮丽场景，由于一种野性的光辉，由于一种陈旧的血液转化为新生儿的奇迹，这种诗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在我成为诗人和漂泊天涯的诗人的岁月里，我可以肯定地说，生活没有让我看见过在天赋和语言知识方面如此思路敏捷的奇才。

《绿马》诗刊

我和费德里科、阿尔韦蒂（他就住在我家附近俯临一个树丛——那个《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的顶楼上）、雕刻家阿尔韦托（当时已成为抽象派雕刻教师的托莱多面包师）、阿尔托拉吉雷、贝尔加明、伟大诗人路易斯·塞努达、前途无量的诗人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以及建筑师路易斯·拉卡萨等人，每天都或是全体合在一处，或是分成几个小组，在这些人家和咖啡馆里聚会。

我们经常从卡斯特利亚纳林荫道或邮差啤酒店坐车到我在阿圭列斯区的家——鲜花之家去。我们从一辆巨型公共汽车（我的同胞、那位杰出的科塔波斯称之为“低音大号”）的上层下车，分成喧闹的几拨去吃饭、喝酒、唱歌。在这些欢乐的年轻诗友中，我记得有诗人阿图罗·塞拉诺·普拉哈、才华横溢而又举止文雅的画家何塞·卡瓦列罗、从安达卢西亚直奔我家而来的安东尼奥·阿帕里西奥，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有的已经不在那里，有的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友情有如我躯体的一部分或我的心灵本质，是我所迫切需要的。

当年的马德里哟！我和加利西亚女画家马鲁哈·马略一起到贫民区，去寻找出售细茎针茅和席子的店铺，去寻找桶匠街、绳匠街，去寻找西班牙出产的各种干材料——这种材料可以编成绳子，把西班牙的心捆绑起来。西班牙气候干燥，地上又多岩石，太阳直晒着她，晒得平原上直冒火花，用扬起的大片尘土建造起光的城堡。只有西班牙的诗人才是她真正的河流：克维多流淌着涌起黑色浪花的深沉的碧绿河水；卡尔德隆的河里响着铿锵的音节；阿尔亨索拉兄弟的河水清澈透明；贡戈拉是流淌着红宝石的河。

我只见过巴列-因克兰一次。他非常瘦，蓄着奇长的白胡须，我觉得他仿佛是从自己的书页间钻出来的，受到书页挤压，因而有发黄的书页那种颜色。

我是在拉蒙·戈梅斯·德·拉·塞尔纳的庞博咖啡馆的地下室里见到他的，后来又在他家里见过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拉蒙洪亮的嗓音，这嗓音从他在咖啡馆的座位上引导着谈话、笑声、各种想法和吸烟吐出的烟雾。在我看来，拉蒙是我们这个语种的最伟大作家之一，他像克维多和毕加索那样才华横溢，博洽而又多才多艺。拉蒙的每一页作品，都像留连于物质世界和抽象世界的探索者，而且凡与西班牙有关的事物，除他所知所写之外，从未有人说过。他曾是一个神秘世界的积累者。他亲手改变了语言的句法，在上面留下谁都抹不掉的深深指纹。

我有几次看见堂安东尼奥·马查多身穿黑色的公证人服装坐在咖啡馆里，十分沉默谨慎，神情温和而又严肃，如同西班牙的老树。那位爱说人坏话的胡安·拉蒙·希门尼斯——诗坛的老坏孩子——确实说过，堂安东尼奥这家伙总是弄得到处是烟灰，而且他的口袋里装的尽是烟头。

胡安·拉蒙·希门尼斯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本人让我了解了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的妒忌。随着本世纪黑暗时期的出现，这位诗人的作品发出了璀璨的光芒，所以他是无需妒忌任何人的；他过的是假隐士的生活，从他藏身的地方指责一切他认为挡住他光线的事物。

胡安·拉蒙这个大胡子恶魔，对加西亚·洛尔卡、阿尔韦蒂、豪尔赫·纪廉和佩德罗·萨利纳斯凡位年轻人紧追不舍，每天都对这个或那个发射冷箭。他每周都写一些拐弯抹角的评论攻击我，这些文章每逢星期日刊载在《太阳报》上。不过，我选择的是自己活也让人家活的态度。我从未作过任何答复。文学界的那些攻击，我过去没有答复，现在也不答复。

诗人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有一个印刷厂，也有办印刷厂的才干。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告诉我他要出版一本西班牙水平最高、质量最好的精美诗刊。

“只有一个人能主编这个刊物。”他对我说。“这个人就是你。”

我曾经是几个杂志颇有雄才大略的创办人。不过我不是很快就撒下了杂志，就是被杂志所抛弃。1925年，我创办过《梅花牌中的马》这样的杂志。当时我们写作不打标点，我通过乔伊斯描写的街道发现了都柏林。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那时候常穿一件高领绒线衫，就那个时代的诗人而言，是个很大胆的行为；他的诗优美而且高洁，似乎他永远都该这样写下去。罗萨梅尔·德尔·巴列从脚到脚穿得一身黑，仿佛诗人的衣着就该如此。这两位杰出的诗人是我的积极合作者，我对他们铭记不忘。别的许多人我都忘了。然而，我们的绿马的那一阵奔驰，确实震撼了那个时代。

“好吧，曼诺利托，我答应主编这个杂志。”

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印刷厂厂主，他亲手用优美的博多尼活字丰富了活字字盘。曼努埃尔用自己的诗和勤劳的双手，为诗坛增添了荣誉。他翻译了雪莱为哀悼约翰·济慈之死而作的《阿多尼斯》，而且印制得特别精美。他还印制了佩德罗·德·埃斯皮诺萨的诗集《赫尼尔河的神话》。在那个庄严的印刷厂里，金玉锦绣般的诗篇发出何等璀璨的光辉，而醒目的铅字如同在化铅炉里重新熔铸过一般。

我主编的《绿马》诗刊的头5期在街头出现了，这几期无疑都很精美。看到曼诺利托总是开怀大笑和面带笑意，我很高兴；他捡起铅字放进字盘，然后用脚踩动小小的名片印刷机。有时他用女儿帕洛玛的婴儿车运送已出版的刊物。过路人都赞叹道：

“多好的爸爸！带着这么个孩子走拥挤危险的路！”

这孩子就是诗，它要骑着《绿马》去旅行。刊物上发表了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第一首新长诗，当然还发表了费德里科·塞努达、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好人纪廉的诗。胡安·拉蒙·希门尼斯这位20世纪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每星期日继续向我发冷箭。

拉斐尔·阿尔韦蒂不喜欢这个刊名：

“为什么这匹马成了绿的？应当叫做：红马。”

我没让这匹马换颜色。不过，拉斐尔和我并没有为此闹翻。我们从来不

为任何事情争吵。世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具有彩虹的全部颜色的马匹和诗人。

《绿马》第六期堆在比里亚托街的印刷厂里，没有拼版，也没有装订。这一期是胡利奥·埃雷拉-雷西格（蒙得维的亚的第二个洛特雷亚蒙）专号，还刊载了几篇西班牙诗人写的纪念他的文章，这一切连同它们的美都起不了作用，它流产了，也到不了目的地。这期杂志应在1986年7月19日出板，但是这一天街头到处硝烟弥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做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将军，在非洲驻地发动了反共和国的叛乱。

发生在格拉纳达的罪行

我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西班牙官方正好在庆祝成功的举事的多少周年（竟有这么多年了！）。此时此刻在马德里，那个元首身穿镶金边的蓝色制服，由摩尔卫队簇拥着，同美国、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使一起，正在检阅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不了解那场战争的小伙子组成的。

我对那场战争是了解的。100万西班牙人死于非命！100万人被迫流亡！看来要想从人类的良心上拔掉这根血淋淋的毒刺，恐怕绝对办不到。可是，现在在摩尔卫队面前列队接受检阅的小伙子们，也许对这一段恐怖历史的真相毫无所知。

我认为，一切都开始于1936年7月19日夜间。一位名叫博比·德格拉内的和气而富于冒险精神的智利人，是马德里普赖斯大马戏场表演自由式摔交的经理人。对于这一“体育运动”的严肃性，我向他表示过我的保留意见，他则说服我和加西亚·洛尔卡一起去

马戏场，证实这种表演的真实性。我说服了费德里科，约定在那里会面的时间。我们将在那里消磨一段时光，去观看戴面具的野蛮人——阿比西尼亚扼杀者和凶险的猩猩的凶残表演。

费德里科没有赴约。他已经走上死亡之路。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他和其他一些扼杀者约会会了。我认为，改变我的诗歌创作的这场西班牙战争，就这样以一位诗人的失踪而开始了。

他是个何等了不起的诗人啊！像他这样兼具风度与才华、敏捷的才思与明澈如清泉的心灵的人，我还从未见过。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是个不会吝啬的精灵，是个欢乐的离心机，把生活的幸福收集在胸中，而且像行星那样把它放射出去。他既纯真又虚伪，既是宇宙人又是乡巴佬，是独特的乐手，是出色的小丑，胆小而又迷信，欢乐而且潇洒；他是个概括了西班牙各个时代的一种人物，是人民的精华；他是阿拉伯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后裔，在当时西班牙的整个舞台上熠熠生辉，并像茉莉花那样散发出醉人的芬芳。令人哀痛的是，他永远消失了！

加西亚·洛尔卡运用隐喻的超凡能力深深吸引了我，他写的诗文我读来无不兴味盎然。他也往往要我为他朗诵我新写的诗，但在朗读中间，他又大声打断我说：“别念下去，快别念下去，你都影响我了！”

在剧场里和在寂静中，在群众间和在庄严场合，他都是美的加倍创造者。我从未见过双手具有如此魅力的人，我从未有过比他更快乐的兄弟。他欢笑，歌唱，弹奏，跳跃，创作，他把火花射向四面八方。我的这位不幸朋友，世上的才能他无所不有，他简直像一位高超的黄金工艺品工匠，像伟大诗歌养

蜂场的一只大蜂。他是自己才华的毫不吝啬的奉献者。

“听着，”他拽住我的一只手臂对我说，“你看见那扇窗子了吗？你没发现它有点‘那个’？”

“‘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出来，不过，应该感觉到那个是不是有点‘那个’。不然一个人就会迷失方向。瞧那条狗，真太‘那个’了！”

他还告诉过我他在格拉纳达一所年纪很小的孩子们上学的学校里的情况。他们邀请他参加一次《堂吉河德》纪念活动，当他来到教室时，所有的孩子在女校长带领下唱道：

“从边疆到边疆，
堂弗·罗德里格斯·马林____
评注的这部书，
将永远永远被人纪念。”

加西亚·洛尔卡去世后几年，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于他的报告，一位听众向我提问道：

“您在《费德里科颂》一诗中，为什么说为了他‘人们把医院都涂上蓝色’？”

“嘿，朋友，”我答道，“向诗人提这种问题，就跟问女人多大岁数一样。诗不是一种静态的物质，而是一种动态的水流，它往往会从创作者自己手里溜走。诗的原料，是同时又不是由实际存在的和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种种成分加工而成的。无论如何，我要尽力坦诚地回答您。我认为，蓝色是最美的一种颜色。它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活动空间，如同通往自由和欢乐的苍穹。费德里科的风采，他的个人魅力，使得他的周围弥漫着一种欢乐气氛。我的诗大概是想说，甚至医院，甚至医院里的悲哀，在他的勉力影响下都能改观，还会突然变成美丽的蓝色建筑物。”

费德里科对自己的死早有预感。有一次，他参加戏剧巡回演出归来，把我叫去，对我讲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曾同“茅屋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来到卡斯蒂利亚的一个非常偏远的村子，他们就在村子附近安营。由于旅途劳顿，费德里科累得不能入睡。天刚破晓他就起床，独目到周围去随意走动。天气寒冷，这种凛冽的严寒是卡斯蒂利亚专为旅客这种闯入者保留着的。晨雾渐渐消散为一块块白气团，然后又全部化为幻影似的一团团东西。

一个锈迹斑斑的巨大铁栅。破碎的雕像和柱子倒在枯枝败叶中间。他在一块古老领地的大门前停步；这是一座封建庄园的大花园的入口。这么个被弃置不顾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刻和如此严寒之中，使人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由于是在那么早的时候出来，由于隐约感到那里也许会出事，费德里科突然心情沉重起来。他坐在一块倒下的柱头上。

一只小羊羔走来，在废墟之间吃嫩草。它像出现在云端的小天使，又像飘落在当地的孤独之上的一片柔嫩的花瓣，突然使孤独感缓和了。诗人感到有伴儿了。

忽然，一群猪也闯进这块地里来。那是四五头凶恶的野兽——饿疯了的黑猪，长着石头般坚硬的蹄子。

费德里科当时目睹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场面。这几头猪扑向那只羊羔，把

它撕碎吃掉，看得诗人不寒而栗。

这一幕血淋淋的场面和孤独感，使费德里科命令他的巡回剧团立即继续赶路。

西班牙内战开始前3个月，费德里科对我讲述这个可怖的经历时，仍然心有余悸。

后来，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出，那个事件就是他的死的预演，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的先兆。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不是被枪决，而是被暗害的。当然，谁也不到有朝一日会有人要杀害他。在西班牙所有的诗人中，他最受爱戴，最被人喜欢；由于他出奇的欢乐性格，他又最像一个孩子。谁能相信，在地球上，而且就在他的国土上，竟有能干出如此无可解释的罪行的凶狠之徒？

这一罪恶事件，是我在一场长期斗争中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西班牙永远是角斗士们的角逐场地；是一块血迹斑斑的土地。兼具牺牲与残酷风雅的斗牛场，在虚夸的瑰丽场景中，在阳光和阴影之间重演着古代的殊死格斗。

宗教裁判所监禁过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克维多在它的地牢里受尽折磨；哥伦布曾戴着脚镣蹒跚而行。最精彩的景观是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的尸骨存放所，它现在是阵亡者纪念馆，有一个十字架耸立在千百万死者之上，耸立在无数黑色纪念物之上。

我写的关于西班牙的书

岁月流逝。战事开始失利。诗人们和西班牙人民并肩斗争。费德里科已在格拉纳达被暗害。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已经由牧羊人变成军人，他身穿士兵制服，在战火纷飞的最前线朗诵自己的诗。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仍在经营他的几个印刷厂；他把一个印刷厂开设在赫罗纳附近的东部战线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我写的书《西班牙在我心中》，就是在那里以特殊方式印制的。我认为，在众多书籍的奇异历史上，没有几本书有过如此周到的准备过程和如此不平常的命运。

前线的士兵学会了排版；但是当时缺纸。他们找到一架旧粉碎机，便定在那里造纸。在投下的炸弹之间，在战斗的环境里，竟加工制出了奇特的混合材料。他们把所有的东西——从敌人的旗子到一个摩尔士兵血迹斑斑的长袍——都扔进了那架粉碎机。用的虽然是些不常见的材料，制作者又毫无经验，造出的纸却非常好。这本书幸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几册，其排印技术和成品的不可思议的开张，都令人惊叹不已。几年后，我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里看到一册这一版的书，作为我们时代最罕见的书籍之一，陈列在一个玻璃柜里。

我的书刚刚印好并装订成册时，共和国就突然溃败了。由西班牙通往国外的各条大路上，满是逃亡的人。这是西班牙人的大规模出逃，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事件。

东线军队的幸存者，也在这些队伍里走向流亡地，其中有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有造纸和印制《西班牙在我心中》的士兵。我的书是这些人的骄傲，在向死神挑战中他们为我写的诗出过力。我知道，他们有许多人宁愿搬运装了这批印好的书的袋子，而不携带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他们扛上这些袋子，开始了奔赴法国的长征。

这支向流亡地进发的庞大队伍，遭到几百次轰炸；许多士兵倒下了，他们运送的书散落在大路上。余下的人则继续进行无休无止的逃亡。在边界以外，已到达流亡地的西班牙人遭到粗暴对待。在激战中诞生并毁灭的那本热情洋溢的书的最后几册，在一堆篝火中成为祭品。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到智利大使馆寻求保护，这个大使馆在战争期间曾经允许人数多达 4000 的长枪党徒避难。这时候卡洛斯·莫拉·林奇大使却拒绝这位伟大的诗人避难，尽管诗人是他的朋友。几天之后他就被捕，并被监禁起来。过了 3 年多，他患肺结核病死在关他的地牢里。夜莺是受不了囚禁的。

我的领事职务早已告终。因为我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智利政府决定撤了我的职。

战争和巴黎

我们安抵巴黎。我同拉斐尔·阿尔韦蒂及其妻子玛丽亚·特雷莎·莱昂，在洛尔洛什堤岸（一个安静的极妙的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我们房子对面可以望见纳夫桥、亨利四世雕像和在塞纳河两岸到处垂钓的渔人。我们的房子后面是德奈尔瓦描写过的多芬广场，弥漫着枝叶的清香和饭馆的气味。“法国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就住在那里，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守中立的人士之一。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敢发表意见，甚至对饿狼般扑向巴黎的纳粹分子，也不敢说一句话。

从我的阳台上探出身去，可以隐约望见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许多黑魑魑的岗楼。附属监狱的金色大钟，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区的最后边界。

在法国的许多年月里，我有幸成为法国文坛上两位杰出人物——保罗·艾吕雅和阿拉贡——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游刃有余的、极其真实的、有强大生命力的、世人瞩目的经典作家，在法国作家之林中名列前茅；他们同时又是名垂青史的道德的理所当然的坚定的身体力行者。像这样两个如此不同的人，也是少有的。有许多次，我同保罗·艾吕雅一起在谈诗论文的欢乐中，享受了消磨时光的乐趣。如果诗人们如实回答民意测验，就会亮出这么个秘密：没有比消磨时光更美的事了。对待这种古老的追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跟艾吕雅在一起，连度过了一整天或一整夜都觉察不到，更是绝对不知道我们谈的事情有无重要意义。阿拉贡是一台有才智、有知识、言词尖刻、文思敏捷的电子机器。从艾吕雅家里出来，我总是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同阿拉贡一起度过几小时之后，出门时我会感到筋疲力尽，因为这个人中鬼蜮迫使我去思考。这两位都是我无法抗拒的忠实朋友，他们身上最令我喜爱的也许就是他们抗争的伟大精神。

南希·丘纳德

我和南希·丘纳德决定创办一个诗刊，我给该刊定名为《世界诗人捍卫西班牙人民》。

南希在法国外省的乡间住所，有一个小印刷所；那里的地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离巴黎很远。我们到达她的住所时，已是明月当空的夜里了。雪花和月光帘幕般在田庄周围飘动。我心情激动地出门散步。归途中，冰冷的雪花

执拗地在我头上盘旋；我完全迷路了，在白茫茫的夜里摸瞎走了半小时。

南希有印刷经验。以前当她还是阿拉贡的女友时，她出版过阿拉贡和她翻译的《斯纳克之猎》。刘易斯·卡罗尔 的这首长诗，确实是无法翻译的，我认为只有在贡戈拉的作品里，才能找到类似的摩西式疯子干的事情。

我头一次动手排版，还认为决不会是太差的排字工。由于我在排印方面拙手笨脚，把字母 p 排倒了，印出来变成 d。有一首诗里，两处出现 párpados（眼睑）这个词，结果两处都成了 dárdapos。以后好几年，南希都用这个词叫我，以示惩罚。她从伦敦来信，开头往往是这样的：“我亲爱的 Dárdapo……”不过，这个刊物出得十分漂亮，而且印行达六七次之多。除冈萨雷斯·图尼翁、阿尔韦蒂、其他几位法国战斗诗人的作品，我们还发表了威·休·奥登 、斯·斯彭德 等诗人热情洋溢的诗篇。这几位英国绅士决不会知道，在排印他们的诗作时我迟钝的手指所吃的苦头。

不时从英国前来一些摩登诗人——南希的朋友，他们在纽扣眼上插着白花，也写些反佛朗哥的诗。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西班牙内战这样内容丰富的主题。西班牙人抛头颅、洒鲜血所产生的吸引力，使一个伟大时代的诗坛为之不寒而栗。

我不知道这个诗刊有无成效，因为这时西班牙内战已经以失败告终，另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也已不祥地开锣了。这次世界大战尽管规模空前，极其残酷，英雄壮举到处可见，却决不能像西班牙内战那样，吸引住诗歌界的共同感情。

不久之后，我就要从欧洲回国了。南希也马上要在一名斗牛士陪伴下去智利旅行；这名斗牛士在圣地亚哥抛开了斗牛和南希·丘纳德，跑去做香肠的买卖。但是，我最亲密的女友——这位出身高贵、爱赶时髦的女人，是不肯认输的。她找了一个游手好闲、不修边幅的诗人做情人，这个巴斯克裔智利人不乏才能，缺的是嘴里的牙齿。此外，南希的这个新相好还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夜间经常毒打这位贵族出身的英国女人，使她在社交场合露面时不得不戴上一副很大的墨镜。

她确实是个积习难改、勇敢而又动人心弦的吉诃德式人物，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南希是丘纳德·莱因的唯一继承人，是丘纳德夫人的女儿；1930年，她因为干了出格的事——同一个黑人私奔——而使伦敦舆论大哗；这个黑人是沙沃伊饭店弄进英国的最早一批爵士乐队的乐师。

丘纳德夫人发现女儿人去床空，还在床上找到一封女儿写的信，信中骄傲地通知她，自己已与黑人共命运。这位贵族夫人当即去找她的律师，办理了剥夺女儿继承权的手续。我所认识的这位在世界上到处漂泊的女子，就这样成了那个英国公爵的遗嘱中不予提及的继承人。经常参加她母亲茶会的，有乔治·穆尔 （他私下老是说自己是南希的亲生父亲）、托马斯·比彻姆爵士 、年青的奥尔德斯·赫胥黎 以及后来的温莎公爵——即当时的威尔士亲王。

南希·丘纳德予以回击。在她被母亲赶出家门的当年12月，所有的英国贵族都收到一本标题为《黑人和白人小姐》的红皮小册子作为圣诞礼物。我看到通篇都是辛辣的言词，有些地方其挖苦的程度决不逊于斯威夫特 。

她为黑人辩护的论据，是对丘纳德夫人及英国社会的当头一棒。她的话极有说服力，所以我还记得她对贵族们说的话，现凭记忆引述如下：

“您这位由人夫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您的那些人，万一被更强大的部落绑架、殴打并戴上锁链，然后运到远离英国的地方，把你们卖作奴隶，把你们当作人类丑恶的可笑标本展示出来，强迫你们在皮鞭抽打和食物供应很差的条件下干活，那么，如何维持你们的种族呢？黑人们受过这类粗暴和残酷造成的痛苦，而且比这更甚。然而，在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苦难之后，他们现在已成为最出色、最高雅的体魄强健的人，还创造了一种较之其他任何音乐更普及的新音乐。你们——跟你一样的白人们——能否从这样不公正的境遇中走出来呢？如此说来，哪一种人更优秀呢？”

这样的内容共有 30 页之多。

南希不可能回英国定居了，从此她献身于受迫害的黑色人种的事业。在埃塞俄比亚遭受侵略期间，她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到美国，以声援斯科茨伯勒^[1]的几位黑人小伙子，他们因为没有犯过的恶行而被指控。这几位黑人青年被美国的种族主义法院判了刑，南希·丘纳德也被美国的民主警察驱逐出境了。

大约在 1969 年，我的女友南希·丘纳德在巴黎逝世。在临终的危急时刻，她几乎赤身裸体地从旅馆的电梯下楼。她倒毙在电梯里，永远闭上她那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

她亡故时体重 35 公斤，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她的身体在与世上的不公正进行斗争中搞垮了。除了生活日益孤独和在无助的情况下死去之外，她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报酬。

在马德里召开的一个代表大会

西班牙内战的战况越来越不妙，然而西班牙人民的抵抗精神却感动了全世界。国际志愿人员旅已在西班牙参战。早在 1936 年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已经身穿军服到达马德里了；这是不同年龄、不同毛发、不同肤色的一群了不起的人。

现在是 1937 年，我们都在巴黎，主要任务是筹备一个世界各地反法西斯的作家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要在马德里召开。就在那里，我开始对阿拉贡有了认识。他身上最先使我惊奇的东西，是他那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和组织才干。所有的信件都由他口授，进行修改，并且记在脑子里。最微末的细节他都不放过。他经常在我们小小的办公室里长时间连续工作。如所周知，他在工作之余，还写了几本大部头的散文作品，他的诗是用最美的法语写成的。我见过他校改译自俄语和英语的译作的校样，我还见过他在打印好的校样上重新改写。他确实是个非凡的人，而我从那时起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我早已卸去领事职务，因此也就身无分文了。为了一个月 400 旧法郎的进项，我到阿拉贡领导的保卫文化协会工作。我当时以及以后许多年的妻子德丽亚·德尔·卡里尔始终有个富有的田庄主的名声，其实她比我还穷。我们住在一家可疑的下等旅馆里，那家旅馆的第一层全部供来去匆匆的露水夫妻住宿。在好几个月时间里，我们吃得又少又差。不过，这个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倒是成了事实。世界各地纷纷寄来可贵的答复。有一封复信是爱尔兰民族诗人叶芝^[2]寄来的；另一封复信是瑞典的伟大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3]寄来的。这两位作家都太老了，不能到马德里这样一座受围困和轰炸的城市去旅行；不过，他们两人都赞成捍卫西班牙共和国。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没多大能耐的人，在具体事务和重大使命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当一张银行支票送到我手里时，我简直惊呆了。这张支票是西班牙政府送来的，是一大笔款子，足够支付代表大会的全部费用，包括从别的洲来的代表的旅费。已有几十位作家陆续到达巴黎。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拿这笔款子能做什么呢？我决定把这笔款子转交代表大会筹备机构去负责处理。

“我从来不追求金钱，而且，我恐怕也没有掌管钱财的本事。”我对当时路过巴黎的拉斐尔·阿尔韦蒂说道。

“你是个大傻瓜。”阿尔韦蒂答道。“你为西班牙丢了领事职务，还穿着破鞋到处奔走。为了你的工作和最起码的开销，难道你就不会给自己留几千法郎吗？

我把鞋细看一遍，的确是破了。阿尔韦蒂买了一双新鞋送给我。

过几小时我们就要同全体代表一起动身前往马德里了。为了替从世界各地来到法国的作家们办理各种手续，德丽亚、安帕罗·冈萨雷斯·图尼翁以及我自己都忙得团团转。办理法国的出国签证，我们遇到许多难题。我们实际上占据了巴黎警察局，人们戏称“收条”的证件，就是那里签发的。有时，在护照上加盖叫做“钢印”的法国最高证明标志的，竟是我们自己。

在挪威人、意大利人、阿根廷人中间，有来自墨西哥的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1]，他夺旅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险。能说服他来参加，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自豪。两个月前，我收到他已经出版的仅有的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孕含着真正的萌芽。那时没有人认识他。

我的老朋友塞萨尔·巴列霍阴沉着脸来找我。他生气是因为没有给他的妻子火车票，而别人也都受不了她。我很快拿到了给她的火车票。我把车票送交巴列霍，他的脸还是像来的时候那么阴沉。他准是有什么事，几个月后我才弄明白是什么事。

这事的原因如下：我的同胞比森特·维多夫罗早已到达巴黎，以便出席代表大会。维多夫罗和我是对头，彼此见面都不打招呼。可他是巴列霍的好朋友，利用在巴黎的这几天，往我这个单纯的朋友的脑子里灌输攻击我的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和巴列霍经过一次心情激动的交谈之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驶离巴黎的列车，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坐了这么多作家。在车厢过道里，我们有的互相认出来了，有的没有认出来。有些人睡下了，还有一些人却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许多人眼中，西班牙是个谜，又是那个历史时期的谜底。

巴列霍和维多夫罗不知在列车上的什么地方。脸部习惯性抽动的安德烈·马尔罗^[2]肩上披着风衣，停步跟我聊了一会儿。这次他是独自旅行；以前总是看见他与飞行员科尔东-莫格利尼埃尔同行，这位飞行员是他在西班牙天空冒险（因为那里的城市有的找不到，有的一览无遗；有时要把飞机紧急送交共和国）的左膀右臂。

记得这列火车在边界停留很久。维多夫罗像是丢失了一个手提箱。大家都在为列车延误的事奔忙或担心，因此谁也没有闲心去关注他的事。这位智利诗人在很不恰当的時刻到站台上去找他的手提箱，当时这次远征的领队马尔罗就在站台上。马尔罗天生容易激动，又有许多难题压在身上，已经达到

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许他没听说过维多夫罗的名字，也没见过面。维多夫罗走到他跟前，向他诉说丢失手提箱的事，马尔罗这时连剩下的一点耐性都没有了。我听见他对维多夫罗嚷道：“您要把大家打搅到什么时候！一边去！Je vous emmerde！”

我偶然目睹了这位智利诗人的虚荣心受挫的一幕。我倒宁愿那一刻我正呆在离那里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但是人生无常。在那列火车上，我是维多夫罗唯一憎恶的人；成为那件事唯一目击者的，竟是跟他同是智利人的我，而不是跟我们一起旅行的上百位作家中任何一个别的人。

我们继续旅行，这时已是夜阑人静，列车正在西班牙土地上奔驰；我想到维多夫罗，想到他的手提箱，还想到他度过的倒霉时刻。于是，我对朝我房间走来的中美洲一个共和国的几位青年作家说道：“你们也去看看维多夫罗吧，他准是独自呆着，而且情绪消沉。”

20 分钟后他们回来了，都笑容满面。刚才维多夫罗对他们说：“你们别跟我讲丢失手提箱的事了，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严重的事情是，当芝加哥、柏林、哥本哈根、布拉格等地的大学早已授予我各种荣誉头衔的时候，你们那个小国的小小大学，是仍然对我毫无所知的唯一学府。甚至没有邀请我去举行一次关于创造派的讲座。”

我的同胞和伟大诗人肯定是无可救药的。

我们终于到达马德里了。在客人受到欢迎并有人为之安排住处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再去看看我近一年来一次也没回过的家。我的书和东西，全都扔在那里了。那是在叫做“鲜花之家”的大楼里的一套房间，就坐落在大学城的大门口。佛郎哥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大学城周围，这里的住宅区早已多次易手。

身穿军装、背着枪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弄到一辆斗车，要用来搬运我家里我最心爱的书籍和用具。

我登上五楼，颇为激动地打开我那套房间的门。霰弹炸坏了窗子，还炸塌了几段墙。书籍被从书架上抛到地上。要从这一堆堆瓦砾中理出头绪来，绝对不可能。无论如何，我还是匆匆忙忙地找寻一些东西。奇怪的是，那些多余的、毫无用处的衣服都不见了，想必是被入侵的或守卫的士兵们拿走了。然而，那些锅、缝纫机、盘子零乱地散落一地，但都完好无损；我的领事礼服，我的波利尼西亚面具，我的东方刀子，都已荡然无存。

“米格尔，战争就跟梦境一样变幻不定。”

米格尔在房里散落地上的纸张中，找到一些我的作品的原稿。这样杂乱无章的场景是我生平所仅见的。我对米格尔说：

“我什么东西也不想拿走了。”

“什么东西都不拿？连一本书也不拿吗？”

“一本书也不拿了。”我答道。

我们推着空车走了。

面具和战争

……我的家恰好处于两个战区之间……在一侧，摩尔人和意大利人在前进；在另一侧，马德里守卫者在前进，在退却，或者在停步

不前.....大炮打穿墙壁.....窗子被轰得粉碎.....我在散落地上的书籍之间找到几颗子弹头.....但是我的面具却不见了.....我的面具是在暹罗、巴厘、苏门答腊、马来群岛、万隆收集来的.....我的金色、灰色、番茄红的面具有银灰色的、蓝色的、凶恶的、沉思的眉毛，它们是我第一次东方之行的唯一纪念品，那些地方曾经用茶叶味、粪便味、鸦片烟味、汗臭味、浓郁的茉莉香味、鸡蛋花香味、街头的烂水果味来迎接我.....那些面具使我想起十分完美的舞蹈，在神庙门前跳的舞.....被神话蒙上色彩的木制吊饰，花的神话的残余物，在空中描绘出与我的美洲人的天性格格不入的梦想、习惯、鬼怪和玄义.....当时.....士兵们也许在互相射击的间隙，戴上面具从我家的窗口探出身去，以此吓唬摩尔人.....就在那里，好几个面具成了碎片，而且染有血迹.....另外几个被枪炮打落，从我住的五楼滚下去.....佛朗哥的进攻路线就在这几个面具前面.....一大群目不识丁的雇佣军在它们面前乱喊乱叫.....30个亚洲神祇的面具，在最后一次舞蹈——死亡之舞中——从我家里升天了.....那是休战时刻.....形势起了变化.....我坐着凝视那些瓦砾，凝视草席上的斑斑血迹.....还通过新开的窗口，即震弹打穿的洞.....举目远眺，凝望大学城以外的远方、平原、古堡.....我忽然觉得西班牙空无一人.....觉得我最近邀请的一批客人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们有的戴上面具，有的没戴，在枪林弹雨中唱着战歌，开心得发狂，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守，有的死去，有的仍然活着，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已结束了.....是节日之后的最后宁静.....度过这最后的节日之后，有的戴着面具走了，有的戴着面具倒下了，有的跟随我未曾邀请的士兵，为了我的西班牙走了.....

六、出发寻找战败者 我选定了一条路

尽管很久以后我在智利正式入党时才拿到党证，但我认为，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就明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很多事情加深了我的信仰。

我的思想矛盾的朋友、信仰尼采哲学的诗人莱昂·费利佩，是个很有人缘的人。他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对待纪律的无政府倾向，和难对付的爱开玩笑的性格。在内战正酣的时候，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引人入胜的宣传，很容易使人上当。他经常到无政府主义者阵线去，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想法，朗诵自己反传统的诗篇。这些想法和诗歌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的思想意识，既有祈祷又有咒骂。他的话使那些无政府主义小组入迷，这种小组在马德里异乎寻常地大量增加时，那里的居民正在纷纷奔赴日益逼近的前线。无政府主义者把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刷上油漆，一半漆成红色，一半漆成黄色。他们留着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和胡子，戴着子弹做的项链和手镯，在西班牙垂死时的狂欢节中扮演主要角色。我看到他们有些人脚穿有象征意义的鞋子，一半用的红皮，一半用的黑皮，制作这种鞋子使鞋匠费了很大的劲。可别以为他们演的是无害的滑稽戏。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刀子、笨大的手枪、步枪和卡宾枪。他们一般都盘踞在大楼的大门口，一边扎堆吸烟和吐痰，一边炫耀他们的武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受恐吓的大楼住户收钱；或者强迫大楼住户自愿放弃自己的珠宝、指环和手表。

莱昂·费利佩深夜才从他参加的一次支持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回家，这时候我们在我家拐角处那家咖啡馆里相遇了。这位诗人身披一件西班牙斗篷，与他的拿撒勒人 式的胡子非常般配。走出咖啡馆时，他那份浪漫气派服装的雅致褶子，蹭上了一个心地狭窄的、与他政见相同的人。我不知道莱昂·费利佩的老派绅士的举止，是否惹恼了那个后卫队“英雄”，我们刚走了几步，确实就被一群由一个对咖啡馆反感的人领头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拦住了。他们要检查我们的证件，对我们的证件膘上一眼之后，两个武装人员就把诗人架走了。

他们把他带到我家附近的枪决行刑场去（那里夜间传来的轰鸣声，往往搅得我无法入睡），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两个从前线回来的武装民兵经过。我向他们说明莱昂·费利佩是什么人，他遭受什么伤害，并感谢他们使我的朋友获释。

这种思想意识的混乱和无缘无故进行破坏的气氛，使我陷入深思。我知道一名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业绩，他又老又近视，满头乱蓬蓬的亚麻色长发，以送人去“散步”见长。他组织过一个命名为“黎明”的小组，因为他们都在日出时刻进行活动。

“您是不是有时感到头疼？”他问受害者。

“是的，有时感到头疼。”

“那么，我可要给您一种很有效的止痛药。”这个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对受害者说，一边用他的左轮手枪瞄准对方的前额，开了一枪。

当诸如此类的匪帮在马德里漆黑的夜晚群集横行的时候，共产党人是建立起一支抵抗意大利人、德国人、摩尔人和长枪党的军队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同时，他们又是坚持抵抗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支柱。

简而言之，那时我必须选定一条路。这就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做过的事，对于在那个悲惨时代的黑暗和希望之间作出的决定，我永远无需感到后悔。

拉斐尔·阿尔韦蒂

诗歌创作永远是一种和平行动。诗人诞生于和平环境，和面包由面粉制成是一样的。

纵火者、武士、狼都在搜寻诗人，以便烧死他，杀害他，咬死他。在一座阴森森的公园的树林中，一名好勇斗狠的人使普希金受了致命伤。一匹烈马疯狂地从裴多菲丧失生命的躯体上践踏过去。拜伦在希腊为反战而牺牲性命。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在发动战争时暗害了它的最杰出的诗人__。

拉斐尔·阿尔韦蒂是这种屠杀的幸存者之一。他本应死过上千次。有一次是在格拉纳达。另一次，死神在巴达霍斯等他。在阳光普照的塞维利亚，在他小小的故乡，在加的斯和圣玛利亚港，有人在找他，要用刀子捅死他，要吊死他，要通过杀害他再次扼杀诗歌。

但是，诗歌没有死，它像猫一样有7条命。有人折磨它，把它拖在街上，啐它，嘲弄它，一心要吊死它，流放它，把它投入监狱，开枪打它。然而，他逃脱了所有这些谋害事件，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发出米粒一样灿烂的微笑。

我是在马德里街头认识拉斐尔·阿尔韦蒂的，他那时身穿蓝衬衣，打着红领带。我知道他早就是人民的战士，当时干上这种艰难行当的诗人不多。警钟还未曾为西班牙敲响，但他早已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是南方人，生长在歌声嘹亮的海边和储存黄玉般葡萄酒的酒窖旁。于是，葡萄产生的热情和海涛发出的喧哗就形成了他的心。他始终是个诗人，尽管早年时他自己对此毫无所知。后来西班牙人全知道了，再往后是全世界。

对于我们这些会讲并熟谙卡斯蒂利亚语的人来说，拉斐尔·阿尔韦蒂是西班牙语诗歌的一个璀璨的高峰。他不仅是个天生的诗人，还是个把握诗这种形式的大师。他的诗有如神奇地盛开在冬日的一株红玫瑰，有贡戈拉的雪花似的团絮，有豪尔赫·曼里克__的根，有加尔西拉索__的花瓣，有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__的忧伤的芬芳。就是说，在他晶莹剔透的酒杯里汇合了西班牙诗的精华。

这株红玫瑰为西班牙那些力图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人照亮了道路。世人都知道这段英勇而悲惨的历史。阿尔韦蒂不仅写过壮丽的十四行诗，不仅在兵营和前线朗诵过这种诗，还创造出诗的游击战，创造出反战的诗的战形式。他创作的诗在大炮的轰鸣中长出双翼，这些诗后来在全球上空翱翔。

这位至纯至真的诗人显示出在批判世界的时刻，如何利用诗这种武器。在这一点上，他与马雅可夫斯基相似。这种公开利用诗歌的基础，是力量，是柔情，是欢愉，是人的真实品质。缺乏这种品质，诗歌虽会发出悦耳的响声，却不会歌唱。阿尔韦蒂的诗会永远歌唱。

智利的纳粹分子

我又一次乘坐三等舱返回我的祖国。拉丁美洲虽然没有塞利纳__、德里欧·拉罗舍尔__和埃兹拉·庞德__之流著名作家，成为替法西斯主义效劳的

叛徒这种事例，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存在一股受希特勒主义势力渗透的强大暗流，这股暗流有的是本性使然，有的却是由于受到财政支持。到处都有小团体出现，他们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穿戴得像纳粹的冲锋队员。本大陆的老牌封建寡头政治集团同情任何一种反共形式，不管它是来自德国还是来自极左的土生白人。此外，不要忘记在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的许多特定地区，居住着大批德国人后裔。希特勒昙花一现的登台和日耳曼千年强盛不衰的神话，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种阶层俘虏过去。

在希特勒获得大肆张扬的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智利南方的荒村或城镇，真的不止一次必须在如林的弯臂十字旗下穿过街道。有一次，我在南方一个小镇被迫用当地的一台电话机，向“元首”表达并非出自肺腑的敬意。一家店铺的德国老板设法把电话机放在一个位置上，使打电话的人不得不举高手臂，向希特勒肖像表示拥戴。

我当时是《智利曙光》杂志的主编。这门文学大炮（我没有其他武器）的全部炮弹，都射向正在把别国一个一个吞吃下去的纳粹。希特勒驻智利大使向智利国立图书馆赠送所谓新德意志文化的书籍。我们进行反击，要求我们的全部读者把被希特勒禁止的真正忠于德意志的德国书籍寄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我接到死亡威胁。许多包得整整齐齐的装有抹上污秽的书籍的包裹也寄到了。我们还收到收集齐全的宣扬色情、暴虐和排犹思想的报纸《前锋报》，这个报纸就是数年后在纽伦堡被正义地绞死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主编的。不过，德语版的海因里希·海涅、托马斯·曼、安娜·西格斯、爱因斯坦、阿诺德·茨韦格等人的作品，也渐渐开始怯生生地寄来了。我们收到将近 500 册书籍时，便把这些书交给国立图书馆。

太令人吃惊了，国立图书馆竟对我们锁上了大门！

我们于是组织游行，举着尼默勒牧师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的肖像开进大学礼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礼堂里正在开一个由外交部长堂米格尔·克鲁查加·托科纳尔主持的会。我们把书籍和肖像小心地放在主席台入口。我们打赢了这一仗；那些书籍被接受了。

黑 岛

我想更尽心尽力地专注于文学创作。我在西班牙的经历，使我坚强了，也成熟了。我的诗歌创作中的苦吟时期应该告终。我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忧郁的主观性，或者《大地上的住所》中痛苦的哀伤都行将结束。我仿佛找到一条矿脉，它不是埋藏在地底岩层之下，而是蕴藏在书页下面。诗歌能为我们人类服务吗？能配合人的种种斗争吗？我在无理性的和消极的领域里已经跋涉得太久了。我应该停下脚步，去寻找那条人道主义的路，它虽然已被现代文学摒弃，却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的愿望中。

我动笔创作我的《漫歌集》。

为此，我需要有一个写作的地方。我在叫做黑岛的没人知晓的地方，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东堂埃拉迪奥·索夫里诺是个年迈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海军上校，这幢石屋本是他为自己一家建造的，不过他现在愿意卖给我。我怎么买它？我把写《漫歌集》这部书的计划提交当时出版我的著作的埃尔西利亚出版社，但是遭到拒绝。1939 年，别的出版家向我伸出援手，直接付款给房东，使我终于得以买下我在黑岛的房屋，供写作之用。

我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黑岛的荒凉海岸，以及太平洋的汹涌澎湃，使我能够怀着满腔热情，心无二用地投身于我的新诗创作。

你把西班牙人给带来

可是，生活立刻使我离开黑岛。

有关西班牙移民的惊人消息传到了智利。50 多万男人和女人、战士和平民已经越过法国边界。在法国，受到反动势力施加压力的莱昂·布鲁姆政府，把这些西班牙移民成群地赶进集中营，把他们分散送进要塞和监狱，让他们拥挤不堪地生活在萨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地区。

智利政府已经更迭。西班牙人民的兴衰浮沉，已经壮大了智利人民的力量，现在我们才有了一个进步的政府。

这个智利人民阵线政府决定派我去法国，去执行我平生承担过的最崇高的使命，也就是把西班牙人从法国监狱里营救出来，并把他们送往我的祖国。这样，我的诗就会像来自美洲的一盏明灯，在承受他人从未受过的痛苦和做出他人从未表现过的英勇行为的人群中，放射出光芒。这样，在迎接西班牙人的时候，我的诗就会成为来自美洲的物质援助的一部分，去支付一笔久远的债务。

我刚刚做过手术，一条腿打着石膏（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就是如此），几乎是身带病痛地离开我的隐居所，去谒见共和国总统的。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亲切地接见了我们。

“对，你把几千名西班牙人给带来。我们有工作给他们做。你把渔夫给带来；你把巴斯克人、卡斯蒂利亚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给带来。”

没过几天，我仍打着石膏就动身赴法国，去把西班牙人接到智利来。

我有具体职务，是负责西班牙移民的领事——委任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毫不含糊地向智利驻巴黎大使介绍了自己的头衔。

在我的祖国，政府和政治形势都已有所不同，然而驻巴黎大使却没有换人。把西班牙人送往智利的可能性使衣着考究的外交官大为光火。他们把我安置在厨房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用各种方法干扰我的工作，连信纸都不肯给我。受伤的战士、律师、作家、失去了诊所的医生、有各种专长的工人——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开始潮水般向使馆大楼的大门口涌来。

他们须不顾一切才能走到我的办公室来，又因为我的办公室在四楼，大使馆的人出了个鬼主意，让电梯停开。许多西班牙人是战争中的伤员和非洲集中营的幸存者，看见他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登上我所在的四楼，我的心都碎了，然而那些凶恶的官员却以我遇到的困难取乐。

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

智利人民阵线政府把一位代办到达巴黎的消息通知我，使我的生活复杂化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派到大使馆来的新首长，也许能扫清那个旧外交官在西班牙移民工作上给我设置的大量障碍。一个瘦削的年轻人在圣拉扎尔火车站下车，戴着夹鼻眼镜，让人觉得他像个老公务员；年纪大约二十四五岁。

他的嗓音尖细，带娘娘腔，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他要把我当作他的首长；还说，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把那些“光荣的战败者”送往智利的伟大任务上当我的助手。我虽然因为得到一个支持工作的新合作者而高兴，可此人让我打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对我大加恭维，而且言过其实，我却觉得他为人有点虚伪。后来我才知道，随着智利人民阵线的胜利，他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由耶稣会组织的哥伦布骑士团成员，摇身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招募人员的高潮期中，这一类人因其智力上的优点而颇具吸引力。阿雷利亚诺·马林写过几出喜剧和若干篇文章，是个学识渊博的讲演人，似乎人们都知道他。

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巴黎每天晚上都可能挨德国人轰炸，各家各户都接到躲避空袭的指示。我天天晚上到塞纳河畔维伦纳镇一幢临河的小房子去，天天早上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那里回大使馆。

在短短的几天里，这个新来的阿雷利亚诺·马林就超过了我，我曾经介绍他认识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几位西班牙的政党领袖。一周过后，这个新任官员跟这些人亲近得都快要可以称兄道弟了。一些我素不相识的西班牙领袖人物经常出入于他的办公室。他们之间的长谈，对我来说是个秘密。他不时叫我去，有时让我看看他给母亲买的钻石或翡翠，有时则跟我说有关一个风骚的金发女人的私房话；这个女人使他花了不少钱，比在夜总会该花的多得多。我们曾经让阿拉贡夫妇躲在大使馆里，使他们免受反共分子的迫害；阿雷利亚诺·马林马上成为他们——尤其是阿拉贡的夫人埃尔萨——的朋友，对他们关怀备至，还送给他们许多小礼物。这个人心里对埃尔萨·特里奥莱准是存有非分之想，因为他曾在她写的一二部小说里写过他。

尽管我的眼光向来不敏锐，通过这一切也渐渐看出他对奢侈品和金钱的胃口很大。他玩着似地就把一种牌子的小汽车换成另一种牌子的；他还租用豪华房子。那个风骚的金发女人似乎每天还提出些要求来折磨他。

我必须前往布鲁塞尔，去解决一个紧急的移民问题。当离开我下榻的十分简陋的旅馆时，我意外地遇到我那引人注目的合作者——那个风度翩翩的阿雷利亚诺·马林。他大声打着亲切的招呼向我走来，还邀请我当天去吃饭。

我们在他住的饭店里见面，那是布鲁塞尔最昂贵的一家饭店。我们坐的餐桌上摆着兰花。他当然要了鱼子酱和香槟酒。用餐时，我听着东道主大谈特谈他的奢侈的计划、最近几次享乐的旅游和弄到手的珠宝，感到忧心忡忡，一言不发。我像是在听一个有点儿疯癫的暴发户的胡言乱语，不过，他目光锐利，言谈中充满自信，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脑袋发胀。我决定彻底予以解决，把我的忧虑坦率告诉他。我提议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喝咖啡，因为我有话对他说。

我们上楼谈话时，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楼梯口走到他身旁。他用西班牙语让他们等他，说他过几分钟就下来。

一走进他的房间，我就把咖啡放到一旁。我们的谈话很紧张。我对他说：“我觉得，你走到邪路上去了。你正在变成一个财迷。可能你还太年轻，不懂这一点。不过，我们的政治责任是很重大的。成千移民的命运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不能视同儿戏。你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不过，我倒是想提醒你。有很多人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之后就说：‘没有人劝过我；没有人提醒过我。’你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这就是我的提醒。现在我走了。”

我告辞时看着他。眼泪从他眼里直流到嘴角上。我突然后悔了。我莫不是说得过头了？我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哭了！”

“我是气哭的。”他答道。

我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开了。我返回巴黎，从此没有再见到他。两个等他的人一见我下楼梯，就赶紧上楼到他房间去。

这段公案很久以后在墨西哥才有结局，当时我是智利驻墨西哥领事。一天，我应一个西班牙流亡者团体之邀去吃饭，他们中有两个人认出了我。

“你们是在哪儿认识我的？”我问他们。

“我们就是在布鲁塞尔上楼找您的同胞阿雷利亚诺·马林谈话的那两个人，当时您正从他的房间下楼来。”

“当时出什么事了呢？我一直都很想了解。”我对他们说道。

他们告诉我一件怪事。他们走进阿雷利亚诺·马林的房间时，他哭得像个泪人儿，神经紧张得不得了。他抽舞嗒嗒地对他们说：“我刚刚受到生平最大的一次打击。聂鲁达已经离开这里，去向盖世太保告发你们是危险的西班牙共产党员。我没能说服他推迟几小时。你们逃命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你们把手提箱交给我，我替你们保管，以后再设法送还你们。”

“太蠢了！”我对他们说。“幸亏你们到底还是从德国人的手心里脱险了。”

“可是，那几只箱子里装的是西班牙工人联合会的9万美元。为些手提箱没有还回来，我们连见也没有再见到。”

稍后我才知道，那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曾经带上他的巴黎情妇，到近东去旅游一次，不但时间长，而且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个有层出不穷的要求的风骚的金发女人，终于成了巴黎大学的金发大学女生。

后来有一天，他在智利公开宣告脱离共产党。这家伙在致各报的信中写道：“深刻的思想分歧使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

一位将军和一位诗人

每个经历过失败和进过监狱的男人，都是一部有其章节、哭泣、笑声、孤独和牧歌的小说。这些故事有的使我大为惊叹。

我认识一位空军将军，长得又高又瘦，是军事学院毕业的军官，有各种各样的头衔。行在巴黎街头，俨然是西班牙土地上堂吉诃德的影子，如同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杨树，苍老而且挺拔。

佛朗哥的军队把共和地区一分为二的时候，这位埃雷拉将军必须在漆黑中巡航，视察防御设施，向被分隔的两个地区发出命令。在漆黑的夜里，他驾着灯光完全熄灭的飞机飞越敌区。佛朗哥军队的炮火不时从他的飞机旁边擦过。但是，这位将军在黑暗中感到厌倦。他于是学起了布拉耶盲字¹。他一旦掌握了盲字，就在执行危险使命的航程中用手指阅读，而飞机下边却是内战的漫天烽火和痛苦。这位将军对我说，他那时读完了《基度山恩仇记》，刚开始读《三个火枪手》的时候，他的盲人夜读便因内战败北而中断，他随即流亡国外。

安达卢西亚诗人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事情，是我想起来就心情激动的又一件事。他流亡后落脚在苏格兰一个贵族的城堡里。这座城堡一向空无一人，

不安生的安达卢西亚人加菲亚斯便天天到伯爵领地的酒馆去，一声不响地（因为他不会讲英语，他讲的吉卜赛西班牙语我本人也几乎听不懂）独自喝闷酒。这位默不作声的常客引起酒馆老板的注意。一天晚上，所有的喝酒客人都已离去，酒馆老板请他留下，他们就一起对着壁炉的炉火，继续默默地喝酒，炉火不时爆出火星，像是在对他们二人倾吐心曲。

这种邀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加菲亚斯每天晚上都受到酒馆老板的招待；酒馆老板没有妻室，没有家，跟他一样孤单。他们的舌头渐渐松开了。加菲亚斯对他讲述西班牙内战的详情，说话间又是惊喊，又是咒骂——最典型的安达卢西亚的咒骂。酒馆老板肃静地听着，当然是一句话也听不懂。

轮到那位苏格兰人诉说起他的不幸，也许是说他妻子抛弃他的经过，也许是说他几个儿子（他们穿军装的相片就摆在壁炉上）的业绩。我说“也许”，是因为在他们进行奇特交谈的长长的几个月里，加菲亚斯也是一句话都听不懂。

这两个孤独的男人在用彼此听不懂的语言热烈互吐衷情中建立的友谊，与日俱增；夜夜见面并畅谈达旦，成为两个人不可缺少的需要。

后来加菲亚斯不得不动身前往墨西哥，辞行时他们喝酒，谈心，热烈拥抱，而且潸然泪下。使他们的感情显得如此深厚的，乃是他们孤单的离别。

“佩德罗，”我多次问诗人道，“你认为他对你说了什么？”

“巴勃罗，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我一听见他说的话，我总是感到也总是确信，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讲话的时候，我敢肯定他也明白我的意思。”

“温尼伯号”轮船

一天上午我来到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职员们交给我一封很长的电报。他们微笑着，他们对我笑是件怪事，因为他们早就不跟我打招呼了。电文中准有什么叫他们开心的内容。

那是一封发自智利的电报。签发这封电报的恰恰就是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总统，而输送西班牙逃亡者的明确果断的指令，我就是从他本人那里领受的。

电文说，我们的好总统堂佩德罗今晨惊讶地获悉，我正在安排西班牙移民前往智利，他要求我立刻对如此奇怪的消息予以否认。看了这封电报，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感到奇怪的，倒是总统的这封电报。组织、审查和挑选移民的工作不仅困难重重，还要孤军作战。幸亏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理解我的使命的重要性。但是，每天都会冒出许多新的意外障碍；同时，成千上万拥挤在法国和非洲集中营的流亡者，有几百人已经或正准备离开那里，前往智利。

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已设法买到一艘船——“温尼伯号”轮船。这艘船已经经过改装，以便扩大载客容量，并期望在波尔多附近的小港特隆佩卢普停靠码头。

怎么办？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对我来说，这个紧张急迫的工作有如我生平的一个顶点。我向那些被追捕的战士伸出援手，就意味着他们的得救，而且向他们展示了我那好客和战斗的祖国的本质。所有这些梦想，都随着总统电报的到来而破灭了。

我决定去跟内格林商量这件事。我曾经有幸与胡安·内格林总统、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部长以及其他几位共和国的最后执政者建立了友谊。最有趣的是内格林。我总觉得，西班牙高层的政治家过于狭隘、土气、眼光短浅。内格林则是世界的（至少是欧洲的）政治家，曾就学于来比锡，享有全球的声望。他极尊严地在巴黎维持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子似的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

我们进行了交谈。我对他谈了情况——总统那封奇怪的电报使我成为说谎家伙，成为向逃亡的人民提供虚无缥缈的避难所的招摇撞骗者。可能的解决办法有三：其一，简单地通知西班牙人，向智利的移民已经取消；这个办法令人憎恶；其二，公开表明反对的态度，结束我的使命，并对准我的胸膛开一枪；这个办法颇为耸人听闻；其三，让轮船满载移民，不经许可径自开赴瓦尔帕莱索，我登船与他们同行，看看会出什么事，这个办法颇具挑战性。

内格林向后靠到椅背上，抽着他的很粗的雪茄烟。然后，他凄然微笑着回答我：

“您不能利用一下电话吗？”

在那些日子，欧洲和美洲之间打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困难得让人难以忍受。不但杂音震耳，还经常突然中断，在这两者之间我终于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外交部长的声音。通过一阵断断续续的对话——每句话都得重复几十次，对着电话大喊大叫或是听到电话里传来吹法螺般的回答——然不知道彼此是否都听清了，但我认为，我已经让奥尔特加部长明白，我不服从总统发出的与原命令相悖的命令。我认为，我也听清他要求我等到第二天的意见。

理所当然，我在巴黎的小小住所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夜。第二天下午，我获悉外交部长已在当日上午提出辞呈。他也不赞成撤回对我的授权。内阁震惊了，一时间被政治压力弄糊涂的我们的好总统，已经恢复了他的权威。于是我收到一封新的电报，指示我继续进行移民工作。

我们终于要把移民送上“温尼伯号”轮船了。长期身处异地的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从欧洲或非洲遥遥相隔的不同角落，纷纷汇集到登船地点来。等候接人的人群涌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在奔跑、哭泣和呼喊中，他们从窗口伸出的一簇簇脑袋中认出他们亲爱的人。所有的人都上船了。他们是渔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是力量、英雄气概、勤劳的样本。我的诗在奋斗中得以为他们找到了祖国，我深感自豪。

我买了一份报纸。我在塞纳河畔维伦纳镇的一条街上漫步，从一座古城堡前走过，攀缘植物爬上浅红色城堡的废墟，一直爬到石板建造的高高塔楼上。龙萨和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往昔曾在这座城堡里聚首，这座城堡以其所具有的石块和大理石的魅力，以其用古体全字书写的十一音节诗句的魅力，令我神往。我打开报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这一天爆发了。在那披人遗忘的古老小镇街头落到我手中的那份报纸，用灰暗的黑油墨印刷的巨大铅字报道了这个消息。

人人都料到会有这个消息。希特勒早已吞并了许多疆土，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却带着雨伞忙不迭地跑去，把更多的城池、王国和人口拱手奉送给他。

一片混乱的可怕乌云罩在人们心头。从我巴黎住所的窗口径直向巴黎残老军人院望去，看得见第一批应征兵员——尚未学会穿士兵制服的小伙子们——出来，他们出发去投入死神的血盆大口。

他们的出发是悲凉的，这是无可掩盖的事实。这像是一场事先就已败北的战争，是一种无法确定的事情。沙文主义势力在街头到处追捕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敌人不是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不是赖伐尔——之流人物，而是法兰西思想的精华。智利大使馆里已经形势大变，我们接待了伟大诗人路易·阿拉贡。他在大使馆住了4天，白天黑夜都在写作，这时暴徒们正在找他，要干掉他。就在智利大使馆里，他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汽车顶层上的乘客》。第五天，他穿上军装，奔赴前线。这是他第二次对德作战。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习惯了欧洲的犹豫不定。它不能容忍连续不断的革命，也承受不了地震，却任凭致命的战争毒焰弥漫长空，渗透面包。因为害怕轰炸，雄伟的法国首都夜里暗无灯光，那700万人共享的黑暗——那曾经是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心区的一团漆黑，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这个时期之末……

在这个时期之末，我又独自驻足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似乎这次长途跋涉全属徒劳。就在生的阵痛里，就在我早期的诗歌源泉喷涌而出，莫名的恐惧使别人也使自己惊惶不安之际，就在我的创作欲望已经激发的那个新的黎明，我陷入了极度痛苦和第二次孤独中。我何去何从？我应回归哪里，应投往何方，应在何处沉默或激动？我向光明和黑暗的所有方向看去，除了我亲手精心创作的空虚之外，一无所见。

然而，最靠近的、最根本的、最广泛的、最出人意料的事物，直到此刻才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我思虑过整个世界，却没有想到人；我残忍而痛苦地探索过人的心灵；我看见了城市——不过是空荡荡的城市，却没有想列人；我看见了外表悲惨的工厂，却没有看见屋顶下的、大街小巷的、车站的、城市里和村野上的痛苦。

最初射穿西班牙吉他的子弹没有使它发出乐音，却使它喷出鲜血，这时我的诗歌幽灵似地停留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并开始从它顶上升腾起一股鲜血的激流。从此以后，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突然觉察到人民需要我从孤独的南方向北方进发，人民期望我卑微的诗歌能成为剑和手帕，以便擦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淌下的汗水，以便使他们得到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

从此空间拓宽了，变得深厚而且持久。我已经稳稳站立在大地上。我们要不受限制地掌握存在的一切。我们无需探寻奥秘，我们就是奥秘。我的诗开始成为空间茫无边际的氛围——既弥漫于海下又弥漫于地下的氛围——的物质部分，开始进入奇异植物的长廊，开始在大白天与太阳的幽灵谈话，开始勘察藏在大地隐秘处的矿坑，开始使秋天和人建立起已被遗忘的联系。天空暗淡下去，而发出的磷光和令人恐惧的闪电不时照亮天空；一座用远非最直露、最陈旧的语言建造的建筑物，隐约出现在天边；一片新大陆从我的诗歌的最秘密的原料中升起。我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为这个王国进行分类，触摸它所有的神秘海岸，平息它的浪花，浏览它的动物学，走遍它的地理经度，就这样度过了许多黑暗、孤独和渺茫的岁月。

七、多花又多刺的墨西哥

我国政府派我去墨西哥

我因世上层出不穷的苦难和动乱而感到极度痛苦；1940年，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情绪，来到阿方索·雷耶斯所称道的空气最明净的地区——阿纳瓦克高原——来喘口气的。

墨西哥有仙人掌和蛇；墨西哥多花又多刺，干旱而且多飓风，轮廓明晰而且色彩鲜艳，有强烈的爆发和强大的创造力，以它的魅力和令人惊异的阳光而使我心满意足。

我年复一年地跑遍墨西哥的一个个市场，因为墨西哥存在于它的各个市场中。它不存在于电影里带喉音的歌曲中，也不存在于小胡子和手枪的不自然的俗气装饰中。墨西哥是一块披着猩红大披肩和闪着磷光的蓝绿色大披肩的土地。墨西哥是一块制作陶罐和陶坛子的土地，是一块水果上爬满成群昆虫的土地。墨西哥是一片长满顶上有黄刺的青钢色龙舌兰的无边的原野。

这一切都呈现在全世界最美的市场上。水果和羊毛，陶土和织布机，显示出多产、永恒的墨西哥人的手指具有何等惊人的能力。

我在墨西哥漫游，走遍它所有的海岸，走遍它高高的陡峭海岸，那里闪现着绿幽幽的永恒闪电。我从墨西哥锡那罗亚州的托波洛万波来，沿着本半球那些固有的地名往下走，这些刺耳的地名都是比神明略欠残暴的人们侵入其疆土进行统治时，神明留给墨西哥的遗产。我走过所有那些神秘、壮丽的音节，走过那些黎明的声音。走过索诺拉和尤卡坦；阿纳瓦克像个冷却的炉灶般地矗立着，从纳亚里特到米却肯向它飘过来混杂的芳香，从那里能隐约看到小小的哈尼齐奥岛升起的烟雾，能闻到哈利斯科飘来的玉米和龙舌兰的香味，能闻到新的帕里库廷火山飘来的硫磺味，夹杂着帕茨夸罗湖的鱼的芳香潮气。墨西哥是那些神奇国度的最后一个；它的神奇就在于它的古老和历史，就在于它的音乐和地理。我像个流浪汉，在那些受持续流血折磨的岩石中，在鲜血和苔藓的粗线交织的岩石中开辟我的路，我感到自己高大而且古老，值得在年代如此久远的天地万物中行走。陡峭的山谷被巨大的石墙阻断；耸立的山丘有的顶端像刀削似的平整；无边无际的热带大森林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木材、蛇、鸟和传说。在这片适于居住的辽阔疆土上，甚至在它最边远的地区，始终有人在进行斗争。我在这片巨大的空间里发现，我们智利和墨西哥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洲国家。老一套的外交辞令永远不能感动我，日本大使见到智利的樱桃树，英国人见到我们海岸上的雾，阿根廷人或德国人见到我们周围的白雪，就说发现我们是相似的，所有的国家都非常相似，这些老一套的外交辞令从来不能感动我。我喜欢人间的多姿多彩，喜欢一切纬度上不同土地所结出的果实。我丝毫没有贬低墨西哥这个我所热爱的国家，使它和我的五谷丰登的沿海国家隔得更远，而是强调它们的种种差异，以使我们的美洲显示其各个层面，显示其高度和深度。在美洲，甚至也许在本星球，没有一个国家比墨西哥及其人民具有更深厚的人情味。通过他们的杰出智慧，也通过他们的重大失误，人们看到宽宏大度、深厚的活力、内涵丰富的历史和无尽的生机之间的联系。

我经过渔村，见到织得像大蝴蝶似的极透明的渔网，它回到水里去获取它丢失的银色鳞片；我经过矿区中心，见到金属一出来就变成亮闪闪的几何形坚硬铸块；我沿着道路走，见到涌现出许多长得很密的多刺的仙人掌般的

天主教修道院；我经过市场，见到各种蔬菜排列成一朵鲜花，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各异的风味，令人不禁心醉神迷。一天，我们穿过墨西哥，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崇拜偶像的玛雅人——的被湮没的摇篮尤卡坦。历史和种子摇撼着那里的土地。在龙舌兰的根须近旁，正在增长着充满智慧和牺牲的废墟。

在最后几条路的交汇处，我们到达一片广袤的地域，古代墨西哥人在那里的大森林中留下他们用图案构成的历史。我们在那里见到一种新的水——所有地面水中最神秘的水。它不是大海，不是小溪，不是河流，也不是任何我们所知道的水。在尤卡坦，水都在地下，土地会突然裂开，出现一些巨大的天然水井，水井边上长满热带植物，底上可以见到一泓绿油油的清澈见底的井水。玛雅人发现了这种叫做地下湖的大地裂缝，用他们的奇特仪式膜拜这种井。所有的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需要和丰收而祭神，在那片土地上也是如此，大地为隐藏地下的水而裂开，干旱也就被这种地下水战胜了。

于是，在这种神圣的地下湖之上，千百年来原始宗教和入侵者的宗教加强了这种神秘的水的神秘性。在这种地下湖岸边，成百装饰着鲜花和金子的处女，举行婚礼之后，戴着珠宝从高处跳进那流动的深不见底的水中。花朵和处女花冠从深处浮上水面，少女们却被戴着的金链子留在湖底的污泥中。

几千年后，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珠宝被取回，陈列在墨西哥博物馆和美国博物馆的玻璃橱里。我到那片荒野去，不是去寻觅黄金，而是去寻觅那些溺死的少女的呼喊。在鸟儿难以入耳的怪叫声中，我仿佛听到了处女们嘶哑的痛哭声；当他们在迅疾的飞翔中穿过那久远的水里的无边黑暗时，我隐约看到了那些死去的青年女子黄色的手。

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鸽子停息在一尊雕像上，那雕像亮闪闪的石手伸向永恒的水上的永恒的空气中。也许有只老鹰追击过它。它不是那里的鸟，那里只有结巴的走鹃、羽毛神奇的格查尔鸟、青绿的蜂鸟和猛禽，它们占领大森林是为了杀戮，也是为了展现它们动人的美丽。那只停息在雕像手上的鸽子，白得像是落在热带岩石上的一团雪花。我凝望着它，因为它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一个平静和谐的世界，来自一根毕达哥拉斯__圆柱或是来自地中海某地。它停在黑暗边缘，当我已经成为这个原始的、美洲人的、血染的古老世界的一部分时，它尊重我的沉默。它从我眼前飞起，一直飞去，逐渐消失在长空中。

墨西哥的画家们

墨西哥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受绘画支配的。

墨西哥画家们用历史和地理、国内战争、激烈争论等画面覆盖了墨西哥城。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__这位瘦削的独臂巨人，在他变幻莫测的祖国占有类似戈雅__那样非常崇高的地位。我和他交谈过多次。看来他本人并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种暴戾。他有陶工所具有的温柔，当他一只手伸进转盘时，另一只手要用来继续创造宇宙。他所创作的士兵们及随军女商贩们、被监工枪杀的农民们、装着钉死在十字架的可怖尸体的石棺，是我们美洲的绘画中永垂不朽的作品，而且将作为揭露我们的残忍的证据流传下去。

迭戈·里维拉__在那些年里已经创作了许多绘画，成为传奇人物。我望着他，觉得奇怪的是没有发现他有鳞的尾巴或长蹄的脚。

迭戈·里维拉永远是善于杜撰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伊利亚·爱伦堡在巴黎出版过一本有关他的奇异事迹和欺骗勾当的书《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

30年后，迭戈·里维拉仍然是个了不起的绘画和杜撰的大师。他曾经劝人吃人肉，认为人肉是精于饮食的美食家们有益健康的食物。他把食谱分发给各种年龄的烹饪者。有时他又从理论上阐述女性同性恋，坚持认为这是唯一正常的关系，他指导下发掘出来的极古老的历史残迹就证明了这一点。

有时他与我作数小时长谈，转动着他那忧郁的印第安人的眼睛，向我介绍他的犹太人身世。有时他忘了以前的谈话，向我起誓说他是隆美尔将军的父亲，但这一席知心话须严格保密，因为一旦泄露，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国际纠纷。

他说话的声调极有说服力，他从容不迫地用最微不足道的、最出人意料细节编造谎言的方式，使他成为一个绝妙的江湖骗子，凡是认识他的人，永远都忘不了他的魅力。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__当时在狱中。有人使他卷入一个武装闯入托洛茨基家事件。我是在监狱里（实际上也是在监狱外）认识他的，因为我们曾经同监狱长佩雷斯·鲁尔福少校一起外出，到一处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去喝几杯。夜间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回监狱去，我同戴维拥抱告别，他就留在栅栏里边。

我曾多次同西凯罗斯一起从大街返回监狱，其中一次我认识了他的兄弟赫苏斯·西凯罗斯，他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用“诡秘的”一词好的含义来形容他，是较为贴切的。他沿着墙边溜走，没有任何声息，也没有任何觉察得出的动作。突然你会发觉，他就在你后面，或者就在你身旁。他少言寡语，说话声还没有耳语高。这并不妨碍他带着一个小提箱，同样静悄悄地转运四五十支手枪。有一次，我凑巧不经意地打开了那个提箱，我惊呆了，发现那是一箱子有黑枪把、螺钿枪把和银枪把的手枪。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因为赫苏斯·西凯罗斯爱好和平，有如他兄弟戴维那样爱好捣乱。赫苏斯也有艺术家和演员的才能，是个哑剧丑角。他不用动身体，不用动手，也不用发出一点儿声音，只需活动面部，随心所欲地改变面部线条，就能生动地表现出恐惧、愤怒、高兴、温柔等一系列面部表情来。他那张幽灵似的苍白面孔，同他不对带着的他从未使用过的手枪，一起浮现在生死攸关的迷宫中。

这些火山般感情炽烈的画家，总是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有时发生激烈的争论。其中有一次，在辩论得理屈词穷时，迭戈·里维拉和西凯罗斯便拔出大手枪，几乎同时扣动扳机，对着剧院天花板上石膏天使的翅膀射击。当沉重的石膏翅膀开始朝观众头上落下来时，观众纷纷逃离剧院，辩论就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一阵浓烈的火药味中告终。

鲁菲诺·塔马约__当时没有住在墨西哥。他从纽约来传播他那些既复杂又热情的画，这种画就像市场上的水果或编织品，具有墨西哥特色。

迭戈·里维拉的画和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的画是不能相比的。迭戈是个线条的古典主义者，他的画的线条极富动感，是一种历史的书法，同墨西哥历史有紧密联系，使墨西哥的事件、风俗习惯和悲剧鲜明地显示出来。西凯罗斯则是火山般炽烈气质的喷发，其中结合着他的惊人技巧和长期探索。

西凯罗斯多次偷偷从监狱出来，在这期间我同他谈了全部实际情况，并策划使他获得彻底自由。我准备好一份签证，亲自贴到他的护照上，他就带着妻子安赫利卡·阿雷纳莱斯到智利去。

墨西哥曾在智利的奇廉城设立一所学校（该校已被抛震摧毁），西凯罗斯在那所“墨西哥学校”里画了他的一幅不同凡响的壁画。智利政府对我为我国文化所作的贡献的回报，是让我这个领事停职两个月。

拿破仑·乌维科

我决定访问危地马拉。我坐汽车出发。我们穿过墨西哥的黄金地区特万特佩克地峡，那里的妇女穿得像花蝴蝶，空气中飘着一种蜜和糖的香味。随后我们进入恰帕斯大森林。夜间森林中打电报般的噪音，把我们吓坏了，我们便把汽车停下来。千万只蝉发出震动全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响声。神秘的墨西哥把它的绿荫投在古建筑上，投在年代久远的绘画、珠宝和纪念碑上，投在巨大的头像上，投在石刻的动物上。所有这一切都留在大森林中，留在墨西哥人存在了千万年的前所未闻的事物中。越过边界，在中美洲最高处，危地马拉的狭窄道路上使我眼花缭乱的有藤本植物和巨大树冠；然后有高山上像被古怪的神明们遗忘的眼睛般平静的湖泊；最后，还有松树林和宽阔的原生河流，河里一群群的海牛，像人一样从水里探出头来。我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一起度过了一星期，当时他还没有因自己的几部获得成功的小篇小说而显露头角。我们明白，我们生来就是弟兄，几乎一天都没有分开过。晚上我们曾计划前往云雾缭绕的山上那遥远的去处，或者到联合果品公司的热带港口去。

危地马拉人没有随便讲话的权利，他们谁都不在别人面前谈论政治。那里隔墙有耳，而且有人告密。有时我们要把车停在高地顶上，确信任何一棵树后都没有人埋伏之后，才会如饥似渴地谈起形势来。

那个暴君名叫乌维科，已经统治好多年了。他是个肥胖的人，冷漠的眼睛一直是严酷的。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在危地马拉，没有他的明确同意什么事也办不成。我认识他的一个秘书——现在是我的朋友，一位革命者。他为了了一件细微末节的小事跟乌维科顶了句嘴，乌维科就在总统办公室里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狠心地用鞭子抽他。

青年诗人们要求我举行一个朗诵自己的诗的朗诵会。他们给乌维科发一封电报，恳求准许。大厅里坐满了我的所有朋友和许多年轻的学生。我很高兴朗诵我的诗，因为我觉得，这像是我的诗把那座大监狱的窗子打开了一道缝。警察头子显眼地坐在第一排。后来我才知道，有4挺机枪一直瞄准我和听众，警察头子一旦公然离座来打断我的朗诵，这4挺机枪就会开火。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家伙没有离座，而是坐着听我的诗，直到朗诵结束。

后来有人想把我介绍给那个独裁者——一个被拿破仑的狂热所左右的人。他让一绺头发垂在额头上，经常摆出波拿巴的姿势拍照。有人对我说，拒绝这样的建议是危险的，但我宁愿不与他握手，于是急忙返回墨西哥。

手枪选集

在当时的墨西哥，持枪者比用枪杀人者要多。有一种对45毫米口径左轮

手枪的崇拜热。那种大手枪经常会被亮出来。议员候选人和报纸曾发起“收枪”运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摘掉一个墨西哥人最钟爱的手枪，比拔下他的一颗牙齿要难得多。

有一次，一群诗人招待我乘一条有鲜花装饰的小船出游。有 15~20 位诗人在霍奇米尔科湖聚会，邀我在湖水与鲜花间泛舟，他们驾船穿过阿斯特卡时代起就用于鲜花泛舟的沼泽地里的一条条运河和一个个陡峭去处。船上到处装饰着形态繁多、色彩艳丽的鲜花。墨西哥人的双手跟中国人的一样，无论用石头、银子、黏土还是用康乃馨，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

泛舟中，诗人之一喝了大量龙舌兰酒之后坚持说，为了向我表示崇高的敬意，我要用他那支柄上装饰有金银标志的美丽手枪朝天射击。离他最近的那位诗人连忙从枪套中拔出自已的手枪，在激情驱使下一巴掌把第一位诗人递过来的枪打到一边去，请我用他的枪射击。其余的诗人都向我一哄而上，个个都坚决地拔出枪来，举在我的头周围，要我选用他的而不要选用别人的枪。交叉在我鼻子前边或是从我腋下递过来的手枪，形成一个晃动的华盖，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这时我才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就拿过一顶典型的墨西哥大草帽，以诗与和平的名义，请这一大群诗人把所有的枪都放到草帽里去。大家都听从了，就这样我没收了这些武器，在我家里存放了好几天。我认为，我是唯一的一个靠诗人的荣誉编成一本手枪选集的诗人。

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世上的精英都曾云集在墨西哥。当早已占领法国、意大利的希特勒军队连连告捷，战争在欧洲形成长期迁延之势时，各国流亡作家们都集合到墨西哥的自由旗帜下边来。他们中间有安娜·西格斯和现已去世的捷克幽默大师埃贡·埃耳温·基施^[1]。这位基施留下几本使人着迷的书，我非常赞赏他的杰出才能、孩子般的好奇心和变戏法的技巧。他一走进我的家，就从耳朵里掏出一个鸡蛋，或是一枚接一枚地吞下 7 枚之多的硬币，这些硬币是这位一贫如洗的披流放的作家所相当需要的。我们早在西班牙时就已相识，他对我为什么使用聂鲁达这个并非生而有之的姓氏，表现出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于是我对他开玩笑说：“伟大的基施，你发现过雷德尔上校的秘密（1914 年发生在奥地利的著名间谍案）^[2]，但你永远也弄不清楚我取名聂鲁达的秘密。”

事情果真如此。他大概死于布拉格，享有他解放了的祖国所给予的全部荣誉，但是这位专爱管闲事的人却永远查不出聂鲁达为什么名叫聂鲁达。

回答十分简单，而且毫无惊人之处，所以我极力保持沉默。我 14 岁时，我父亲总是不依不饶地反对我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意有个诗人儿子。为了不让他知道我发表最早写的那些诗，我找了一个使他完全找不到线索的姓氏。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个捷克名字，然而并不知道它是被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热爱的大作家的名字，是优美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的作者的姓名；他的纪念碑竖立在布拉格的马拉·斯特拉纳区。许多年后，我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在他那有大胡子的雕像脚下放上一朵鲜花。

珍珠港事件前夕

萨拉曼卡来的西班牙人文塞斯劳·罗塞斯，毛拉公爵的亲戚共和派、美

畅销书《在光辉的地方》的作者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诗人莱昂·费利佩、胡安·雷哈诺、莫雷诺·比利亚、埃雷拉·彼得雷，画家米格尔·普列托、罗德里格斯·卢纳等人常到我家来。他们全是西班牙人。以第五团卡洛斯少校闻名的维托里奥·维达莱和意大利流亡者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这两位意大利人，满脑子都是往事的回忆和惊人的故事，而且掌握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雅克·苏斯戴尔和吉尔贝·梅迪奥尼也常来；他们是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自由法兰西的代表人物。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家来的自愿或被迫的流亡者，也都云集墨西哥，使之充满一种多国的情趣，有时我的家（在圣安赫尔区的一幢旧别墅里）仿佛跳动着世界的心脏。

那位苏斯戴尔当时是个左翼社会主义者，许多年后成为搞政变者的政治首领，给戴高乐总统惹了不少麻烦。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这件事应该说说。

早在1941年，当时纳粹已经围困了列宁格勒，并长驱直入苏联领土。参加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预感到德国一旦打胜这场战争，他们就可能有丢失参战应得的那份利益的危险。世界上流传着各种谣言。到了发起进攻的时刻，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就将在远东动手。与此同时，日本的一个和平使节团正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大献殷勤。不容置疑，日本人想必要发动一场快速的突然进攻，因为“闪电战”已成为当时血淋淋的时尚。

为了让读者听明白我所说的话，我必须提到，早就有连接日本和智利的一条日本轮船航线。我曾经多次乘坐这条航线的轮船旅行，因而非常了解它们。这些轮船停靠在我国的港口，它们的船长花时间购买旧铁器并进行摄影。这些轮船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的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甚至远达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从该港掉转船头越过太平洋，开往横滨。

于是有一天（当时我还是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我接待了7个来访的日本人，他们急于得到前往智利的签证。他们来自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和其他港口。他们流露出忐忑不安的神色。他们衣着考究，证件齐备，个个都像工程师或企业管理人员。

我当然问他们，他们刚刚到达墨西哥，为什么就要乘坐最近的一次班机去智利。他们答道，他们想乘坐停泊在智利北部装卸硝石的托科皮利亚港的一艘日本轮船。我反驳说，为此没有必要到本大陆另一端的智利去，因为那些日本轮船也要在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停靠，他们如果愿意，可以步行前去，还准能及时到达那里。

他们彼此对看一眼，并且尴尬地笑了笑。他们用日语交谈一阵。他们同陪伴他们的日本大使秘书商量。

这个秘书决定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说道：“您看，同行，这艘船凑巧改变了航线，不再在曼萨尼略港停靠。所以，这些优秀的专家们必须在智利港口乘船。”

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想法：我遇上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了。我要来了他们的护照、相片、在美国的工作资料等等，随即告诉他们，第二天再归还他们。

他们不同意。他们必须立刻得到签证，为此要付多少钱，他们都愿意。

我竭力要争取时间，便对他们郑重表明，我无权立即签发签证，我们第二天再商谈。

我独自留下。

我脑子里琢磨开了这个难题。他们为什么仓皇逃出美国，又如此急切地要得到签证？日本轮船为什么 30 年来第一次改变航线？这意味着什么？

我霍然开朗了。不用说，这是一群消息灵通的要人。为了使日本的谍报工作万无一失，他们急忙在某种严重事件发生之前从美国溜走。这种严重事件只能是日本即将参战。我说到的这几个日本人一定知道内情。

我所得出的结论，使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我能有什么作为？

同盟国驻墨西哥的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我都不认识。我仅仅和正式委派的戴高乐将军的代表们有直接联系，他们能与墨西哥政府进行接触。

我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我对他们说明局势。我们手里有这些日本人的名字和有关资料。如果法国决定干预，日本人准会落入我们手中。我在戴高乐的代表们面前热心地争辩，后来也就不耐烦了。

我对他们说：“年轻的外交官们，揭露那几个日本间谍的秘密，你们是会获得荣誉的。至于我，我将不给他们签证。但你们得立刻作出决定。”

这种软硬兼施的交涉，持续了两天多。苏斯特尔对此事毫无兴趣。他们不想采取任何步骤。而我，仅仅是个智利领事，不可能有更多作为。在我拒绝给予签证之前，日本人迅速办好外交护照赶到智利大使馆，而且及时抵达托科皮利亚港登船。

一周以后，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把全世界惊醒了。

我是软体动物学家

数年前，智利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报道，说我的好友、著名的朱利安·赫胥黎教授到达圣地亚哥时，在机场问到我。

“是那位诗人聂鲁达吗？”新闻记者问他。

“不是。我不认识名叫聂鲁达的什么诗人。我想跟软体动物学家聂鲁达谈谈。”

malacólogo 那个希腊词的意思，就是“软体动物学家”。

我喜欢这篇打算惹恼我的报道。它不可能是真的，因为赫胥黎和我已相识多年，而且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比他有名的弟弟奥尔德斯要有朝气和真诚得多。

在墨西哥，我在海滩上漫游，潜入清澈温暖的水中，收集绝妙的贝壳。后来，在古巴和别的地方，通过交换、收购、接受馈赠和偷盗（再没有如此真诚的收集者了），我收藏的海中珍宝渐渐增多，甚至摆满了我家的一个又一个房间。

我拥有来自中国海和菲律宾、日本和波罗的海的稀有标本；南极的海螺、贝类和古巴的杂色螺；像加勒比海的跳舞女郎那样披着红色、桔黄色、蓝色、紫色外衣的彩绘海螺。说实话，有一种罕见的标本我没有，那就是巴西马托格罗索的蜗牛壳。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但不能买它，又不能到大森林去采集。这种蜗牛浑身碧绿，如同一粒新琢磨的美丽的翡翠。

我收集到的海螺超过 15000 个，我所有的架子，桌子和椅子也开始被海螺占满了。我的藏书室里到处是贝类学或软体动物学（随你爱叫它什么）的书。于是有一天，我把全部收藏品装进几口大箱子，送往智利大学，作为我第一次给母校的捐赠。在当时，那是一批著名的收藏品。我的母校跟南美洲的优秀学院一样，赞不绝口地收下它们，再把它们埋到一间地下室里去。从

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

《阿劳卡尼亚》

我曾经居住在爱琴海遥远群岛上最偏远的角落，那时大海在低声絮语，宁静的世界到处是诉说我的孤独的事物。但是冷战和热战使领事职务染上了污点，使每个领事成为一台没有个性的自动机器，不能作任何决定，领事工作无疑地接近于警察的工作。

大使坚持让我查明移民的种族血统，非洲人、亚洲人和犹太人都不能进入我们智利。

这种蠢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连我都成了它的受害者，当时我没花智利国库一分钱，创办了一本精美的杂志。这个杂志定名为《阿劳卡尼亚》，我用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齿的美丽的阿劳科女子的肖像，作为它的封面。这足以使当时的外交部长严肃地要我注意我的冒犯行为；尽管那时的共和国总统是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从他那和蔼可亲的高贵的脸上，可以看出我国混血人的一切特征。

大家都知道，阿劳科人曾经被击溃，终于被遗忘或被征服了，况且写历史的不是战胜者，就是享有胜利果实的那些人。没有几个种族比阿劳科人更值得尊敬。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阿劳科大学，看到阿劳科文字印的书；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他们的光明磊落，他们的纯洁，他们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某些南美洲国家荒谬的“种族主义”要求，乃是殖民主义者的遗毒；这些国家本身便是多重杂交和混血的产物。他们想建起一个高台，使一批皮肤纯白或灰白的赶时髦之辈可以在这里进入社交界，在纯雅利安人或世故的旅游者面前高谈阔论。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联合国已经有很多黑人代表和蒙古人代表；也就是说，由于吮吸了才智的浆液，各种族的枝叶都显示出各自的色彩。

我终于厌倦了，便在某一天永远地辞去了我的总领事职务。

魔幻和神秘

此外，我还了解了在前哥伦布时期礼仪的掩盖下充满压迫、暴力和民族主义的墨西哥社会，它即使没有我的存在和我目睹的证据，也会照样发展下去。

当我决定回国时，我所了解的墨西哥生活，比我刚到墨西哥时还要少。

艺术和文学在竞争的圈子里产生，但可悲的是，如果有人想从圈外支持或反对某人或某团体，那么两者都会起而攻之。

当我已经准备动身时，有人安排一个向我表示敬意的、盛大的群众集会：约有 3000 人参加的午餐会，没找到座位的好几百人还不计在内。共和国的几位总统送来了贺信。墨西哥仍然是美洲的试金石，古代美洲的太阳石历在那里雕刻出来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是颖悟、智慧和神秘交汇而成的圆形物。

在那里，一切都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唯一对立的报纸得到政府的补贴。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最独裁的民主政体。

记得有一个令我异常震惊的悲惨事件。有一家工厂发生了一次旷日持久

的罢工，毫无解决的可能。罢工者的妻子们聚集在一起，一致同意去找共和国总统，也许是想把她们的贫困和痛苦告诉他。她们当然没有携带武器。路上她们弄来一些鲜花，以便赠送给国家元首或他的夫人。当她们正要进入政府大厦时，一名卫兵拦住她们。她们要往前一步都不可能。总统先生不接待她们。她们必须到有关的部去。此外，她们必须撤离那个地方。那是必须执行的命令。

妇女们为自己的理由辩护。她们决不添任何麻烦。她们只想送鲜花给总统，求他尽快解决罢工问题。她们没有食物给孩子们吃；她们不能这样下去了。警卫军官拒绝转达任何口信。妇女们也不肯撤走。

这时传来了政府大厦的卫兵密集的枪声。六七个妇女当场被击毙；还有许多人受了伤。

第二天举行了仓促的葬礼。我原以为会有人数众多的送葬行列跟在被害妇女的灵柩后边；但是来的人寥寥无几。对了，那位杰出的工会领导人倒是讲了话；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著名的革命者。他的墓地演说在文字上是无懈可击的。次日我在报纸上读了演说全文。演说中没有一行是抗议的文字，既没有一个愤怒的字眼，也没有将那些对这一暴行负有责任的人交付审判的任何要求。两周以后，已经没有人谈论这次大屠杀了。后来我也从未见过有人在文章中回忆过这件事。

这位总统简直是个阿斯特卡皇帝，比起英国王室来，他更是千百倍地碰不得。不管是开玩笑还是郑重其事，任何报纸都不能批评高官显贵，否则就会立即遭到致命打击。

墨西哥戏剧笼罩着一层华丽的外衣，看到它有如面对讽喻那样令人惊讶；而这种讽喻会使你越来越远地脱离内在的搏动，脱离有血有肉的骨骼。哲学家们变成了浮夸之辈，在活火山下高谈有关存在的废话，显得十分可笑。平民的行动时断时续，而且十分艰难。在王权周围分成层次的各种不同的流派，都顺服了。

但是，各种魔幻的事物总是在墨西哥一再出现，诸如：一个农民在自己贫瘠的菜园种菜豆，火山会突然在他身旁喷发起来；产生了搜寻科尔特斯尸骨的狂热，据说这个征服者就安葬在墨西哥，几个世纪来他的头上一直戴着黄金头盔。寻找阿斯特卡皇帝夸乌特莫克的遗物的热烈程度也毫不逊色；这些遗物4个世纪前就已失踪，现在突然到处出现，由神秘的印第安人守护着，以便再次不停地使之消失在无人知晓的黑夜中。

墨西哥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如同流淌在我血管里的一只迷途的小鹰；只有死神才能在我这个安眠的战士心上折断它的翅膀。

八、黑暗中的祖国

马丘比丘

大使连忙接受了我的辞职要求。

我自行结束外交生涯使我得以返回智利，这给予我莫大的快乐。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生活在他自己的祖国；我还认为，人类失去自己的根，就会不同程度地使头脑不清醒，从而导致失败。我只能生活在故土上；我要把手、脚和耳朵紧贴着它，我要聆听地上河流的流淌和树荫的移动，聆听我的根如何在土壤中觅取母亲的养分，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

但是，在回到智利以前，我又发现应该给我的诗的发展增加一个新的领域。

我在秘鲁停留下来，登上马丘比丘遗址。当时还没有公路，我们是骑马登山的。我从高处看见了苍翠的安第斯山群峰围绕的古代石头建筑。急流从多少世纪以来被侵蚀、磨损的城堡处飞泻而下。一团团白色的云雾从维尔卡马约河升起。站在那个岩石肚脐的中心，我觉得自己何等渺小；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据傲而突兀的世界的肚脐，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年代，我的双手曾在那里劳动过——开垄沟，磨光岩石。

我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那难以到达的山巅上，在那光荣的和分散的废墟间，我发现了必须继续写诗的信条。

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就诞生在那里。

硝石大草原

1943年年底，我又到圣地亚哥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房子是我分期付款购置的。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在这所树木葱茏的房子里，又过起了艰苦的生活。

我再次寻觅我的祖国的美丽之处——大自然的壮丽，妇女的魅力，我的同伴们的工作，我的同胞们的智慧。这个国家毫无变化。田野和村庄昏昏沉睡，矿区一贫如洗，乡村俱乐部挤满了高雅人士。我必须作出决定。

我的决定使我遭受迫害，也给我带来光荣的时刻。

哪个诗人会对此感到懊悔呢？

我现在来讲讲数年后与我会晤的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他在他的文章中讲得好：“我不是共产党人，但如果我是智利诗人，我就要做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的诗人。你必须不是站在卡迪拉克们一边，就是站在那些没受过教育和没有鞋子穿的人们一边。”

这些没受过教育和没有鞋子穿的人们，在1945年3月4日选举我为参议员。千千万万来自智利最艰苦地区，来自最大的铜矿和硝石矿区的人们投了我的票，这一事实我将永远引以自豪。

在大草原上步行艰苦而费力。那些地区有半个世纪没有下雨了，沙漠赋予矿工们以外貌。他们是些脸色焦黑的汉子；他们的孤独和漫不经心的神情，全部凝聚在他们乌黑的眸子里。从沙漠登上群山，走进每户穷苦人家，了解那些非人的劳动，便可以感到这些与世隔绝、陷于不幸中的汉子把希望托付给你，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责任。但是，我的诗打开了交流的通道，使我有可能是作为那些生活艰辛的同胞们永远的兄弟，在他们中间走动并受到款待。

我不记得是在巴黎还是在布拉格，我忽然对当时在那儿的我那些朋友的渊博知识产生了些许怀疑。他们几乎全是作家，其余的是大学生。

“我们谈了一大堆智利的事，”我对他们说，“这可能因为我是智利人。但是，你们真的知道我的十分遥远的国家的什么事情吗？例如，我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大象、小汽车、火车、飞机、自行车、骆驼，还是雪橇？”

他们中大多数一本正经地回答：是大象。

智利没有大象，也没有骆驼。但是我明白，一个从冰封的南极延伸到长期不下雨的盐矿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多么令人困惑不解。作为那一带荒山僻野的居民选出的议员，作为从未戴过硬领和领带的无数硝石矿和铜矿工人的代表，多年来我当然要在那一带人烟稀少的地方奔波。

进入那片平原，面对荒沙，有如登上月球。这一空荡荡的星球般的地方，蕴藏着我国的巨大财富。但是，那种白色肥料和红色矿石都须从那片干旱土地和石山去取得。生活如此艰苦，同时又如此缺乏生活所需的欢愉，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为了保住一棵能开出最平凡的花朵的植物，为了饲养一条狗、一只兔子或一头猪，都要付出无可言喻的代价运来淡水。

我来自共和国的另一端，我降生在拥有大片密林的绿色土地。我有一个充满雨雪的童年。仅仅面对月球般荒凉的沙漠这一事实，使我对自己生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议会中代表那些人，陈述他们的孤立、他们的广袤土地，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光秃秃的土地上没有一棵草，没有一滴水，是一个难以了解的巨大秘密。在河边，在树下，一切事物都会对人类诉说。然而，沙漠是不与人沟通的；我不懂它的语言，也就是不懂它的沉默。

多年以来，各硝石矿公司在南美草原上建立了许多真正的领地、采邑或王国。英国人、德国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入侵者圈占了产地，并在那里标上公司的名字。他们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自己的货币，制止一切集会，查禁政党和人民的报纸。未经特别准许不能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能得到准许的人当然很少。

一天下午，我在玛丽亚·埃莱娜硝石矿公司的机车车辆厂中与工人们交谈。那巨大车间的地面上总是被水、油和酸弄得泥泞不堪。几位陪伴我的工会领导人和我走在一块把我们与泥泞地隔开的大木板上。他们告诉我：“这些大木板曾让我们花费了连续15次罢工、8年的请愿和7个人的生命。”

死亡是出在一次罢工中，当时公司的警察带走了7个罢工领导人。警察们骑在马上，而被绑在一根绳索上的工人们却是跟着步行在荒凉的沙漠上。只用几发子弹就杀害了他们。他们的尸体横卧在沙漠的阳光下和严寒中，直到被他们的伙伴找到并予以安葬。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情况要糟得多。例如1906年在伊塞克，罢工者们从各硝石矿公司进城，直接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因长途跋涉而累得筋疲力尽的数千工人，都聚在学校对过的广场上休息。他们打算第二天上午去找地方长官，呈送他们的情愿书但是他们永远办不到了。拂晓时，由一名上校率领的军队包围了广场，不声不响地开始杀人。在那场大屠杀中，6000多人倒下了。

1945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有时我觉得灭绝人民的日子又回来了。有一次，我被禁止向工会大厅里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我把他们从大厅中叫出来，

在沙漠里开始向他们讲解形势，讲解从冲突中寻求出路办法。我们大约有200人，我忽然听见发动机的噪音，接着便看见军队的一辆坦克，开到靠近我讲话的地方四五米处。坦克的盖子打开了，从出入口里探出一挺机枪瞄准了我的脑袋。机枪旁站起来一名军官，脸上修饰得很光鲜，但神情十分严峻，我继续谈话时，他就盯着我。这就是全部情况。

那群工人（其中许多人目不识丁）对共产党人的信任，是同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雷卡瓦伦在这一沙漠地区开始斗争一起产生的。雷卡瓦伦从一个单纯的工人鼓动者，一个旧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幻影似的高大的人物。他使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工会和联合会。他终于出版了15种以上的报纸，专门用于捍卫他所创建的各种新组织。他筹办这一切时身无分文，所需款项均来自工人们所具有的新觉悟。

我有机会参观过雷卡瓦伦的几处印刷厂，这些厂曾英勇地服务过，而且40年后仍然在工作。其中有几台印刷机曾被警方砸得破损不堪，后来才被仔细地修过。精心焊接过的机器运转如初，但在焊接处仍看得见巨大的疤痕。

在那漫长的旅行途中，我习惯了住在沙漠居民的简陋房屋、小木屋或茅舍里。几乎总有一群举着小旗的人在公司门口等我。然后他们带我去看我留宿的地方。男男女女一整天鱼贯走过我的住处，来诉说他们对劳动条件的不满，诉说他们构心的矛盾。有时他们的怨言在一个外国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滑稽、任性，甚至觉得可笑。例如，茶叶短缺就可能引发一场后果严重的罢工。这么典型的伦敦需求，在如此荒凉的地区是可以理解的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智利人如果一天不喝几次茶，就活不下去。有些光脚的工人苦恼地问我，这种少不了的外国的难喝饮料为什么短缺，还辩解地说出理由：“要是我们不喝茶，我们就头疼得要命。”

在荒凉的土地上和寂寥的天空下，封闭在沉默的大墙之内的人们永远有一种活跃的政治好奇心。他们想知道在南斯拉夫和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关心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变化，关心意大利大罢工的结局，关心战争的传闻，关心遥远地方发生的革命。

在上百次彼此相距遥远的集会上，我总是听到同样的要求：给他们朗诵我的诗。他们往往要求朗诵他们指定的诗。当然，我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全都懂我的某些诗句或许多诗句。当他们在那种绝对沉默和毕恭毕敬的气氛中听我朗诵时，要对此作出判断是困难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学识渊博的傻瓜之一，荷尔德林荷尔德林和马拉梅马拉梅的不少诗句我是永远也听不懂。然而我确实曾经同样毕恭毕敬地读过他们的诗。

想使吃饭具有节日气氛，那就吃炖鸡——这是大草原上很稀罕的禽类。经常送到我盘中来的往往是我咬不动的肴馔——做好的豚鼠。环境使这种为死于实验室而生的小动物，变成一道受欢迎的菜。

在我住宿过的无数房子里，让我睡的床，总是有两个修道院的特征。床单其白如雪，而且浆得发硬，自己都能支棱起来。床硬得可以和沙漠地面相比。他们不知道床垫，只睡过一些光滑的硬木板。

尽管如此，我还是睡得很香，像个有福气的人。就是同众多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也会毫不费力地进入梦乡。白天总是又干又热，像一团炭火，但沙漠的夜晚却在精致地缀满繁星的穹空下把凉爽扩散开来。

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条美洲大河，又如发源于南方隐秘的山峦深处的一条智利湍流，那浩浩荡荡的河水不停地流向出海口。我的诗不拒绝其水流所能携带的任何东西；它接受激情，发展神秘，还冲开进入人民心中的通过。

我必须去经受痛苦和进行斗争，去爱和歌唱；我分享过世上的胜利和失败，也品尝到了面包和血的滋味。一个诗人还要求什么？一切抉择——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还在我的诗中活着，并且还在发挥作用，因为我是为我的诗而活着，而我的诗也为我的历次斗争提供了营养。我虽然得过许多奖，但那些奖却像采集昙花一现的花粉的蝴蝶那样瞬息即逝，而我获得的一项最高奖（一项受许多人蔑视的奖），实际上却是许多人难以得到的。我通过对美学的艰苦学习和长期探索，通过写作的迷宫，终于成为我的人民的诗人。那就是我所得的奖，它不是那些已被翻译的书和诗，也不是那些写出来用以描述或剖析我的语言的书。在我一生的那个关键时刻，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的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脸脱形，灰尘使他的眼睛发红，他向我伸出粗糙的、上面的胼胝和皱纹形似大草原地图的手，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那就是我所得的奖。一个工人从可怕的大草原上那个坑道中出来，智利的风、夜晚和星星曾多次对他说：“你并不孤独；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那就是我的诗所得到的荣誉。

1945年7月15日，我加入了智利共产党。

冈萨雷斯·魏地拉

我和我的朋友们所代表着的痛苦，历经种种困难才到达议会。那舒适的议会大厅似乎装有护垫，以免不满的群众的喧闹声对它有所影响。在发表长篇大论的爱国演说的技巧方面，我的反对派同事们都是发空论的专家，在他们展开的假丝绸花毯下面我感到窒息。

我们很快又有了希望，因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冈萨雷斯·魏地拉发誓要伸张正义，他活泼生动的口才使他大得人心。我被任命为他的竞选活动的宣传负责人，并把这一好消息带往全国各地。

人民以压倒的多数选他为总统。

但是，在我们土生自人的美洲，总统们往往发生一种特殊的转向。在我所陈述的这一事例中，这个新的统治者很快就换了朋友，使他的家庭与“贵族”结亲，而且渐渐从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统治者。

冈萨雷斯·魏地拉事实上进不了南美独裁者的圈子。玻利维亚的梅尔加雷霍和委内瑞拉的戈麦斯将军都有公认的群众基础。这两个人确有其伟大之处，并且似乎受一种孤寂凄凉而又无可缓解的力量的驱使。当然，他们都是亲历过战斗的枪林弹雨的首领。

冈萨雷斯·魏地拉则与此相反，他是政治餐馆里做的一道菜，是一个不严肃的浅薄之徒，一个故作坚强的弱者。

在我们美洲动物志中，那些不可一世的独裁者都不过是巨蜥目动物，是史前大地上庞大的封建主义的幸存者。那个智利的犹大只不过是暴君的学徒，而且在蜥蜴目的等级上恐怕至多只能是一只毒蜥蜴。但是，他做了足以损害智利的事，至少使这个国家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智利人难为情地面面

相觑，无法确切弄明白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家伙是个踩钢丝艺人，是个议会的杂技演员。他成功地在轰动一时的左派中占一席之地。在这出“撒谎喜剧”中，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没有人对此有异议。在一个国家里，政治家们往往（或似乎）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态，人们则对这种无聊的表现感激备至。等到这个跳孔加舞的家伙开始乱来时，已经为时太晚了。监狱关满了政治犯，甚至建立起好几个像在皮萨瓜建立的那种集中营。一个警察国家就这么建立起来了，这是智利前所未见的新鲜事。除了忍耐，除了为恢复尊严而进行地下斗争，没有别的路可走。

冈萨雷斯·魏地拉的许多朋友，那些在竞选活动中追随他到底的人，只因对他的转向有异议，就被送往设在高山或沙漠中的监狱里去。

实际上，包围着他的上流社会像以前常干的那样，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再次把我国的政府吞吃下去。但是，这次却没有那么好消化，智利于是安然度过了一场重病，这场病害得它有时震惊，有时几乎死去。

我们投票选出的这个共和国总统，在美国的保护下变成了残忍可耻的吸血鬼。尽管他在总统府附近用地毯和镜子布置了眠花宿柳的私宅，以供寻欢作乐之用，内疚肯定会使他无法入睡。这个卑鄙的家伙有一种卑鄙而又邪恶的思想。就在他发动反共的大规模镇压的那天晚上，他邀请两三位工人领袖去吃晚饭。饭毕，他同他们一起走下总统府楼梯，他在拥抱他们时，一边抹掉几滴眼泪，一边对他们说：“我哭，是因为我已经下令监禁你们。你们走出大门时将被捕。我不知我们能否再见面。”

分散的身体

我的讲话变得激烈起来，议会大厅里总是坐满听我讲话的人。立即有人提出要对我采取非常行动，而且已下令警方逮捕我。

但是我们诗人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其成分大都是火与烟。

我要用烟进行写作。我所经历的全部有关历史事件，与古老的美洲主题惊人地接近，在那必须东躲西藏的危险的一年里，我完成了我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

我几乎每天都要更换住处，到处都有一扇门为庇护我而打开。用某种方式表达他们让我躲藏几天的愿望的，永远都是我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要我去避难，哪怕只躲避几小时或者几周。我走过田野、港口、城市、野营，我也到过农民、工程师、律师、水手、医生和矿工们的家。

有一个古老的民歌主题，在我们所有的国家里一再出现——那就是关于“分散的身体”的主题。民歌手想象自己的双脚在一处，肾脏却在另一处，而且描述他的全部机体已经撒遍田野和城市。这就是我在那段日子里的感受。

在我留宿过的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我忘不了隐蔽在瓦尔帕莱索贫穷的山冈中的一所两居室房子。

我的活动被限制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而且只能从窗子的一角去观察港口的生活。从那个简陋的瞭望台上，我只能看到街道的一小部分。夜间，我看到人们来去匆匆。这里是个贫穷的郊区，这个区的全部灯火都集中在我窗下那条小街上。整条小街尽是小商店和小酒馆。

由于我被限制在那个角落里，我的好奇心强烈得没有边，但一些问题却

往往得不到解决。例如，不管是随意溜达的还是匆匆而过的过路人，为什么总是要在同一个地方驻足？那个橱窗里陈列的是什麼神奇的商品？全家人带着坐在肩头上的孩子们，在那里久久流连不去。我看不见他们盯着神奇的橱窗时那副心醉神迷的神色，但我想象得出来。

过了6个月，我才知道那是一家不起眼的鞋店的橱窗。我于是得出结论，鞋子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我发誓要研究这件事，对它进行调查，并把它写出来。我始终没有时间实现这个目标，或是履行我在如此奇特的境况中许下的诺言。不过，我的诗里倒是有了不少鞋子。这些鞋子噤噤响着走进我的许多诗里，虽然我从未打算使自己成为鞋子诗人。

客人们会突然到这所房子来，而且聊天聊得很久，想不到近在咫尺，就在用纸板和旧报纸做的隔墙那边，躲着一个被天知道有多少职业捕手追捕的诗人。

星期六的下午，还有星期日的上午，这家一个姑娘的未婚夫总到这里来，可惜他是属于不该了解内情的那种人。他是个青年工人，已经得到了姑娘的心，可惜大家还不能充分相信他。我从窗子的窥视孔中看见他从他那辆自行车上下来——那辆自行车是他往整个平民区送鸡蛋用的。过不久，我就会听见他哼着首小曲走进房子。他是我的安静之敌。我称他为敌人，是因为他总要在离我脑袋仅几厘米远的地方，不停地甜言蜜语向姑娘求爱。她总是请他去某公园或去电影院进行柏拉图式的谈情说爱，但他激烈地予以抗拒。我则暗暗咒骂这个无辜的送鸡蛋工人。

这家其余的人——包括寡居的妈妈、两个迷人的女儿和两个当水手的儿子——都参与了收留我的秘密。两个儿子在海港卸香蕉，时常因为没有船雇用他们而生气。我从他们那里得知，有一条旧船正在拆卸。我从隐藏的角落里指挥着拆船的行动，他们从船头卸下那尊美丽的人像，把它藏在港口的一个仓库里。过了好几年，当我的逃匿和流亡已成为往事之后，我才得以认识她。当我现在在海边写这部回忆录时，那尊俏丽的木雕女像（它像所有古帆船船头饰那样具有一副希腊面孔），正以它含颦的秀目凝视着我。

计划让我暗暗上船，藏在小伙子之一的船舱里，到达瓜亚基尔时我就在卸香蕉时出来登岸。那位水手对我说，船在厄瓜多尔的那个港口抛锚时，我要像个穿着考究的旅客，嘴里抽着我从来也不会抽的雪茄，突然出现在甲板上。既然我已动身在即，这家人决定给我做一身合适的、既高雅又适合热带地区穿着的衣服，为此他们及时给我量了尺寸。

我的衣服三两下放做好了。我从未像收到这套衣服时那么给逗乐了。这家的几位妇女构思服装式样时，受的是当时的一部著名电影《飘》的影响。至于那两个小伙子，他们所认为的高雅典范，则是他们从纽约哈莱姆区的舞厅以及加勒比地区的酒吧和大众化舞场里捡来的双排扣、紧腰身的上衣，长及我的膝盖；裤子紧箍住脚踝。

我收藏起如此善良的人们所缝制的很漂亮的服装，始终没有机会穿它。我从未乘船离开过我的隐藏处，也从未穿戴得像假克拉克·盖博¹，在瓜亚基尔同香蕉一起登岸。我反而选择了那条寒冷的路。我动身前往智利的最南方，也就是美洲的最南方，准备越过安第斯山脉。

大森林中的一条路

里卡多·丰塞卡直到那时为止都还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他是个笑咪咪的坚定的人，跟我一样是南方人，来自气候寒冷的卡拉韦。丰塞卡照管过我的地下生活、我的隐匿处、我的秘密转移、我的小册子的出版，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严格保守了我的住所的秘密。在我隐藏的一年半时间里，唯一真正知道我每天晚上将到何处吃饭、睡觉的人，就是我们年青而杰出的领袖和总书记里卡多·丰塞卡。但是在他双眼冒出的绿色火焰里，他的健康逐渐遭受损害，他的微笑逐渐消失，一天，我们这位好同志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个健壮的人——瓦尔帕莱索的码头装卸工——彼选为新的最高领导人，他名叫加洛·冈萨雷斯。他是个复杂的人，外表像个欺诈之徒，又显得十分坚定。我应该说，我们的党从未有过个人迷信，然而它却是一个有过种种意识形态弱点的组织。不过，智利人的觉悟，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一切的人民的觉悟，永远处于优越地位。在智利的实际生活中，地方政治势力首领不多，我们的党也反映这种情况。

但是，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条件下，斯大林时代的金字塔政策在智利也产生了些许个人迷信的气氛。

加洛·冈萨雷斯无法同党的群众保持联系。迫害愈演愈烈，囚犯有好几千，在皮萨瓜荒无人烟的海岸上设有一个特殊的集中营。

加洛·冈萨雷斯过的是一种紧张的革命活动的地下生活，但是领导层和党的总体缺乏联系则日益明显。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一位民间的智者和一位英勇斗士。有关我的新的逃亡计划已经送到他手里，而且这次必须严格执行。我要被转移到距首都 1000 公里的地方，然后骑马越过安第斯山脉。阿根廷的同志们将在某地迎候我。

我们是在傍晚时乘一辆我们碰巧得到的汽车离开的。我的朋友劳尔·布尔内斯博士当时在骑警中当医生，他驾驶他那辆不会受攻击的汽车，把我带到圣地亚哥郊外，党组织在那里接过对我应负的责任。在另一辆专为长途旅行而装备好的汽车里，一位党的老同志、司机埃斯科瓦尔在等我。

我们日夜兼程。在白天，尤其是当我们通过乡镇和城市或停在汽油加油站上时，为了增强戴假胡子和眼镜的化装效果，我身上裹着毯子，以免被人认出来。

午间我通过了特木科，我没在任何地方停留，没人认出我来。真是太凑巧了，我古老的特木科成了我的出逃途径。我们过了桥，又过了拉斯·卡萨斯神甫村。我们在离城相当远的地方停下，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东西。一条小河在斜坡下面流过，流水潺潺。那是我的童年在和我告别。我是在这座城里长大的，我的诗是在这个山冈和这条小河之间诞生的，它从雨水借来声音，它像木材那样使自己湮没在森林中。而现在，在走向自由的大道上，我在靠近特木科的地方稍事停留，听一听教过我歌唱的潺潺流水声。

我们继续赶路。仅仅一次我们有过片刻担心。公路当中站着一个态度坚决的警官，向我们的车高声喊叫。我一句话都不敢说，结果却是一场虚惊。这个警官要我们的车带他 100 公里路。他坐在司机埃斯科瓦尔同志旁边，同他友好地闲聊。我为了不讲话，就装做睡大觉。我这个诗人的声音，连智利的石头都认得出来。

我们安然到达目的地，没有遇到什么大意外。那里看来是个无人居住的木材商的庄园，四面临水。你首先得横渡茫茫的兰科湖，然后在灌木丛和巨树中登陆。从那里骑马继续走一段路程，这次要一直走到迈韦湖，在那里乘

上行驶于该湖的一条船。庇护人的房屋隐藏在广阔的丘陵地带低处，隐藏在大树的枝叶间，隐藏在大自然深沉的喧闹声中，几乎看不出来。每每听人说智利是世上的天涯海角，覆盖着原始大森林，四周所见无非皑皑白雪和粼粼湖水，确是本星球最后有人居住的地点之一。

为我提供一间卧室的那所房屋，同这个地区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临时凑合的。一个黄铜和铁制作的炉子里，塞满了像是刚从林子里代来的劈柴，日夜不停地烧着。南方的大雨不停地敲击着窗子，仿佛竭力要闯进这所房子。大雨主宰着荫沉沉的大森林、湖泊、火山、夜晚，还对那人类藏身处大发雷霆，因为那里另有遵循的法则，而且不承认它的胜利。

等候我的那位朋友豪尔赫·贝列特的情况，我所知甚少。他原是飞行员，既讲究实际又富于冒险精神，脚穿长统靴，身穿很厚的短夹克，他有一种天生的指挥官风度，一种充分造应周围环境的军人的举止，虽然那里队列整齐的军队仅仅是大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这房子的女主人是一位神经官能症缠身的、哭哭啼啼的脆弱女人。那个地区令人厌烦的孤寂，那无休无止的雨水，那寒冷，她都认为是对她本人的冒犯。一天的大部分时光她都在哭泣，但一切进行得十分准时，有益健康的食品都来自森林和河流。

贝列特经营一家木材厂，只加工供瑞典或丹麦使用的铁路枕木。锯子整天吱吱地发出尖声的哀鸣，切割着大树干。首先传来一棵树倒地时来自地下的深沉的撞击声。每隔5~10分钟，由于高大假山毛榉、落叶松、智利罗汉松等倒地时的猛烈撞击，大地就像黑皮鼓似地颤抖起来。这些树是1000年前风把种子播到那里的，是大自然的伟大作品。然后锯子又开始发出哀鸣，锯子的这种如同粗野的小提琴所发出的金属的、高亢的、尖锐的声音，紧随大地迎接诸神的黑皮鼓声之后，形成了一种神话般的紧张气氛，形成一个神秘的无限恐怖的环境。大森林正在死去。我恐惧地听见了它的哀怨，仿佛我的到来就是要倾听那从未引起过反响的最古老的声音。

大老板——那片森林的主人——是个我不认识的圣地亚哥人。他要到这里来的令人害怕的消息，是在夏天很晚的时候才宣布的。他名叫佩佩·罗德里格斯。别人告诉我，他是个新派资本家，拥有织布厂和其他工厂，他是个灵活的、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此外，他是个有家族传统的反动分子，是智利极右翼党派的重要成员。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路过他的领地，他的这些情况和身份，对我是有利的。谁也不会到这儿来找我。地方当局和警方是这个大人物的忠实奴仆，而我正在享受他的热情款待，我也几乎不可能碰上他。

我起程的日子日益迫近。安第斯山上就要下雪了，跟安第斯山可不能开玩笑。我的朋友们每天都在研究这条路。这条所谓的“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事实上不过是对早已被雪花和腐殖质掩盖了的足迹进行的一番探索。等待使我感到苦恼。此外，我在阿根廷那边的朋友们想必也已在找我了。

当一切看来都准备就绪时，豪尔赫·贝列特这位木材厂的总指挥，告诉我发生了新情况。他说这件事时面带愁容。他说大老板已经宣布他要来，再过两天想必就到了。

我不知所措。我们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经过那一长段时间的努力，我面临的危险是老板也许会知道我正呆在他的土地上。人人都知道他是迫害我的冈萨雷斯·魏地拉的密友。人人也都知道冈萨雷斯·魏地拉已悬赏要我的首级。怎么办？

贝列特一开始就主张跟大老板罗德里格斯当面谈。“我非常了解他。”他对我说。“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会告你的密。”

我不同意。党的指示是要求绝对保密，贝列特却企图违反党的指示。我把这个意见对他说了。我们争论得很激烈。权衡了政治上的利弊之后，我们决定让我住到一位马普切人酋长家去，那是依偎在大森林边上的一间茅屋。

我搬进茅屋，在那儿我的情况变得非常不安定。因为太不安定了，在多次反对之后，我终于同意会见企业、锯木厂和森林的拥有者佩佩·罗德里格斯。我们确定在一个中间地点会面，既不在他的住宅，也不在酋长的茅屋。傍晚时分，我看见开来一辆吉普车。一个既成熟又年青、一头灰白头发、神色坚定的人，同我的朋友贝列特一起从吉普车上下来。他一开头就对我说，从那一刻起要担负起守卫我的责任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来损害我的安全。

我们谈得并不十分热情，但是这人逐渐把我争取过去了。由于天气十分寒冷，我邀请他到酋长家去。我们在那儿继续交谈。遵照他的吩咐，送来了一瓶香槟和一瓶威士忌，还送来冰块。

在喝第四杯威士忌时，我们大声争论起来。此人自信得像个专制主义者。他谈了许多有趣的事，而且无所不晓，但是他那目空一切的语锋激怒了我。我们两个都在酋长的桌子上拍得砰砰响，一直拍到我们和好地喝光了那瓶酒。

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很久。一个习惯于大权在握的男子汉的无可争辩的直率，是他的品格之一。但他还会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朗诵我的诗，他用以朗诵的声音是如此富有智慧和阳刚之气，使我觉得我的诗得到了新的再现。

罗德里格斯做了最后的一个姿态。他把部下召集到我的跟前，用他特有的声音命令他们说：“今后一周莱加雷塔先生通过走私贩的那条路前往阿根廷，如果遇到障碍，你们就要打通到达边境的另一条路。停下你们所有的木材活儿，去打通那条路。这就是我的命令。”

莱加雷塔是我当时用的名字。

这个支配一切的封建主佩佩·罗德里格斯，两年后由于破产和受迫害而死于非命。他因一宗大规模走私受到指控，在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月。这对于一个生来高傲的人来说，该是一种难以言表的痛苦。

我确实从来也不知道，在人们指控他的罪行中，他到底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我却知道，我们的寡头政治集团几年前为获得慷慨的罗德里格斯的一张请帖而难以入眠，一看见他破产并受审就抛弃了他。

至于我，我仍然站在他一边，无法把他从记忆中抹掉。对我来说，佩佩·罗德里格斯是个小皇帝，他曾下令在原始大森林中打开60公里道路，为了让一个诗人获得自由。

安第斯山

安第斯山上有几条从前走私贩们走的鲜为人知的通道，这些通道险情迭起而且崎岖难行，乡村警察因而不在于守卫上操心。悬崖和河流会阻断旅行者的去路。

我的同伴豪尔赫·贝列特是我们的探险队队长。护送我的5个人都是出色的骑手和向导，参加这个护送队的还有我的老朋友维克托·比安基，他是

作为几个土地诉讼案的量地员来到这个地区的。他没有认出我来，在我度过一年半隐居生活之后，我长了胡子。他一知道我穿越大森林的计划之后，就为我们献出一个老探险家的无法估价的热忱。从前在一次悲惨的探险中他攀登过阿空加瓜山，而且几乎是这次探险的唯一生还者。

我们在黎明的庄严气氛笼罩下列队前进。从童年起我有许多年没有骑马了，但在这儿，我却骑马走向那条通道。南方的安第斯山大森林是由一棵棵分开的参天大树繁殖而成的，其中有巨大的落叶松、智利美登木、特帕树和针叶树，那些高大假山毛榉的树干粗得令人吃惊。我停下来量一棵树，它的直径有一匹马那么长。上面看不见天空。下面马蹄陷进几百年来飘落的树叶所形成的一层腐殖土中。我们正在悄悄通过那座蛮荒大自然的宏伟教堂。

我们走的路是秘密的和被禁止的，因而我们接到的是最微弱的方向信号。没有足迹、没有小径，我同4位骑马的伙伴组成一支不整齐的马队，排除粗壮的大树、不可逾越的河流，巨大的岩石、荒野里的积雪等障碍，去寻觅（更确切地说是去猜测）使我获得自由的道路。我的同伴们知道方向，知道繁茂枝叶间可能性最大的出路，不过，当他们把我独自留下时，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们总用砍刀在各处大树的树皮上留下能指引他们回到原处的刀痕。

每个人都在前进，沉醉在那无边的孤独中，沉醉在那绿色和白色的寂静中——也就是，那些树，那些长长的蔓藤，那堆积了千百年的腐殖土，那些突然变成我们行进中新路障的歪斜树干。令人眼花缭乱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就是一切，同时寒冷、雪花和追捕的威胁又在不断增长。孤独、危险、寂静和我的使命的紧迫性，全部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沿着也许是走私者或逃跑的刑事犯留下的模糊足迹走。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曾遭到冬天严寒之手的突然袭击，遭到安第斯山中刮起的暴风雪的突然袭击而死于非命；暴风雪会把旅客包围起来，并把他们埋葬在厚厚的白雪底下。

在那些足迹的两边，在那莽莽荒野里，我看见一种人工建筑，那是经过许多个冬天堆积在一起的一段段树枝，那是千百个旅行者献出的草木祭品，那是用以追忆死者，用以使我们想起那些没能够走下去而永远留在那里的皑皑白雪下面的人们的高高木坟。我的同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把碰到我们头部的枝桠砍掉；把从巨大的针叶树树顶，从冬天的暴风雪来临前颤抖着的最后枝叶的橡树上垂下的那些树枝砍掉。我也在每一座木坟上留下一个纪念物，一块木制的名片，一根从森林中砍下的树枝，用以装饰那些陌生的旅行者的木坟。

我们必须渡过一条河。发源于安第斯山群峰的一条条泉水飞泻而下，释放出令人目眩的、无所顾忌的力量，变成了瀑布，以其由著名的山顶上带来的力量和速度，冲破了土地和岩石——然而这一次我们遇到一条缓流，一片镜子般的水面，一个涉渡口。马匹走进，踩不到水底，便游往对岸。我骑的马很快就几乎整个被水淹没，我因为失去支持而摇晃起来，当那匹马挣扎着把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尽力使它不偏离方向。我们就这样渡过去了。我们刚一到达对岸，那些陪伴我的农民向导就笑着问我：“您很害怕吧？”

“很怕。我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

“我们都拿着套索跟在您后面呢。”他们对我说。

“我父亲就是在那里落水的，”他们中有一个也说，“水流把他卷走了。”

您可不会出这种事。”

我们继续赶路，走进了一条隧道，它也许是一条已经消失的丰沛的河流在雄伟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也许是本星球的一次地震在山上造成的这件作品——这条我们正在进入的在岩石即花岗石上凿出来的石头渠道。马匹往前没走几步就打滑，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岩石上站稳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蹄铁上迸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上摔下来，仰面倒在岩石上。我的马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仍然坚定地在我们那条广阔、灿烂而又艰巨的路上迈进。

在那莽莽的大森林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们。突然间如同一个奇妙的幻觉，我们来到了依偎于丛山怀抱中的一块平展的小草地上，那里泉水晶莹，碧草如茵，溪流潺潺，上面是湛蓝的天空，没有树叶遮蔽，阳光普照。

我们停在那里，如同驻足于一个奇幻仙境里，成为一块神圣场地的宾客；而更为神圣的是我在那里参加的一种仪式。牧牛人从马上下来。在那块场地中央像是举行仪式般地摆着一具牛的头骨。我的同伴们一个跟着一个静悄悄地走上前去，往头骨洞里投下几枚钱币和一些食物。我同他们一道给迷路的粗鲁的尤利西斯们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们献上供品，他们也许会在死牛的眼窝里找到面包和援助。

但是那令人难忘的仪式并没有到此停止。我的农民朋友们脱下帽子，跳起一种奇特的舞蹈，沿着他人以前经过该处转圈跳舞时留下的足迹，绕着摆在那里的头骨单脚蹦跳。在我们这些难以理解的旅伴身旁，我当时隐约意识到，陌生人之间也是相通的，甚至在世上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也存在着关切、请求和回应。

我们是在夜里到达群山间最后几条山谷的，再往前走，就到达越过边界的地点，从此我将远离祖国许多年。我们突然看见燃烧的火光，那是有人居住的确切迹象，走近时我们发现几间东倒西歪的房屋，几乎空无一人的杂乱棚舍。我们走进其中一个棚舍，借着火光看见巨大的树干在棚舍中央燃烧，巨大的树身日夜在那儿燃烧，让烟从棚顶的缝隙逸出，有如一片沉沉的蓝色帷幕在黑暗中飘荡。我们看见了成堆的干酪，是人们在山上制成后存放在那里的。火堆近旁有几个人像一堆布袋似的躺着。寂静中我们听到吉他琴的弦声，听到从炭火和黑暗处传来的歌声，是我们旅途上首次听到的吸引我们的人声。那是一首有关爱情和离别的歌，是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开的城市、对无限扩展的生活的爱和怀念的怨叹，他们不知我们是谁，他们对逃亡者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的诗，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就算他们知道我的诗和名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火堆旁一起唱歌，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起在黑暗中走向一些简陋的房舍。有一股温泉流经那些房舍，我们泡到温泉水里，从山里冒出的热气就把我们拥抱到它的怀里了。

我们畅快地在水中扑腾，使劲揉搓，把身上因骑马长途跋涉而引起的疲乏一扫而光。天刚破晓，我们就踏上了将与我暗无天日的祖国分手的最后几公里路程。这时我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像受过洗礼一般。我们骑马唱着歌离去，浑身充满新鲜气息，充满把我们推上通往等待我的世界的那条康庄大道的勇气。为了那些歌、食物、温泉、屋顶和床，也就是说，为了我们所受到的意外接待，我们要给山民们一些钱（此事我记忆犹新），他们却不动声色地拒绝了我们的馈赠。他们只不过帮了我们点忙；而在那个“只不过”里，在那个无声的“只不过”里，有许多不言而喻的含义，也许是感激之情，

也许就是梦想本身。

安第斯山的圣马丁

一所无主的茅屋为我们指明了边界。我自由了。我在茅屋墙上写道：“再见，我的祖国。我走了，但我把你带在心上。”

一个智利朋友准是已经在安第斯山的圣马丁等我们。那个阿根廷小山镇非常小，别人只是像下指示似地对我说：“到最好的旅馆去。佩德里托·拉米雷斯会到那儿找你。”

但是人间的事就是难料。在安第斯山的圣马丁，最好的旅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们该选哪一个？由于我们看不上在小镇美丽广场上看到的第一家旅馆，我们决定挑选坐落在小镇近郊较昂贵的那家。

结果我们挑选的这家旅馆是第一流的，不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几天来骑马长途跋涉、肩上背着行囊、一脸的长胡子、风尘仆仆，引来了充满敌意的目光。谁都害怕接待我们。

况且旅馆经理接待的是苏格兰来的英国贵族，他们是来阿根廷钓鲑鱼的。我们丝毫没有贵族派头。经理要我们走开，用演戏似的表情和手势说，最后一间空客房十分钟前已经被人预定了。就在那时，一位显然是军官的高雅绅士在门口出现，陪伴他的是个全发女演员；他在门口用雷鸣般的声音喊道：

“停下！哪儿都不该把智利人赶出去。他们就住这里！”

我们于是住下了。我们的保护人非常像庇隆，他的情人也像埃娃，我们都想：就是他们！但是后来，等我们梳洗完毕穿好衣服，坐在桌旁享受一瓶可疑的香槟酒时，我们才知道这人是当地警备队的指挥官，女的却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看他的一位女演员。

我们被认为是几个智利的木材商人，准备去做一笔好买卖。那位指挥官把我叫做“山里人”。为了友谊和热爱冒险，一直陪伴我到那里的维克多·比安基，发现了一把吉他，用他的挑逗性的智利歌曲引得阿根廷的男女如醉如痴。但是三天三夜过去了，佩德里托·拉米雷斯仍没来找我。我很担心。我们已经没有一件干净衬衣，也没有钱去买新的。维克托·比安基说，一个出色的木材商人至少应该有干净衬衣。

同时，这位指挥官在他的警戒队队部请我们吃一顿午饭。他的友谊使我们更亲密了，他向我们承认，虽然他的外貌像庇隆，他却是反庇隆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谁的总统——智利总统还是阿根廷总统——更坏。

一天早晨，佩德里托·拉米雷斯突然走进我的房间。

“你这个倒霉蛋！”我对他喊道。“你怎么迟到了这么久？”

原来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他一直在广场上的那家旅馆里耐心等待我的到来。

10分钟以后，我们正在乘车驶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们日夜奔驰。阿根廷人不时要停车喝一杯巴拉圭茶，然后我们继续穿过那连绵无尽的单调草原。

在巴黎，有了护照

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使我头疼的是要弄到一个新的身份证。如果我想横渡大西洋并在欧洲各处走动，我用以通过阿根廷边境的假证件恐怕是不行了。我怎能得到一个新证件呢？得到智利政府的通报，阿根廷警方正在想方设法搜捕我。

在如此窘迫的境况中，我回忆起深藏在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我的中美洲老朋友、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他当时担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官。我们的相貌略有相似之处。我们彼此同意把我们归入“乔姆皮佩”（chompi-pes）一类，危地马拉和部分墨西哥用这个土话来叫火鸡。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身体，使我们都像这种美味的鸡形家禽。

他到我隐藏处来看我。

“乔姆皮佩’老兄，”我对他说，“把你的护照借给我。请允许我有变成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到达欧洲的乐趣。”

我应该说，阿斯图里亚斯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与政治活动家相去甚远。但是，他对此毫不犹豫。几天之后，我就在“阿斯图里亚斯先生，请这里走”和“阿斯图里亚斯先生，请那边走”的招呼声中，冒充杰出的危地马拉小说家渡过分隔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那条宽阔的河流，进入蒙得维的亚，通过机场和警察的戒备队列，终于安抵巴黎。

但在法国，我的身份又成为一个问题。我那本崭新的护照准经不起保安局的严格检查。我只好不再冒充阿斯图里亚斯，恢复为巴勃罗·聂鲁达。但是，既然聂鲁达从未到达巴黎，我怎能恢复身份呢？到达巴黎的可是阿斯图里亚斯呀！我的顾问们硬要我住在乔治五世饭店。

他们说：“在那儿，在国际权势人物中，谁也不会向你要证明文件。”

我在那里住了几天，在那富有而高雅的世界里，用不着多担心我的山里人装束是怎样的不协调。

那时，毕加索来了，他为人善良，堪与他的天才媲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他刚刚发表第一篇有关他生活的演讲。这篇演讲涉及我的诗，我的受迫害，我的缺席。现在，这个现代派绘画天才的半人半牛怪物，怀着兄弟般的柔情，对我的困境乃至其细微末节都关心到了。他去找当局谈话，他给许多人打电话。由于我的缘故，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杰出的作品没能去创造。我因为使他浪费了宝贵时光而打心眼里感到遗憾。

那几天一个和平大会正在巴黎召开。我于最后时刻在会场上露面，仅仅为了去朗读我的一首诗。全体代表向我鼓掌并且拥抱我。许多人以为我死了。他们想象不出我竟能躲过智利警察的残暴迫害。

第二天，法兰西快报的老资格记者阿尔弗雷特到我住的饭店来了。他对我说：

“当报纸报道你在巴黎的消息时，智利政府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认为来到这儿的是你的替身；说聂鲁达还在智利，他们正在紧紧跟踪他。逮捕他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该怎么回敬他们？”

我记起一次有关莎士比亚写没写过作品的讨论，那次讨论烦琐而且荒谬。马克·吐温插嘴道：“写出那些作品的确实不是威廉·莎士比亚，而是生于同一天、同一时辰，也死于同一天的另一个英国人，而更大的巧合却是这个人也叫威廉·莎士比亚。”

我对这个记者说：“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

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

办理我的证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在帮助我。与此同时，我必须以一种半地下状态中主活。

很多人家收留过我，弗朗索瓦兹·吉罗夫人的家就是其中之一。我决不会忘记这位如此独特而富有才智的夫人。她的住宅在皇家大厦，在科莱特隔壁。她收养了一个越南小孩。法国军队正在干的也就是后来美国人接手干的勾当：在遥远的越南土地上杀害无辜的人民。所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

记得这个住宅里挂着一幅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毕加索作品。这是他前立体派时期的一幅很大的画。它画的是一张桌子，上方垂下来两幅窗户般半闭着的红色长毛绒帘子。桌子从一侧到另一侧横放着一块法国长面包。这幅画使我肃然起敬。桌上的大面包有如古代圣像画的中心人物，或像格列柯在埃斯柯里亚尔画的《圣莫里斯的殉教》。我给这幅画安上一个我的标题：《圣面包的升天》。

一天，毕加索亲自到我隐藏处来看我。我带他到他多年前画的那幅画跟前去。那幅画他全忘了。他非常认真地端详它，沉浸在他少见的高度精神集中和淡淡忧伤里。他沉默了 10 分钟光景，在这幅忘却的画跟前进退退。

“我越看越喜欢。”他凝视完毕后，我对他说，“我打算建议我国的博物馆买它。吉罗夫人准备把它卖给我们。”

毕加索又把他的头转向那幅画，把目光盯着那块绝妙的面包，他仅有一句回答是：“不错。”

我找到一所出租的房屋，我来住似乎有点过于奢侈。它在第十五区的皮埃尔-米勒街，魔鬼在那里都会丢外套。那是一个工人和穷人的街区。你必须坐数小时地下电车才能到达那里。这所房屋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像个笼子。它有 3 层，有几条过道和几间小房间；它是个难以描述的大鸟笼。

第一层最宽敞，有一个烧锯末的火炉。我拿这一层做书房和不定期聚会的客厅。上边的两层由我的几位朋友居住，他们几乎全都来自智利。那里住着何塞·万徒勒里和内梅西奥·安图内斯两位画家，还有别的人我就记不得了。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接待了苏联文学界 3 位知名人士的来访，他们是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他又是乌克兰政府官员）和小说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他们拥抱我，好像我们是久别的兄弟。除了拥抱，每个人都响亮地吻了我，那是斯拉夫男人间表示深厚友谊和尊敬的吻，对此我是很不容易习惯的。几年之后，当我懂得了那种兄弟般的、男性的吻的特点之后，我有机会用这句话开始讲一段我的故事：“第一个吻我的男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事……，

智利政府不喜欢我，我在智利国内，他们不喜欢，在国外，也不喜欢。不管我到哪里，在到达之前总有照会或电话要求其他政府对我采取敌对行动。

我得知在法国外交部有一份关于我的报告，上面大致写道：“聂鲁达和他的妻子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时常去西班牙旅行，把苏联的指示带进带出。他们从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那里领受这种指示，聂鲁达也同他一起秘密到西班牙旅行。为了同爱伦堡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聂鲁达在苏联作家们居住

的公寓中租房子栖居。”

这是一连串的朗言乱语。让-里夏尔·布洛克__交给我一封转致一位朋友的信，这位朋友是外交部的重要官员。我向这位官员解释，有人力图以不着边际的推测为根据，要把我赶出法国去。我告诉他，我热切希望结识爱伦堡，但是很遗憾，直到那无我还没有得到这种荣幸。这位重要官员怜悯地看着我，答应去调查真相。可是调查从未兑现，那些荒谬的指责依然存在。

于是我决定向爱伦堡自荐。我得知他每天去拉库波勒餐馆，在那里按俄国习惯，也就是在傍晚时吃午饭。

“我是智利来的诗人聂鲁达。”我对他说。“按照警方的说法，我们是密友。他们硬说我和您住在同一座楼里。为了您的缘故，他们要把我赶出法国，因此我至少要亲自认识你，还要握您的手。”

我不相信爱伦堡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现象都显出惊讶的神色。但是，我却看见从他一绺绺怒冲冲的华发底下粗硬的眉毛中，射出一道显得相当惊讶的目光。

“我也想认识您，聂鲁达。”他对我说。“我喜欢您的诗。眼下您先尝点儿阿尔萨斯的腌酸菜吧。”

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认为就在那天，他动笔翻译我的《西班牙在我心中》。我必须承认，法国警方倒是无心地促成了我生平最得意的友谊，而且还把这位最优秀的俄语译者介绍给我。

一天，于勒·苏佩维埃尔__来看我。当时我已经有了写着我自己名字的有效智利护照。这位年迈、高尚的乌位圭诗人那时很少上街。他的来访使我又感动又惊奇。

“我给你带来一个重要口信。我的女婿贝尔托要见你。我不知道是什么事。”

贝尔托是警方首脑。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老诗人和我在靠近他的桌子边坐下。我从未见过一张桌子上摆着比这里更多的电话了。有多少？我认为不少于20台。他一脸的聪明和精明，越过如林的电话机看着我。我坚信在那块重地，所有通往巴黎地下生活的线路都通向那里。我想起方托马斯和检查官梅格雷__。

这位警方首脑读过我写的书，而且出人意料地理解我的诗。

“我收到智利大使吊销您的护照的申请。大使说您用的是外交护照，那是不合法的。这个情况真实吗？”

“我用的不是外交护照。”我答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官员的护照。我是我国的议员，因此我有权持有这种护照。此外，我这就交给您，您可以检查；可是您别吊销，因为它是我的私人财物。”

“到期了吗？谁给延长期限的？”贝尔托先生拿着我的护照问我。

“它当然到期了。”我对他说，“至于谁为我延长期限的，我不能说。智利政府会把那位官员撤职的。”

警方首脑仔细检查了我的证件，然后拿起他许多电话中的一台，吩咐接通智利大使的电话。

这次电话会谈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

“不，大使先主，我办不到。他的护照是合法的。我不知道是谁给延长期限的。我再说一遍，没收他的证件是不对的。大使先生，我不能照办。我

很抱歉。”

大使仍在坚持，贝尔托显然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终于挂上话筒，对我说：“他像是您的死敌。不过，您想在法国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

我同苏佩维埃尔一起离开那里。老诗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我而言，只觉得一种胜利感和另一种厌恶感交错在一起。那个骚扰我的大使，那个智利迫害者的帮凶，就是那个自吹和我有交情、从不放过机会奉承我的华金·费尔南德斯，他就在那天早晨还通过危地马拉大使给我送来一个亲切的口信。

根

爱伦堡读过也译过我的诗，他责怪我：你的诗里“根”太多，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写这么多根呢？

确实。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长入我的诗里，而且再也不能离开它。我的一生乃是漫长的漂泊，始终到处奔波，而且总要回到南方的树林，回到那已被遗忘的大森林。

在那里，参天大树有时在健壮地活了700年之后，竟倒下了，有时被洪流连根拔起，有时被大雪冻伤，有时被大火焚毁。我听到过巨人般的大树在森林深处倒下的声音——栎树沉重倒下时发出山崩地裂的响声，有如一只巨手在敲大地的门，要敲开一个墓穴。

但是，根露出来了，暴露给怀有敌意的时间、潮湿、苔藓、接连不断的摧残。

再没有比那些受伤和被烧过的张开的巨手更美的了，它们横在林间小径上，向我们诉说埋在地下的树木的秘密，诉说支撑枝叶、控制植物深厚肌肉的奥妙。那些悲惨的粗硬的巨手，向我们展示一种崭新的美：他们是具有深意的雕刻，是大自然的神秘杰作。

一次，我同拉斐尔·阿尔韦蒂在奥索尔诺附近的瀑布、灌木丛和树木间散步，他使我注意到每一丛枝叶都各不相同，所有的叶片也似乎都在以千姿百态争奇斗妍。

“看上去好像是植物风景画家为一个美不胜收的公园收集的。”他对我说。

几年以后在罗马，拉斐尔还想起那次散步和我国森林里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色。

先前是这样，而今却不然。我伤心地想起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博罗亚和卡拉韦之间的旅行，或是到托尔滕沿海山冈的漫游。有多少发现啊！智利芳香木的清丽身姿和它雨后散发的芬芳，苔藓以及它挂在森林的无数“脸”上的雪白胡子。

我把落叶拨到一边，试图找到几只闪光的鞘翅目虫子——那种披着闪色外衣、在树根下面跳小型芭蕾舞的步行虫。

后来，我骑马越过那座山脉，奔向阿根廷那边，在参天大树形成的绿色拱顶下，碰上一个障碍，即其中一棵树的根，比我们的马还要高，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费力地干，还动用了斧头，才得以过去。那些根就像坍塌的大教堂，其宏伟一经展现，便慑服了我们。

九、流亡始末 在苏联

1949年，我刚刚摆脱流亡状态，便应邀第一次前往苏联，去参加普希金100周年纪念会。黄昏时分，我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了波罗的海的寒珠——古老、崭新、高贵和英雄的列宁格勒。这座彼得大帝和伟大列宁的城市，和巴黎一样，自有其可爱之处。铁灰色的大街、铅灰色石块建造的宫殿和绿灰色的大海，组合成一个灰色的可爱之处。世界上最美妙的博物馆，沙皇们的财宝，他们的藏画，他们的军服，他们的礼服，他们的武器，他们的餐具，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些新的不朽纪念物：“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与列宁的思想相结合的大炮，轰垮了往昔的围墙，打开了历史的大门。

我是来赴100年前辞世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许多不朽的传奇和小说的作者——的约会的。这位人民所喜爱的杰出诗人征服了伟大苏联的心。为了举行他的100周年纪念会，俄国人一砖一瓦地修复了沙皇的宫殿。每一堵被纳粹枪炮化为齑粉的墙壁，都已按昔日的模样从瓦砾中拔地而起。为了安装新的五彩斑斓的彩色玻璃窗，为了修造带花边的檐口，为了建造华丽的柱顶，他们参考了旧的宫殿平面图和当时的文件。他们还为了纪念往昔的一位杰出诗人而建造一座陈列馆。

在苏联，我首先感受深刻的是她的幅员辽阔，包容丰富的空间，草原上摇曳的白桦树，惊人洁净的广大森林，长河大川，在麦田上起伏奔驰的马匹。

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明白它不仅给人类生存的各个角落提供道德方面的教益——即可能性的对照以及生产和分配的不断增长，而且表明从这块保持着大自然纯朴景色的草原绵亘的大地上，将出现巨大的飞跃。全人类都知道，那里正在创造出一个巨人般的真实，而世界却在紧张地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些人心惊胆颤地期待着；另一些人只是期待着；又有一些人则预感到将要来临的事情。

我在一片村林中间遇到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他们在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那里的人群，叶片，新麦开始生长的广袤大地——一切都激动得颤抖。大自然与人形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飞往其他星球的那个人，必定是从某次在米哈依洛夫斯基村附近的森林里朗诵过的普希金的诗中诞生的。

正当农民们出席纪念会的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一道闪电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烧焦了一个人和他躲雨的那棵树。我觉得一切都像是大自然大雨倾盆画卷的一部分。此外，那首有大雨为伴的诗已经写进我的书里，与我息息相关。

苏联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规模庞大的城市和运河正在建造中，连地理面貌都在变化中。然而，我在这第一次访问中就明确我与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不过我又觉得这个国家的一切都难以理解，或是觉得它与我的心离得很远。

在莫斯科，作家们永远过着沸腾的生活，总在无休无止地辩论。我在那里了解到，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同是苏联的第一流诗人。声若洪钟、面如铜铸、心胸开阔的马雅可夫斯基是大众的诗人，他打破了语言的陈规，迎着政治诗的难题上。帕斯捷尔纳克是个思想迟暮的伟大诗人，具有抽

象的精神境界，政治上是个正派的反动分子，对于自己祖国的改造并不比一个头脑清楚的教堂司事看得更远。无论如何，那些政治上主张中央集权的最严肃的评论家们，都多次向我背诵着引证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

苏联文艺界长期存在教条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过也应该说，这个教条主义向来被看作缺点，并且公开与之进行斗争。随着光辉的教条主义者日丹诺夫的批判文章的发表，个人崇拜引起苏联文化发展严重僵化。但是，各方面对那几篇文章都提出许多反驳，况且人们已经知道，生活本身比清规戒律更有力，也更顽强。而革命就是生活，清规戒律则在寻找它自己的坟墓。

爱伦堡年事已高，但仍然是苏维埃文化的一位最真诚、最有活力的鼓动者。他已成为我的挚友；在他挂满毕加索的绘画和石版画的坐落在高尔基大街的公寓房间里，有时在莫斯科附近他的别墅里，我多次拜访过他。爱伦堡酷爱植物，几乎永远在他的花园里一边拔除杂草，一边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想出自己的结论。

稍后，把我的诗出神入化地译为俄文的诗人基尔萨诺夫成为我的至交。基尔萨诺夫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词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

我经常在莫斯科城里或乡间，造访另一位诗人——土耳其人纳齐姆·希克梅特，他是被他祖国的莫名其妙的政府囚禁过 13 年的传奇式作家。希克梅特被控企图煽动土耳其海军反叛，因而受到地狱般的刑罚。案件是在军舰上审理的。他告诉我，他被迫在甲板上走，宜走到筋疲力尽；然后给送到厕所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地板上有半米深的粪便。我的这位诗人兄弟感到浑身瘫软；恶臭熏得他头晕脑胀，站立不稳。这时，他突然想到：刽子手们正在什么地方观察我，他们想看见我倒下去，想以我的不幸取乐。他从自豪中产生了力量。他唱起歌来，先是低吟，后来把声音提高些，最后竟引吭高歌。他什么歌都唱，吟唱了他记得的各种情诗，他自己的诗，农民的抒情曲，他的人民的斗争颂歌。他唱了他知道的一切东西。就这样，他战胜了污秽和折磨。他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的兄弟，你是为我们大家唱的。我们无需怀疑，也不必为我们必将干的事情有所顾虑。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歌唱。”

他还对我说起他的人民的痛苦。农民们受土耳其封建主的残酷迫害。希克梅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监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拿发放给他们当口粮的仅有的面包片去换烟草。他们开始失神地看着院子里的草料；后来注意地瞧，几乎是贪婪地盯着。有那么一天，他们拿起一点儿草塞进嘴里。稍后，他们便抓起一把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最后，他们竟像马匹似地，趴在草料上吃起来。

热烈反对教条主义的希克梅特，在苏联度过了许多年流亡生活。他热爱接纳他的那片国土，他倾吐出这样几句心里话：“我相信诗的未来。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我生活在诗歌已成为灵魂最不可或缺的需要的一个国度。”在这些激动人心的话里，有许多秘密还远远未被窥见。苏联人处在作家们的思虑的中心，所有的图书馆、教堂、剧院的大门都向他们敞开。在探讨文学活动的目的时，这一点是不应遗忘的。一方面，新的形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必要的更新，必须超越并打破文学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又怎能不伴随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呢？怎能胜利、矛盾、人类的问题——面临政治、经

济、社会制度全面改变的广大人民的繁衍、进步和成长——这些中心主题抛诸脑后呢？怎能不声援这个受残暴的侵略袭击，受无情的殖民主义者、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包围的人民呢？文学或艺术对如此重大的事件能采取一种虚无缥缈的独立态度吗？

天空是白色的；傍晚4点钟时就已黑下来。从这个时刻起，夜色笼罩了这座城市。

莫斯科是一座冬天的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冬天城市。屋顶上反反复复积满雪花。永远洁净的路面闪闪发亮。空气冻得有如坚硬透明的水晶。钢铁似的柔和色调，羽毛般的片片雪花盘旋飞舞，成千的行人来来往往，好像感觉不到寒冷，这一切把我带进这样的梦境：莫斯科是一座巍峨的冬天宫殿，宫里布满了幻影及活人的奇特装饰。

零下30度气温的莫斯科，像一颗火和雪的星辰，像位于大地胸膛里的一颗燃烧的心。

临窗眺望，街上有士兵站岗放哨。出什么事了？连雪花都不下了。要举行维辛斯基的葬礼。街道畅通无阻，庄严地让送葬队伍通过。为了这个伟大的战士，四下里一片沉重的肃穆，冬天的心也暂停了跳动。维辛斯基这团火回归到苏维埃祖国的根基中去。

送葬人排着队列经过时，士兵们行持枪礼。其中不时有人举起带手套的手跳一小步，并跺一下穿着高统靴的脚。此外都像是一动不动的。

一位西班牙朋友告诉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严寒的日子里，而且恰恰就在敌机轰炸之后，就能见到莫斯科人在大街上吃冷食。我的朋友对我说：“当我见到他们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中，而且在零下的寒冷天气里能如此平静地吃冷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一定能够胜利。”

公园里的树木一片雪白，都已披上一层白霜。冬日莫斯科公园里的这种晶莹的花瓣，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媲美。太阳使它们显现半透明、发出白色的光焰，但没有使一滴花朵般的结构溶化。这是树木的天地，透过雪的春天可以隐约看到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塔楼、几千年的细尖塔、圣巴西里奥教堂的金色圆顶。

穿过莫斯科郊区，我在前往另一城市途中，看见几条宽阔的白色道路。那是几条结了冰的河。这几条静止的河流的河床上，不时出现一个沉思默想的渔夫的身影。渔夫停在开阔的冰原上，选定一个地点，把冰钻透，直至能看到掩藏在下面的水流。这时候不可能立刻捕到鱼，因为鱼害怕钻洞铁器的声音，都逃走了。渔夫便撒下一点食物做鱼饵，以便把逃走的鱼引回来。他放下鱼钩守候着；在那恶魔似的严寒里，几小时几小时地等下去。

我认为，作家的工作和那些北极区的渔夫干的活，有许多共同点。作家必须去找那条河，如果遇到结了冰，就得在冰上钻洞。他必须极有耐心，经得起严寒天气和逆耳的批评，受得了嘲笑，找到深深的水流，放下合适的鱼钩，忙忙碌碌大干一番之后，捕到的只是一条很小的小鱼。可是，他还得顶着严寒、冰雪和批评再去捕鱼，直至每次都能捕到一条大鱼。

我应邀参加过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伟大的渔夫们——伟大的苏联作家们。一头银发的法捷耶夫面带苍白的笑意；费定长着一副又瘦又尖的英国渔夫的面孔，爱伦堡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他穿的衣服即使是刚刚上身的，也让人觉得已经穿在身上睡过一觉了；还有吉洪诺夫。

主席台上，也有蒙古人的面孔和他们刚出版的书籍，他们是最遥远的一些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学代言人，那里的人民我从前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些没有文字的游牧国家。我感到奇怪的是，恰好选定我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并承担看来如此容易的任务。

重游印度

1950 年，我突然必须去印度旅行。在巴黎，约里奥-居里¹派人叫我，委托我一项目标。这次新德里之行是要与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接触，就地估计加强印度保卫和平运动的可能性。

约里奥-居里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主席。我们详谈了一次，尽管印度向来以爱好和平的杰出国家而受到尊敬，和平主义者的意见，在印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他感到不安。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本人就是以倡导和平这一由来已久并深深植根于该国事业的领袖而著称于世的。

约里奥-居里交给我两封信。一封信是致孟买科学家的；另一封信则要亲自递交总理本人。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必须派我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并完成看来如此简单的任务。也许是因为青年时代在该国度过几年时光，我对它有持久的爱，要它为它干点事。也许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伐木者醒来吧》那首长诗，我获得了那一年的和平奖。毕加索和纳齐姆·希克梅特当时也被授予这项殊荣。

我乘飞机前往孟买。过了 30 年之后，我回到了印度。它现在已经不是争取解放的殖民地，而是一个有主权的共和国了——这是甘地的梦想，1928 年我参加过他召开的最早的几次代表大会。我当时结识的朋友——待我亲如兄弟并把自己的斗争经历信任地告诉我的大学生革命者们，也许没有一个活在人世了。

一下飞机，我就直奔海关。我要从海关到随便哪一家饭店去，把一封信交给物理学家拉曼，然后将继续向新德里进发。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我的手提箱要没完没了地受检查；一大帮想必是海关关员的人，把我的行李像用篦子篦似地查了个遍。我见过许多次检查，可没有一次能与这次相比。我的行李件数不多，只有一个装衣服的中型手提箱和一个装盥洗用具的小皮包。我的长裤、内裤、鞋都高高举起，用 5 对眼睛查看。衣服口袋和线缝都仔细检查过。为了不弄脏衣服，我在罗马时用饭店房间里找到的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把鞋子包起来。那张报纸大概是《罗马观察家报》。他们把这张报纸摊在桌上，对着光透视它，把它当作秘密文件仔细折起来，最后把它跟我的其他文件一起扔到一旁。我的鞋也被里里外外研究过，如同两件独特而且神奇的化石标本。

这次难以置信的搜查持续了两小时。他们把我的文件（护照、通讯录、必须面交政府总理的信件和那张《罗马观察家报》）细致地捆成一包，当着我的面郑重其事地用火漆封好。这时才告诉我，我可以到饭店去了。

我竭力不失去智利人的耐心，提醒他们说，没有身份证件哪家饭店也不会接待我；而且，我这次到印度来，目的是向总理递交一封信，由于他们把信件封存，我无法向总理递交。

“我们将通知饭店接待你。至于那些文件，我们会及时给你的。”

我想，难道这就是我青年时代曾关心过其独立斗争的国家？我关上手提

箱，同时也闭上嘴。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狗屁！”

我在饭店里遇到了贝拉教授，就把这些烦心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宽厚的印度人，认为那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对自己的国家是宽容的，认为它还处于成长阶段。我则相反，从那场混乱中觉察到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某种远非我期望得到一个新独立国家欢迎的东西。

约里奥-居里的朋友——我要交介绍信的那个人，是印度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研究所的设备，还告诉我，我们当天将应邀和总理的妹妹共进午餐。我的运气这么好，而且我一辈子都这么好：一面在我肋骨上揍一棍子，一面又献给我一束花表示歉意。

核研究所是个洁净、光线充足、色彩鲜明的地方之一，里边的男男女女身穿很薄的白色衣服，流水般地经过走廊，穿行于仪器、大黑板和方盘之间。尽管科学解说我听得很少，那次参观对我无异是一次洗涤邪祟的圣浴，为我洗去偶然因受警察侮辱而留下的污点。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其他一些东西之间见过一种水银喷泉。最使我惊奇的是，这种金属竟显示出像有生命的动物那样的能量；它的运动性，它那液态、球形的神奇的变化能力。

那天我们与之共进午餐的尼赫鲁的妹妹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在地面前，我的恶劣情绪烟消云散。她是一位非常俏丽的妇女，打扮得像个异国的女演员。她穿的沙丽闪现出斑斓的色彩。她戴的金银珠翠，显示着她的富有。我对她极有好感。那么一位文雅之至的妇女，用戴着珠宝的纤细手指插进拌有咖喱调味汁的米饭里，用手抓饭吃，看起来有某种反差之感。我告诉她，我要去新德里，去看望她的兄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朋友们。她对我说，她认为印度的全体人民看来都应当参加到这一运动里去。

当天下午，有人在饭店里把我的那包文件交还我。那些装腔作势的警察曾经当着我的面亲自把文件打包，他们已经把火漆封印弄碎了。他们肯定连洗衣店的账单都拍过照了。我后来渐渐明白，凡是在我的通讯录里记有地址的人士，警察都找过他们并向他们问过话。其中有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寡妇，她当时是我的小姨子。这位夫人是个浅薄的女人，相信神智学，只醉心于亚洲哲学，居住在印度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只因我的通讯录有她的名字，她遇到了很多麻烦。

在新德里，在我到达的当天，我就坐在一座花园里遮阳的阳伞下，见到了六七位印度首都的名流。他们是作家、哲学家、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这些人都单纯得十分可爱，毫不傲慢自大。他们一致认为，拥护和平的人所组织的运动，和他们古老国家的精神，和他们坚持的仁慈和理智的传统是一致的。他们明智地补充说，他们认为宗派和霸权的缺点必须纠正：无论是共产主义者、佛教徒还是资产阶级，谁都不应擅自控制这个运动。各种倾向所作的贡献是主要方面，是问题的关键。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智利驻印度大使胡安·马丁博士是我的老朋友，又是作家兼医生，他在吃饭时候来看我。他绕了好几个圈子才对我说他会晤过警方首脑。印度警方首脑以当局对待外交官那种独特的冷静态度通知他，我的活动使印度政府感到不安。他们希望我尽快离开该国。我对大使说，我的活动只不过在饭店的花园里，与六七位著名人士会晤，他们的思想我想是尽人皆知的。至于我，我对他说，等我把约里奥-居里致印度总理的信一交，就没有兴趣再呆在这个国家了，尽管我支持其事业的感情已有事实为证，它却毫无道理地以十分不

礼貌的态度对待我。

我们的大使虽然曾经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建者之一，可能由于年龄和外交特权，他成了一个和稀泥的人。面对印度政府的这种愚蠢态度，他竟丝毫不表愤慨。我没有求他的任何支持，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分手了。他确实是在人家硬要他来找我的沉重负担下松了一口气，而我期望得到的他的同情和友谊的梦想却永远破灭了。

尼赫鲁约我第二天在他的小会客室见面。他起身和我握手。脸上毫无欢迎的笑意。他的家已经拍过许多相片，我就无须再费笔墨描绘了。他那双冰冷的黑眼睛，毫不动情地看着我。30年前，在一次印度独立支持者的大型集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和他的父亲。我对他提起这件事，他的脸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我对他说什么，他都只用三言两语作答，同时用他那一成不变的冷冰冰的眼光仔细地看我。

我把他的朋友约里奥-居里的信递给他。他对我说，他非常敬重这位法国学者，说着还从容不迫地读那封信。约里奥-居里在信中谈到我，还要求尼赫鲁支持我的这次使命。读毕，他把信装回信封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忽然想到，我的出现一定引起他某种抑制不住的反感。我的脑海里又闪过一种想法，这位面色微黄的男人一定有过肉体上，政治上或感情上的不幸经历。他的举止显示出一种高傲和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的坚定，但是没有领袖人物的威力。我记得他的父亲——古老领主家族的地主潘迪特·莫蒂拉尔·尼赫鲁——是甘地的司库，他不仅以自己的政治智慧，还以自己的大量财产帮助国大党。我想，也许这位沉默寡言的人在我面前已经微妙地变成一个“地主”，以他对他的一名赤脚农民表示过的同样态度，冷漠而且轻蔑地凝视我。

“我回到巴黎时，该对约里奥-居里教授说什么呢？”

“我会给他复信的。”他干巴巴地对我说。

我沉默了几秒钟，我认为这几秒钟极其漫长。我觉得，尼赫鲁已经不想再跟我谈任何事情了，不过他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似乎我可以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由此产生使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浪费时间而惶惶不安的感觉。

我认为，我少不得要对他讲几句有关我的使命的话：冷战随时都有白热化的危险；一场新的灾难会把人类吞没；我对他讲到核武器的可怕危险、现在重要的是，要把绝大多数期望避免战争的人团结到一起。

他仍然在沉思，仿佛根本没有听我说话。过了几秒钟，他说道：

“结果是两派的人都以和平的理由互相攻击。”

“依我看，”我答道，“所有谈论和平或愿意为和平做贡献的人，可能都属于同一派，属于同一个运动。除了鼓吹复仇和战争的人之外，我们不愿意排除任何人。”

持续的沉默。我明白，谈话已经结束了。我起身伸手和他握别。他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向房门走去时，他略为亲切地问我：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您什么都不需要吗？”

我这个人反应相当迟缓，而且不幸的是，我没有坏心眼。不过，我平生就这一次采取了攻势：

“噢，当然！我给忘了。我从前虽然在印度呆过，可从来没有机会游览离新德里极近的泰吉·玛哈尔陵。如果警察没有通知我不能离开市区并且必须尽快返回欧洲，这次也许是参观这个令人赞叹的古迹的好机会。我明天

回去。”

朝他开了这一枪，我感到很开心；我对他匆匆行了个礼，就离开了他的小会客室。

饭店经理在接待处等我。

“我要转达一个口信给您。政府刚刚来电话通知，您如果愿意，可以去游览泰吉·玛哈尔陵。”

“请把我的帐单准备好。”我答道。“很遗憾，我不去游览了。我现在马上去飞机场，要赶上飞往巴黎的第一架飞机。”

5年后，我在莫斯科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列宁和平奖评委会会议，我是国际评委会的成员之一。到了提名并表决该年的候选人时，印度代表提出了尼赫鲁总理的名字。

我微微一笑，别的委员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投了赞成票。尼赫鲁由于被授予该国际奖而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士之

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曾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1951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样，也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拉斐尔·阿尔韦蒂。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首途前往中国。登上这种传奇式的列车，就像乘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无非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平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胳膊和腿。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各种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走着。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城市里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和轻蔑地向我谈论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存在过的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个。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那是比利时军械师为波拿巴·拿破仑制作的一支步枪和1650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被雨水打湿的痕迹和血迹。

爱伦堡把那支拿破仑的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

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把这首诗叫做“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章杂志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后，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告诉我的许多事情，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结局归之于他那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络络乱蓬蓬的头发，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而且一脸的惨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重要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的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一天，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的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大声嚷着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从盘子里溢出来掉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警察。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他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不停地干他打鸡蛋的活儿。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惊奇了。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让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口，走向车站，走向镇上的大街。

我苦涩地想到，一个喝醉的不幸的印度人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越过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我仅仅零零星星地写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诗，这是我为马蒂尔德 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形式发表于那不勒斯 。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去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称为通往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独一无二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

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 2000 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要求科学家们让我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那里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漠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第一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出现才打破它的孤寂，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我确实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还会浑身打颤。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丽名字中的我，更是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如同生活在他们为我构筑的梦幻般的华厦中。我曾经在新加坡的名字中，在撒马尔罕的名字中度过这样的生活，吟味着每一个音节的乐趣。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以使它的音节能在海边我的骨骼上歌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众多人口所获得的最美的稻米收成。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而然地发出的灿然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在鼻子底下可以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的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以崇高的好客之情接待我们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的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几年之后，文化革命把他们全都葬送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授予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的仪式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得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祝酒使你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喝干，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怂恿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全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必，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留下它，因为它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器，镶满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地看了看

它，又赞美了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男女皆宜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发生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国家大事。中国的同志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饭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地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们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 15 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并且十分坚决地决定，决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火冒三丈。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饭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制度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但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饭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

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正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忧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

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生硬言辞起了作用。4 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 500 年历史。这是一道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饭店不足 300 米。

《船长的诗》

在行踪不定的流亡旅程中，我到过一个当时尚不了解的国家，还学会了去热爱它，这就是意大利。在这个国家里，我觉得一切都难以置信。特别是意大利的纯朴：纯朴的橄榄油，纯朴的面包和纯朴的葡萄酒。甚至那位警察……那位警察从不虐待我，但他一刻也不放松地盯着我。他是个到处都会碰到的那种警察，甚至在做梦和喝汤的时候。

作家们邀请我去朗诵自己的诗。我到处——在大学、在圆形剧场，为热

那亚的码头工人，在佛罗伦萨的拉拉纳艺术宫里，在都灵，在威尼斯——真诚地朗诵这些诗。

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朗诵，我感到无限舒畅。我身旁的一个人跟着用纯正的意大利语把我的诗句复述出来，这种美妙的语言为我的诗增添了光彩，我听了很高兴。但是，警察却非常不喜欢这件事。用西班牙语朗诵，可以通过；可是，译成意大利语则须删节。对和平这个已被“西方”放逐的词的歌颂，尤其是我的诗倾向于人民的斗争，却是很危险的。

选举中人民政党获胜的那些市的政府，都在雄伟的市政府大厅里像欢迎贵宾那样欢迎我。我多次成为荣誉市民；我是米兰市、佛罗伦萨市、热那亚市的荣誉市民。在我的朗诵会之前或之后，市议员们授予我荣誉称号。名流们、贵族们和主教们聚集在大厅里。我喝了一小杯香槟酒，以我遥远的祖国的名义表示感谢。又是拥抱，又是吻手，我终于走下了市政府大厦的台阶。警察就在大街上等我，他们缠住我不放。

在威尼斯发生的事简直就像一部惊险电影。我在礼堂里举行了惯常的朗诵会；我再次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但是，警察却要我离开这个苔丝狄蒙娜——出生并遭害的城市。警探们日夜在我下榻的饭店布下暗哨。

我那位浑号“卡洛斯少校”的老朋友维托里奥·维达莱，从的里雅斯特——赶来听我朗诵诗。他陪我在河道里游览，从威尼斯平底船上观览灰溜溜的高楼大厦，也感到无限舒畅。至于警察，对我更加纠缠不休；他们往往紧跟在我们背后，相距只有两米远。于是我决定像卡萨诺瓦——那样，逃脱想幽禁我的威尼斯。我同维托里奥·维达莱和在威尼斯邂逅的哥斯达黎加作家华金·古铁雷斯——一起，在街上飞跑。威尼斯的警察在我们背后猛追，我们很快就上了威尼斯仅有的一条装了摩托的平底船，这条船是共产党员市长的。这条市政府当局的平底船在河道里飞速航行，而另一个当局的人都像鹿一样地跑去找船。他们弄到的是许许多多颇具浪漫情调的划桨船只之一，这种漆成黑色并有描金花饰的船是威尼斯情侣们乘坐的。他们在很远的地方追赶我们，有如鸭子想追上海豚那样毫无希望。

所有这种追踪，一天早上在那不勒斯到了危急关头。警察来到我住的饭店不算太早，因为在那不勒斯没有人赶早上班，警察也不例外。他们借口护照有错，要我同他们去市政府。在那里他们给我一杯速溶咖啡，还通知我必须在当天离开意大利领土。

我对意大利的热爱，帮不了我什么忙。

“一定是搞错了。”我对他们说。

“绝对没错。我们都非常尊敬您，可是您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然后拐弯抹角地告诉我，是智利大使要求把我赶走。

火车就在当天下午发车。我那些前来送别的朋友，早已在火车站上了。亲吻，鲜花，呼唤。来了保罗·里奇，阿利卡塔兄弟，还有许多别的人。Arivedercio——！再见，再见！

在我乘火车前往罗马的途中，监视我的警察对我殷勤备至。他们把我的手提箱提上火车，安放妥帖。他们替我买来《团结报》和决非右派报纸的当地的《晚报》。他们要求我签名，有的是他们自己要，有的是替他们亲友要。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有礼貌的警察。“阁下，我们很遗憾。我们都是穷困的一家之长。我们必须服从命令。是令人厌恶的……”

罗马火车站到了，我得在这里转车，以继续前往边境的旅程。我从窗口看见一大群人；还听到叫喊声，看到你推我挤的场面。一大把一大把的鲜花高举在人头形放的河流上向火车涌来。

“巴勃罗！巴勃罗！”

当我走下被严密监视起来的车厢的梯级时，我立刻成为一场惊人的角斗的中心。男女作家们、记者们、议员们，约有上千人，把我从警察手中抢去好几秒钟。警察也冲上来把我从朋友的手臂里夺回。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看见了几位名人的面孔。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及其妻子埃尔萨·莫兰特，她和他同是小说家。著名画家雷纳托·古图索。还有别的诗人；别的画家。

《耶稣停留在埃博利》的著名作者卡洛·莱维递给我一束玫瑰花。就在这时，这些花掉到了地上，帽子和雨伞飞起，拳击发出爆炸般的响声。警察处于劣势，我又被朋友们抢去。在这场混战中，我见到十分和蔼可亲的埃尔萨·莫兰特用自己的绸伞打一名警察的头。突然有几辆运行李的手推车经过，我看见一个胖胖的搬运工在警察背上揍了一棍子。这些都是罗马人民对我的支持。这场冲突越来越复杂化，警察们在一边对我说：

“您跟您的朋友们说说吧。请您让他们安静下来……”

群众喊道：

“聂鲁达留在罗马！聂鲁达不要离开意大利！让诗人国下！让智利人留下！奥地利人滚蛋！”（“奥地利人”指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德·加斯贝利。）

打斗了半小时之后，传来了一道上级命令，允许我留在意大利。我的朋友们纷纷拥抱我，吻我，我沉痛地踩着因打斗而撒落在地上的花朵，离开了火车站。

第二天拂晓，我来到有议会豁免权的议员家，是画家托·古图索带我到那里的，他不相信政府的诺言。我在那里收到一封发自卡普里岛的电报，署名的是历史学家欧文·切里奥，我并不认识他。他对于他认为糟蹋并且不尊重意大利传统和文化的做法，表示愤慨。他在电报之末表示，在卡普里为我提供一座别墅，让我在那里住宿。

一切都像一场梦。当我和我的马蒂尔德（马蒂尔德·乌鲁蒂亚）一起到达卡普里岛的时候，梦幻般的不真实感有增无已。

我们是在冬天夜里到达这座秀丽岛屿的。高峻的白色海岸陌生而又沉默，矗立在夜色中。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会遇到什么事呢？一辆精巧的马车在等我们。马车在夜间阒无一人的街道上不停地往前行驶，所经之处白色的房子寂然无声，小胡同又窄又直。马车终于停下。车夫把我们的手提箱搬进那所也是白色的房子，它似乎是空的。

走进房子，我们看见大壁炉内炉火熊熊。在点燃的枝形烛台的烛光里，站着一位长有头发和胡须、身穿白色衣服、身材很高的男子。他就是半个卡普里岛的所有者、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堂欧文·切里奥。他屹立在阴影里，如同童话中描写的一尊神明爷爷。

他年约90岁，是岛上最有名望的人。

“这座房子归您使用。您在这儿会很安宁的。”

他离开我们好多天，出于礼貌，他在这些日子里没有来找我们，只叫人送来写有一些消息或建议的短简，笔迹工整漂亮，还附有他花园里生长的树叶或花朵。在我们看来，欧文·切里奥代表了意大利那颗宽厚、慷慨和温馨

的心。

后来我了解了他的工作，他写的书虽然没有阿克塞尔·蒙特 写的那么有名，却比后者更真实。这位年高德劭的切里奥用挖苦的幽默语气一再说道：

“卡普里镇的广场就是上帝的杰作。”

我和马蒂尔德在我们的爱情里蛰居。我们在阿纳卡普里岛上远足。这个被分隔成上千个小果园的小岛有大自然的壮丽景色，有关的评论虽嫌过多，却绝对可信。在饱受日晒风吹的岩石之间的干旱土地上，草木繁茂，鲜花怒放，简直是个规模宏大的园林。这个受人喜爱的卡普里岛到处是岩石和小葡萄园，岛上居民谦和、勤劳、朴实，只有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进入这个隐蔽岛屿的人，只有当他的衣服上的旅游标签脱落的时候，才能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当你和那里的事物和人有了共同点，当你认识了那里的车夫和渔夫，当你成为隐蔽、贫困的卡普里岛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哪里有廉价的好葡萄酒，哪里能买到卡普里人食用的橄榄油。

我们在书里读到过的那些离奇的恶行，可能在王宫的高墙内都发生过。可是，我在无边的孤独中，或是世上最纯朴的人们中间，享受到的却是幸福的生活。难忘的时光！我整个早晨都在写作，下午马蒂尔德把我写好的诗用打字机打出来。我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在一座房子里。在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地方，我们的爱情越来越浓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分开了。

我在那里完成了一本关于爱情、迷恋和痛苦的书，这就是后来在那不勒斯不署作者姓名出版的《船长的诗》。

这本书是我最有争议的书之一，现在我来说说它的经历。

这本书的封面很久都没有印我的名字，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秘密，好像是不承认它，又好像是这本书自己不知道谁是它的父亲。和私生子、婚外恋生的孩子一样，《船长的诗》也是一本私生的书。

这本书所收的诗，都是在我流亡欧洲期间在许多地方写的。它 1952 年在那不勒斯出版，没有署作者名字。这本书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马蒂尔德的爱、对智利的怀念和一个公民对祖国和家乡的强烈感情，可惜它好几个版本的封面上都没有署作者名字。

画家保罗·里奇弄到优质纸张、古老的博多尼活字和从庞贝水瓶上拓下的版画，以供该书第一次印刷之用。保罗怀着兄弟般的热情，还编制了订购者名单。那本精美的书很快就出版了，这一次只印了 50 册。我们用摆满一桌子的鲜花、海贝肉、清水般透明的葡萄酒（卡普里岛葡萄园的独子），为这件事举行长时间的庆祝会。我们还得到热爱我们并祝贺我们至纯爱情的朋友们的欢呼。

几个多心的批评家提出，出版这本没有署名的书有政治动机。他们说：“党是反对的，党没有批准出版这本书。”但这不是真的。幸运的是，我们的党不反对任何美的表现。

唯一的真相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不愿意让这些诗伤害已经同我分手的德丽亚。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子，在我写出最动听的诗歌的岁月里，她是捆住我双手的钢和蜜编成的绳子，是我 18 年间的模范伴侣。这本充满突发的和炽烈的激情的书，会像一块扔出去的石头那样击中她的温柔结构。这些，也只有这些，才是我怀着深情的、值得尊重的匿名的个人原因。

后来，这本书仍然无姓无名地长大成人，长成为一个私生的勇士。它在生活中闯出一条路，我终于不得不承认它。现在，署上真船长姓名的那些《船长的诗》，已经在康庆大路上——也就是在书店和图书馆——阔步前进。

流亡的结束

我的流亡生活即将告终。那是在 1952 年。我们经瑞士到达戛纳，以便乘上一艘将把我们带往蒙得维的亚的意大利轮船。这次在法国，我不想看望任何人。我仅仅把路经法国的事告知了艾利斯·加斯卡尔，他是最忠实的译者和结识多年的朋友。但是，我们在戛纳遇到了意外的事。

我在轮船公司附近的街上，遇到了保罗·艾吕雅和他的妻子多米尼克。他知道我已经到达，就等在这里请我去吃午饭。毕加索也要去。后来我们遇到了智利画家内梅西奥·安国内斯和他的妻子伊内斯·菲格罗亚，他们也要去吃午饭。

那次大概是我与保罗·艾吕雅的最后一面。我还记得他在戛纳的阳光下，穿一身睡衣似的蓝衣服。我在戛纳耀眼的街道和非洲般炙热的阳光下，永远忘不了他那张黝黑、红润的脸，他那双湛蓝湛蓝的眼睛，他那无限年轻的笑意。艾吕雅特地从圣特罗佩赶来和我告别，他带来了毕加索，而且安排了午饭。盛宴已经准备好了。

一件意料不到的蠢事，把我那天给毁了。马蒂尔德没有乌拉圭的签证；她必须立刻赶到该国领事馆去。我陪她坐出租汽车去，就在领事馆大门口等她。当领事出来接待马蒂尔德时，她乐观地笑了。领事看上去像个和气的的小伙子，嘴里哼着《蝴蝶夫人》乐曲。他身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种装束在领事中极为少见。马蒂尔德万万没有想到，这家伙在谈话间竟变成一个粗俗的勒索者。他想利用平克顿的外貌收取加班费，还设置了种种障碍。他让我们奔忙了整整一上午。午饭吃的普罗旺斯鱼汤，我只觉得味苦如胆汁。马蒂尔德花了好几小时才拿到签证。平克顿每时每刻都在要她办更多的手续：他得照张相，她得把美元换成法郎，她得为打到波尔多的长途电话付款。本应免费的签证，所付费用竟高达 120 多美元。我甚至想到，马蒂尔德恐怕要误船了，我大概也上不了船。

过很久我都会想到，那天大概是我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海洋学杂谈

我是个海洋学爱好者。几年来我收集的有关海洋的知识，对我用处不大，因为我总是在陆地上奔忙。

如今我正在返回智利，返回我的濒临大洋的祖国，我乘坐的轮船正在驶近非洲海岸。轮船已经通过两个古老的赫拉克勒斯石柱，这两个石柱现在披上了坚甲，成为倒数第二名帝国主义的仆从。

我以熟悉海面 and 海底情况的纯海洋学家最无私的眼光观察大海，不靠文学兴趣，而靠行家的品尝，靠鲸鱼一样的味觉。

我向来喜爱海洋故事，我的书架上还放着一个渔网。我时常查阅的是威廉·毕比写的一本书，是描述南极海海螺的一本精彩的专著。

浮游生物引起我的兴趣；那种有营养的、成分不同的、带电的水，会使

大海染上紫色闪电的色彩。这样我才知道，鲸鱼几乎只靠食用不计其数的这种海洋生物取得营养。极微小的植物和看不见的纤毛虫正在我们颤动的大陆繁衍。鲸鱼在游动中张开大嘴，把舌头抬到上颚，把这种活命的和有益于内脏的水含在口中，以吸收其中的营养。经过我黑岛家的窗前游往南太平洋各温暖岛屿的蓝鲸，就是这样觅食的。

智利捕杀最多的抹香鲸（或称有齿鲸）的回游路线，也经过那里。智利的水手们往往用抹香鲸来形象他说明民间传说中海上世界的情景。他们用刀子将鲸鱼牙齿上刻出作为爱情的小小纪念遗迹的心和箭，刻出他们的帆船的图像和他们的未婚妻的肖像。

但是，我们的捕鲸者——海半球上最勇敢的捕鲸者，渡过麦哲伦海峡和合恩角，穿过北极区及其风暴，不只是为了取下气势汹汹的抹香鲸的牙齿，而是为了夺取它的油脂宝藏，尤其是要取走只有这种怪物才藏在它高山般隆起的腹部中的分泌龙涎香的小囊。

我现在是从别处前来。我把地中海的最后一个蓝色圣殿、洞穴、卡普里岛周围的海面和海底区域抛到了身后；在卡普里岛周围，美人鱼登上礁石，去梳理她那蓝色的头发，因为大海的翻腾浸染并弄湿了她散乱的秀发。

在那不勒斯水族馆可以看到春季生长的有机物的导电分子，可以看到水母像蒸汽和白银那样在上下浮沉，它飘动着跳起轻柔而庄严的舞蹈；水母体内只有一个导电环，然而这种环是迄今海底深处其他任何贵妇都没有戴过的。

许多年前我还年轻时，在令人沮丧的印度的马德拉斯参观过一个神奇的水族馆。至今我还记得那些闪亮的鱼，有毒的海鳝，身披烈火和彩虹的鱼群，尤其是那些非常严肃、行动谨慎、有金属般颜色的章鱼，像计算器那样具有无数眼睛、腿、吸盘和存储的信息。

我们大家最初是从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中认识那种大章鱼的（维克多·雨果也是一只有触手和多形态的诗歌章鱼），我在哥本哈根博物馆里只看到这种章鱼一条胳膊的一部分。这一定是古代传说中的海妖，是古代大海里的霸王，抓住一条帆船便把它压在身体底下，紧紧缠住。我见过保存在酒精里的这种章鱼的一部分，看来它的长度当在30米以上。

不过，我坚定不移地要寻找的是独角鲸的踪迹，或者不如说是寻找它的躯体。由于我的朋友们对北方海域庞大的独角鲸如此缺乏了解，我觉得自己是独角鲸的专门信使，甚而觉得我自己就是独角鲸了。

到底有没有独角鲸呢？

在特别平静的海洋里，可能有一种动物，前额上长着一根四五米长象牙般的长矛，长矛上有螺旋形凹纹，一直延伸到尖端；也许千百万人都忽略了它和关于它的传说，甚至忽略了它奇特的名字？

独角鲸这个名字，我可以说是最美的海洋生物的名字，是会歌唱的海洋酒杯的名字，是水晶马刺的名字。

为什么没人知道它的名字呢？

为什么没有姓独角鲸的家族，没有漂亮的独角鲸家的宅邸，甚至没有独角鲸·拉米雷斯或独角鲸·卡瓦哈尔？

都没有。海洋独角兽仍然是个奥秘，仍然在覆盖着海外阴影的水流间，带着它那长长的象牙剑潜没在未被发现的浩淼大洋里。

在中世纪，捕猎各种独角兽是一项神秘的审美运动。世上的独角兽永远生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挂毯间，雪花石膏般白皙和高贵的贵妇围在它四周，它头上有各种啼啭的或发出光彩的鸟儿飞翔组合成庄严的光环。

至于独角鲸，中世纪的君王把它神奇的躯体一部分一部分地当作极好的礼物赏赐出去，从这种礼物上刮下的碎末用白酒冲眼，就能使人健康、年轻、精力充沛——人类永恒的梦啊！

一次，在丹麦的什么地方漫步，我走进一家古老的博物商店——这种买卖我们美洲还没人知道，然而却是世上最使我入迷的事。在店铺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三四根独角鲸的角，最大的几根有5米长。我长久地挥舞、摩挲这些角。

年老的店主看着我拿起那根象牙长矛，当作想象的矛枪，扎向看不见的海上风车。我扎完，就把每一根角放回原来的角落。我只能买下从一头刚出生的小独角鲸上取下的很小的角，这头小独角鲸是要用自己天真的刺，到北极冰水中探索的独角鲸之

我把这根角藏在我的手提箱里，但在瑞士面对莱梦湖的我居住的小膳宿公寓里，我要看看并摸摸属于我的这件海洋独角兽的神奇宝贝。我想从手提箱里把它拿出来。

然而这件宝贝却找不到了。

我也许把它忘在贝塞纳斯膳宿公寓里了，也许它是在最后一秒钟滚到床底下去了？也许它真的已经神秘地在夜间返回极圈了？

我在新的一天凝望着大西洋上的小小浪花。轮船把海水、泡沫劈开，形成两道浮动的深渊，在船头两侧泛起白色、蓝色和黄绿色。

海洋的大门在颤抖。银色透明的小飞鱼在海洋大门上飞跃。我正从流亡中归国。

我久久凝望着海水。我正在这片海水上驶往别的水域，驶往我的祖国的汹涌波涛。

漫长白昼的天空覆盖在整个海洋上。

夜色将临，又将用它的黑影把这神秘的绿色宫殿隐藏起来。

十、归航

我家里的一只羊羔

我有个当参议员的亲戚，在新近几次选举获胜后，来到我在黑岛的家里盘桓数日。羊羔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于是，特别热心支持这个参议员竞选的人纷纷前来祝贺。第一天下午，在空地上生起一堆火，把整只羊羔穿在一根烤肉木棍上，按智利乡间方式烤羊。这叫“木棍烤羊羔”，庆贺时还要喝许多酒，并由如怨如诉的克里奥尔吉他伴奏。

另一只羊羔留作第二天庆贺之用。就在它气数将尽之际，有人把它拴在我窗下。它整夜呻吟、哭泣、咩咩叫，为孤独而哀怨，那只羊羔忽高忽低的怨诉，听了令人心碎。我当即决定天一亮就起床，把它劫走。

我把羊羔塞进汽车，带它到 150 公里外我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在那里屠刀就够不着它了。它一进门，就贪婪地吃起我的花园里最美的花木的嫩叶来了；它最喜欢的是郁金香，吃得一棵不剩。玫瑰有刺，它不敢碰，却兴高采烈地把紫罗兰和百合吃得精光。我只好再把它拴起来。它立刻又咩咩叫起来，显然是想像先前那样感动我。我很烦恼。

现在，华尼托的故事和那只羊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了。当时智利南方发生一次农民罢工；那个地区的大庄园主们（他们每天只付给佃农两角工钱），要用棍棒和判处入狱的办法解决那次罢工。

一个乡下小伙子非常害怕，便爬上一辆正在运行的列车。这小伙子名叫华尼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世界上的事毫无所知。列车员向旅客查票时，他说他没有车票，他要去圣地亚哥，以为火车是给人坐的，谁要旅行就可以上车。列车员当然要他下车。不过，三等车的乘客（总是很慷慨的乡下人）捐款为他付了车票钱。

华尼托腋下夹一包衣服，行在首都街头和广场。他谁也不认识，因而不愿跟别人说话。在乡下时，听说圣地亚哥盗贼比居民还多，他害怕腋下夹着的、包在报纸里的衬衣和麻鞋会被偷走。他在最繁忙的街上闲荡，这种地方人们总是来去匆匆，总是把这个从其他星球落下的卡斯帕尔·豪瑟尔撞到一边去。夜间他又找到人多热闹的街区去，但是这种地方都是开设夜总会和过夜生活的大街，他出现在这里——脸色苍白的牧羊人在妓女堆里迷了路——就更显得古怪了。他身无分文，所以吃不上饭，有一天终于晕倒地上，不省人事。

一群好奇的人把这个躺倒街头的小伙子团团围住。他正好倒在一家小餐馆门前，人们把他抬进餐馆，放在地板上。有些人说：“他是心脏病发作了。”另一些人说：“他是肝昏迷。”餐馆老板走近一看，便说：“他是饿的。”还没吃上几口东西，这个昏死的人就活了。餐馆老板让他洗碗盘，还对他极有好感。对他表示好感自有道理。这个乡下小伙子总是笑咪咪地洗涮堆积如山的碗盘。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比起乡下来，他有更多的东西吃。

城市的魔法用特殊方法使这个牧羊人和那只羊羔很偶然地聚集到我家来了。

牧羊人忽然想去城里各处看看，便迈步离开成堆的餐具，到更远一点的

地方去。他热切地走上一条街，穿过一个广场，一切都使他着迷。可是，到他想回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他因为不会写字，没有记下餐馆的地址；他寻找那个接纳过他的好客的大门，竟是徒劳无益。他再也找不到了。

一位过路人同情他的尴尬处境，就对他说他应该来找我，来找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给他出这个主意。可能因为智利人有一种习惯，脑子里一有什么奇想，就让我来承担；出了什么事，就把过错推给我。这是很奇怪的民族习性。

这小子有一天就这样到我家来了，遇见了那只被拴起来的羊羔。我既然照管了那只谁也不需要羊羔，再增加一份照管这个牧羊人的负担，也并不困难。我派他专门看管那只羊羔美食家，不让它只吃我的花，也要不时地让它用我花园里的牧草填肚子。

他们马上互相了解了。开头几天，他很认真地拿一根带子似的小绳套在羊羔脖子上，用这根绳子牵着它到处走。羊羔不停地吃草，牧羊人自己也不停地吃东西。他们俩走遍整座房子，也走进了我住的房间。他们彼此情投意合，简直像是由一根大地母亲的脐带连在一起，像是由人的自然法则连在一起。

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牧羊人和羊羔的体形都变圆了，尤其是那只羊，它的个头都快赶上它那胖墩墩的牧羊人了。他们有时小心翼翼地走进我的房间，冷漠地看看我就走了，在地板上给我留下一串黑念珠。

当这个乡下小伙子害思乡病，告诉我他要返回遥远的故乡时，一切都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他必须给本村的圣母还愿。他没法带走那只羊羔。他们亲切地告别了。牧羊人上了火车，这次手里拿着车票。这次离别是令人伤感的。

在我花园里存在的不仅是一只羊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或者是羊更加肥胖的问题了。怎么处理这只羊才好？现在谁能照料它？让我心烦的政治问题太多了。我因为写战斗诗篇招致迫害之后，我家里乱成一团。那只羊羔又如怨如诉地咩咩叫起来。

我闭上眼睛，要我妹妹把它带走。唉！我敢肯定，这次它可逃不脱烤肉棍了。

从 1952 年 8 月到 1957 年 4 月

从 1952 年 8 月到 1957 年 4 月这几年发生的事，我将不在回忆录里作详尽记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都在智利，既没有发生新奇事情，也没有遇到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惊险事件。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倒是有几件要事值得一提。我早已写好的诗集《葡萄与风》出版了。我加紧写作《元素颂》、《新元素颂》和《颂歌第三集》。我组织了一次美洲大陆文化代表大会，在圣地亚哥召开，整个美洲的杰出人士都来了。我的 50 岁生日也是在圣地亚哥庆祝的，全世界的重要作家都来了：艾青和萧三来自中国；伊利亚·爱伦堡从苏联飞来；德尔达 和库特瓦列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来的拉丁美洲人中，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奥利韦里奥·希龙多 、诺拉·兰赫 、埃尔维奥·罗梅罗 、玛丽亚·罗莎·奥坎弗、劳尔·拉腊以及许多别的人。我把自己的藏书及其他财产捐赠智利大学。我作为列宁奖评委会成员去了一趟苏联；在这段时期里，我也获得了这个奖（当时还叫斯大林奖）。我终于

同德丽亚·德尔·卡里尔分居了。我建造了那幢叫做“拉恰斯科纳”的房子，同马蒂尔德·乌鲁蒂亚一起搬进去居住。我创办了《智利报》杂志，主编了几期。我参加竞选和参与了智利共产党的其他活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全集的圣经纸本。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

在这段时期之后，我应邀参加在锡兰岛科伦坡（许多年前我在这里生活过）召开的和平大会。这是1957年4月的事。

遇上秘密警察似乎并不危险，然而要是遇上阿根廷的秘密警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事虽然不乏幽默，其后果却难以逆料。

那天夜里，我们刚从智利来，打算继续上路前往几个更遥远的国家，我浑身疲乏，便躺到床上去。我刚刚昏然入睡，就有几个警察闯进房来。他们慢腾腾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搜遍了；他们把书本和杂志收到一起，搜查了衣橱，连内衣都翻遍了。他们在房子尽头发现我们住的房间时，留我住宿的那位阿根廷朋友已经被带走了。

“这人是谁？”他们问。

“我叫巴勃罗·聂鲁达。”我答道。

“他病啦？”他们问我妻子。

“对，他病了，也因为长途旅行太累了。我们今天刚到，明天坐飞机去欧洲。”

“很好，很好。”他们说走出房间。

过一小时他们回来了，开来一辆救护车。马蒂尔德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他们是奉命行事。不管我是疲倦还是精神饱满，是健康还是有病，是活的还是死的，他们都要把我带走。

那天晚上在下雨。布宜诺斯艾利期阴沉的天空大雨如注。我感到茫然。庇隆已经倒台；阿兰布鲁将军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专制统治。可是，我却被捕了，既不知道原因和时间，也不知道目的和地点；他们毫无理由，也不管我的疲乏和病痛。4个警察用来抬我下车的担架，在下楼梯、进电梯、穿过走廊则成了棘手的问题。4个抬担架的人吃尽苦头，喘着粗气。为了加重他们的痛苦，马蒂尔德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我的体重是110公斤。我身上穿着绒线衫和大衣，蒙头盖着几条毯子，使他们觉得真有这么重。我像奥索尔诺火山那样的一个庞然大物，躺在阿根廷式民主为我提供的担架上。我想象在我体重下挣扎、出汗的不是那几个抬我的可怜魔鬼，而是来为我抬担架的阿兰布鲁将军本人；这么一想，我就感到自己的静脉曲张好多了。

我是按入狱的例行手续被收监的，办了犯人登记，个人财物也被收走。他们不许我留下为了免于腻烦而带来的有趣的侦探小说，事实上我根本没时间腻烦。铁栅栏打开又关上；担架穿过一个个院子和一扇扇铁门，在叫门声和上門声中越来越往监狱的深处走。我突然来到一大群人中间；他们是夜里被抓来的，有两千多人。我被隔离开了，谁也不能靠近我。但是，还是有人在毯子底下和我握手，也有士兵把枪放在一旁，递过纸来要我为他签名。

最后，他们把我关到上面最远处的一间单人牢房去，牢房里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小窗。我很想休息，不断地想入睡。可我睡不了，因为天已破晓，阿根廷犯人发出震耳的嘈杂声，如同观看大河队和河口队比赛时发出的雷鸣般

的叫喊声。

几小时后，阿根廷、智利和更多国家的作家们和朋友们发出了声援。警察让我从单人牢房下来，带我到医务室去，还给我衣物，把我释放了。我即将离开监狱时，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向我走来，把一张纸片交给我。那是一首献给我的诗，诗写得很拙劣，如同民间器物那样满是瑕疵和稚拙的构思。我深信，没有几个诗人曾从看守自己的人那里得到过一份用诗表达的敬意。

诗和警察

在黑岛时，有一次女仆对我们说：“夫人，堂巴勃罗，我怀孕了。”后来她生了个男孩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她不在乎这个；她在乎的是要马蒂尔德和我当孩子的教父母；可是这事办不到，我们不能当。最近的教堂在埃尔塔沃镇，我们经常开小型卡车到这个小镇去拉汽油。教士毛发倒竖，活像一只豪猪。“一个共产党员教父？绝对不行。聂鲁达不能进教堂大门，也不能抱你的孩子。”那姑娘回到家里就低着头走进自己的卧室。

另外一次，我亲眼看见堂阿斯特里奥遭受的痛苦。他是个老外表工。他已有一大把年纪，是瓦尔帕莱索最高明的精密钟表匠，给舰队修过各种航海精密時計。他的相依为伴的老妻就要死了。他们是50年的夫妻。我当时想，我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诗文，在他十分难过时能给他少许安慰的一篇诗文，让他可以念给他气息奄奄的妻子听。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可不知道是否想得对。我把这首诗写出来了，诗中我对这位工匠及其技艺，对在各种旧钟表的嘀嗒声中度过的十分纯洁的生命，发出由衷的赞叹，倾注了赤诚的激情。萨里塔·比亚尔把这首诗送到一家报纸去。这报纸叫《团结报》，由帕斯卡尔先生主编。帕斯卡尔先生是个教士，他不愿意发表，这首诗也就发表不了了。这首诗的作者聂鲁达是个革出教门的共产党员。他不愿意发表。那位老太太，那位堂阿斯特里奥的老伴去世了。那个教士就是不发表那首诗。

我要生活在没有革出教门的世界上；我不会把任何人革出教门。将来我决不会对这个教士说：“您不能给任何人施洗，因为您是反共分子。”我也不会对别人说：“我不发表您的诗，您的创作，因为您是反共分子。”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那里人们都只是人，除此没有其他头衔；那里人们不会为一条戒律、一句话、一个标签而苦恼。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走进所有的教堂，都可以进入所有的出版物。我希望市长办公室门口再不会有人守在那里阻拦和赶走别人，我希望人人都能笑逐颜开地进出于市政府大楼。我希望没有人须坐威尼斯平底船逃走，没有人被人骑着摩托车追踪。我希望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大多数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话、阅读、聆听、茁壮成长。我从来不赞同斗争，除非为了使一切斗争告终。我从来不赞同严酷，除非为了使严酷不复存在。我已选定一条要走的路，因为我认为这条路会把我们大家引到永远相亲相爱的境界。我在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宽广的、没有穷尽的善意而奋斗。我的诗曾和警察多次遭遇，所有这些遭遇及其他一些我没有一再诉说的事，还有别的一些我没有亲身经历而许多人又不可能诉说的事，使我对人类的命运怀有绝对信心，越来越明确地相信我们正在向脉脉温情接近。我有意识地写到悬在我们大家头上的炸弹的危险，写到不会放过地球上任何人和物的原子灾难的危险。然而，这改变不了我的希望。在这危急关头，在这垂死挣扎的一刹那，我们知道，决定性的阳光定能射进尚未完全

闭上的眼睛里。我们一定能互相理解。我们一定能共同进步。这种希望是决不会破灭的。

与锡兰重逢

为反对核子死亡而斗争这个全球性事业，使我再次来到科伦坡。我们乘坐专门调来运送我们庞大代表团的“图—104”这种了不起的喷气式飞机，飞越苏联，前往印度。我们仅在靠近撒马尔罕的塔什干稍事停留；飞机经两天飞行，将把我们载到印度的心脏。

我们在1万米高空飞行。为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我们的巨鸟还要爬升得更高，大约升到15000米高度。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的景物几乎是不动的。最初的几道屏障——喜马拉雅山脉的几条蓝色和白色的支脉——出现了。那里有令人畏惧的雪人在可怕的孤寂中行走。随后，在左侧，在众多的雪冠中巍然耸立着珠穆朗玛山主峰，它像一顶更为突兀的小雪冠。太阳直射在奇异的景物上，它的光线削出轮廓，削出锯齿形的岩石，削出冷峭的寂静之凛凛威风。

我不禁想起多次越过的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里不像我们那个山脉，没有那么杂乱，没有独眼巨人般的暴烈性格，没有易动怒的沙漠。我觉得亚洲的山脉更加典雅，更有条理。它们冰雪砌成的圆顶，有如矗立在无垠空间的庙宇或宝塔。孤寂更加宽广。阴影没有像可怕的石墙那样竖立起来，而像宏伟庙宇中神秘的蓝色花园那样铺展开来。

我告诉自己，我正在呼吸世界上最高处的空气，正在从地球最高处的上空向下眺望。这是一种独特的感觉，其中混合着光明和骄傲，速度和雪花。

我们在飞往锡兰。我们在印度炎热的疆土上空稍稍降低了高度。我们在新德里离开苏联飞机，转而乘上这架印度飞机。这架飞机的机翼在风暴的浓云间吱嘎作响并抖动。在不停的抖动中，我的思绪已经飞到那座繁花似锦的海岛。22岁时，我曾在锡兰度过孤独的时光，还在岛上天堂似的大自然中写出我最为苦涩的诗。

经过漫长的岁月，我国到这里来参加这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和平大会，这次集会得到了该国政府的支持。我看到，有众多和尚（有时多达几百人）出席这次大会，他们聚集在一起，身穿藏红色僧袍，显出佛教僧众所特有的庄严和沉思。这些僧众在反对战争、破坏和死亡的斗争中，坚持悉达多·乔答摩王子（即菩萨）所宣扬的平和与和谐的古老观念。我想到，他们这种表现，与我们美洲各国的教会，即官办和参战的西班牙式教会，相去何其遥远。真诚的基督徒如果看到天主教士从布道坛上反对最严重、最可怕的罪行，即反对杀害千百万无辜的人并在人类身上永远留下生物污染的原子死亡，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快慰。

我试着到韦拉瓦特郊区的小巷去寻找住过的房子，好不容易才找到。树木都已长大，街道的面貌也变了。

我在其中写过许多痛苦的诗的那幢旧平房，马上就要拆毁了。平房的门都被蛀蚀了，热带的潮湿损坏了平房的墙，但是，它们还挺立在那里，等待这次与我最后告别的时刻。

一个老朋友我都没遇到。不过，这个海岛又用它那尖锐的喊声和强烈的闪光来叩击我的心扉。椰枣树下，大海仍然哼着同一首古老的歌与礁石对抗。

我又到森林里去漫步，又看到踏着豪迈步伐的大象把林间小径阻塞了；我又闻到令人陶醉的浓郁芳香，又听到林中生物生长和活动的声音。我来到锡吉里耶岩柱，一位疯狂的国王在这个岩往上建造了一个要塞。我瞻仰过宏伟的佛像，人群在佛像影子里小虫似地来来去去，此情此景宛如就在昨天。

我又该走了，现在可以肯定，我这一走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再访中国

开完科伦坡和平大会，我和若热·亚马多及其妻子泽莉亚一起飞越印度。印度的飞机上总是坐满包着鲜艳的缠头布的旅客，而且都带着篮筐。一架飞机似乎装不下这么多人。一大群人在第一个机场下飞机，马上就有另一群人进来坐满他们腾出的坐位。我们必须继续飞到马德拉斯以远的加尔各答去。飞机在热带风暴中颤抖。漆黑的大白天，比夜晚还要黑的黑暗突然笼罩着我们，然后又留给我们一片耀眼的天空。飞机又晃动起来；闪电照亮了突然出现的黑暗。我看见若热·亚马多的脸色如何由白变黄，又由黄变绿。他同时看见，由于萦绕心头的恐惧的影响，我的脸色也发生同样的变化。飞机内下起雨来了。漏进来的大滴雨水，使我想起冬天时我在特木科的家。然而，1 万米高空的这些雨滴，一点儿也不能使我感到有趣。有趣的倒是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和尚，他打着雨伞，以东方人特有的安宁继续诵读他那充满古代智慧的经文。

我们平安抵达缅甸的仰光。我曾在居留缅甸的日子里度过我来到世间的 30 周年，我这个无名之辈在这里写了不少诗。1927 年我 23 岁，这一年我正好在仰光登岸。这是一片酷爱斑斓色彩、语言难懂、热情、迷人的土地。这块殖民地深受统治他们的英国人的剥削和欺凌，但是这个城市却很洁净、明快，大街小巷都洋溢着生活的乐趣，玻璃橱窗里炫耀着殖民地的诱惑。现在我见到的仰光，却是个半空的城市，玻璃橱窗里空空如也，大街小巷垃圾成堆。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一条艰难的路。人民觉悟、高举自由旗帜之后，必须在艰难险阻中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深深隐匿在浩浩荡荡的伊洛瓦底江畔和许多座金塔脚下的独立缅甸的历史，我至今部不了解；但是，透过远处大街小巷里的垃圾堆和时强时弱的哀愁，还是可以隐约看出撼动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悲惨事件。往事仿佛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我到处寻找的乔丝·布莉斯，也就是我那首《鰥夫的探戈》诗中的女主人公，毫无踪影。她是死是活，没有人能告诉我。住在同一个街区的我们的邻居，都已不在人间了。

我们现在正从缅甸飞越把它与中国分隔开的一道道山脊。那是田园诗般安谧的一幅简朴景色。飞机从曼德勒起飞后，在水稻田、外形怪异的宝培、千万株椰枣树、缅甸人进行兄弟相残战争的战场上空飞过，接着就飞进肃穆的中国风景线中去。

我的老朋友诗人艾青，在越过边界后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昆明迎候我们。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乃是这次漫长旅途中又一次提前得到的喜悦。

艾青和胡志明一样，是在东方的殖民压迫下和巴黎的艰苦生活中造就的具有东方古老传统的诗人。这些声音柔和、自然的诗人一旦从监狱出来，就

出国成为穷学生和餐馆侍者。他们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在诗中柔情似水，在政治上坚强如钢，都及时回国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昆明公国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时常可以见到敷泥的截除部位，或者像绑着绷带的受伤手臂那样扭曲的树枝。我们被带去看望园丁，他是统治着千奇百怪的花园的居心不良的天才。粗壮的老枞树生长的高度不超过 30 厘米，我们还看到金桔树，枝头挂满微型桔子，小得像金色的谷粒。

我们还游览过壮美的石林。岩石有的伸长如整根钢什，有的翻腾起伏如凝然不动的海涛。我们知道，这种欣赏奇形怪石的爱好，已有许多世纪之久。古城的广场上装饰着许多外形令人费解的巨石。古代的地方官员要向皇帝进贡时，就派人送去几块这种巨石。这种庞大的贡品由上百名奴隶推着走几千里路，需要数年才能送抵北京。

我觉得中国并不是费解的谜。相反，我甚至在它的冲天革命干劲中也看出它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千百年的国家，永远在形成自己的结构，永远在分成层次。它是一座巨塔，人和神话、武士、农民、神明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进进出出。这里没有任何自然产生的东西，连一个微笑都不是。要是有人想到各处寻找朴拙的民间小艺术品，就是那种不按透视原理制作而又往往接近于奇迹的艺术品，那是白费气力。中国的陶瓷小人、石雕小人、木刻小人，都是按上千年的模式复制的。一切事物都有按同一精美标准进行复制的印记。

我在农村集市上见到一种用细竹条编成的小蝉笼，感到万分惊奇。它妙就妙在按建筑学的准确度把一只笼子安在另一只上方，每只笼子里都装一只捉来的蝉，直至形成一座一米高的城堡。看着那连接竹子的一个个节和竹茎上的嫩绿色，我觉得具有能创造奇迹的天真品格的人民的手，已经恢复了活力。农民们看出我的赞叹之意，不想把那种发出响声的城堡卖给我；他们要把它送给我。在中国腹地，宗教仪式般单调的蝉鸣就这样陪伴我好几周时间。记得只有在童年时代，我才得到过如此难忘的土气礼物。

我们乘坐一艘运载上千名旅客的轮船，开始沿长江旅行。船上旅客都是农民、工人、渔夫——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我们沿着帆桁如织、由千百万的生命、忧虑和梦想馈渡而过并划出航迹的大河，朝南京方向航行了好几天。这条大河是中国的主要街道。长江这条非常宽阔和安静的河，有的地方变得很狭窄，行船艰险万分，如同通过巨人的喉咙。两岸高高的峭壁几可摩天，空中不时出现一片白云，像是用毛笔娴熟地抹上去一般；在岩石的疤痕间，有时可以隐约见到一间小屋。

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险难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5 年来，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看出的显著变化，随着再次深入这个国家而得到证实。

这种印象开始时是模糊的。在大街小巷，在人们身上，我能看出什么变化呢？唔，我发现蓝色不见了。5 年前，在那年的同一个季节里我游览了中国的街道，那里永远挤满朝气蓬勃的人群。但是，当时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穿蓝色工人服——一种用斜纹布或薄棉布做的工人服。戏很喜欢这种只有不同的蓝色色调的简便服装。看着无数蓝点穿过大街小巷，是很美的。

现在这种情况变了。发生什么事了？

只不过在这 5 年里，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

穿上用各种颜色，各种花卉、条纹和点的图案印的料子和各种绸缎制作的服装；甚至也可以让千千万万中国男子穿上用其他颜色和质地更好的料子制作的服装。

现在，许多街道已经变成具有中国高雅情趣的精美彩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

沿长江航行时，我发觉了历史悠久的中国画的真实性。在长江，隘道高处一株小塔似的蟠曲的松树，立刻使我想起想象力丰富的古代版画。比长江上的隘道更不真实、更富于幻想色彩、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实不多见；这种隘道高入云霄，令人难以相信，在一处岩石裂缝间显示出非凡人民的年代久远的足迹：五六米宽新种的菜地，或是供人观赏并引人遐想的有5层屋顶的庙宇。在更高处，在光秃秃的巉岩顶上，我们仿佛见到古老神话中描述的那种如纱如雾的烟气；那只不过是世上绝顶聪明的极老的微画画师画过无数次的云影和飞鸟的踪迹。一首隽永的诗便产生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色；一首白描的短诗有如鸟的疾飞，又如岩壁间近平静止地流淌着的河水所发出的银白色闪光。

不过，这种景色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看到在小方格里、在岩石间的小绿点里劳动的人。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中国的大地母亲是广阔而坚硬的。她使人遵守纪律并定形，变成不知疲劳的、细致的、坚韧的劳动工具。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航行长江的整个旅程中，我觉得若热·亚马多显得紧张不安和心情抑郁。船上生活的许多方面使他和他的伴侣泽莉亚感到不快。不过，泽莉亚性情平和，火烧眉毛也不急。

在船上成为违反意愿的享有特权的人物，是引起我们不快的原因之一。船上成百的中国人到处都挤成一团，我们在他们中间却睡在特等舱，吃在专用餐厅，感到很不自在。这位巴西小说家用嘲弄的眼睛看着我，甩出一句诙谐而又冷峭的评论。

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确实把若热·亚马多心灵深处的一根弦给扯断了。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共同度过流亡的岁月，共同的信念和希望永远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不过，我认为我的宗派情绪已经减弱；我的天性和我的祖国的气候条件，使我倾向于去理解他人。若热则相反，始终是坚定的。他的良师益友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曾度过将近15年铁窗生活。诸如此类无法忘却的事实，使他的心肠变硬。尽管我跟若热没有共同看法，我却打心里为他的宗派情绪辩解。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是一股巨浪，把我们革命者全部推到新的处境中去，迫使我们作出新的结论。我们有些人感到，我们从一场又一场严酷的革命所产生的痛苦中得到了再生。我们已经从黑暗和恐怖中得到净化的再生，准备继续踏上掌握真理的征途。

然而，似乎就在那里，就在长江两岸难以置信的隘道之间的那艘轮船上，若热的生活中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已经开始。从此以后，他安静多了，他的态度和言论更是克制多了。我不相信他已失去革命信念，但是他的作品更趋

内向，失去了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中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性特点。仿佛他心中的享乐思想骤然挣脱开来，以《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洋溢着声色与欢乐的杰作）为始，陆续写出他的几部最好的作品。

诗人艾青是我们的导游团团长。每天晚上，若热·亚马多、泽莉亚、马蒂尔德、艾青和我，都在一间隔开的餐厅内用餐。席上摆满了金黄和翠绿的蔬菜、糖醋鱼、用特别方法烹制的永远可口的烤鸭和烧鸡。天天吃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饭食，几天下来，我们再爱吃也咽不下了。有一次，我们找机会摆脱如此鲜美的食物，但是我们的主动却是一条艰巨的路，这条路越来越曲折，像那些受折磨的树的一个枝桠。

当时恰巧碰上我的生日；马蒂尔德和泽莉亚计划改变我们的饮食制度，用西餐为我祝寿。那是再俭朴不过的一席寿宴了：用我们的方法烤一只鸡，配上智利式的西红柿、洋葱凉拌菜。两位妇女对这一令人惊奇的事严加保密。她们悄悄告诉我们的好兄弟艾青。诗人略显不安，回答她们说，他在答复之前须和导游团的成员们商量。

他们的决定出人意料。一个严峻的浪潮刚刚席卷全国；毛泽东已经拒绝对他的祝寿活动。在如此威严的先例面前，我怎么可以为自己祝寿呢？泽莉亚和马蒂尔德答道，我们想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那一桌食物（其中有我们动都不动的鸡、鸭、鱼）。换成按我们的方法用炉子烤的极俭朴的一只鸡。艾青和那些看不见的成员义开了一次会，他们第二天严肃地答复说，我们乘坐的船上没有炉子。泽莉亚和马蒂尔德早已跟厨师说过，她们便对艾青说，他们搞错了，船上一个顶好的炉子已经烧热，正等着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只鸡。艾青眯起眼睛，把目光投向奔流不息的长江水。

那年的7月12日，我的生日那天，餐桌上摆着我们的烤鸡——那场斗争的金黄色礼物。两个西红柿加切碎的洋葱，在一个小盘子里闪闪发亮。稍远处有一张大桌，跟每天一样桌上摆着用亮晶晶的盘子盛的丰盛的中国菜肴。

我在1928年到过香港和上海。当时中国是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机、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在这两个大都会的银行大楼前面，八九艘灰色装甲舰的出现，暴露了不安全和恐惧，暴露了殖民者的勒索，暴露了一个开始散发死亡臭味的世界的垂死挣扎。得到卑鄙的领事们的准许，中国流氓和马来流氓的海盗船上飘扬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妓院附属于国际公司。在本回忆录的第三章我曾记述，有一次我受到了袭击，他们剥去了我的衣服，抢光了我的钱，把我扔在中国的一条街上。

当我来到革命的中国时，这些记忆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上的纯洁令人惊奇。种种缺陷、小矛盾和不理解，也就是我说过的许多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主要印象是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土雄辩地发生了变化。无数实验在全国各地进行。封建农业正在发生变化。道德气氛如同旋风过后那样透明。

使我与中国革命进程疏远的不是毛泽东。谁能否定毛泽东这个政治人物是伟大的组织者和一个民族的解放者呢？我怎能不受他那壮丽的光环和他那如此富有诗意、如此忧郁、如此古老的纯朴的影响呢？

但是，我在旅行期间看见无数贫苦农民，收工回家没等放下手中的农具，就去向延安那位谦虚的游击队员（现在已变成神）的肖像敬礼。我看见了成

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本历书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倾泻出来。

在斯大林事件中，我在个人迷信方面也有我的责任。不过，当时我们都把斯大林看作打败希特勒军队的战胜者，看作世界人道主义的救星。他个人的蜕变是个神秘的过程，迄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在重庆，中国朋友带我到该市的桥上去游览。我一生都爱桥。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使我对桥产生莫大的敬意。他从不把桥叫做桥，那是对其的亵渎。他把桥叫做艺术品，而不许把这个称号授予绘画、雕刻，当然也不许授予我的诗；他只许把这个称号授予桥。他曾经多次带我去观赏智利南部神奇的马列科高架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那是世上最美的一座桥，它伸展在南方群山的万绿丛中，高大，细长，而且纯洁，像一把绷紧琴弦的钢铁小提琴，准备让科伊普伊_的风来演奏。横跨长江的那座大桥却是另外一种。它是中国最宏伟的工程建筑，是在苏联工程师参加下完成的。此外，它还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的结果。千百年来，重庆城被河流分隔开，这种隔绝意味着落后、迟缓和孤立。

领我观览大桥的中国朋友的热情，远远超过我的腿脚的承受能力。他们让我登上高塔，又让我爬到桥下低处，去观看奔流了几千年的那条河，今天被这座几公里长的钢铁结构跨越了。一列列火车将从铁轨上奔驰而过；公路上可以骑自行车；这条康庄大道将供人步行。我被如此雄伟的景物压垮了。

晚上，艾青带我们到一家餐馆去吃饭，这是一家极具传统烹饪特色的老字号；我们品尝了樱桃肉、麻辣明笋丝、松花蛋、鱼唇。中国烹饪在其复杂性、惊人的花色品种、离奇的创造、不可思议的形式等方面，都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艾青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一道好菜必须达到的最高标准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极重要。味道必须鲜美，香味必须浓郁，颜色必须鲜艳和谐。艾青说：“我们用餐的这家餐馆又添了一项绝妙的特点：声响。”一个大瓷盘四周摆一圈菜肴，在最后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虾尾浇汁，倒到一块烧红的铁板上，使之发出一种吹笛似的悦耳声音——以同样方式一再重复的一个乐句。

在北京，我们受到丁玲的接见，她是被指派接待若热·亚马多和我的作家协会负责人。我们的老朋友诗人萧三及其德国妻子兼摄影家也在场。一切都显得欢乐愉快。我们在开阔的人工湖的荷花之间泛舟，这个湖本是修造来供末代皇后游乐的。我们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和宝塔。我们在皇族后裔经营的一家世界上最专一的餐馆（它专一得只有一张餐桌）里吃过饭。如同一定会在我们大陆任何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两对南美洲夫妇一同在中国作家之家里饮酒，抽烟，欢笑。

我每天把报纸递给我姓李的年轻译员。我用手指指给他一栏栏费解的中国字，对他说：

“请译给我听！”

他开始用刚学会的西班牙语译出来。他给我念有关农业的社论、毛泽东的游泳壮举、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的议论、军事新闻；但是，刚开始我就

厌倦了。

“停！”我对他说。“最好给我念这另外的一栏。”

就这样，有一天当我用于指触及一个痛处时，我吃了一惊。这一栏谈的是一个政治案件，其中指控的就是我每天见面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人仍然是我们的“接待组”成员。看来这个案件早些时候就已发生了，尽管如此，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他们正在受调查的话，也从没有谈到危及他们命运的事。……

我的朋友女小说家丁玲被指控曾与蒋介石的一名士兵有爱情关系。那是发生在大革命以前的事实。她为革命抛弃了情人，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延安开始了英雄年代的万里长征。然而，这对她毫无用处。她被撤掉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被罚在她领导多年的作家协会食堂里像勤杂工那样端饭端菜。但她做勤杂工的活却是那么自豪自尊，后来就给送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公社食堂去劳动。这是我得到的关于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作家、中国文学的头号人物的最后消息。

我不知道萧三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

若热·亚马多已动身回巴西。稍后，我将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

苏呼米的猴子

我已回到苏联，应邀到南方去旅行。当飞越辽阔的疆土之后下飞机时，我把大草原、工厂和公路、苏联的大城市和乡村，统统抛到了后边。我来到布满枞树和栖息着野兽的威严的高加索群山。在我脚下，黑海为迎接我们而披上蓝色服装。遍地是盛开着浓香扑鼻的花朵橙树。

我们正在小小的阿布哈兹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苏呼米。这是传奇式的科尔基斯——是公元前6世纪伊阿宋前来觅取金羊毛的地区，是狄俄斯库里兄弟的希腊故土。稍后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新近从黑海水中取出的一件巨大的希腊大理石浅浮雕。古希腊诸神在这个海的海边，举行过他们的秘密祭礼。现在，这种秘密祭礼已被苏联人民简朴而勤劳的生活所取代。列宁格勒的人已经不同了。这片阳光明媚、长满小麦、到处是大葡萄园的土地有了另一种腔调——一种地中海口音。这些男人走路的风度不同了，这些妇女有意大利和希腊女人的眼睛和手。

我在小说家西蒙诺夫家里住了几天，我们在黑海温暖的海水里游泳。西蒙诺夫让我观赏了他果园里美丽的树木。我认识这些树，他每告诉我一种树的名称，我就像个爱国的农民那样答道：

“智利有这种树。另外这种树，智利也有。那种树也有。”

西蒙诺夫面带谐谑的微笑看着我。我对他说：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大概从来没见过我圣地亚哥家里的野葡萄，也没见过智利秋天的金色杨树；绝对没有那么灿烂的金色。要是你能在春天看到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并且闻到智利波耳多树的清香，那该多好。要是你能看到在通往梅利皮亚那条路上，农民们怎样把金色玉米穗铺在屋顶，那该多好。

要是你能把脚浸到黑岛那洁净清冷的水里，那该多好，可是，我亲爱的西蒙诺夫，各国却在设置障碍，彼此为敌，在冷战中互相射击，人们也彼此隔绝。我们可以乘飞速的火箭接近天空，却不能在人类的友爱中握起手来。”

“事情也许会发生变化。”西蒙诺夫笑着对我说，向黑海诸神潜没的地方扔去一块白色的石头。

大群的猴子是苏呼米的骄傲。一个实验医学研究所利用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在那里养殖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猴子。我们进了研究所。在许多大笼子里，我们看到烦躁的猴子和呆头呆脑的猴子，巨型猴子和小型猴子，光秃的猴子和多毛的猴子，脸上若有所思的猴子和目光炯炯的猴子；还有忧郁的猴子和横暴的猴子。

有灰猴子，有白猴子，有三色臀部的猴子，有严肃高大的猴子，还有一雄多雌的猴子，这种猴子不让它的任何一只雌猴未经允许就吃食，只有在它庄严地吃完食物之后，才允许雌猴进食。

这个研究所在进行最先进的生物学研究。猴子的机体被用来研究神经系统、遗传，并用来精心探索生命奥秘和长寿之道。

带领两只幼猴的一只小母猴引起我的注意，一只幼猴总是跟着母猴，母猴充满人类那样的柔情抱着另一只。所长告诉我们，母猴宠爱的那只幼猴不是它的亲生儿子，而是养子。另一只母猴分娩时，刚生下这只幼猴就死了。这只母猴立刻收养了这只孤儿。从此以后，它把自己的母爱，把自己时刻怀有的温情投注在养子身上，比投注在亲生儿子身上的还要多。科学家们想，它有如此强烈的母性，也许可以带几只其他母猴的儿子，然而它一只只都拒绝了。因为，它的态度不单纯决定于生命力，而决定于母性意识。

亚美尼亚

我们飞往勤劳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我们抵达亚美尼亚。在遥远的南方，阿拉拉特山的雪峰俯视着亚美尼亚的历史进程。据《圣经》记载，这里是挪亚方舟停靠的地方，以便重新在陆地上垦殖。这是一个艰巨的事业，因为亚美尼亚多岩石和火山。亚美尼亚人为耕种这块土地，作出了无法描述的牺牲，还把他们的民族文化提高到古代世界的最高程度。社会主义社会使这个历尽苦难的优秀民族，得到惊人的发展和繁荣。土耳其侵略者屠杀并奴役亚美尼亚人达数世纪之久。荒地上的每一块石头，修道院里的每一块石板，都洒有一滴亚美尼亚人的鲜血。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是个奇迹。我参观过亚美尼亚有 5000 工人的纺纱厂，水利和电力的巨大工程，以及其他大规模的工业。我走遍了城市和乡村，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男人和女人。我只遇见过一个俄罗斯人，生活在皮肤黝黑的人的千万双黑眼睛中间的一个孤独的蓝眼睛工程师。他在领导塞凡湖的一座水电站。这个湖仅由一条河道排水，湖面相当开阔。宝贵的水蒸发掉了，缺水的亚美尼亚无法把这一资源收集起来加以利用。为了延缓蒸发速度，这条河被拓宽了。这么一来，湖的水位降低了，同时，随着河流水量增加，可增设 8 座水电站、几个新的工业企业、巨型铝厂、供应全国的发电厂和灌溉网。我永远不会忘记参观过的那座耸立在湖畔的水电站，那里清澈的湖水映着亚美尼亚令人难忘的蓝天。当新闻记者们问我对亚美尼亚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的印象时，我

强调地答道：

“我最喜欢的教堂是那座水电站——立在湖边的那座庙宇。”

我在亚美尼亚观看了许多东西。我认为，用火山凝灰岩建造的、像一朵红玫瑰那么和谐悦目的埃里温，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参观比纳坎天文台是令人难忘的，在这座天文台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用星星与的字。天体发出的搏动的光被观察到了；极精确的机械正在记下空间那颗星的搏动，像是在记录一种天空心电图。在那些图表上，我观察到每颗星都各有不同的、迷人的、搏动的字形，虽然我这个尘世诗人的肉眼看了莫名其妙。

在埃里温动物园，我直奔南美神鹰的笼子，可是我的老乡并不认识我。这只绝望的神鹰，这只思念我们山峦的大鸟，停在笼子的一个角落，秃着头，两眼带着疑虑重重的神色。我伤感地看着它，因为我就要返回祖国了，而它却要永远被囚禁在笼子里。

我和獾的奇遇则是另一回事。埃里温动物园是少数拥有一只亚马孙獾的动物园之一；这种奇怪的动物身躯像牛，脸上鼻子很大，眼睛很小。我应该承认，獾长得很像我。这不是什么秘密。

埃里温那只獾睡在紧挨池塘的它的圈里。它一见到我，就向我投来理解的一瞥，也许我们在巴西曾有一面之缘。动物园园长问我想不想看它游水，我答道，我走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喜欢看獾游水。他们给獾打开一扇小门；它高兴地看我一眼，就跳进水里去，像神话中的鱼尾马又像多毛的人鱼那样吁吁喘气。它把整个身体浮山水面；它猛地潜入水中，掀起一阵激浪；它高兴得如醉如痴地浮出水面，喷着响鼻，喘着粗气，随后就以飞快的速度表演起它那令人难以相信的游泳特技来了。

动物园园长对我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它这么高兴。”

中午，在作家协会宴请的午餐席上，我在致感谢词时对他们说到亚马孙獾的业绩，还告诉他们我对动物的热爱。我从不放弃参观动物园。

亚美尼亚作家协会主席在答词中说：

“聂鲁达有必要参观我们的动物园吗？他只要到作家协会来，各种动物就都能见到了。我们这里有狮子和老虎、狐和海豹、鹰和蛇、骆驼和鹦鹉。”

葡萄酒和战争

归途中，我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壮丽首都，不仅是实现许多梦想的地方，还是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的住处。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个节日。我一到莫斯科，就独自上街去，舒畅地呼吸着，用口哨吹起奎卡舞曲。我看着俄国男子的脸、俄国女子的眼睛和发辫、街角出售的饮食、民间纸花、玻璃橱窗，我寻找着新事物，寻找着使生活变得崇高的小事。

我再次去拜访爱伦堡。这位好朋友首先让我看一瓶挪威烧酒。商标上是一艘彩色大帆船。另一处有将这瓶酒带往澳大利亚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原产地那艘船起航及回港的日期。

我们谈起酒来。我想起在我青年时代，我们智利产的酒由于市场需要，也由于质量高超，开始销往国外。对我们这些穿铁路员工服装和过着吉卜赛式动荡不定生活的人来说，酒永远过于昂贵。

在世界各国，我感兴趣的是酒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从它由“人的脚板”

下产生起，直至装入绿玻璃瓶或刻花水晶瓶为止的全过程。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我爱喝里贝罗葡萄酒，用陶杯喝，杯子里会留下鲜血似的浓浓的酒迹。我记得匈牙利有一种叫做“牛血”的醇厚的葡萄酒，它的冲击会使吉卜赛人的小提琴发颤。

我的高祖拥有几个葡萄园。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村，是葡萄原汁产地。我从父亲和叔父们——堂何塞·安赫尔、堂霍埃尔、堂奥塞亚斯、堂阿莫斯——那里学会了辨别粗制的酒和已过滤的酒。他们偏爱从酒桶，也就是从特别的、不会收缩的心脏里倒出来的粗制酒，要我尊重这种偏爱太难了。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在提高了品味水平并品尝过盛宴的酒香之后，要我“归真返璞”实在费力。艺术也有同样情况：与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阿佛洛狄忒一起诞生的人，到头来却与大洋洲野蛮人的雕像生活在一起。

从前在巴黎，我在一家杰出人家品尝过一种佳酿。这是穆通-罗恩柴尔德牌的酒，其浓度无可指责，香味难以言传，口味极佳。这就是阿拉贡和埃尔斯·特里奥莱的家。

“这几瓶酒是我刚收到的，现在就打开请你。”阿拉贡对我说。

他接着告诉我有关这种酒的事。

德军当时长驱直入法国领土。法国最有才智的士兵——诗人和军官路易·阿拉贡，来到一个前哨据点。他率领一个护士分队。给他的命令是到达这个据点后，继续前进，到坐落在300米外的一座楼房去。法国阵地上有一位连长阻止了他。这位连长就是阿尔丰斯·德罗斯柴尔德伯爵，比阿拉贡还年轻，性子却跟阿拉贡同样急躁。

“从这儿你可过不去。”连长对他说。“德国人的火力太猛了。”“给我的指示是到那座楼房去。”阿拉贡坚决地说。

“我命令你不要往前走，留在这里。”连长答道。

我敢肯定他跟我一样，是在像手榴弹那样火花乱进的争论中，是在唇枪舌剑的对答中认识阿拉贡的。不过，争论持续不到十分钟。在罗思柴尔德和阿拉贡睁得大大的眼睛前面，一颗德军的迫击炮弹突然落到那座楼房上，它刹那间烟雾弥漫，化为一片瓦砾和灰烬。

就这样，由于一位罗思柴尔德的固执，救了法国头号诗人一命。

从此以后，每逢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日，阿拉贡都会收到几瓶穆通-罗思柴尔德牌的佳酿；这酒是上次世界大战中当过他的连长的那位伯爵的葡萄园出产的。

我现在是在莫斯科，在伊利亚·爱伦堡家里。这位杰出的文坛游击队员是纳粹主义的死敌，其危险程度如同一支有4万兵员的雄师，但他又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我从来弄不清他是更了解司汤达，还是更了解肥鹅肝。他欣赏豪尔赫·曼里克的诗，跟品尝格勒诺布尔苹果酒一样兴味盎然。他热爱整个法国——鲜美而芬芳的法国的灵魂和躯体。

战后，莫斯科曾谣传将出售一批神秘的法国瓶酒。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攻克一座有地窖的要塞，要塞里到处是戈培尔癡狂的宣传品和他从温柔的法国酒窖里抢夺来的葡萄酒。宣传文件和瓶酒被送往获胜军队的总司令部；红军对文件加以研究，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瓶酒。

酒瓶是极漂亮的玻璃制品，瓶上炫耀着出产日期的特制标签。瓶酒全部来自著名产地，酿制于最有名的葡萄收获季节。其中有布尔哥尼葡萄酒、博

纳葡萄酒、帕普新堡葡萄酒，都可以与金黄的普伊酒、玻璃似的武夫里酒、天鹅绒似的香贝丹酒相媲美。藏酒全部靠佳酿年份标签辨认。

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使他们把法国酒坊酿制的高级战利品送进酒店，以俄国酒的同等价格出售。作为限制措施，规定顾客只能购买数量有限的几瓶酒。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最好的主张，但是我们这些诗人，不管是哪儿的全都一样。我的文学界朋友人人都让亲戚、邻居、熟人去购买如此价廉物美的瓶酒。这些瓶酒一天之内就被人争购一空。

进入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爱伦堡家的瓶酒数量，我将不予披露。这就是我成为他的伙伴的原因，我们边谈论酒，边喝下戈培尔地窖里的一部分酒，以庆祝诗和胜利。

收复的宫殿

工商界巨子从没有邀请我到他们的深宅大院去，实际上我对此也始终没有多少兴趣。智利的民族消遣就是拍卖，许许多多人急匆匆赶去参加具有我国特点的、每周一次的拍卖活动。这种拍卖的深宅大院各有其归宿。一经拍板成交，最高出价人便关上栅栏，不让我，也不让我为其一分子的平民通过，于是，扶手椅、血淋淋的受难耶稣像、老派肖像画、盘子、勺子、在其中养育过多少懒散生命的床单，连同栅栏一起换了主人。智利人喜欢进去摸摸，瞧瞧，买东西的却很少。后来，这座建筑物给拆了，房子的碎片也拍板成交了。买主带走了眼睛（窗），肠子（楼梯），脚（地板）；最后，连棕榈树也分了。

欧洲则相反，这种大房子都被保存下来。我们有时能看到只有某个见过这些大房子的一丝不挂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幸运画家画的肖像，使我们这些目前在欣赏这种绘画和曲线的人感到喜悦。我们似乎还能发现种种秘密、暧昧的罪行、假发以及那些令人吃惊的密室，密室中装饰着挂毯的墙壁听过许多谈话；这类密室以后可以改装为有电子装置的小室。

我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如期到达。作家们把我带到他们集体的乡间别墅去休息，这座别墅坐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美丽树林中。罗马尼亚作家之家一度设在卡罗尔__的王宫里，这个白痴不符合王室法度的婚恋，成了全球的笑料。这座王宫现在用它的现代家具和大理石浴缸，来为罗马尼亚的思想和诗歌服务。我在王后陛下的床上睡得很香；第二天，我们到改作博物馆和疗养院的其他城堡去参观。陪我参观的有诗人叶贝梁亚努__、贝纽克__和拉杜·博雷亚努。在绿色的上午，在古老的王家花园内枞树林深处的树荫下，我们唱得跑了调，笑得像打雷，用各种语言把诗句喊出来。在法西斯君主制度下有过长期苦难经历的罗马尼亚诗人，是世上最勇敢的人，也是世上最快乐的人。那群杂耍艺人，都是像他们布满森林的疆土上的鸟儿似的罗马尼亚人，他们的爱国心不可动摇，他们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他们对生活爱得痴迷，对我来说这是个新发现。我能这么快就得到许多弟兄，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为了让罗马尼亚的诗人们开怀乐一乐，我对他们谈起从前参观过的另一座了不起的宫殿。那就是马德里的利里亚宫，是在西班牙内战方酣的时候。当时佛朗哥这个敌人正带着意大利人、库尔人和纳粹的卐字旗向前挺进，献身于屠杀西班牙人的神圣事业。在1934年和1935年间，我每次走过阿圭列斯街，总看到民兵攻占那座宫殿的场面。我从公共汽车上投去景仰的一瞥，

不是出于我对那些新的阿尔瓦公爵 的依附（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美洲人和半野蛮的诗人，他们压制不了我），而是它那肃穆的白色石墓似的庄严强烈吸引了我。

战争爆发时，那个公爵留在了英国，因为事实上他的姓是贝里克 。他带着最好的藏画和极珍贵的珠宝留在英国。想起公爵的这次出逃，我对罗马尼亚人提到中国解放时，靠孔庙和哲人遗骨发了财的孔夫子的最后一代子孙，也带上藏画、全套桌布和餐具逃往台湾；此外，还带走哲人遗骨。他在那里想必已经很舒服地安顿下来，靠展览圣物获取进项。

在那段日子里，“阿尔瓦公爵那座有历史意义的宫殿遭赤党党徒洗劫”，“毁灭的猥亵场面”，“让我们都来拯救这件历史的瑰宝吧”之类耸人听闻的消息，从西班牙传往世界各地。

我去看过那座现在已能让我进去的宫殿。那些所谓的劫匪，当时身穿蓝色工装，拿着枪站在大门口。第一批炸弹正从德军飞机上落到马德里。我请求民兵让我进去。他们仔细检查了我的证件。当我已经准备迈步进入那几个豪华的大厅时，他们慌忙拦住我，因为我没有在入口处的踩垫上把鞋蹭干净。地面确是亮得像镜子，我把鞋蹭干净才进去。墙上的空画框表示被带走的画。民兵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们告诉我，公爵在好几年前就已把这些画带往伦敦，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一个牢靠的保险柜里。大厅里仅有的重要东西是猎物陈列品——无数带角的兽头和各种小动物的口鼻部。最惊人的猎物陈列品，是用两只脚站在房间当中的一头大白熊，两只手臂向两边大大张开，制成标本的脸毗着满嘴的牙在笑。这是民兵们的宠物，每天早晨都要用刷子刷它。

我当然对那么多阿尔瓦公爵睡过的卧室感兴趣，佛兰德的鬼魂们天天夜里来胳肢他们的脚，弄得他们睡不安稳。他们的脚已经不在，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鞋。这个末代公爵从来没有扩充过他的画廊，可他搜罗的鞋却多得令人吃惊。有多层搁板的长玻璃橱柜高达天花板，摆放着成千双鞋子。有几个特制的像图书馆里使用的那种小梯子，也许是为了让人能够拿住后跟把鞋小心地取下来。我看得很仔细。有几百双十分精致的骑马靴，一部分是黄色的，一部分是黑色的。还有一些高靰皮鞋，配有点缀着珍珠母纽扣的长毛绒鞋罩。还有大量的套鞋、便鞋和尖翘头鞋，鞋里都塞着鞋楦，使之像是都有供驱遣的结实的腿和脚。如果把玻璃橱柜打开，这些鞋大概都会跟随公爵跑到伦敦去！你可以在摆满三四个房间成排的鞋子中尽情享受乐趣；这是一种视觉的享受，只能是视觉的享受，因为持枪的民兵们决不允许任何一只苍蝇去碰那些鞋。他们说：“这是文化。”他们说：“这是历史。”我想起那些穿麻鞋的不幸的小伙子，他们在索莫谢拉山可怖的峰峦上被法西斯捉住，被埋在白雪和烂泥里。

公爵的床旁有一帧镶在金框里的小画，画上的哥特体大写字母引起我的注意。哟！我想，这里印的一定是阿尔瓦家的世系图。我错了。那是拉迪亚德·吉卜林 的《如果》，这首平庸、虚伪的诗是《读者文摘》的先驱，据我判断，其智力水平超不过阿尔瓦公爵的那些鞋子。请英国国王原谅！

我想，公爵夫人的浴室准让人激动。它让人想起许多事情。尤其是普拉多博物馆 的那幅躺着的女人像 ，戈雅把她的两个乳头画得彼此分得很开，使人想到这位革命画家在量距离时，如何在每一吻之间加上一吻，直至两个乳房之间留下了一串看不见的项链。但是，我又错了。那只熊，那个西班牙轻歌剧中的鞋铺，那个《如果》，最后，我看到的不是神女的浴池，

而是一个冒充的庞贝式圆形房间，房间里有一口低于地面的浴缸，几只附庸风雅的雪花石膏制的小天鹅，几盏俗气可笑的落地灯；总之，是一部美国电影中供后宫妃嫔使用的那种浴室。

我怀着抑郁的失望心情正要离开时，得到了一个补偿——民兵们邀请我吃午饭。我同他们一起下楼到厨房去。四五十名公爵的听差、仆人、厨师和园丁，继续为他们自己，也为守卫这座深宅大院的民兵做饭。他们把我看作荣誉参观者。他们经过几番耳语，多次来回奔忙，在几张收据上签字之后，取出一个尘封的瓶子。那是一瓶贮藏百年之久的“基督之泪”，他们只让我喝几口。这是烧酒，是一种蜜和火的织体，热烈而又醇和。阿尔瓦公爵的这种泪水，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一周后，德国轰炸机朝利里亚宫扔下4颗燃烧弹。从我家的平台上，我看见那两只不祥鸟飞过。一片红光立刻使我明白，我正目睹那座宫殿的最后时刻。

“当天下午，我经过那片还在冒烟的废墟。”我对罗马尼亚作家们说了这段话，以结束我的故事。“在那里，我了解到一个动人心弦的事件的详情。在自天而降的燃烧弹下，在震撼大地的爆炸和越来越猛的火势中，那些高尚的民兵一心只想把那只白熊救出来。他们几乎在这种尝试中牺牲。屋梁倒了，一切都烧着了，那只涂了防腐剂的大野兽硬是通不过窗子和大门。我最后一次又在利里亚宫花园的草坪上见到它，它张着雪白的双臂，笑得合不拢嘴。”

宇航员时代

我又来到莫斯科。11月7日上午，我出席观看了人民、人民的运动员、前途似锦的苏联青年的游行。他们在红场上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前进。一位去世多年的人的犀利目光正注视着他们，这个人就是这种信心、这种欢乐、这种力量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利扬诺夫，不朽的列宁。

这次游行队伍里武器不多；但是，第一次展示了巨型的洲际导弹。我几乎可以伸手触及那几个巨大的雪茄，它们样子憨厚，却能把毁灭性原子武器带到本星球的任何地点去。

那天给两位从太空返回的俄国人授勋。我觉得自己离他们的翅膀很近。诗人的任务大部分是游逛；恰恰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在黑海岸边，在苏维埃高加索的山隘之间，我真想写一本关于智利的各种鸟的书。当两只人鸟——两位苏联宇航员——升上太空，使全世界惊奇得目瞪口呆时，我这个特木科诗人却一心要去游逛，要去写如此遥远的故土上的鸟儿，去写燕雀和鸛鹑、小嘲鸦和全翅雀、神鹰和小涉禽。我们大家都感到两位宇航员在我们头上飞行，便屏息用我们的眼睛仰望他们。

那天要给他们授勋。就在地球上，在他们身旁的是他们的亲属，是他们的来源，是他们人民的根。老头子们留有农民那样的大八字胡，老太婆们用乡野独特的大披巾披在头上。那两位宇航员跟我们一样，是来自乡野、工厂、办公室的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以苏维埃国家的名义，在红场迎接他们。后来，我们在圣格奥尔基大厅见到他们。有人为我引见古尔曼·季托夫，他是二号宇航员，一个很亲切的小伙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我突然问他：

“请告诉我，少校，当您在空间飞行并遥望我们的星球时，能看得清智利吗？”

这简直像是对他：“您该明白，您这次飞行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从空中看看智利。”

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发笑，而是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我记得南美洲有几条黄色的山脉。显然那几条山脉都很高。也许那就是智利。”

同志，那当然是智利。

恰好在社会主义革命 40 周年那天，我乘坐开往芬兰的火车离开莫斯科。当我穿过莫斯科城前往火车站时，一大束一大束发磷光的、蓝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橙色的灿烂焰火，高高地腾空而起，如同迸发出的欢乐，如同胜利之夜发给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交往和友谊的信号。

我在芬兰买了一个独角鲸的牙齿，然后继续我们的旅行。在哥德堡 ，我们登上将把我们送回美洲的那艘轮船。美洲以及我们的祖国，也要随着生活和时间一起前进。当我途经委内瑞拉前往瓦尔帕莱索时，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尼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宠儿、特鲁希略 和索摩查 的私生子，竟像派兵参战似地派了许多兵来阻止我和我的妻子下船。但是，在我安抵瓦尔帕莱索时，自由已经把这个委内瑞拉暴君赶走，这个威严的家伙也已经像患梦游症的兔子那样，逃到美国迈阿密去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以后，世界的发展加快了。谁能告诉我，在瓦尔帕莱索敲响我卧舱的门来迎接我的第一个人，竟会是我原先让他留在黑海游泳的小说家西蒙诺夫呢？

十一、写诗是一门手艺 诗的威力

我们这个战争、革命和澎湃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的时代得天独厚，把诗歌的繁荣推进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普通人在孤寂中，或是在公众集会的广大山民中，面对诗歌时，必然不是处于伤害人的境地，便是处于被伤害的境地。

当我写作最初几本抒发孤独感的诗集的时候，我从未想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竟会在广场、街道、工厂、教室、剧院和花园等处朗诵自己的诗。我几乎跑遍了智利的各个角落，在祖国的人民中传播我的诗。

我要说说我在“中央维加市场”——智利圣地亚哥最大的、也是人们最爱去的一个市场——遇到的事情。

黎明时，两轮运货马车、小货车、大车、卡车从饕餮的首都周围的小农场，把蔬菜、水果、食品络绎不绝地运到这个市场来。搬运工们（一个人数众多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低，往往打赤脚）挤满了“中央维加市场”附近各街区的咖啡馆、廉价旅店和低级小餐馆。

一天，有人坐小汽车来找我，上了他的车，我还没有确切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我的口袋里揣了一本我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在车上，他们向我说明，我是被请到“中央维加市场”搬运工工会去做报告的。

我走进那个乱糟糟的大厅，感受到了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在《夜曲》中表达过的那种寒意，这不仅仅因为是在隆冬季节，还因为那里的环境使我大吃一惊。约有50个人坐在箱子或临时搭的木板长凳上等我。有的人腰上系一条袋子当围裙，另外的人身上穿的是有补丁的旧汗衫，还有的人不顾智利7月的严寒而光着身子。我坐在一张把我和那些不寻常的听众分开的小桌后边。他们都用智利人特有的乌黑和凝然不动的眼睛看着我。

我记起了那位老拉斐特。对于脸上肌肉动也不动、目光呆涩、无动于衷的观众，拉斐特给他们起了个让我发笑的名字。有一次，他在盛产硝石的大草原对我说：“瞧，在大厅那边的尽头，有两个穆斯林靠在柱子上正看着我们。他们只要有一件带风帽的披风，就像是沙漠中冷漠的信徒了。”

对这些听众我该怎么办？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能使他们感兴趣？我拿不定主意，却隐瞒下要跑出去的愿望，拿出揣在身上的那本书，对他们说：

“不久前我就在西班牙。那里斗争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请听听我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诗。”

我应该说明，我从没有认为我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是本好懂的书。我力求写得晓畅，但是，那些纷至沓来、刻骨铭心的悲痛充满字里行间。

我确实只想略为朗诵几段诗，再加上几句话，就跟他们告别。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是这样。诗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我感到自己的诗句像落入听不见声息的深水一样，看到那些眼睛和黑眉毛如何紧随着韵律在发生变化，这时我明白我的书正在实现它的目标。我继续不停地念下去，我自己也被我朗诵的声音所感染，也被我的诗和那些被抛弃的人之间相互吸引的关系所震撼。

朗诵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我正要离去时，那些工人中的一个站了起来。他就是腰上系着袋子的人之一。

“我要代表大家感谢你。”他大声说。“我还要说，从来没有什么东西

叫我们这么感动过。”

说完这些话，他突然抽泣起来；另外几个人也哭了。我是同热泪盈眶的人们紧紧握别后走到街上去的。

一个诗人经过这种严寒和烈火的洗礼之后，还能一成不变吗？

每当我回忆蒂娜·莫多蒂，总像想抓一把雾霭那样费力。那是易碎的，几乎是无形的。到底我是了解她，还是不了解她呢？

她依然俏丽动人——一张苍白的鹅蛋脸，镶嵌在两片黑翅膀似的卷发中间；一对天鹅绒般温柔的大眼睛，透过流逝的岁月继续凝视着。迭戈·里维拉曾在他的一幅壁画上留下她的容颜，给她戴上植物和玉米穗的花冠。

这位意大利女革命者、杰出的摄影艺术家，为了要给苏联的平民百姓及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照相，很早就到了苏联。但是，她在苏联卷进了社会主义创造的不可抑制的律动中，把自己的照相机扔进莫斯科河，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的最平凡的工作。我在墨西哥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履行自己的誓言，我为那天夜里她的去世而深为痛惜。

那已经是 1941 年的事了。她丈夫是第五团著名的“卡洛斯少校”维托里奥·维达莱。蒂娜·莫多蒂在回家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出租汽车上。她知道自己心脏有毛病，但她不说，免得人家减少她的革命工作。她随时准备做没人愿意做的事，例如：打扫办公室，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熬夜写信或翻译文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她当过护理共和派伤员的护士。

她一生中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那时她还是流亡墨西哥的古巴卓越的青年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的女友。古巴暴君赫拉尔多·马查多从哈瓦那派了几名杀手去杀害这位革命领袖。一天傍晚，蒂娜挽着梅利亚的胳膊走出电影院时，后者在手提机枪扫射下倒下了。他们一起滚在地上，被打死的男友的鲜血溅了她一身，此时那几个杀手却在严密保护下逃之夭夭。更有甚者，保护罪犯的那些警方官员竟企图把杀人犯的罪名安在蒂娜·莫多蒂头上。

12 年后，蒂娜·莫多蒂的精力无声无息地耗尽了。墨西哥的反动派如同从前梅利亚被刺身亡时想给她横加罪名那样，又力图给她自己的去世硬加上丑闻的恶名。这时，“卡洛斯少校”和我正在为她那小得可怜的遗体守灵。眼看一位如此强壮、勇敢的男人遭受痛苦的煎熬，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用丑闻的恶名玷污已故的蒂娜·莫多蒂的企图，有如撒在伤口上的腐蚀性药物，使那只雄狮流血了。“卡洛斯少校”圆睁着发红的眼睛怒吼。蒂娜躺在她那流亡者的小小灵柩里，像是蜡制的。而我面对聚集在她房间里的所有的人的哀痛，只能无能为力地保持沉默。

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耸人听闻的污言秽语。他们把蒂娜叫做“莫斯科来的神秘女人”。有的报纸还说：“她之所以死，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我为“卡洛斯少校”强烈的痛苦所感动，决心做点什么。我与了一首向所有诽谤我们亡友的人挑战的诗，并把这首诗寄给所有的报纸，对于他们是否会发表，我根本不抱希望。然而，真是出人意外！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没有像头天预告的那样登出新的虚构的揭露材料，却在第一版上刊载了我写的那首令人心碎的悲愤的诗。

那首诗的标题是：《蒂娜·莫多蒂已经死去》。当天上午，我在墨西哥公墓朗诵了它，她的遗体就留在了那里，安卧在一块墨西哥的花岗石下面。那块花岗石上镌刻着我的几段诗句。

墨西哥的报纸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行反对她的文字。

那是许多年前发生在洛塔 的事。1 万名矿工去参加集会。洛塔这个煤矿区百年来贫困不堪，骚乱从无间断。那天，矿区的广场上挤满了矿工。政治家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午闷热的空气里飘荡着煤炭和海盐的气味。大海近在咫尺，黢黑的采煤坑道在海水底下延伸十几公里，那些矿工就在这样的坑道里挖煤。

现在，他们在当空的烈日下听演说。讲台很高，我从讲台上能看清那片黑色帽子和矿工服的海洋。最后一个轮到我讲话。当宣布我的名字和我的诗《唱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时，出现了不同一般的反应——一种我永志不忘的仪式。

一听到我的名字和那首诗的标题，密密麻麻的人群静悄悄地脱下帽子。他们脱帽，是因为继那种斩钉截铁的政治性讲话之后，就要朗诵我的那首诗了。我从高高的讲台上看到那规模浩大的摘帽子动作——上万只手整齐地放下来，形成一片难以形容的滚滚浪涛，形成静悄悄的大海上的一道巨浪，形成一片表达无声敬意的黑色浪花。

于是，我的诗激扬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战斗和解放的强音。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是那种身披黑斗篷的学生诗人，同当时所有的诗人一样消瘦和缺乏营养。我刚刚出版了诗集《晚霞》，体重比一根黑羽毛还轻。

我同我的朋友们一起走进一家简陋的下等酒馆。那是探戈舞风靡和流氓横行的时代。跳舞突然停止，探戈舞曲就像酒杯砸在墙上似地突然中断。两个臭名昭著的流氓在舞池当中龇牙咧嘴地互相辱骂。当一个上前打对方时，对方就退却，桌子后边的一群音乐迷也随着向后躲闪。那场面就像两个未开化的野人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跳舞。

我没有多加考虑就走上前去，不顾自己又瘦又弱，责骂他们：“不要脸的坏蛋，狼心狗肺的家伙，下贱的渣滓，别吵大家了，大家是来跳舞的，可不是来看你们演闹剧的！”他们吃惊地对看一眼，好像不能相信他们听到的话。身材较矮的那个以前曾是拳击手，他朝我走来，想揍死我。若不是打得极准的一拳猛地把这个猩猩般的汉子打倒在地，他准能达到目的。是他的对手终于决定给他一拳。

当这个战败的斗士被人像搬麻袋似地抬出去时，当坐在桌旁的人向我们递来酒瓶时，当舞女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的笑声时，那个打出致命一拳的大汉理所当然地想分享这次胜利的欢乐。但是，我严词责骂道：

“滚出去！你跟他是一路货！”

我的得意时刻不久就结束了。我们穿过狭窄的过道之后，看见一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堵住出口。这是另一个成了恶棍的拳击手——那个被我申斥的胜利者，他堵住我们的去路，等着进行报复。

“老子正等着你呐。”他对我说。

他轻轻一推，把我推往一扇门，这时我的朋友们都慌里慌张地跑了。我面对凶恶的刽子手，无依无靠。我急忙扫一眼，看看能抓到什么东西进行自卫。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沉重的大理石桌面，铁椅，我都举不起来。没有花瓶，连一根别人忘记带走的不值钱的手杖都没有。

“咱们谈谈。”那人说。

我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我还想到，他大概像面对一只小鹿的美洲豹，在吞下我之前要打量我一番。我知道，我所能进行的全部自卫，只不过是不要让他知道我的恐惧感。我回手也推他一下，但是动不了他一丝一毫。他简直是一堵石墙。

他忽然向后扬起头，他那双凶恶的眼睛换了一种神色。

“您是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吗？”他问。

“是的。”

他低下头，继续说道：

“我太不幸了！我现在就在自己衷心钦佩的诗人面前，而当面骂我坏蛋的竟是他！”

他两手抱着头，继续悲痛地说：

“我是个坏蛋，跟我打架的那个人是可卡因贩子。我们是世上最卑贱的人。可是，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纯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的未婚妻所给予的爱。堂巴勃罗，您看看她。您看看她的相片。我一定要告诉她，您亲手拿过这张相片。这事儿准会使她高兴。”

他把那张笑吟吟的少女的相片递给我。

“她是由于您，堂巴勃罗，是由于我们背诵过您的诗才爱我的。”

他没头没脑地朗诵起来：

“一个像我一样悲伤的孩子，跪着从你眼睛深处看着我们……”

这时门给撞开了。那是我的朋友们带着武装的援军回来了。我看见一张张惊讶的脸挤在门口。

我缓缓地走出门去。那人独自留下，连姿态都没变，继续朗诵道：“为了将要在她血管里燃烧的生命，我这双手不得不杀人。”他被诗打败了。

鲍尔斯驾驶的那架被派往苏联领空执行间谍任务的飞机，从难以置信的高空掉下去了。是两枚神奇的导弹击中了它，将它从云端击落。记者们纷纷奔赴人迹罕至的山间导弹发射场。

射手是两个单身小伙子。在那遍地是枞树、冰雪和河流的广阔天地里，他们吃苹果，下象棋，拉手风琴，读书，站岗。他们朝空中瞄准，保卫俄罗斯祖国的寥廓的天空。

人们用各种问题纠缠他们：

“你们吃什么？你们的父母是谁？你们爱跳舞吗？你们读什么书？”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年轻射手之一回答说他们读诗，还说俄国古典诗人普希金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是他们喜爱的两位诗人。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枚导弹飞得那么高，使敌人的威风扫地以尽，它还以某种方式携带着我那火热的诗中的一粒原子。

诗

……艺术品可真多……世上已经容纳不下……必须把它们挂在房间外边……书籍可真多……小册子也很多……谁能把书全读完？……如果书是食物……恰好又在食欲大振之时，我们就拿它们拌色拉，把它们切碎，调上作料……我们吃不下了……我们吃腻了……世界淹没在如潮的书里……雷弗迪对我说：“我已通知邮局，别把书送来。我没法把寄来的书打开了，没有

空地方。它们挨着墙往上爬，我怕出事，会砸到我头上的。”……大家都知道艾略特——他在成为画家，领导剧院，写出富有文采的评论以前，读过我的诗……我很高兴……没有人比他更理解我的诗了……直到有一天，他对我念起了他自己的诗，我却自私地跑开并反对道：“别给我念这些诗，快别念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艾略特隔着门把他的诗念给我听……我感到非常悲伤……苏格兰诗人弗雷泽——当时在场……他责骂我说：“你干吗这么对待艾略特？”……我答道：“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读者，他是我培养的。他连我诗里的皱纹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艺……他会画画……他会写散文……可是我要保住这个读者，维护他，像对奇花异草那样灌溉他……弗雷泽，你是理解我的。”……因为，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诗人们将会只向别的诗人公开自己的诗……每个诗人将拿出自己的小书，把它塞进别的诗人的口袋……他将把自己的诗……放在别的诗人的盘子里……克维多有一天把诗放在国王的餐巾底下……这确是值得的……或者在阳光明媚的广场上朗诵诗……或者让书籍在人们的手指间磨损，撕成碎片……但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公开自己的诗这种情况并不吸引我，并不使我入迷，并不使我受到激励，只能使我遁入大自然，去面对一块岩石和一朵浪花，远离出版社，远离书页……诗已经远离读者，与之失去了联系……必须把读者拉回来……必须在黑暗中摸索行进，去与人的心灵，与妇女的眼睛，与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会——他们在黄昏时分或在繁星满天的深夜需要诗，哪怕只读一行……我们走过的路。读过的东西和学会的知识，统统源自这种对新奇事物的探寻……只有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有朝一日从大街上，从沙地上，从落在同一片森林里已达千年之久的树叶上，捡起我们的东西……并且轻柔地捧着我们的造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诗人……诗将生存在这样的作品中。

与语言共存

我生于1904年。1921年，我的一首诗被收入一本小书。1923年，我的第一本诗集《晚霞》出版。现在这本回忆录，我写于1973年。一个诗人看到印制出来的书，犹如听到新生儿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头几声叫喊，令人激动。从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算起已经过了50年。

同一种语言打一辈子交道，把它颠来倒去，探究其奥秘，翻弄其皮毛和肚子，这种亲密关系不可能不化作机体的一部分。我跟西班牙语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口语有其他尺度；书面语却有料想不到的伸缩性。语言的运用有如衣服，又如人体的皮肤，袖子、补丁、排汗、血迹和汗迹，能显示一个作家的气质。这就是风格。我发现法国文化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把我们的时代弄得颠三倒四。它们对我永远有吸引力，但是总像有些衣服那样，我穿了不合身。智利诗人维多夫罗醉心于法国的时新式样，他巧妙地把这种时新式样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他的生存和表达方式。有时我觉得，他已超越了自己的模本。鲁文·达里奥闯进西班牙语诗坛时，大致也是如此，只是他更加彻底。鲁文·达里奥是一头声音洪亮的大象，撞碎他那个时代西班牙语的全部玻璃窗，以便让世界的风吹进它的领域。世界的风果真吹进去了。

语言数次把我们美洲人和西班牙人分开。但是，首先是有关语言的观念分成了两个体系。贡戈拉冷漠的美并不适合我们的纬度，然而西班牙的诗，

尤其是最新的西班牙的诗，无不具有贡戈拉式的怪味和繁丽词藻。我们美洲的地层是由盖满尘土的岩石、破碎的熔岩、混着鲜血的黏土构成的。我们不会雕琢水晶。我们大陆上刻意雕琢的诗人发出的声音是空洞的；只要一滴《马丁·菲耶罗》 的葡萄酒或一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浓得化不开的蜜，就足以使他们如同插着别处弄来的鲜花的花瓶，呆若木鸡地立在客厅里。

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语变得华而不实，它获得了宫廷的典雅，却失去了产生贡萨洛·德·贝尔塞奥 和那位伊塔大司祭 的狙犷力量，失去了仍然在克维多作品中燃烧的情欲。在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发生过同样的变迁。乔叟及拉伯雷的恣肆，遭到了阉割；具有彼特拉克风格的刻意雕琢的诗人，使翡翠和钻石发出璀璨的光彩，但是宏伟的源泉却开始干涸。

那昔日的源泉与当时人的整体素质，与他们的博大襟怀、丰富感情和豪放性格密切相关。

至少这是我曾遇到的难题，虽然我未曾以这样的方式提到过。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明友。

评论家必须忍受痛苦

《马尔多罗之歌》实质上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连载小说。可别忘记，伊西多尔·杜卡斯的笔名洛特雷亚蒙，取自连载小说家欧仁·苏的一部 1873 年写于沙特奈 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洛特雷亚蒙，比小说中的洛特雷亚蒙走得更远千百倍。他入地，欲为地狱的恶鬼；他上天，欲为堕落的天使长。马尔多罗在极度不幸中庆贺“天堂与地狱的婚礼”。愤怒、颂扬和极端痛苦汇成杜卡斯滚滚波涛般扫荡一切的诗风。马尔多罗的含义就是“巨大的痛苦”。

洛特雷亚蒙曾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他抛弃了自己的阴郁面目，还写序鼓吹一种新的乐观主义诗歌，但最终也没有写出这样的诗。在巴黎，死神带走了这位乌拉圭青年。但是，他那没有兑现的改变诗风的诺言和那没有完成的向善与健康的转移，却招来了许多批评。他的痛苦得到赞赏，而他向欢乐的转变却遭到谴责。诗人必须自我折磨和忍受痛苦，必须在绝望中生活，必须继续写绝望的歌。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阶级）的见解。许多人服从这一金科玉律，这些人一贯屈从那些不成文的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规范所强加的痛苦。这些无形的裁决判定诗人命该居陋室，穿破鞋，入医院和陈尸房。这样人人皆大欢喜，因为不用付出多少眼泪，欢乐就可以继续下去。

然而事物因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这些诗人突然领头为欢乐而造反。时运不济的作家，受磨难的作家，成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幸福仪式的组成部分。以往人们的趣味被巧妙地引向赞美不幸，把不幸看作巨大创造力的催化剂。不道德行为和苦难被认为是有益于诗歌创作的灵方。荷尔德林 有精神病而且一生不幸；兰波的生活漂泊不定而且满腹苦涩；热拉尔·德奈尔瓦 自缢在穷巷的一根路灯杆上。在那个世纪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仅使美激发出

来，还开辟了苦难的道路。他们的信条就是，这条荆棘之路应当成为精神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迪伦·托马斯曾是已开列的殉难者名单上的最后一名牺牲者。

奇怪的是，暴戾的老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起作用。这些人摸世界脉搏时不理睬它的鼻子，而世界的鼻子能闻到未来，所以必须在这里把脉。

有些评论家像葫芦科攀缘植物，伸出茎和卷须寻找最时髦的气息，生怕失去它。但是，他们的根仍然浸泡在过去的时光里。

只要我们诗人紧紧地和我们和人民在一起，坚定地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

“巴勃罗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位幸福的人之一。”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巴勃罗就是我，爱伦堡一点儿也没说错。

因此，一些在期刊上撰文的著名随笔作家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并不使我吃惊，显然我的私事本不应成为评论题目。我明白，我可能得到的幸福使许多人不舒服。可事实是，我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我问心无愧，然而理智上却感到不安。

那些看来对诗人的小康生活水平忿忿不平的评论家，我倒劝他们要为诗集的出版、销售并完成给评论界提供关注的材料的使命而感到欣慰。他们应该高兴的是，著作权使作家得到稿酬，另外至少某些作家可以靠自己的神圣工作度日。评论家对这种自豪感应该加以宣扬，而不要从中作梗。

因此，不久前当我看到一个青年评论家——才华横溢的教士——为我写的一篇短文时，我觉得他的才华并未使他稍许脱出谬误的窠臼。

据他看来，幸福感削弱了我的诗。他给我开的药方是痛苦。根据这种理论，患阑尾炎准能产生精彩的散文，得腹膜炎也许会产生绝妙好诗。

我要继续用我所拥有的素材并以我自己为素材进行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活人、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诗的短句和长句

作为积极的诗人，我同自己的骄傲作过斗争。因此，现实与主观之间的斗争，能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解决。我并不企图规劝别人，不过我的经验可能对别人有所助益。让我们来粗略地看看结果。

我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二者竞相出现。在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发言权，但我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

你若觉得我的话很自负，那你是对的。说到我的自负，那是怀着不朽的爱在漫长岁月里从事一门手艺的工匠所具有的那种自负。

但是，有件事我很满意，那就是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至少在我的祖国，使人们尊重诗人的手艺，敬重写诗的技能。

我开始写作的时代，有两类诗人。一类诗人是大阔佬，他们受尊敬是因为有钱，钱财帮助他们取得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声望。另一类诗人是诗坛的散兵游勇、酒店里的豪饮之徒、神魂颠倒的疯子、苦恼的梦游症患者。还有一

种情况我们也不要忽略，那就是被绑住手脚的作家们的困境，他们像拴在铁链上划船的苦役犯，被拴在政府机关的硬板凳上。他们的梦想几乎永远被堆积如山的盖过戳的公文，被对上司和对尴尬处境的恐惧所窒息。

我初涉世事时，比亚当更加一无所有，但是决心保持我的诗歌的真诚。这种不妥协态度不仅对我自己有价值，也使那些傻瓜不再嘲笑。事后，这些傻瓜凡是有勇气和有良知的，都跟善良的人们一样，在我的诗所唤醒的根本事实面前折服了，而那些居心不良的傻瓜则对我心怀畏惧。

于是，大写的诗赢得了尊重。不仅是诗，连诗人也赢得了尊敬；所有的诗和所有的诗人都是如此。

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我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我说的别的话都可商榷，但是我说的这一点却是不容抹煞的史实。

诗人的死敌想利用的许多论据，都已毫无用处。在我年轻时，他们把我叫做饿鬼。现在，仇视我的人却想方设法要别人相信，我是个有钱有势的人，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尽管我没有这样的财富，但我巴不得有，目的之一就是使他们更加不舒服。

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作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作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没有活力。但是，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同样缺乏活力。纯粹无理性的诗人，只能被他自己和爱慕他的人所理解，这种情况相当可悲。仅仅是理性主义者的诗人，连蠢驴都能理解，这也十分可悲。诗的方程式既没有数值的概念，也没有上帝或魔鬼所谕示的成分；相反，这两位极重要的人物在诗歌内部展开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会儿此方得胜，一会儿彼方得胜，不过，诗绝不会吃败仗。

诗人的手艺显然正在被滥用。初出茅庐的男女诗人纷纷出笼，以致一时间人人都似乎成了诗人，而读者却渐渐消失了。有朝一日我们为了寻觅读者，将不得不骑着骆驼穿过沙漠去远征，或是乘坐宇宙飞船在空中巡航。

诗是人的深切爱好，由此产生礼拜仪式和赞美诗，也产生了宗教的内容。诗人敢于面对种种自然现象，在远古时候，他们给自己加上祭司称号以维护其志向。因此在现代，诗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诗，接受在大街上和群众中所得到的地位。当今的平民诗人，仍然是最古老的祭司中的一员。诗人从前要与蒙昧妥协，现在则应当表达光明。

独创性

我不相信独创性。它是我们这个飞速崩溃的时代制造出来的又一个偶像。我相信通过艺术创作的任何语言、任何形式、任何立意所表现出的个性。但是，胡言乱语的独创性是一种时髦发明和竞选骗术。有些人希望彼选为他的祖国、他的语言或全世界的头号诗人。于是，他们为寻找选民而奔走，辱骂他们认为可能与之争夺桂冠的人，这样，诗就变成了骗人把戏。

但是，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方向，把握有助于发展诗人优秀品德的大自

然、文化、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效奥维德”，“效卢克莱修”。

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毫无疑问，激情是我早期诗集的主要部分，而诗人若不用自己的诗响应心灵的温柔或愤怒的召唤，那就太糟了！不过，有了40年之久的历练，我相信诗作一定能更有效地驾驭激情。我信奉有引导的自发性。为此，诗人的口袋里必须永远有储备，以便应急。首先，要储备通过观察事物的外表、本质、语言、声音、形状等等获得的印象，即观察像蜜蜂那样从你身旁掠过的那些东西。必须立刻捕捉住它们，并且藏到口袋里去。我在这方面是很懒的，不过我知道我提供的是个好建议。马雅可夫斯基有个小笔记本，不断往本子上记东西。激情也可以储备。激情如何保存？办法是当激情产生时，我们就要意识到它，然后面对稿纸，我们就能比激情本身更鲜明地在脑海里重现我们的那种意识。

迄今为止，我在自己相当多的作品中一直力图证明，诗人能写别人给他指定的题材，写某个社会集体所需要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古代杰作都是按明确要求写成的。《农事诗》是为古罗马农村的耕作做宣传。诗人可以为某大学或某工会，为某行会和某机构写作；决不会因此而失去自由。神奇的灵感和诗人与神的交流，都是离不开个人功利的发明。在创作的关键时刻，因受阅读的影响和外界压力，作品可能部分地融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突然中断这些略带理论性的思考，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生活。那时画家们和作家们都满怀激情默默无闻地进行创作。画里和诗里无不回荡着秋的抒情气息。他们每个人都更不守秩序、更散漫、更狂放不羁。智利的社会生活深受震撼。亚历山德里发表了颠覆性演说。在盛产硝石的荒原，将开创本大陆最重要的人民运动的工人正在组织起来。那是卡洛斯·比库尼亚和胡安·甘多尔福等人开展斗争的神圣日子。我一下子接受了大学生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体系。我最喜欢的书是安德烈耶夫写的《萨什卡·日古列夫》。别的人则读阿尔志跋绥夫的色情小说，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一系列后果，如同今天出现的存在主义色情作品。知识分子们躲到酒店里去了。陈酒使贫穷闪现金色的光彩，直闪到第二天清晨。极具才华的诗人胡安·埃加尼亚，一辈子都是疯疯癫癫的。据说，他曾继承了一笔财产，却把全部钞票扔在一所弃置的房子的桌上。他的酒友们白天睡觉，晚上到酒桶里找酒喝。但是，胡安·埃加尼亚月光似的诗不过是我们《抒情森林》里没人知道的一阵颤抖。《抒情森林》乃是莫利纳·努涅斯和O.塞古拉·卡斯特罗给一本出色的现代主义诗歌选集加的富有浪漫情调的标题。这是一本包罗全面的集子，满纸皆是崇高气概和慷慨精神。这是以无边的空虚和纯洁的光辉为标志的混乱时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那位新文学独裁者，他名叫阿利里奥·奥亚尔顺，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他是个苍白瘦削的波德莱尔模仿者，是个集多种品质于一身的颓废者，是个智利的巴尔瓦-雅各，神情苦恼，面如死灰，俊美而又性情怪僻。他身材颇长，说话声音低沉。他发明以猜字谜的方式提出美学问题，这种方式在我们文学界的某一部分也是很独特的。他说话时提高嗓门；前额像智慧神堂の黄色圆顶。例如，他就说过“圆形之圆”，“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狄俄尼索斯精神”，“黑暗之黑暗”之类的话。但是，阿利里奥·奥亚尔顺一点儿也不蠢。他身上集中了

一种文化的天堂和地狱两个方面。他是个为了理论上自圆其说不惜扼杀其精髓的世界主义者。据说，他为了在一次打赌中取胜，才写下他仅有的一首诗；但是我不明白，所有的智利诗歌选集为什么都没有收那首诗。

酒瓶和船头雕饰

圣诞节已日益临近。每过一个圣诞节，我们就向 2000 年迈进一步。为了将来的幸福，为了明天的和平，为了普遍的公正，为了 2000 年的新年钟声，我们当代诗人们斗争过，也歌唱过。

在 30 年代那个时候，索克拉特斯·阿吉雷那个精明的杰出人物，曾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馆的上司，有一年的 12 月 24 日，他要求我到他家装扮圣诞老人。我生平搞糟过许多事情，但是没有一次像装扮圣诞老人那次搞得那么糟。我脸上用来做胡子的棉花掉了，分送玩具时又错得一塌糊涂。我那智利南方人从小就显得龃声龃气的、带鼻音的、很特别的嗓音，可怎么伪装呢？我施了一个小计：我对孩子们讲英语，孩子们却用几双黑眼睛和蓝眼睛盯着我，比有教养的儿童显出更多的不信任。

谁会想到，这些孩子中竟有一个会成为我最喜爱的朋友，会成为杰出的作家，还会成为我最好的传记之一的作者呢？我说的是玛加丽塔·阿吉雷。

我家里收集了大大小小许多玩具，没有这些玩具我就没法活。不玩的孩子不是孩子；不玩的大人就永远失去了活在他心中的童心，这童心却是他十分需要的。我也像造玩具那样建造我的房子，并且在这所房子里从早玩到晚。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玩具。我仅仅抱着消遣的科学目的，用毕生时间收集这些玩具。我要为小孩子和其他年龄的人描述这些东西。

我有一艘放在一个瓶子里的帆船。说实话，我拥有不止一艘船。那是一个真正的船队。它们有写好的船名、桅杆、船帆、船头和锚。有几艘船来自远方，来自别的不重要的海域。最漂亮的船之一是从西班牙送来给我的，作为付给我一本颂歌集的版税。主桅顶上挂着我国国旗，旗上缀着一个孤零零的小星。不过，几乎所有其余的船只，都是卡洛斯·奥朗德尔先生制作的。奥朗德尔先生是位老海员，他为我仿制了许多从汉堡、萨勒姆、布列塔尼沿海一带前来运载硝石和到南方海域捕鲸的壮观的著名船只。

当我沿智利漫长的公路南下，去寻访住在科罗内尔的那位老海员时，我在南方城市煤炭和雨水的气味中，真的进入世界上最小的船坞。在他的小客厅、饭厅、厨房、花园里，整整齐齐堆着要放进倒掉了皮斯科酒的透明酒瓶里的各种部件。堂卡洛斯用他的魔笛触碰船头和船帆，前桅帆和中桅帆。连港口最小的一缕烟，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一件创作，变成一艘新的瓶装船，崭新又闪闪亮，准备驶往幻想的大海。

在我的收藏品中，出自科罗内尔那位航海者谦虚之手的瓶装船，在安特卫普或马赛买来的其他船只中显得很突出。因为，他不仅赋予那些船只以生命，还凭自己的知识给它们配上说明，给它们贴上标签，上面写明船名，并对该模型船的功绩、迎着风浪的航行、张着我们再也看不到的帆颠簸在太平洋上运送货物等情况加以说明。

我拥有诸如强大的“波托西号”和壮丽的“普鲁士号”那样著名的瓶装船，后者是汉堡的船，1910 年在芒什附近的英吉利海峡中失事。“玛丽亚·塞

莱斯特号”从 1882 年起成为明星，成为奥秘中之奥秘，奥朗德尔大师为我制作了两个它的模型。

我不准备披露处于它自己透明状态中的航行秘密，我说的是，那些微型船只是如何进入那亲切的酒瓶的。我是个职业骗子，为了蒙蔽的目的，我在一首颂歌里详细描述了不可思议的建造师的缓慢而细致的工作，还讲述了他们如何进出于那些海员的酒瓶。但是，这个秘密依然如故。

船头雕饰是我的最大的玩具。跟我的许多东西一样，报刊上登过这些船头雕饰的相片，还善意地或恼怒地进行过争论。凡是怀着善意玩过这些玩具的人，都会心地笑了，并且说：

“真是个疯子！瞧他收集的都是什么！”

居心不良的人看事情就不同了。这种人之一为我的收藏品，也为我在黑岛的房子上升起一面有白鱼的蓝旗而感到酸溜溜的，他说：

“我不挂自己的旗。我也没有船头雕饰。”

可怜虫像嫉妒别人有陀螺的孩子那样痛哭流涕。与此同时，我那些来自海上的船头雕饰，却因被嫉妒叫醒而高兴得笑起来。

确实应该谈谈船头雕饰。它们是胸像，是海的雕像，是迷途的海洋的化身。造船时，人们都想用一种优越的含义抬高自己的船头；在古代，人们给船安上木头雕的飞禽形象、图腾鸟和神话里的野兽。后来在 19 世纪，捕鲸船雕上了象征性形象——半裸的女神或头戴弗里吉亚帽的共和派妇女。

我有男性和女性两种船头雕饰。最小最讨人喜欢的那个船头雕饰叫做玛丽亚·塞莱斯特，萨尔瓦多·阿连德多次想从我这里夺走。它原属于一艘法国船，这艘船很小，可能只在塞纳河里航行过。它色彩暗淡，由橡木雕成，由于经历了多年的航行，它永远变成棕褐色的了。它是个小妇人，身上穿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漂亮服装，雕得像被风吹得飘飘欲飞。在它双颊的酒窝上方，瓷珠镶成的眼睛望着天际。说来也怪，这双眼睛每年冬天都流泪，谁也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这种棕褐色木头也许有微孔，能吸收潮气。这两只法国眼睛确实在冬天会流泪，我每年都看见珍贵的眼泪从玛丽亚·塞莱斯特的的小脸上滚落下来。

也许是基督教或异教的圣像，唤醒了人类的宗教感。我的另一个船头雕饰若干年间都处在最适合它的地方，斜着身体面对海洋，如同它在船上航行那样。但是有一天下午，我和马蒂尔德发现，黑岛几位虔诚的女教徒像要采访我的新闻记者常于的那样，跳过围栅，跪在花园里的船头雕饰面前，她们点燃的不少支蜡烛把船头雕饰照亮了。一种新的宗教也许已经诞生了。虽然这个又高又端庄的船头雕饰极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我们不得不提醒这几个女教徒，不要如此无知地继续膜拜一个海上妇女形象，它曾在我们罪孽深重的星球的罪孽最深重的汪洋大海上航行过。

从此，我把它从花园里搬走，现在它离我更近了，就放在壁炉近旁。

书籍和海螺

穷藏书家有无数感受痛苦的机会。书籍不会从他手中溜走，却会驾着价格的翅膀，像鸟儿那样越过他头顶飞往空中。

但是，经过反复探寻，珍珠出现了。

记得 1934 年在马德里 ,当我提议分期付款每月 20 比塞塔购买价格为 100 比塞塔的古版贡戈拉著作时 ,书商加西亚·里科表现的那种惊讶。书价不高 ,可我没有那么多钱。整整半年里我准时按期付款。这是弗本斯版本。这位 17 世纪的佛兰德出版家 ,用无与伦比的漂亮字体印制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名家著作。

我只爱阅读那种版本的克维多著作 ,其中的十四行诗像铁甲战舰那样摆开作战的阵势。后来 ,我钻进了法国和英国的大森林般的书肆区 ,跑遍郊区陡峭崎岖小径般的旧书店 ,或者大教堂中殿似的大书店。出来时我的双手满是尘污 ,不过 ,有时我会得到一件宝藏 ,至少我会得到自以为发现宝藏的乐趣。

有现金的文学奖 ,有助于我购得某些贵得出奇的版本。我的藏书室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古本诗集在藏书室里熠熠生辉 ;由于我对博物学的喜爱 ,藏书室里到处是色彩鲜明的漂亮的植物学书籍 ,还有有关鸟、昆虫、鱼的书。我收集到妙不可言的游记 ,伊瓦拉印制的不可思议的《堂吉诃德》 ,用精美的博多尼活字印制的八开本但丁著作 ,甚至经删改供法国王子阅读的印数极少的一部莫里哀作品。

但是 ,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 ,实际上是我的海螺。海螺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的妙不可言的细瓷 ,加上多姿多彩的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实用的外壳——使我心旷神怡。

自自古巴软体动物学家堂卡洛斯·德·拉·托雷 ,把他收藏的最精美的标本赠送给我以后 ,成千扇海底知识的小门为我打开了。此后 ,我游遍了世界各大海洋 ,所到之处我都窥探并寻觅海螺。可是我必须承认 ,在巴黎这个大海的一道道浪涛间 ,我发现了更多的海螺。巴黎已经把海洋里的全部珍珠母 ,都搬到它的博物商店和“跳蚤市场”里去了。

在大都市的马尾藻底下 ,在破灯泡和旧鞋之间 ,比伸手到维拉克鲁斯或下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岩石里去 ,更容易找到外形精美绝伦的彩线榧螺。可以出其不意地捉住一种鲁舍螺伸出像水写成的诗句那样的石英长矛。我从海里拽出壳上缀满珊瑚刺的大牡蛎时 ,感到眼花缭乱 ,谁也不能使我摆脱这种激动情绪。更远处 ,另一种大牡蛎半开半闭 ,它壳上雪白的刺 ,如同贡戈拉岩洞里的石笋。

这些猎获物中有几种可能算得上文物。记得在北京博物馆里 ,主人打开那只存放中国海洋软体动物标本的最神圣的箱子 ,把仅有的两个奇异宽肩螺的标本之一送给我。我因此才得以珍藏那件不可思议的宝物 ,大海通过这种珍品 ,把迄今仍然存在于该地区的庙宇和宝塔的建筑风格赠送给中国。

我花了 30 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书籍。我的书架上摆着我爱不释手的古版书和其他书籍 ,其中有克维多、塞万提斯、贡戈拉等作家的作品的初版版本 ,还有拉弗格、兰波、洛特雷亚蒙等诗人的著作。我觉得 ,这些书的每一页都留下了我所喜爱的诗人们触摸过的痕迹。我有伊莎贝尔·兰波的手稿。在巴黎 ,保罗·艾吕雅把伊莎贝尔·兰波写给她母亲的两封信送给我做生日礼物 ,这两封信是在那位流浪诗人 在马赛医院截去一条腿时写的。这可都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芝加哥贪婪的书商垂涎的珍宝。

我在世上走过许多地方 ,我的藏书因而大大增加 ,远远超过一个私人藏书室的规模。有一天 ,我把花 20 年时间收集的大量海螺收藏品 ,和怀着最大的热情从世界各国选购来的我最喜爱的 5000 册图书 ,全部赠送出去。我把这

些东西赠给我国的大学。它们被当作不同凡俗的礼物接受下来，一位校长还宣读了美好的致词。

任何胸怀坦荡的人大概都会认为，我的这种馈赠，在智利一定会被愉快地接受下来。然而，也有心怀叵测的人。一个官方评论家写了几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强烈抗议我的举动。他狂叫道，何时才能遏止国际共产主义？另一个先生在国会发表激烈演说，反对大学接受我那些极好的今版书和古版书；他威胁要把接受馈赠的国立院校的津贴砍掉。那个评论家和那个国会议员一唱一和，在智利这块小天地的上空，掀起了一股寒流。那位大学校长脸色大变，来回奔走于国会走廊。

从那时起 20 年已经过去，确实再没有人去观看我的图书和我的海螺了。看来它们都已返回书店和大海里去了。

碎玻璃

我在长期远行之后，于 3 天前回到我在瓦尔帕莱索的家中。墙上出现了伤痕似的大裂缝。打碎的玻璃在房间的地上形成一块令人看了难受的地毯。几个钟也掉在地上，执拗地指着地震发生的那个时刻。马蒂尔德现在用扫帚扫掉多少美好的东西；大地的震动使多少稀罕的物品转眼间变成垃圾。

我们必须进行清扫、整理，一切都重新开始。在一片零乱中找到纸张是很费事的；以后要找到思想，就更困难了。

我新近做的两件事是：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按古代格律写一首爱情长诗——这首诗还没有完成。

让我们开始吧，情诗，从碎玻璃中起来吧，吟唱的时刻已经来临。

帮助我吧，情诗，帮助我把完整性恢复，帮助我去歌唱痛苦。

世界上确实还没有肃清战争，还没有涤净血污，还没有消除仇恨。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暴徒们在世界的镜子里照出自己的形象，他们的嘴脸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丑恶。这也是事实。

我仍然相信世间有爱。我坚信，人类识得了痛苦、流血和打碎玻璃，终将建立起相互理解。

我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

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外省人。她出生于南方的城市奇廉，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以农民的陶瓷制品闻名遐迩，不幸的是它以可怖的地震而尽人皆知。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里，把我要对她说的话全部倾吐了。

这些诗句也许表明了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地和生活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件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我们把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但不是在夏天，因为这时被阳光晒干的海岸，显得像沙漠那样发黄，而是在冬日，这时是奇特的开花季节，海滨随着雨水和寒冷的降临而披上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外衣。有几次，我们从粗犷、荒凉的大海前往乱糟糟的圣地亚哥城，在那里共同忍受别人过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生活。

马蒂尔德以高昂的歌喉唱我的歌。

我把我所写的和我所拥有的东西，全部奉献给她。东西不多，可她感到满意。

现在，我远远地看着她把小巧的鞋子踩进花园的泥里，然后又把她那纤巧的双手伸入草本深处。

她用她的脚、手、眼睛和声音，从地里把各种各样的根，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种各样的芳香的幸福果实，全部带来给我。

星星的创造者

一名男子在巴黎一家饭店的客房里睡觉。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夜猫子，所以当我说你，中午 12 点那个人还在睡的时候，你决不会感到惊讶。

可是，他不得不睁开眼来。因为左边的墙突然坍倒。随后，正面的那堵墙也倒了。这不是炸弹炸的。几名大胡子工人手提尖锤从刚挖开的豁口进来，对还在睡觉的人骂道：

“Eh, leve-toi, bourgeois！__跟我们一起干一杯！”

香槟酒开瓶了。进来了一位市长，胸前挎着一条三色饰带。一个铜管乐队和谐地奏起《马赛曲》。何以出现如此不寻常的情况呢？是因为当时正在铺设的巴黎地下铁路两条路线的连接点，恰好就在那位耽于梦乡的人的卧室下面。

自从那位男子把这件往事告诉我以后，我拿定主意要成为他的朋友，或者说要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成为他的学生。由于他遇到许多如此不同一般的事情，我又不愿错过其中任何一件，便跟随他走遍几个国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也为那位杰出人物所吸引，采取了与我相似的态度。

费德里科和我一起坐在紧挨着马德里库柏勒女神__喷泉的信使啤酒店里，这时那位巴黎的耽于梦乡的人突然闯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来。他虽然看似见多识广，来到时却是面如土色。他又遇到难以言传的事情。他刚才在马德里一个简陋住所里，想把自己的乐谱理整齐。我忘了说，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出色的作曲家。他出什么事了？

“一辆汽车停在我住的饭店大门口。我听见有人上楼梯，走进我隔壁的房间。后来，那个新房客打起鼾来。起初鼾声较轻，后来四周都震颤起来。衣橱、墙壁都在那个惊人的打鼾者有节奏的鼾声冲击下晃动。”

无疑，那准是一只野兽。当鼾声山洪般爆发出来时，我们的朋友再没有任何疑问了，肯定是那头“野公猪”。在其他国家，它的喧嚣声曾使许多会堂震颤，使公路受阻，使大海扬波。这个岌岌可危的星球，这个威胁欧洲和平的可憎的魔鬼，将会出什么事呢？

他每天都把“野公猪”干的新的可怕事件告诉我们——费德里科、我、拉斐尔·阿尔韦蒂、雕刻家阿尔韦托、富尔亨西奥·迪亚斯·帕斯托尔、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我们都热切地迎接他，都不安地与他告别。

后来有一天，他面带原有的乐呵呵的笑容来了。他对我们说：

“叫人胆战心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德国人齐柏林伯爵__同意运走‘野公猪’，把它扔到巴西大森林里去。参天大树会养活它。它不可能一口气喝下亚马孙河何水。它可以在那里继续用那吓人的鼾声，把大地吵得头昏脑胀。”

费德里科听了他的话哈哈大笑，激动得紧闭双眼。这时，我们的朋友又说起发电报的事，那次报务员说服他决不要发电报，而要发信，因为人们收到这种神速的邮件会非常惊慌，有的人没等打开电报，就心肌梗塞而死。他还告诉我们，他那次在伦敦因好奇去观看拍卖“纯种”马；只因他偶然举手向一位朋友打招呼，拍卖商便把阿加汗已出价 9500 英镑认购的一匹母马，以 10000 英镑的价格卖给他。

他最后说：“我只好带着那匹母马到我下榻的饭店去，第二天就把它退还了。”

如今，这位寓言作家不能讲“野公猪”的故事，也不能讲别的故事了。他在智利这块土地上溘然长逝了。这位圆滚滚的智利人、心胸坦荡的音乐家、许多无与伦比的故事素材的挥霍者，在实际生活中名叫阿卡里奥·科塔波斯。在这位不会被人忘却的人的葬礼上，由我致悼词。我只说了一句：“今天，我们把一位光辉的人物交给黑暗，他每天赠给我们一颗星。”

杰出的艾吕雅

我的同志保罗·艾吕雅不久前与世长辞了。他是如此坚强、结实，面对失去他这一事实，我感到既痛苦又困难。他是个蓝眼睛、脸色红润的法国诺曼底人，体质看似强壮实为柔弱。1914 年战争期间，他两次中过毒气，使他终生落下一双颤抖的手。不过，艾吕雅使我始终想到天蓝色，想到深沉的止水，想到认识自身力量所显示的柔顺。保罗·艾吕雅的诗清晰明澈得像打在窗玻璃上的滴滴春雨，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个厌恶政治的诗人。其实并非如此。他和法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理性及斗争，有强有力的联系。

保罗·艾吕雅是坚定的。他是一座法兰西塔，具有热情而清醒的头脑，不同于通常的那种热情的愚蠢。

我们曾在墨西哥结伴同行，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他濒临一种绝望的悲观境地——他总是在心灵中为悲哀保留一个宁静的角落，悲哀与才情在他身上表现得同样充分。

那时他心力交瘁。我说服这位彻头彻尾的法国人，把他拉到那遥远的国度去，而在那里，就在我们安葬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那天，我因患危险的血栓性静脉炎而病倒了，这种病使我困在病榻上达 4 个月之久。他感到孤独——没有一线光明的孤独，像个无依无靠的盲人探险者。他谁都不认识，没有一家的大门为他打开。丧妻的哀痛压在他心头，他在那里感到自己形单影只，而且没有爱。他对我说：“我们生活需要有人陪伴，我们需要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孤独实在不可取，真是作孽啊。”

我打电话叫来我的朋友们，我们硬拖他出门走走。他们数落着带他跑遍了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就在街道的一个拐弯处，他遇上了爱神，遇上了他最后那位爱人——多米尼克。

对我来说，撰文悼念保罗·艾吕雅是十分困难的。我仿佛仍然看见他活在我身旁，他那双视野开阔、目光深远的眼睛，似乎仍然炯炯有神，闪着如电的蓝光。

他生长于法兰西土地，桂冠和根在那里交织成它流芳百世的遗产。他的

躯体由水和岩石构成，全身缠满老藤，藤上鲜花簇簇，光彩照人；藤上还有鸟巢，传出透明的歌声。

“透明”是个确切的词儿。他的诗是晶莹的水晶，是他吟唱之河里凝然不动的水流。

诗人心中充满至高无上的爱，充满法国南方人的纯真热情。在法国横遭战祸的日日夜夜，他把心奉献给祖国，从心中喷出坚决战斗的烈火。

于是，他顺乎自然地进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对艾吕雅来说，入党就是以自己的诗和生命确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

决不要以为艾吕雅的政治家气质逊色于诗人气质。他的远见卓识和精辟的辩证推理，往往令我叹服。我们一起研讨过许多事情、人物和当代问题，他的高明见解使我永远受益。

他没有在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中迷失方向，因为他不是模仿者，而是创造者，正因如此，他把清醒和智慧的子弹射向超现实主义的僵尸。

他是我朝夕相处的至友，现在我失去了他那成为我的面包的一部分的温情。他带走的一切，谁也无法为我填补，因为他那积极的手足之情，是我平生最珍贵的享受之一。

法兰西塔哟，我的兄弟！我俯身看着你紧闭的眼睛，它们仿佛仍在向我展示你早已确立在大地上的光辉和伟大，质朴和正直，善良和纯真。

皮埃尔·雷弗迪

我从不认为皮埃尔·雷弗迪的诗富有魅力。“魅力”这个词儿是一个时期的口头禅，像集市上魔术师的帽子，野鸽子不会从这种帽子里钻出来，展翅高飞。

雷弗迪是个注重实际的诗人，他列举并涉及了天地间的无数事物，他历述了世上的明显事实与壮丽景观。

他自己的诗有加深藏地下的、闪闪发亮的、取之不尽的一个石英矿层。它有时闪现刺眼的光辉——艰难地从厚土层中采得的黑色矿石所具有的那种光泽。它会突然发出耀眼的火花，不然就藏身在矿井的坑道里，远离光明，却执著于自己所确信的真理。也许就是这一真理，也许就是他的诗的本质与大自然的这种一致性，这种雷弗迪式的宁静，这种不变的真诚，使他早早就有了健忘的缺点。别人渐渐认为，像明显的事实、自然现象、房屋、河流或熟悉的街道那样，他的外观和地点决不会有所改变。

如今，他的地点变了；如今，一种严肃的寂静——比他自己更可尊敬的、骄傲的寂静，已经把他带走了，我们知道他已经不在了，那不可替代的光泽消失了，已经安葬在天地之间。

我说，他的名字总有一天会像复活的天使，回来把不公正的、健忘的大门推倒。

在最后审判日（即末日审判）我们将看到他，没有昂扬的号声，但有由他美妙、持久的诗歌形成的悦耳的寂静，光轮似地环绕在他周围，以他作品的单纯的永恒性使我们眼花缭乱。

叶尔齐·博雷萨

叶尔齐·博雷萨再也不会波兰等我了。命运为这位老流亡者保留了重返祖国的机会。他在离开祖国多年之后，作为一名士兵进入华沙时，那里只

剩下一堆倒塌的废墟，没有街道，也没有树木；也没有亲人等候他。博雷萨是个精力充沛的奇人，他与自己的人民一起奋发工作。一个个庞大的计划从他脑子里冒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建立一家图书印刷厂的雄心勃勃的创举。厂房一层一层建造起来；运来了世界上最大的轮转印刷机；现在这家印刷厂印制了千百万册图书和刊物。博雷萨像个不知疲倦的世俗点化术士，把梦想一一变成了现实。在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的新波兰，他的大胆计划像梦中的城堡那样实现了。

我本来不认识他。我曾经到波兰北部马苏里亚恩湖区的度假营地去结识他，他在那里等我。

我一下车就看见一个笨手笨脚的人，一脸胡子拉茬，身上只穿一条说不出颜色的短裤。他立刻以狂热的劲头，用书本上学来的西班牙语对我嚷道：“巴勃罗，你可别累了。你该休息。”实际上，他一点儿也没让我“休息”。他的谈话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出人意料，使人惊叹不已。他同时给我讲述7个建设规划，还穿插评点了几部对史实或人生提出新见解的著作。“巴勃罗，真正的英雄是桑乔·潘萨，而不是堂吉诃德。”对他来说，桑乔代表了通俗实在论的声音，是他的世界和他的时代的真正中心。“桑乔治理一方时，把事情办得很好，因为这是人民在治理。”

他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拖起，总是对我大声说“你应该休息”，接着就带我穿过枞树林和松树林，让我参观一座一个世纪前从俄国迁移来的教派的修道院，这里还保持着他们的全套宗教仪式。修女们把他当作神赐予的福分加以接待。博雷萨对待这些修女十分得体，十分尊重。

博雷萨心肠软，却是个实干家。他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岁月。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支左轮手枪，在一次即决审判之后，他曾用这支手枪处决了一名战犯。

这名纳粹战犯详细记载自己罪行的一个笔记本被人发现了。本子上记有他亲手吊死的老人和儿童，被他强奸的少女。就在他抢掠过的村庄，他被意外地俘获了。证人排成一长队。有人对他宣读了告发他自己的那个笔记本。这个气焰嚣张的杀人犯只回答一句话：“要是能重新开始，我还要这么干。”我亲手拿过那个笔记本，还拿过结果过一名残暴逃犯的性命的那支左轮手枪。

马苏里亚恩湖区的冰碛湖多得不可胜数，人们都到那里钓鳗鱼。我们起大早去钓鱼，很快我就看见了颤动着的、湿漉漉的、黑腰带似的鳗鱼。

我和那里的湖水、那里的渔夫以及那里的景色，亲近起来了。我的朋友从早到晚让我上岸下湖，让我奔跑划桨，让我认识人和树；做这一切时总是大声说：“你在这里应当休息。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休息地了。”

我离开马苏里亚恩湖区时，他送给我一条熏鳗鱼，我从未见过这么长的鳗鱼。

这根奇特的“手杖”给我的生活添了麻烦。我想吃它，因为我非常爱吃熏鳗鱼，这条鳗鱼又是直接来自它生长的湖泊，毫无疑问，它不是购自商店，也不是购自中间人。但是，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那些日子每天菜单上都有鳗鱼。不管白天晚上，我都没有机会吃自己那条鳗鱼。它开始成为折磨我的东西。

夜里我把它拿到阳台上去，让它透风。有时在趣味盎然的谈话中间，我忽然想起已经是中午了，我那条鳗鱼还在露天晒太阳。我顿时对话题兴味索

然，赶紧跑去把它放到我房间的凉爽处，例如放到柜子里去。

我终于找到一位爱吃鳗鱼的人，便不无内疚地把那条世上最长、最鲜嫩、最好的熏鳗鱼送给他。

现在，杰出的博雷萨——干瘦而又精力充沛的吉诃德，像另一位多情和有学识的吉诃德那样赞赏桑乔的人，一位建设者和空想家，第一次休息了。他休息在他十分喜爱的树荫里。在他安息墓地旁，一个世界仍在创造中，他曾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他沸腾的精力和永不熄灭的火焰。

乔治·萨姆利约

我喜爱匈牙利那种生活和诗。历史和诗、时代和诗人紧密结合的道路。在别的地方，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多少有点儿幼稚，多少有点儿不公正。在匈牙利，每位诗人在出生前就承担了义务。尤若夫·阿蒂拉__、奥第·安德莱__、久拉·伊列什__等诗人，便是义务与音乐、祖国与黑暗、爱情与痛苦激烈相撞的必然产物。

乔治·萨姆利约是我20年来亲眼看着他自信地凭实力成长起来的一位诗人。他是个音色很美的诗人，引吭高吟时声如小提琴；他是个为自己也为天下人怀忧的诗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匈牙利诗人；是个慷慨的、准备与人分享一个民族的现实与梦想的匈牙利人。他还是个具有最坚定的爱和最热忱的行动的诗人，在他身上那些人类共性中保留着他祖国的伟大诗歌的特殊印记。

他是个成熟的青年诗人，应该受到我们时代的注意。他的诗恬静，晶莹剔透，令人陶醉，如同金色沙漠里流出的葡萄酒。

夸齐莫多

意大利这块土地十分纯洁的地下深处，保存着古代诗人的声音。当踩上原野的土地，穿过波光闪闪的公园，走过蓝色小海洋的沙滩时，我觉得脚下是钻石般的物质，是神秘的水晶，是几个世纪的光辉。意大利赋予欧洲诗歌以形式、音韵、雅趣和激情，使之从早期的雏形中，从粗呢和甲冑遮掩的粗陋中脱胎而出。意大利之光把中世纪游吟诗人身上的破衣烂衫和英雄史诗描述的铁器，变成流淌着精雕细琢的钻石的滔滔江河。

我们这些初登文化殿堂的诗人，来自1880年之后才有诗人选集的国家，看到大约出版于1230年或1310年、1450年的意大利诗歌选集就会大吃一惊；这些诗歌选集中有阿利盖里__、卡瓦尔坎蒂__、彼特拉克__、波利齐亚诺__诸诗人令人眼花缭乱的三韵诗，有他们所醉心的艺术性，有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宝石般的精美形式。

这些名字和这些人物，为我们刚柔相济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和宽厚的博斯坎__传来了佛罗伦萨的启示，照亮了贡戈拉的道路，使克维多的悲怆增添阴郁讽刺的色彩，造就了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点燃法国的各种香料，使龙萨和迪·贝莱__的情诗繁荣起来。

因此，对诗人而言，生长在意大利大地上相当艰难，随时会遭受失败，而且要支撑得起布满五彩斑斓遗产的天宇。

我认识萨尔瓦托雷·夸齐莫多已有多多年，我可以断言他的诗是表现一种意识，因其内涵深奥、炽热而使我们觉得它变幻莫测。夸齐莫多是个欧洲人，自如地运用着知识、和谐与智慧的各种手段。但是，尽管他处于意大利诗坛的中心地位，处于盛盛衰衰绵延不绝的古典主义的当代角色的地位，并没有

使他变成囿于堡垒中的武士。夸齐莫多是个杰出的世界性人物，他没有好斗地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而认为当今最迫切的任务是清除文化壁垒，并确认诗歌、真理、自由、和平与欢乐是人类共享的事物。

一个宁静得令人伤感的世界上的种种色彩和声音，汇集在夸齐莫多的诗中。他的哀伤不是表达莱奥帕尔迪 那种失意者的人世无常之感，而是傍晚时分大地上刚刚萌发的幽寂，这一虔诚的思绪是傍晚时产生的，这时芬芳、声音、色彩和钟声保护着地下深处种子的萌发。我喜爱这位杰出诗人的凝练语言，喜爱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我尤为赞赏他把自己沉浸于无时无处不在的美感中，以及他把一切事物转化为真诚、动人的诗歌语言的能力。

我隔着大海和千山万水，举起一个用阿劳卡尼亚地区的树叶制成的馥郁的花冠，让它飞向空中，让风和生活带走它，把它戴到萨尔瓦托雷·夸齐莫多头上。这可不是我们经常在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的肖像上看到的那种阿波罗桂冠；而是来自我们未开发的森林的一种花冠，用尚未命名的树叶制成，上面沾满了南方黎明时的露珠。

巴列霍还活着

另一个人是巴列霍。我决不会忘记他那颗黄澄澄的大脑袋，像是在秘鲁的老式窗户上看到的那种脑袋。巴列霍为人严肃，心地纯洁。他死于巴黎；死于巴黎的污浊空气，死于从中打捞出许多尸体的污浊河流。巴列霍是因饥饿和窒息而死的。如果我们当初把他带回他的秘鲁，让他在秘鲁的大地上呼吸空气，也许他今天还会活着，而且还会在吟诗。我在不同时期写过有关我这位挚友，有关我这位好同志的两首长诗。我认为，我在这两首诗中描述了我们亲密无间的友谊的经历。第一首长诗《塞萨尔·巴列霍颂》，收入《元素颂》第一卷。

近来，在这场小小的文学论战中，也就是在这场由一些张牙舞爪的无名小卒挑起的论战中，有人抬出巴列霍，抬出塞萨尔·巴列霍的影响，抬出塞萨尔·巴列霍留下的空缺，抬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来反对我和我的诗。这种事到处都可能发生，旨在伤害那些勤奋写作的人。他们说：“这家伙不行，巴列霍确实棒。”要是聂鲁达早已见阎王，他们就会抬出他来反对活着的巴列霍。

第二首长诗收在《狂歌集》中，其标题只有一个字母（即字母V）。

为了探寻无法确定的事物，也就是为了探寻将人与作品联系起来的主导因素或线索，我要说说我多少有过一点关系的那些人。我们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光，如今我仍然健在，他们却物故了。我只有以这种方式探索人们称之为诗的奥秘（我却要称之为诗的明晰）的东西。人的手与其作品之间，人的眼睛、五脏六腑、鲜血与其著述之间，必定有某种关系。但是，我说不出什么理论来。我的胳膊底下没有挟着什么教条，准备拿去砸在谁的头上。我跟大家差不多一样：星期一觉得一切都是光明的，星期二就觉得一切都漆黑一团了，而且由此想到这一年是阴暗相间，以后几年可能是一片蓝色。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前面我说过，我早在故乡特木科城就已认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了。

她后来永远离开了该城。加夫列拉那时已经艰难而勤奋地过了半生，外表像修女，有点儿像领导一所严谨的学校的高级修女。

在那些时日，她用精确、鲜明生动和简洁晓畅的散文写了几首关于孩子的诗篇，因为她的散文往往就是她最深刻动人的诗。这几首关于孩子的诗中描写了妊娠、分娩和成长，于是一些含混的流言在特木科流传开来；我十分熟悉那些铁路工人和伐木工人（说话直言不讳、性情粗野而暴烈的人们），他们往往词不达意，讲些没有恶意的粗话，甚至可能发些粗野的议论，有损于她单身女子的身份。

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且至死都感到受了伤害。

数年后，她在她那本不朽著作的初版上，加了一篇于事无补的长长的按语，对世界尽头那个山区的人们关于她本人的议论和流言加以谴责。

当她取得值得永志不忘的胜利，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她在旅行中理应路经特木科火车站。学生们每天都在火车站等她。小学女生冒雨前去，手捧喇叭藤花瑟瑟发抖。喇叭藤花是那种灿若星辰的花朵，是阿劳卡尼亚地区美丽的野花。他们空等一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有意安排在夜间经过该车站，她乘坐一列客货混合夜车，以避免接受特木科献的喇叭藤花。

那末，这是责备加夫列拉吗？这只是说，她心灵上的创伤仍然张着口子，愈合并不容易。这件事表明，在这位写出如此之多的绝妙好诗的女诗人的心灵深处，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爱与恨的搏斗。

她对我永远面含友好的笑容，那是在她那黑面包似的脸上，如同面粉发酵般绽开的笑容。

但是，放在她的工作烤炉里的上等材料是什么呢？她那些永远悲戚的诗用的是什么样的秘密配方？

这些我不去探究，肯定我也不可能弄明白，即便弄明白，我也不会说。

9月是帚状砾芥开花的季节；在这个月份，原野变成一块起伏波动的黄地毯。在这一带海岸上，南风怒吼着猛刮了几天；夜里只听到它的呼啸声。天放晴时，大海像碧琉璃和巨大的白色块。

你来了，加夫列拉，你是这些帚状砾芥，这些岩石，这狂风的心爱女儿。我们大家都满怀喜悦地欢迎你。谁都不会忘记你赞美智利的山楂树和白雪的歌。你是智利女性。你属于人民。谁都不会忘记你描述我国儿童赤裸的脚的诗行。谁都忘不了你那些“可恶的话语”。你是令人感动的和平拥护者。为了这些，也为了别的理由，我们热爱你。

你来了，加夫列拉，你来到智利的帚状砾芥和山楂树近旁。我应当捧出鲜花真诚而又不拘礼仪地欢迎你，这符合你的伟大和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岩石和9月的春光为你敞开了大门。看见你畅怀地笑着走进智利人民使之充满鲜花和欧声的神圣土地，我无比喜悦。

关于宇宙本质和真理，我同你的见解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奔走呼号，真理终将得到承认。我愿你美好的心灵摆脱重负，充满活力，不懈战斗，放声歌唱，并且在祖国的大洋和安第斯山的孤独中继续创造。我亲吻你高贵的前额，向你内涵丰富的诗鞠躬致敬。

比森特·维多夫罗

杰出的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对待一切事物，总是采取一种恶作剧的态度，他用花样繁多的恶作剧折磨我——寄来一些幼稚的匿名信攻击我，不断指责我剽窃。维多夫罗是源远流长的自我中心偏执狂世系的代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在矛盾重重的生活中作家没有任何地位，于是采取这种自卫方式，在当时是颇具特点的。利己主义强人的处世哲学在美洲的传播，不过是欧洲邓南遮无耻言论的回声。这位意大利作家是个滥用并践踏小资产阶级准则的人，他在美洲掀起信奉救世主的狂热，势如火山喷发。他的追随者中最虚夸、最革命的是巴尔加斯·比拉。

维多夫罗毕生缠着我打算人听闻的笔墨官司，反而使我更受尊敬，我因此难以责备他。他自封“诗神”，而且认为让我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成为他的奥林波斯山上一员是不合适的。我从来都不十分清楚那座奥林波斯山上有什么。维多夫罗的一伙人把巴黎的最新花样加以创造，使之超现实化，把它生吞活剥地咽下去。而我大大相形见绌，永远是个土里土气的、半野蛮的外省人。

维多夫罗事实上确是一位有非凡才能的诗人，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成为“超人”。他的恶作剧中具有一种稚气的美。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提出，第一个志愿登月旅行者非他莫属。我能想象出他会向科学家证明，他的头骨的形状和韧性世上无双，最适应宇宙火箭的旅行。

有几则轶闻颇能说明他这个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智利，这时他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却老拿一台生锈的电话机给大家看，还说：

“我亲自从希特勒手中把它夺下来。这就是元首最喜欢的那部电话机。”

有一次，有人让他看一件很平庸的裸体雕刻习作，他说：

“太可怕了！比米开朗琪罗的雕刻还糟。”

1919年发生在巴黎的一件由他担任主角的惊人事件，也值得一提。维多夫罗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列颠之终结》的小册子，书中预言不列颠帝国即将分崩离析。因为没人注意他的预言，他决定躲起来。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智利外交官遭神秘绑架。”几天之后，他直挺挺地躺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英国童子军绑架了我。”他对警察说。“他们把我绑在一处地道的一根柱子上，强迫我喊1000次‘不列颠帝国万岁！’”

说完他又晕了过去。但是，警察检查了他腋下挟着的一个小包，发现包里有维多夫罗本人3天前在巴黎一家豪华商店买的一套新睡衣。一切都被拆穿了。维多夫罗于是失去一位朋友。画家胡安·格里斯曾坚信绑架这件事，而且憎恶帝国主义者欺凌这位智利诗人，他永远不原谅诗人撒的那个谎。

维多夫罗是个水晶似的诗人。他的作品无论在何处都闪耀光彩，而且洋溢着令人入迷的欢乐。他的诗通篇充满他凝聚起来并以充满风趣和智慧的手法加以润色的欧洲光泽。

反复吟诵他的作品时，最使我惊奇的是它的晶莹澄彻。这位诗人极具文学才能，追求一个错综复杂时代的一切时髦式样，决心不理睬大自然的庄严，让不停地歌唱的清泉，让风声和树涛声，让深沉的人类情感，行云流水般都来入诗；尤其是后者，充溢了他的最后几首诗。

从维多夫罗的法国式诗歌的迷人技巧，到他所写的主要诗篇的强大震撼力，我们都能发现他的作品里在嬉戏与烈火之间，在逃避现实与献身之间存在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引人注目，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是完全自觉地进行，

发出令人目眩的光彩。

毫无疑问，由于爱好朴实的偏见，我与他的作品产生了距离。我们都认为，比森特·维多夫罗的死敌就是比森特·维多夫罗自己。死神结束了他充满矛盾和难以改变地耽于嬉闹的一生。死神为他难逃一死的生命盖上一片薄纱，却掀开另一片薄纱，永远显露出他那迷人的品质。我曾建议在鲁文·达里奥纪念碑近旁，为他立一座纪念碑。但是，我们的政府为创造者树碑立像颇为吝啬，而在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方面却慷慨大方。

我们不能把维多夫罗看作政治人物，尽管他曾短暂地闯入过革命领域。对待思想问题，他不负责任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不过，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都已化作前尘，如果我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那我们就太轻率了。我们倒是应该说，维多夫罗歌颂十月革命和哀悼列宁去世的诗，是他为唤醒人类所作的重要贡献。

维多夫罗 1948 年逝世于黑岛附近的卡塔赫纳，当时他刚刚写完几首诗，那是我平生读过的最令人心碎的、最庄严的诗。他逝世前不久，在我的好友兼出版人贡萨洛·洛萨达陪同下，到我黑岛的家来访问过。维多夫罗和我作为诗人、智利人和朋友进行了交谈。

文学界的仇敌

我料想，文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在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美洲大陆的文学界骇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革命的俄国，马雅可夫斯基也被嫉妒他的人逼得走投无路，终于饮弹自尽。

在拉丁美洲，小小的怨恨会愈演愈烈。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有人说，我们这种感情是从破落的、殖民的西班牙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我们在克维多、洛佩斯和贡戈拉那里往往能见到他们彼此伤害造成的创伤。西班牙黄金时代虽然闪射出神奇智慧之光，却是个不幸的时代，连王宫周围都有饥馑在徘徊。

近年来，小说在我们这些国家有新的发展。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胡安·鲁尔福、巴尔加斯·略萨巴尔加斯·略萨、萨瓦托萨瓦托、科塔萨尔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卡洛斯·富恩特斯、智利人多诺索多诺索等人声名远播，到处都有人阅读他们的作品。他们有些人是和 boomboom 的名字同时接受洗礼的。但是也常听人说，他们是自吹自擂的一群。

这些人我差不多全认识，而且发现他们非常健康，十分宽宏大度。我明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有些人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宁静的工作环境，为了远离政治仇恨和不断滋长的妒忌，不得不迁离自己的祖国。他们自愿流亡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在我们美洲的真实与梦想中，他们写的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说不说我本人对这种登峰造极的嫉妒的体验，我一直迟疑不定。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是自我中心，觉得我过于关心个人痛痒。但是，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

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

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手之一惨死，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种空缺。多年来，凡是我做的事，他都要加以攻击，现在一旦没有了这种攻击，我反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怅然若失之感。

40 年的文学迫害是一种异常现象。我乐于开始再现这场一个人反对他自己影子的孤独的战斗，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进去。

由同一个编辑（永远是他）出版的 25 种杂志，都是用来摧毁我的，硬把形形色色的罪名——背信弃义、诗才枯竭、公开和秘密的恶习、剽窃、耸人听闻的性心理变态——统统安在我身上。还出了一些小册子，而且持久不停地到处散发；还发表了几篇不乏幽默感的专题报道；最后，出版了一整本名为《聂鲁达和我》的过于冗长的书，书中充斥着侮辱和咒骂。

我的对手是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智利诗人，既顽固又拔扈，装腔作势多于内在的实感。这一流具有利己的冷酷心态的作家，正在美洲大量繁殖；他们的粗暴和自满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然而他们的邓南遮血统却是可悲的事实。

在我们不幸的地区，我们这些几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诗人，在酷烈的黎明时分，在酒鬼呕吐的秽物间你争我夺。在这样可悲的环境中，文学界反常地产生了一些恶棍——流浪汉时代幸存的幽灵。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种虚伪的尼采犬儒主义，使我们许多诗人戴上了罪犯的面具。不少人沿着这条捷径，把自己的生活转向犯罪，或转向自我毁灭。

我那位传奇式的对手就是从那种环境中涌现的。他起先力图引诱我，使我服从他的嬉戏规则。这种事情和我小资产阶级的乡土习气格格不入。我不敢也不喜欢靠耍手腕过日子。我们的那位主人公却是擅长投机的专家。他生活在一个不断搬演闹剧的世界上，在这里以扮演恶棍来欺骗自己，这个角色成了他的职业和护身符。

现在该是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了。他名叫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是个强壮、多毛的人，总是极力想用天花乱坠的言词和相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只有十八九岁时，有一次他向我提议，我们一起出版一个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只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他用不同笔调，用散文和韵文，断言我是个有影响力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另一部分由我从各方面赞扬他具有超绝的智慧和无限的才能。一切就这样安排定了。

我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也觉得那个计划太过分了。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劝阻他。他是个很罕见的杂志出版家；他筹集资金以维持自己长期出版小册子的活动的办法，谁见了都会惊叹不已。

他在严寒的偏远外省，草拟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他开列了一份一长串医生、律师、牙科医生、农学家、教授、工程师、公用事业负责人等的很长的名单。我们这位人物因为出版了许多多卷本出版物、杂志、全集、叙事和抒情的小册子而声名远扬，成了世界文化的使者。他往往庄严地把这种声誉全部奉献给他访问的那些无名人物，然后屈尊向他们收取微不足道的几个埃斯库多。在他夸夸其谈面前，受害者仿佛越来越渺小，变得只有一只苍蝇大小。通常德·帕洛特斯把钱装进口袋就走，让苍蝇去为世界文化的伟业尽心尽力。

另外几次，佩里科·德·帕洛特斯自称农业广告专家，建议南方原始森林里的庄园主，编印附有业主和牲畜照片的豪华本庄园专集。看见他穿着马

裤和消防员的长统靴、身披舶来的华丽宽袖长外套来到时，那就是一场表演开始了。我们这位人物把恭维和有关不利于对话者的出版物的旁敲侧击的威胁混合在一起，离开庄园时就拿到了几张支票。庄园主们很吝啬，但也很现实，给几个钱就把他打发了。

尼采哲学家、无可救药的写作狂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个文痞加流氓。他在智利的文学生活中是靠吹牛混饭的，许多年里他有一个由一帮向他歌功颂德的可怜虫组成的小朝廷。但是，生活往往毫不留情地使这帮见风使舵的家伙失势。

我这位暴躁的对手的可悲结局——晚年自尽，使我在下笔写这些往事之前踌躇再三。为了顺应时代和地点的要求，我终于写出来了。一条仇恨的巨大山脉横亘在各西班牙语国家的大地上；强烈的妒忌损害了作家的的工作。消除这一类毁灭性暴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的丑行——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名有里贝罗之类加利西亚姓氏的可疑的乌拉圭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文学和政治方面对我本人和我的作品进行攻击，丧心病狂，纠缠不休。此人多年来出版了好几本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小册子，在书中把我千刀万剐。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反聂鲁达的英勇行动，不限于自己掏腰包印制出版物，还花钱进行开销昂贵的旅行，目的在于无情地搞垮我。

这个怪人在牛津大学宣布将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旅行。这个乌拉圭打油诗人一到那儿，就想用他捏造的罪名摧毁我的文学声誉。我接受了牛津的荣誉学位之后，身上还穿着红色长袍，依例喝波尔图葡萄酒时，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嘲弄地议论起他对我的指控。

更加难以置信和更大胆的是这个乌拉圭人1963年的斯德哥尔摩之行。当时谣传我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这家伙遍访了瑞典科学院院士，会见了报界，在电台上断言我是杀害托洛茨基的刺客之一。他力图用这种手段阻挠我得奖。

时间证明此人始终命运不济，无论在牛津还是在斯德哥尔摩，他都可悲地白花了金钱和气力。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可否认，我有过几位杰出的评论家。我指的不是文学界盛宴上的捧场，也不是我无心招致的辱骂。

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些人。除热情的年轻人写的书之外，在论述我的诗的书中，我首先应该提到苏联人列夫·奥斯波瓦特写的那本书。这位青年精通西班牙语，他不满足于研究我的诗中的意义和音响。他还为我的诗画出一幅他的世界里北极光照耀下的未来图景。

一流的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1]出版过一本评论我的诗作的书，书名叫《静止不动的旅行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位博士一点儿不傻。他立刻发现，我喜欢足不出户、不离开祖国、不离开自我地进行旅行。（我收藏的一本很精彩的侦探小说名叫《月亮钻石》，书中有一幅我很喜爱的插图。插图上有一个身上裹着宽袖长外套或带披肩无袖男大衣或长礼服式大衣之类外衣的英国老绅士，坐在壁炉前，一手拿本书，一手拿个烟斗，

脚边还有两只打瞌睡的狗。我就是喜欢这样，要永远留在火炉前，靠近大海，坐在两只狗中间，阅读我费尽心力收集到的书，抽着我的烟斗。）

《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与风格》这本阿马多·阿隆索写的书，对许多人是有用的。这本书热情洋溢地在黑暗中探索言语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此外，阿隆索的专著是第一次对一位当代诗人的作品进行的认真研究，使我尤感荣幸。

许多评论家为了研究和分析我的诗，都曾求助于我，其中就有阿马多·阿隆索本人。他提的问题使我发窘，他还刨根问底把我逼上绝境，而当时我每每赶不上他的思路。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都有些许失误。

《大地上的住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一样，写于（或者至少是开始于）超现实主义鼎盛时期之前，不过，其日期是无法确信的。世上的风传播着轻若花粉或坚硬如铅的诗的分子，这种种子落在犁沟里或人的头上，给予万物以春天或战斗的气息，开出鲜花，也产出枪炮。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消除急躁冒进时代的神话，在这个时代里商标比商品更有价值，在这个时代里本质的东西被抛到一旁。但是，作家们更迫切的需要是写出好书。我喜欢美国人惠特曼或苏联人马雅可夫斯基笔下乱纷纷的内战战壕里的“积极的英雄”，我的心中同样也能容纳洛特雷亚蒙的哀伤的英雄，拉弗格的唉声叹气的骑士，夏尔·波德莱尔的消极的士兵。把创作这个苹果分成这样两半时你可要当心，因为也许我们会割伤自己的心，甚至就活不成了。要当心！我们应该要求诗人置身于街头和战斗中，也置身于光明和黑暗中。……

我奉献了我的一切。我曾把我的诗掷向沙场，经常与它一起抛洒热血，遭受极度的痛苦，歌颂我所目睹和经历的光荣时刻。我在某些方面曾受人误解，这并非全是坏事。

一位厄瓜多尔的评论家说过，在我的《葡萄与风》那本诗集里，真正的诗不超过6页。原来这位厄瓜多尔人看了我这本书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而另外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同样憎恶《大地上的住所》，认为它太内向，太忧郁。连十分杰出的胡安·马里内略，一度也以原则的名义谴责过我的诗。我认为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都犯了错误。

我偶尔也说过不满《大地上的住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我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忘不了几年前一位圣地

亚哥的小伙子在一棵树下自杀，留下一本我写的书，打开在题为《这就是阴影》那首诗的地方。

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住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

我对《葡萄与风》确实有点儿偏爱，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最受误解的一本书，或者也许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起步走向了世界。这本书里有路上的尘土和河里的流水；这本书里有我本来不认识而是在多次旅行中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我再说一遍，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

在我的全部诗集中，《狂歌集》不是唱得最多，而是跳得最好的一本书。书中爱蹦跳的诗句无视荣誉、礼节、互相保护、法规和责任，以便保护谦恭的不敬。由于它的不恭，倒成了我最贴心的书。由于它的影响，成了我的诗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本。依我看，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具有真理所特有的滋味。

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始初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因为我把一些石头比做鸭子而愤愤然。他曾经规定，鸭子不是写诗的素材，其他小动物也不是。这种文学上的高雅要求竟达到如此轻率的地步。他们企图强制有创造力的文艺家只涉及崇高的题材。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资产阶级要求诗越来越脱离现实。宣言不讳的诗人对垂死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危险的。最好诗人要像比森特·维多夫罗所说的那样自认为是个“小上帝”。这种信念或态度对统治阶级是没有妨碍的。诗人就这么忘情地保持着神圣的隔绝状态，对他们无须加以收买，也尤须予以镇压。因为诗人已自我收买，将自己判给了天国。同时，地球在它的轨道上颠簸，在它的光辉里颤抖。

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 7000 万文盲这块绊脚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我们应当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

书评家往往讨好封建头脑的企业家的想法。例如，1961 年我的 3 本书问世，即《丰功伟绩颂歌》、《智利的石头》、《礼仪之歌》。我国的评论家在一整年时间内，连这几本书的书名都不提一下。

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第一次出版时，智利也没有人敢提它。诗集的出版者到智利版面最多、历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报纸《水星报》编辑部去。他带去一则付费的广告，预告这本书即将问世。但是人家要删去我的名字，才接受这则广告。

“可聂鲁达是这本书的作者呀！”内拉抗议道。

“没关系。”他们答道。

《马丘比丘之巅》不得不以作者为无名氏出现在广告上。150 年的历史

对这家报纸有什么用？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学会尊重真理，没有学会尊重事实，也没有学会尊重诗。

反对我的消极情绪，有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强烈反映，而是另有原因。我工作了 40 多年，荣获了几项文学奖，我的书被译成各种最令人惊奇的语言，而我没有一天不受到周围妒忌的人或轻或重的打击。我的房子就是个例子。几年前我买下坐落在黑岛上一个荒凉去处的这所房子，当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用写书的收益来改善它，提高它的舒适水平。我带来了心爱的木雕像，带来了旧船上的船头雕饰，它们长期漂泊之后在我家得到庇护和休息。

但是，有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诗人因为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品所获得的成果而享有体面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是一切作家、音乐家、画家应该得到的。那些不合时代的反动文人时时刻刻要求尊敬歌德，却不让当今的诗人有生活的权利。我有小汽车这件事尤其令他们恼火。在他们看来，小汽车应该是买卖人、投机商、妓院经理、高利贷者和无赖专用的东西。

更加惹他们生气的是，我要把我在黑岛的房子赠给人民，有朝一日工会将在那里开会，矿工和农民要到那里休养。我的诗将报复他们。

新年伊始

有一位新闻记者问我：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您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

“准确他说，在 1 月 5 日上午 9 时 20 分这个时刻，我看见整个世界一片玫瑰色和蓝色。”

这句话没有半点文学的、政治的或主观的色彩。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窗口扑进我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玫瑰花坛，远处是太平洋和天空融为一片蓝色。

但是我明白，我们也都都知道，在世界的全景中还有别的颜色。谁能忘记越南每天徒然抛洒的那么多鲜血的颜色？谁能忘记那些被凝固汽油弹焚毁的村庄的颜色？

我回答这位记者另一个问题。同往年一样，在这新的 365 天里，我将出版一本新书。对此我是有把握的。我爱抚它，虐待它，每天写它。

“书里写什么？”

我能回答什么呢？我的书里写的永远是同样的东西；我写的永远是同样的书。在这新的一次和来日方长的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的朋友见谅，我能奉献给他们的只有我的诗句，同样是新的诗句。

刚刚结束的一年，给我们全体地球居民带来了许多胜利——在空间的胜利和在前进路上的胜利。在这一年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想飞翔，我们大家做了宇航梦，在太空遨游。无论戴上第一道月亮光环，吃上第一串月亮上的葡萄的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征服太空的胜利属于我们大家。

人类已发现的才能绝大部分属于我们诗人。从儒勒·凡尔纳（他在一本书里使古老的空间梦机械化）到朱尔斯·拉弗格、亨利希·海涅和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别忘了发现月球的魔力的波德莱尔），我们诗人在别人之前早就考察、歌唱了那颗苍白的行星，并出版了有关的诗文。

岁月流逝。你精疲力竭，茁壮成长，吃苦受累和享受生活。岁月把生命带去又带来。离别更是日益频繁；朋友们进出于牢狱，来往于欧美，或者干脆作古。

当死者去世时，你身在远方，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完全死去；他们仍然活在你心中，一如既往。一个比自己的朋友活得长的诗人，往往要在他的书中收入体念诗文。我不再写这一类诗文，因为我担心会使人类面对死神的痛苦显得千篇一律。你决不会愿意使这一类诗文成为一种死亡者名录，尽管他们可能是你最亲爱的人。1928年在锡兰，当我为我的朋友诗人华金·西富恩特斯·塞普尔韦达之死写了《华金不在了》时；以后1931年在巴塞罗那，当我写了《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在飞翔》时，我想再不会有人先我而死了。可是先我而死的人却很多。就在这里附近，在科尔多瓦的阿根廷山冈上，长眠着我最好的阿根廷朋友鲁道夫·阿劳斯·阿尔法罗，他抛下了寡妻——我们智利人玛加丽塔·阿吉雷。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风带走了伊利亚·爱伦堡虚弱的躯体，他是最亲爱的朋友、真理的英勇捍卫者、戳穿谎言的巨人。这一年，人们在莫斯科安葬了诗人奥瓦季·萨维奇，他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我的诗的译者，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死神刮起同样的风，带走了我的诗人弟兄纳齐姆·希克梅特和谢苗·基尔萨诺夫，还带走了其他几个人。

还有一桩令人悲恸的事件：在愁云笼罩的玻利维亚，当局杀害了切·格瓦拉。宣告他的死讯的电报，像一阵神圣的寒颤传遍世界各地。千万首挽歌齐声颂扬他英勇而又悲壮的一生。世界各地涌现了大量悼念他的诗，虽然其中有些诗对于如此沉痛的事并不恰当。我收到古巴一位管文学的上校打来的电报，向我征诗。我至今没有写。我认为，这种挽歌不仅应该包括直接的抗议，还应该有关于这一令人痛苦的历史事件的深刻反响。我要反复思考这首诗，直到在我脑海里和血液中构思成熟。

在切·格瓦拉的日记中，我是被这位杰出的游击队领袖引用的唯一的一个诗人，令我感动。记得切有一次当着军士长雷塔马尔的面对我说，他曾经多次向最早的、谦卑而又光荣的马埃斯特拉山的大胡子们朗读我的《漫歌集》。他显然有一种预感，在日记中抄录了我写的《博利瓦尔之歌》中的一句诗：“你那勇敢的船长的小小遗体……”

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许多年里，我都被提名为候选人，但这种提名都没有什么结果。

到1963年，这件事变得认真起来了。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说，在斯德哥尔摩，我的提名在争论中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候选人中，我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于是，马蒂尔德和我便把保卫家庭的第三号方案付诸实行。我们准备了食物和红葡萄酒，并在黑岛家的旧大门上挂上一把大锁。看到这种要过隐居生活的前景，我添了几本西默农的侦探小说。

新闻记者很快就来了，我们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进不了那扇用又漂亮又牢固的大铜锁锁住的大门。他们老虎般地在墙外转来转去。他们打算干

什么？对于世界另一边只有瑞典科学院院士参加的争论，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新闻记者们毫不掩饰他们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意图。

在南太平洋沿岸地区，春天已是姗姗来迟。那些孤独的日子使我得以亲近这海边的春天，它虽然迟到，却也为自己孤寂的节日披上了盛装。夏天没下一滴雨，土地是泥灰质的，坚硬而且多石，看不见一丝绿意。冬季里，海风怒吼，掀起巨浪和含盐的浪花，这时大自然显得沉闷哀伤，像是那种可怕力量的牺牲品。

春天开始于一项庞大的黄色工程。无数小黄花覆盖了一切；这种细小、生机盎然的植物铺在山坡，长满岩石周围，一直推进到海边，还从我们每天走的路当中冒出来，似乎想向我们挑战，向我们证明它的存在。这些花维持它们不显眼的生命已经如此长久，这片贫瘠土地排斥摧残它们，使它们惶恐了如此长久，现在它们都不在乎了，只是满世界黄灿灿地盛开。

后来，淡黄的小花消失，到处又布满了盛开的深紫色花朵。春天的心由黄色转为蓝色，然后又转为红色。这无数不知名的小花是怎样由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呢？风抖落一种颜色，第二天又抖落另一种颜色，像是在荒凉的山冈间更换着春天的国旗，像是不同的共和国在炫耀他们入侵的旗帜。

这时节，海岸上盛开仙人掌花。在远离这个地区的安底斯山山梁上，布满凹纹和尖刺的仙人掌巨人般挺立着，如同一棵棵充满敌意的往子。海岸上的仙人掌却又小又圆。早先我看见这种仙人掌顶端挤着20个绯红的花苞，仿佛一只手冒出几滴鲜血作为热情的表示。这些花苞后来都开放了。千百棵仙人掌面对翻腾着白色的滚滚泡沫的大海，被怒放的花朵烧得一片火红。

我家那棵老龙舌兰，曾从它内心深处开放出自杀性的花朵。这棵蓝黄相间的植物，高大而且肉质，在我家大门旁已生长了十多年，长得比我还高。这种植物一旦开花便会死去。它曾举起一枝坚挺的绿色长矛，伸高达7米，每隔一段便是千巴巴的花序，上面有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金粉。后来，这棵美洲龙舌兰的大叶片突然全部凋落，枯死了。

在这枝高大的死花近旁，另一种巨大的花生长起来。在我国之外，没有人认识它；它只长在这南极区的海滨。它叫智利普雅树。这种历史悠久的树种，受阿劳科人崇拜。古代的阿劳科人已不存在。鲜血、死亡、时间和后来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写的史诗，结束了一个黏土部落的古老历史，这个部落突然从千百年的酣梦中惊醒，奋起保卫自己被侵略的祖国。当我看见他们的花在几个世纪的色泽暗淡的累累尸骨之上，在血迹斑斑的被遗忘的地层上再次开出花朵，我于是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地的过去总会开花的。只有大地继续存在下去，不改它的本质。

但是，我忘了描述这种花。

这是一种有锯齿尖叶的凤梨科植物。它像一堆绿火在道路上冒出来，像插满神秘的翡翠色宝剑的武器架。不过，从它腰部突兀地长出单独的一朵总状花序的大花，像一朵巨大的、足有一人高的绿玫瑰。这朵孤零零的花由许多小花复合在一起，就像人群聚集成一座座绿色的大教堂，花顶上是金色的花粉，在大海的辉映下闪烁。这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种绿色巨花，是座孤独的海浪纪念碑。

我国的农民和渔夫早就忘记了那些小植物的名字，也忘记了那些至今没有名字的小花。他们渐渐忘记这些花，这些花也慢慢失去自豪感。他们缠结在一起，而且颜色晦暗，如同河流从安第斯山的白雪中带到陌生的沿海地区

的那些石头。农民和渔夫，矿工和走私贩，仍然致力于他们的艰难生活，生生不息，履行着自己的责任，承受着挫折。尚未被发现的土地上的英雄是默默无闻的；事实上，在这种土地上及其歌曲中，闪射光芒的无不是无名者的鲜血和没人知道名字的花朵。

在这些花中，有一种已经挤满了我的房子。这种植物开蓝花，有骄傲的、有光泽的、结实的长茎。茎的顶端有许多淡蓝色和深蓝色的小花在摆动。我不知道，是否全人类都能观赏它那极崇高的蓝色。或许它只向某些人展示？而对蓝色神明不让作此观赏的另一些人，蓝花或许是隐蔽的、看不见的？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因我幽居独处而心旷神怡，竟至自命超凡脱俗，以为在那无人问津的春光中见到了这蓝色，这蓝的波浪，这蓝的星？

最后，我要谈谈番杏花。不知道别处是否有这种植物，它多得铺天盖地，用它们三角形的手指巴住沙地。春天使这些绿手戴满不常见的紫红指环。番杏花有个希腊名字 Aizoaceae。在这迟来的春日，黑岛的胜景就是那遍地的番杏花，它们四处蔓延，如同海潮登陆，如同从大海这绿色的洞穴中喷涌而出，如同远方的海神贮藏在酒窖里的一串串紫红色葡萄的汁液。

恰在这时，无线电向我们宣告，一位希腊的杰出诗人获得了这一著名的文学奖。新闻记者们走了。马蒂尔德和我终于清静了。我们郑重地从旧大门上摘下那把大锁，好让大家像春天那样，照常不叫门、不通报就可以走进我的家。

瑞典大使夫妇当天下午来看我。他们带来一只装了瓶酒和熟食的篮子。他们原以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准备下这一篮子酒食要来祝贺。我们并不伤心，我们为获得该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干杯。大使在告别时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报纸肯定要来采访，我对塞菲里斯什么也不知道。您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我也不了解他。”我坦率地答道。

名叫地球的这个行星上的作家，实际上人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说出这种想法的人和否认过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包括在内。

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候选人，都制订行动计划，拟定策略。这倒使一些本该获得这个奖的人得不到了。罗慕洛·加

列戈斯就是一例。他的作品既恢宏又严谨。但是，委内瑞拉是个产油国，也就是说是个富国，打算利用这一点为他争得这个奖。该国任命了一位驻瑞典大使，其最高任务乃是为加列戈斯争得这个奖。大使请客吃饭非常慷慨大方；他在斯德哥尔摩当地的印刷厂印刷出版瑞典科学院院士的著作的西班牙语版。这一切大概使那些敏感又谨慎的院士感到太过分了。罗慕洛·加列戈斯决不会知道，一位委内瑞拉大使过分卖力的活动，也许就是使他得不到理应获得的文学荣衔的原因。

在巴黎时，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一件具有残酷幽默感的悲惨故事。这次谈的是保罗·瓦莱里。他的名字传遍法国，报刊上都认为他是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在斯德哥尔摩投票决定得奖人的那天上午，瓦莱里为了缓解即将到来的消息给他造成的紧张不安，一大早就带上手杖和狗，离开在乡间的家。中午吃午饭时，他远足归来。他一打开大门，就问他的女秘书：

“来过电话了吗？”

“来过，先生。几分钟前，斯德哥尔摩有电话找您。”

“他们说了什么消息？”他说，显然很激动。

“有位瑞典新闻记者想知道您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见。”

瓦莱里本人谈起这个故事，总是用一种嘲弄的口吻。事实上，这么个杰出的诗人，这么个完美的作家，竟始终没有得到这个著名的文学奖。

至于我，应该承认我是很谨慎的。在一位颂扬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学者写的书里，我曾读到我那位严肃的女同胞寄往许多地方的大量书信，信中她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但可以看出，她受到本能的驱使，希望早日获得该文学奖。这更加使我欲说还休。自从得知我的名字被当作候选人提出以后（我不知道已被提名多少次了），我决定不到瑞典去了；从我少年时代起，这个国家就迷住我了，当时我同托马斯·拉戈——自封为一个名叫哥斯塔·伯林格的被革出教门的牧师和酒鬼的入室弟子。

此外，每年被人提名，而事情却毫无进展，使我感到厌倦。看见我的名字像匹跑马那样出现在每年的比赛名单上，我不免恼怒万分。另一方面，智利人（包括作家和民众）因为被瑞典科学院冷落而感到受了伤害。这一切几乎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所周知，我终于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1971年，我正在巴黎，刚刚到那里接任智利大使，当时我的名字又开始在报纸上出现。马蒂尔德和我皱起了眉头。由于习惯了一年一度的失望，我们已经变得没有感觉了。这年10月里的一个晚上，我们使馆的参赞兼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走进我家的饭厅。他生来谨慎，谁知竟提议跟我打个简单的赌；如果我被授予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就要请他和他的妻子到巴黎最好的餐馆去吃顿饭；如果这个奖没有授予我，就由他们来请马蒂尔德和我。

“同意。”我对他说，“我们准能吃上让你破钞的美餐。”

豪尔赫·爱德华兹之听以一反常态，大胆打赌的部分内情，第二天就揭晓了。我得知他的一位女友曾经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他。她是作家兼记者，她说这次巴勃罗·聂鲁达赢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百分之百的希望。新闻记者们开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墨西哥，尤其是从西班牙打来长途电话。在西班牙，人们认为这已是改变不了的事。我当然拒绝发表谈话，但是我的疑虑又开始露头了。

那天晚上，我在瑞典结识的唯一的一位作家朋友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来看我。伦德克维斯特三四年前就当上了瑞典科学院院士。他从瑞典来，要到法国南方去。饭后，我把我须回答那些认为我应该得奖的新闻记者打来的国际电话的窘况告诉他。

“阿图尔，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对他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很想在报纸公布之前先知道这件事。我希望在别人之前头一个告诉萨尔瓦多·阿连德，我和他一起参加过那么多斗争。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会使他十分高兴的。”

院士兼诗人伦德克维斯特用他那双瑞典人的眼睛，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如果有什么事，瑞典国王会打电报通知你，或者瑞典驻巴黎大使会通知你。”

这是10月19日或20日的事。21日上午起，大使馆的几个接待室里开

始挤满了新闻记者。瑞典、德国、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电视台的摄制组人员，对于我只因毫无消息而保持沉默，显得极不耐烦，几乎要举行暴动。瑞典大使在 11 时半打电话来，要我接见他，但没有说要谈什么；这件事没能平息紧张情绪，因为会见要过两小时才进行。电话继续发疯似地响个不停。

这时，一家巴黎电台发了一则快讯——一条最新消息，宣布 1971 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授予“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立刻下去会见一大群乱哄哄的新闻媒介人员。幸亏这时我的老朋友让·马塞纳克和阿拉贡来了。杰出诗人和我的法国弟兄马塞纳克大声欢呼。至于阿拉贡，他看来听到这个消息比我还高兴。他们两人帮助我度过新闻记者骚扰的困难时刻。

我刚做过手术，有贫血症状，而且走路摇摇晃晃，不怎么想动。当晚，有几位朋友来和我一起吃饭。他们是意大利来的马塔，巴塞罗那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来的西凯罗斯，加拉加斯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在巴黎当地的阿图罗·卡马丘·拉米雷斯，从他隐藏地来的科塔萨尔。还有智利人卡洛斯·巴萨略，他从罗马来，要陪我去斯德哥尔摩。

拍来的电报堆成一座座小山，这些电报我至今都没能完全看过，也没能答复。我收到的无数信件中，有一封古怪的、气势汹汹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先生从荷兰写来的，他是个健壮的黑人，这从他附来的那份剪报上可以看出来。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代表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我曾经要求一张参加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予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的请柬。在瑞典大使馆，有人通知我要准备一件燕尾服——这种场合绝对要穿的礼服。我没钱买燕尾服，也决不穿租来的礼服，因为穿旧衣服会使一位自由的美洲人丢脸。所以我通知您，我将用凑到的一点点钱到斯德哥尔摩去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揭露那个授奖仪式的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性质，以此对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人民性的诗人表示敬意。”

11 月，马蒂尔德和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有几位老朋友陪我们去。我们被安排下榻在豪华的格兰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寒冷的美丽城市，王宫就在我们窗子对面不远处。当年在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的获奖者，也都住在这家饭店里，他们是些很不相同的人，有的说话滔滔不绝，举止彬彬有礼，有的像刚刚偶尔走出车间的机械工人那么简朴而且土气。德国人威利·勃兰特没有住在这家饭店，他将在挪威接受授予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真是遗憾。因为在所有获奖者中，他是最想结识并与之交谈的人。后来我只能在招待会上看见他，而且相隔三四个人。

我们必须为这次盛大的仪式举行一次事前排练，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在将要举行仪式的地方指导我们排演。人们十分认真地在预定的钟点起床并离开饭店；准时来到一座空落落的大楼；毫无差错地登上几道楼梯：按严格的次序走向左边和右边；坐到主席台上授奖日我们该坐的那把扶手椅上——看到这些确实感到很滑稽。这一切都面对着电视摄像机进行，而且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这里最显眼的是国王和王室的专座，也黯然地空着。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瑞典电视台为什么有这种怪念头，要把这么糟的演员进行的排练摄制成电视片。

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是和圣露西亚节¹的庆祝活动同时开始的。饭店走廊里的悦耳歌声把我惊醒；不一会儿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少女头戴花冠，

在点燃的蜡烛的照耀下，走进我的房间。她们给我送来早餐，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幅画着大海的长长的美丽图画。

不久，发生了一件惊动斯德哥尔摩警察的事。在饭店接待处，有人交来一封给我的信，署名的就是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那个放肆的反殖民主义者。他写道：“我刚刚到达斯德哥尔摩。”他要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企图已告失败，但是作为革命活动家，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卑微者和受压迫者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不能穿燕尾服去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他买了一把修枝剪，要用这把剪刀公开剪掉我“燕尾服的后襟和任何别的垂下来的东西”。“为此我履行我的义务，事先警告你。您看见大厅尽头有个黑人拿着很大的修枝剪站起来时，就该猜到要出什么事了”。

我把这封荒唐的信交给那位年轻的外交官，他是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始终陪我忙这忙那。我笑着对他说，我在巴黎时就收到过这个疯子的另一封信了，我认为我们不必当回事。这位年轻的瑞典人却不同意。

“在这个争斗不休的时代，最出人意料的事都可能发生。提醒斯德哥尔摩警方是我的责任。”他对我说，接着就飞快地去完成他认为属于他的责任的那件事。

我应该指出，陪我到斯德哥尔摩的人中，有委内瑞拉人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这位杰出的作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我认为他不仅是美洲意识的杰出代表，也是我的一位无与伦比的朋友。离举行仪式还剩几个小时。吃午饭中间，我议论起瑞典人对待抗议信何等认真。当时奥特罗·席尔瓦正和我们一起用餐，他在自己额头猛拍一巴掌，嚷道：

“巴勃罗，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为了捉弄你一下。现在警察正在查找一个不存在的闹事者，我们该怎么办？”

“你大概要给送到牢房去。为了你这个加勒比海的野蛮人干的恶作剧，你要替那个乔治敦人受处罚。”我对他说。

这时，我那位年轻助手向当局报警回来了，坐到我们这张桌旁来。我们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是个恶作剧。肇事人现在正跟我们一起吃饭。”

他又急忙出去。但是警察已经跑遍了斯德哥尔摩的所有饭店，查寻来自乔治敦或其他类似地方的一个黑人。

与此同时，警方依然保持戒备。在参加授奖仪式和离开庆祝舞会时，马蒂尔德和我发现，抢先跑来照顾我们的不是惯常的那些招待员，而是四五个足以对付修枝剪袭击的魁梧、健壮的金发保镖。

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观众很多，安静、守纪律，鼓掌适时，彬彬有礼。年迈的国王和我们每个人握手，给我们颁发证书、奖章和支票；我随即回到主席台的座位上去，台上已经不像排练时那么空荡，现在摆满了鲜花，座无虚席。有人说（也许是人们为了让马蒂尔德留下深刻印象而对她说出的），国王和我比和别的获奖者在一起的时间要长些，同我握手的时间也更长些，对待我显然很亲切。这也许是古代宫廷对游吟诗人的遗风。无论如何，别的国王从没有握过我的手，握手时间是长是短更不用提了。

毫无疑问，严格按礼仪进行的那次仪式，当然是很隆重的。意义重大的时刻举行大典的做法，也许将永远流行世上。看来人类需要它。但是，在那个杰出获奖者的庆典和外省小城的小学发奖仪式之间，我发现了有趣的相似之处。

小智利

我从伊瓦涅斯港来，浩瀚的卡雷拉将军湖，它那金属般的湖水有如大自然心血来潮的产物，使我感到惊奇；只有古巴的巴拉德罗绿松石般的海水或我们的彼得罗韦，可以与那湖水相比。然后是伊瓦涅斯河上奔腾的瀑布，那是该河令人震惊的壮丽景观的不可分割部分。该地区人民的隔绝状态和贫困生活，也使我为之动容；他们守在巨大的水力资源近旁，却没有电灯；生活在无数绵羊中间，穿的却是破衣烂衫。我终于来到了小智利。

我抵达那里时天已向晚，等待我的是无边的苍茫暮色。风吹个不停，把石英似的云彩吹得粉碎。有一大块云被风留在天地之间，几条闪着蓝光的河流把这片辽阔的地段分隔成孤岛。

放牧的和播种的土地，在极地大风的压力下挣扎。周围耸立着“岩石城堡”的坚固高塔，它有刀削似的尖，哥特式的塔顶，花岗石的天然雉堞。不规则的艾森诸山有的圆如球，有的高耸平坦像桌子，上面有长方形和三角形的雪堆。

天空在用薄纱和金属织造它的晚霞——黄云在空中闪烁，像只巨鸟悬浮在澄彻的穹苍。一切都瞬息万变，忽而变成鲸鱼的大嘴，忽而变成火红的豹，忽而又变成形状抽象的彩灯。

我觉得在我头上展开的无垠空间，要我作耀眼的艾森山的见证。艾森山有无数山冈、瀑布、千万株枯死和烧焦的树（它们在控诉那些古代的杀人凶手），作为一个一切都已齐备、正在诞生的世界，它沉默无语，这是祭天、祭地的仪式。然而，那儿没有什么庇护、缺乏公众秩序、建筑物和人。生活在如此沉重的孤独中，需要的是与广袤空间相称的博大爱心。

当晚霞暗淡下去，蓝色夜幕倏然落下时，我走了。

九月的旗帜

在拉丁美洲大陆的南方，9月是轻松的、百花盛开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份，到处旗帜招展。

上一世纪初叶，在1810年，也在9月，南美洲许多地区爆发了或是加强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

如今在9月，我们南美洲人追忆当年的解放，纪念英雄，迎接漫山遍野的春天，这春天跨过麦哲伦海峡，在南巴塔哥尼亚和合恩角催开百花。

由墨西哥到阿根廷和智利萌生的革命，是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对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革命领袖们是各不相同的。博利瓦尔是个有先见之明的战士和贵族；圣马丁是一支军队的天才组织者，这支军队曾经越过本地球上最高也最有敌意的山脉，去智利为解放它而进行决战；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和贝尔纳多·沃伊金斯是智利最早的军队的缔造者，也是最早的印刷厂的创建者和第一批反奴隶制法令的制定者，智利废除奴隶制比美国要早许多年。

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和博利瓦尔及其他一些解放者一样，出身于土生白人贵族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与美洲西班牙人的利益强烈抵触。人民不是有组织的整体，而是为西班牙统治者役使的广大奴隶群体。博利瓦尔和卡雷

拉这些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著作的饱学之士、西班牙军校的学生，有义务打破孤立和愚昧的障壁，去激发民族精神。

卡拉拉的一生如闪电般短促而且灿烂。若干年前，我汇集出版过一本前人追忆他的书，书名叫《不幸的轻骑兵》。他那极具魅力的品格，把各种矛盾冲突吸引到他的头上，有如避雷针之吸引电火花。他终于被刚刚宣告成立的阿根廷共和国的执政者在门多萨枪决了。他不顾一切要推翻西班牙统治的愿望，使他成了阿根廷大草原上不驯的印第安人的首领。他围攻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把它攻克。他的夙愿是解放智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仓促地发动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最终被推上刑场。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革命吞没了自己的一位非常出众和勇敢的儿子。历史把这一流血事件归罪于沃伊金斯和圣马丁。但是，9月这个春意盎然、旗帜招展的月份的历史，用它的翅膀保护着对三位英雄人物的追忆，他们曾以莽莽的南美大草原和终年不化的冰天雪地为大舞台，进行过多次战斗。

智利的另一位解放者沃伊金斯是个谦和的人。若不是他年仅17岁时在伦敦偶遇一位老革命者，他的一生也许是默默无闻和平静的；这位老革命者当时奔走于欧洲的所有宫廷，谋求对美洲解放事业的援助。他名叫堂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除了其他朋友，他还拥有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好感和有力影响。他使用俄国护照前来巴黎，并进出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

这是一个浪漫故事，具有“时代”的旋律，好似一山歌剧：沃伊金斯是一个西班牙总督的私生子，是个幸运的爱尔兰裔军人，当过智利的统治者。当米兰达明白沃伊金斯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起义很有用处时，他就想方设法查明这个青年的身世。有人说过，他曾向年轻的沃伊金斯透露其身世秘密，促使他参加起义行动。这个青年革命者跪倒在地，拥抱米兰达，辍泣着保证立刻动身到他的祖国智利去，要在那里领导反抗西班牙势力的起义。沃伊金斯是在反抗殖民制度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人之一，他还被人认为是我们共和国的国父。

米兰达后来被西班牙人俘获，死于加的斯的泣卡拉卡监狱。这位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将军和革命者的导师的遗休，被装时袋子，从监狱的高处投入海中。

圣马丁被他的同胞流放，孤独地老死在法国的布洛涅。

智利的解放者沃伊金斯死于秘鲁，远离他所爱的一切事物；他是被土生白人大庄园主阶级放逐的；大庄园主阶级很快便篡夺了革命。

不久前我路过利马时，在秘鲁历史博物馆见到沃伊金斯将军晚年画的几幅画。这几幅画全部以智利为主题。他画了智利的春天，画了9月的树叶和花朵。

在这9月里，我不禁想起那个起义时代里的人、事件、爱情和痛苦。一个世纪后民众又激愤不安起来，一股强劲的风和愤怒吹动了旗帜。从那遥远的年代开始，一切都变了，但是历史仍然在前进，一个新的春天将充满我们美洲无限广阔的空间。

普雷斯特斯

没有一位美洲的共产党领袖有过像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那么不幸和奇特的一生。他是巴西的一位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英雄人物；他的真实生

活和有关他的传说早已超越种种意识形态的局限，他已经成为古代英雄的活化身。

因此，当我在黑岛收到访问巴西并与普雷斯特斯结识的邀请时，我立即接受了。此外，我得知没有别的外国人被邀请，这使我深感荣幸。我感到，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他的复活。

普雷斯特斯被囚禁了十多年之后，刚刚获得释放。这种长期囚禁，在“自由世界”里并不是什么例外情况。我的朋友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在土耳其的一所监狱里度过了十三四年。现在，在我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有六七位巴拉圭共产党人已彼活活埋葬了12年，与外界毫无联系。普雷斯特斯德国出生的妻子，被巴西的专制政府交给了盖世太保。纳粹分子用锁链把她锁在船上送去受折磨。她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被这位领袖的母亲、不知疲倦的助产士堂娜莱奥卡迪亚·普雷斯特斯从盖世太保的虎口中拯救出来，现在与她的生父生活在一起。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的妻子在一所监狱的院子里分娩之后，就被纳粹分子斩首了。所有这些受折磨的生活经历，使得普雷斯特斯虽经多年囚禁，也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他母亲堂娜莱奥卡迪亚·普雷斯特斯仙逝时，我正在墨西哥。她曾在世界各地奔走，要求释放她的儿子。墨西哥合众国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曾致电巴西独裁者，要求给普雷斯特斯几天的自由，准许他参加他母亲的葬礼。卡德纳斯总统在电文中亲自担保普雷斯特斯将回监狱去。热蒂利乌·瓦尔加斯的答复是拒绝。

我与全世界同样感到愤慨，与了一首诗纪念堂娜莱奥卡迪亚，怀念她没有到场的儿子，并谴责暴君。

这位崇高的夫人徒然为争取释放儿子而敲打世界的大门，我在她的坟前朗诵了这首诗。我的诗开头是克制的：

夫人，您已使我们的美洲伟大更伟大，
您给了它一条水流充沛的清澈大河，
您给了它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
无愧于您伟大祖国的儿子。

但是，随着诗的展开，对巴西暴君的声讨越来越激烈了。我继续到处朗诵这首诗；它被印成传单，还印在寄往大陆各地的明信片上。

有一次我途经巴拿马，在一场朗诵会上朗诵了我的情诗之后，又朗诵了这首诗。会堂里挤满了人，巴拿马地峡的炎热使我浑身出汗。我朗诵起对瓦尔加斯的谴责时，感到喉咙发干。我停下来，伸手去端放在我身旁的一个杯子。这时我看见有个穿白衣服的人，急匆匆向进台走来。我以为他是会堂的低级职员，就把杯子递过去，要他给倒满水。但是，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气冲冲地拒绝了，他朝听众神经质地喊道：“我是巴西大使。我抗议，因为普雷斯特斯只不过是普通罪犯……”

听众用震耳欲聋的哨声打断他的话。一位身体宽厚得像橱柜的黑人青年学生从会堂中央站起来，向讲台挤过来，把手危险地伸向那个大使的喉咙。我急忙去保护那个外交官，谢天谢地，我终于让他从这地方离去，没有使他的身份受到太大的损害。有过这么一段往事前因我从黑岛前往巴西参加民众的庆祸活动，对大部分巴西人来说，便是理所当然的了。目睹圣保罗的帕卡

恩布体育场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感到惊讶。据说那天体育场里有 13 万人之众。在体育场宽大的圆形场地里，群众的头显得很小。坐在我旁边的普雷斯特斯，身材矮小，我觉得他像个刚从坟墓里出来的拉撒路，为了这一场合而修整得光洁一新。他骨瘦如柴，苍白得达到透明的程度，这是囚犯所特有的苍白。他那热切的目光、暗紫色的大眼圈、极度虚弱的面色、端庄的神态，都使人想起他一生中长期献身的壮举。但是，他说起话来却平静得像个得胜的将军。

我朗诵了一首几小时前写就的向他致敬的诗。若热·亚马多仅仅把诗中西班牙语的“泥瓦匠”一词改为葡萄牙语的“石匠”。尽管我很担心，我用西班牙语朗诵的诗人们还是听懂了。我缓慢地朗诵，每朗诵完一行诗，巴西人都报以掌声。他们的掌声在我的诗中激起深沉的回响。一个诗人在 13 万人面前朗诵了自己的诗句，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在有了这样的体验之后，他也不可能照原来的方式写诗了。

我终于和这位传奇式的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面对面地会晤了。他在他的几位朋友家中等候我。这回他的全部特征——他的矮小，瘦削、透明纸似的苍白，都像微型画一样纤毫毕见。他的言谈，也许还有他的思想，看来与他的外形十分相配。

他为人不苟言笑，对我却非常亲切友好。我认为，他给了我诗人们经常会得到的那种亲切对待，很像大人对小孩说话时所采取的一种介乎温柔和敷衍之间的宽厚态度。

普雷斯特斯邀请我下一周的某天去吃午饭。于是我发生了一件大不幸的事，这只能归因于命运或我的缺乏责任感。问题出在葡萄牙语上，虽然它有与西班牙语相同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周的其他日子却不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之类的词来表达，而用 segunda-feira, terça-feira, quarta-feira 这些该死的名称，单单缺了第一个 feira。这些 feira 完全把我搞糊涂了，根本不知道说的是哪一天。

我和一位漂亮的巴西女友在海滩上待了几小时，不过我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普雷斯特斯曾约我第二天去吃午饭。到了星期三，我才知道普雷斯特斯在星期二摆好饭菜白等了我，而我当时却在伊帕内马海滩消磨了几小时。他到处找我，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为了尊重我的嗜好，这位苦行的上尉订购了巴西极难买到的上等好酒，准备我们两个单独吃一顿午饭。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难为情得要死。我一生中，什么都能学会，除了葡萄牙语一周内每一天的名称。

科多维拉

我正要离开圣地亚哥时，得知维托里奥·科多维拉要跟我谈谈，于是我去看望了他。我和他始终是好朋友，直到他去世。

科多维拉曾经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具有那个时代的全部缺点。他是个人人格至上主义者，很专横，总认为自己正确。他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侵犯他人意志如同刀子切黄油。他出席会议总是匆匆忙忙的，让人感到他把一切问题都考虑过，也都解决了。他听取别人意见似乎只是出于礼貌，而且有一定的耐心，一听完意见，他就发出专断的指示。他才干过人，

他的总结能力令人折服。他工作起来片刻不停，而且强使他的同志按这种节奏工作。他总让我感到，他是那个时代的一台出色的政治思想机器。

他对我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和尊重的感情。这位功利主义的意大利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宽厚，具有富于洞察力的艺术家的感觉，这使他理解文化人的错误和弱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生活中显得铁面无情，有时还给人造成不幸。

他对我说，普雷斯特斯对庇隆的独裁统治没有正确认识，他为此很担忧。科多维拉认为，庇隆及其运动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延伸部分。任何反法西斯战士都不能消极接受庇隆扩张势力，也不能接受他一再采取的镇压行动。科多维拉和阿根廷共产党认为，在那个时刻给予庇隆的唯一回答就是起义。

科多维拉要我同普雷斯特斯谈谈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这不是一个任务；但从他特有的那种自信中，我觉察到他的担忧。

帕卡恩布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之后，我与普雷斯特斯作了一次长谈。天底下决不可能找到一对比他们俩更加不同、更加对立的人。那位阿根廷籍的意大利人高大而丰盈，仿佛永远占满整个房间、整张桌子以及周围的全部空间；普雷斯特斯身体瘦削，过着苦行的生活，纤弱得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窗外去。

但是，透过他们的外表，我发现这两个人同样固执。

“阿根廷没有法西斯主义；庇隆是个政治领袖，但决不是法西斯头子。”普雷斯特斯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道。“哪里有褐衫党徒、黑衫党徒、法西斯民兵呢？”

“此外，科多维拉是错误的。列宁说过，不能拿起义当儿戏。如果没有兵，只靠一些志愿者，那是绝对不能宣战的。”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内心深处都是坚定不移的。也许他们之一的普雷斯特斯，在这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两个令人钦敬的革命者的武断，时常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使我感到窒息的气氛。

我应该补充一句，科多维拉是个生气勃勃的人。我非常赞同他对共产主义时代的假正经和清教主义进行斗争。往昔献身于信仰的时代我们杰出的智利人拉斐特，主张禁酒到了入迷地步。这位老拉斐特还时刻喋喋不休地反对男女党员的婚外爱情关系和风流韵事。科多维拉用他巨大的活力击败了我们这位思想狭隘的导师。

斯大林

许多人认为我是或曾经是个重要的政治家。我不知道，这个天大的传奇故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我的一张邮票大小的相片，刊登在《生活》画报向读者展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人物的两个专页上，着实感到吃惊。我的肖像挤在普雷斯特斯和毛泽东中间，我觉得是个有趣的玩笑，不过我决不去澄清事实，因为我始终厌恶更正信件。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在世界各地派有 500 万特工，却也犯了错误，这是很有趣的事。

我与社会主义世界的重要领袖有过的最长一次接触，是在我们访问北京期间。那是在一次庆祝会上，我与毛泽东互相祝酒。他在碰杯时用含笑的眼睛看我，半是亲切半是诙谐地笑得很开朗。他拉住我的手，握的时间比通常

长几秒钟。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访问过苏联许多次，一次都没见到过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贝利亚，也没见过米高扬和季维诺夫——最后这两个人比其他几个要容易接近些，也更少些神秘色彩。

我不止一次远远望见斯大林，而永远是在同一地点：每年5月1日和11月7日在高耸于红场上的、站满高级领导人的观礼台上。我是斯大林奖评奖委员会委员，曾在克里姆林宫一待好几小时，我们从来没有在走廊上碰到他；我们讨论中或进餐时，他也没有来看过我们，也没有召请我们去并向我们致意。各项斯大林奖总是一致批准授予的，不过事先在选定候选人时并非没有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论。我总觉得，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评奖委员会秘书处准有人带着这个决定去看看那位大人物是否认可。但是，我确实不记得他有过任何反对意见；尽管可以感觉到他就在近处，我也不记得他有过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表示。斯大林显然是有计划地给自己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不然他就是个非常胆怯的、自我封闭的人。可能是这种性格使贝利亚具有了左右他的意志的影响力。贝利亚是进出斯大林房间无须通报的绝无仅有的人。

但是有一次，我与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神秘人物有过意外的爪葛，至今我都觉得非比寻常。那次我和阿拉贡夫妇（阿拉贡和埃尔萨）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当年斯大林奖的评奖会。一场大雪使我们滞留在华沙，我们肯定不能按时到会了。一位陪同我们的苏联人负责把阿拉贡和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用俄文电告莫斯科，这个名单也实际在会上获得通过。但令人奇怪的是，接到电话答复的那位苏联人却把我叫到一旁，意外地对我说：

“聂鲁达同志，祝贺您。当有可能获奖的人的名单呈交斯大林同志时，他大声说：‘名单上为什么没有聂鲁达？’”

翌年，我获得争取和平和人民友谊斯大林奖。可能我值得荣获这个奖，但是我总在问自己，那位与我们相距遥远的人物怎么会知道有我这个人。

就在当时，我得知还有斯大林进行干预的其他类似例子。当反世界主义运动日益加强时，当“硬领”宗派分子要爱伦堡的脑袋时，一天早晨，这位《胡利奥·胡雷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的作者家的电话响了。柳芭接的电话。一个隐隐约约的陌生声音问道：“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吗？”

“这得看情况，”柳芭说道，“您是哪位？”

“我是斯大林。”那声音说。

“伊利亚，一位爱开玩笑的人打给你的电话。”柳芭对爱伦堡说。

但是，作家一接电话，就听出大家都熟悉的斯大林的声音。“您的《巴黎的陷落》那本书我看了一晚上。我打电话是要告诉您，亲爱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要继续多写几本像这本这么有趣的书。”

也许是这次意外的电话，才使伟大的爱伦堡有可能活了许多年。

还有一件事。马雅可夫斯基已经去世，他那些顽固、反动的敌人却咬牙切齿攻击对诗人的悼念，坚决要把他从苏联文学的地图上抹掉。这时发生一件事，打乱了他们的企图。马雅可夫斯基的爱人莉莉·勃里克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向他指出这种攻击是可耻的，并且热情捍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攻击者们以为，靠拉帮结伙那套庸俗的东西保护，就可以免受惩罚。结果他们大失所望。斯大林在莉莉·勃里克的信的页边批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时代最杰出的诗人。”

从此以后，出现了一批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那别具

一格的诗也大量出版了。攻击者们在耶和华的号声里呆若木鸡。

我还得知，斯大林去世时人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一份他亲笔写有“不要触动”字样的名单。这份名单打头的是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以下是爱森斯坦、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等等杰出人物的名字。

很多人认为我是个信念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法西斯党徒和反动派早已把我描绘为斯大林的抒情注释者。我对此并不特别气恼。在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里，做出任何结论都是可能的。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意识到在斯大林问题上，许多方面敌人占了理。这一揭露震撼心灵，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痛苦。有些人感到受骗了，不顾一切地接受了敌人的论点，并转而站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另外一些人则想到，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无情地揭露出来的可怕事实，恰恰证明，把历史真实公诸世界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后继续存在下来的共产党，是坚强的。

尽管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但揭露那些罪行，使我们回到了自我批评和解剖问题——我们学说的基本要素——上去，还交给我们防止如此可怕的事情重演的武器。

我的立场是：由于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时代的黑暗面，出现在我眼前的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是个隐士般简朴的、坚持原则的好心人，是捍卫俄国革命的巨人。此外，这位留有厚厚的小胡子的小个子，是在战争中变得高大的；苏联红军曾高喊着他的名字去进攻并摧毁希特勒恶魔的堡垒。

不过，我只献过一首诗给这个权势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可以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中找到。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巨人之死，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人类大森林颤抖了。我的诗抓住了那种地震的恐惧感。

单纯的教训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很气愤地告诉我，在莫斯科，他们要把他神奇的书《百年孤独》中的几段性爱描写删去。“‘这太糟了。’我对出版者说。

“‘对这本书没什么损害。’他们答复我说，我意识到他们那样做并非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做了删节。”

诸如此类的事该如何处理？我越来越找不到社会学的依据了。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除了我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对于人类难以消除的矛盾，越来越不理解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必须进行抉择。进行抉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怕的非正义战争、持续的压迫、金钱的侵蚀，一切不公正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有条件的“自由”、性、暴力、很方便地按月付费的娱乐，都成了旧制度的诱饵。

当今的诗人寻觅过摆脱苦恼的出路。有些人已经逃往神秘主义，或是逃往理念的梦境。另一些人迷恋于青年人自发的破坏性暴力，变得只关心眼前，而不去考虑在现今战火频仍的世界上，这种做法向来都是导致镇压和无谓的苦难。

在我的党即智利共产党内，我发现有一大群单纯的人，他们把个人虚荣心、首领独裁制、物质利益，都远远地抛到脑后。我结识了一些为大众的正

气即为正义而斗争的正派人，因而感到幸福。

我的党很谦逊、谨慎，为智利人民——我的人民——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我和我的党从未有过芥蒂。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希望自己像同志们那样单纯，百折不挠和不可战胜。我们从未学会足够的谦恭。那种个人主义的清高抱着怀疑论不放，为的是不去分担人类的苦难，它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效益。

菲德尔·卡斯特罗

胜利进入哈瓦那之后两周，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加拉加斯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是来公开感谢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给予他的帮助的。这一帮助包括他的军队所需的武器，提供武器的当然不是新当选的总统贝坦库尔特，而是他的前任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将军。拉腊萨瓦尔曾经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委内瑞拉左派的朋友，应左派的要求同意采取与古巴团结一致的行动。

我看到，这位古巴革命的年轻获胜者得到了少有的最热烈的政治性欢迎。菲德尔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最大的艾尔西伦西奥广场，连续讲了4小时话。我是不出声地站在那里聆听那次长篇演说的20万人之一。如同对其他许多人一样，菲德尔的演说对于我是一种启示。听着他对广大群众的讲话，我认识到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我很喜爱他新颖的语言。那些最杰出的工人领袖和政治家往往把内容可能有价值的套话说了又说，然而重复多了就变成陈词滥调，苍白无力。菲德尔不懂诸如此类的套话。他的语言自然而循循善诱；似乎他自己在讲话和教导别人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学习。

贝坦库尔特总统没有在场。一想到面对加拉加斯市民他就发怵，他在那里从来不受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说中每次提到他的名字，立即响起阵阵日哨声和起哄声，菲德尔只得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我认为，那天在贝坦库尔特和那位古巴革命者之间打上了明显的仇视的印记。当时菲德尔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讲的话与那种政治立场相去颇远。我个人认为，菲德尔的那篇演说，他那炽热、突出的个性，他激发起来的群众的热情，加拉加斯人民聆听他演说所怀的强烈感情，使贝坦库尔特这位老派政治家、开合法和非法会议的老手伤透了心。从此以后，凡贝坦库尔特认为多多少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或与古巴革命有关的一切，都毫不留情地压制。

群众大会后的第二天，我正在乡下参加星期日野餐，这时有几辆摩托车开到我们跟前，交给我一张古巴大使馆的请柬。他们找了我一整天，最后才发现了我的下落。招待会就在当天下午举行。马蒂尔德和我直奔大使馆。宾客如云，大厅和花园里挤得满满登登。大使馆外人群麋集，通往这座使馆的各条街道难以通行。

我们穿过挤满人群的大厅，穿过一条高举鸡尾酒杯的臂膀形成的壕沟。有人领我们走过几条走廊和几道楼梯，一直走到另一层楼上。菲德尔最亲近的女友和秘书塞莉亚，在我们料想不到的地方等候我们。马蒂尔德和她一起留下；我被带往隔壁的那个房间。我觉得这是一间勤杂人员——诸如园丁或司机——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有人刚刚匆匆起床，被单凌乱，一个枕头掉在地上。卧室的一角有一张小桌子，此外别无他物。我想，也许会把我从那里带往一间像样的小会客室，去会见卡斯特罗少校。但是，事情并非如此。房门忽然打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身躯堵满了门洞。

他比我高一头，他快步向我走过来。

“你好，巴勃罗！”他对我说，并紧紧地拥抱我，紧得让我透不过气来。

他那孩子似的细嗓音使我感到意外。他的外貌在某些方面也跟他嗓音的声调相符。菲德尔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大人，而是一个腿突然长长的大孩子，还保持着稚气的面孔和少年人刚刚露出一点的胡子。

他突然放开我，像触电似地转过身，果断地走向房间的一个角落。这时我还不知道有个新闻摄影师已经悄悄进来，从这个角落把他的相机对准我们。菲德尔一下子冲到他身旁。我看见菲德尔掐住摄影师的脖子，并摇晃他。相机掉到地上。我走到菲德尔身边，抓住他一只胳膊，看着小个子摄影师徒然的挣扎而担心。菲德尔把他推到门口，硬是把他轰走了。然后，他笑眯眯地转向我，从地上捡起相机，把它扔到床上。

我们没有谈论这次意外事件，而谈起了建立一个全美洲的通讯社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拉丁通讯社”就是这次谈话的产物。随后，我们各自走一个房门回到招待会上去。

一小时后，当我们马蒂尔德一起从大使馆返回时，那位摄影师惊恐万状的脸和那位游击队首领本能地觉察背后有人悄悄闯入时反应之神速，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就是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晤。他那次为什么如此断然地拒绝摄影呢？他这样做含有某种小小的政治秘密吗？我至今都不明白，我们的会晤为什么需要如此保密。

我与切·格瓦拉的第一次会晤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这次会晤是在哈瓦那进行的。夜间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应邀到财政部（也可能是经济部，我记不准了）他的办公室去见他。他和我约定的时间是半夜，可是我参加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官方活动，又被安排坐在主席团里，因此我迟到了。

切足登长靴，身穿军服，腰间带着手枪。他的装束与办公室的银行气氛很不协调。

切皮肤黝黑，说话缓慢，阿根廷口音很重。他是那种适于在大草原上一杯一杯地品着马黛茶慢悠悠地交谈的人。他的句子简短，并以微笑告终，仿佛言犹未尽。

他对我说起我的《漫歌集》那本书，我听了很高兴。在马埃期特拉山上，他经常在晚上念这本书给游击队员们听。现在虽已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我的诗句在他逝世时也陪伴着他，我还是会浑身战栗。我从雷吉斯·德布雷那里得知，在玻利维亚群山中，到最后一刻还保存在切的背包里的只有两本书：一本算术课本和我的《漫歌集》。

那天夜里切对我讲了一些话，使我着实迷惑不解，不过这些话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视线从我的眼睛移向办公室那扇黑洞洞的窗子。我们谈到美国对古巴可能发动的入侵。我在哈瓦那街头看见了散置在各战略据点的沙包。他忽然说：

“战争……战争……我们总是在反对战争，但是，我们打过仗后就再也离不开战争了，时时刻刻都想回到战争中去。”

他大声地自言自语，也为了说给我听。听了他的话，我确实大吃一惊。在我看来，战争是一种威胁，绝不是目的。

我们分手了，从此永远没有再见面。后来，他在玻利维亚大森林里战斗，

并悲惨地死去，但是，我仍然看见切·格瓦拉这位好沉思的人，始终在武器近旁给诗留下一个位置。

拉丁美洲非常喜欢“希望”这个词。我们爱听人家把我们叫做“希望的大陆”。众议员、参议员、总统的候选人都把自己叫做“希望的候选人”。

这种希望事实上有点像上帝许诺的天国，有点像不断延期兑现的空头支票。延期到下一届立法会议，延期到下一年或下一世纪。

古巴革命产生时，千千万万南美洲人突然觉醒了。他们不相信自己听到的事实。在向往希望中绝望地生活的大陆的各种有关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这件事。

就这样，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

从那时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们却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一个非常强大和十足的帝国主义邻国企图压碎古巴的希望及其一切。美洲的民众天天看报，夜夜听广播。他们每次都高兴地舒了口气。古巴存在着，又存在了一天，又存在了一年，又存在了5年。我们的希望没有被绞杀，它决不会被绞杀。

古巴人的信

秘鲁作家（其中有许多人永远是我的朋友）很久以来一直在施加压力，要他们的国家授予我一枚官方勋章。坦白地说，我始终觉得这类勋章是十分可笑的东西。少数几枚这类勋章我不得不毫无好感地挂在胸前，是为了尽职，是为了当好领事，也就是为了尽义务和例行公事。我有一欢途经利马，杰出的小说家、《饿狗》的作者西罗·阿莱格里亚 当时是秘鲁作家协会主席，坚持要他的国家给我授勋。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已经成为秘鲁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我的诗句成功地表达了有如那座大建筑的石块般长眠的某些感情。此外，当时的秘鲁总统、建筑师贝朗德 是我的朋友兼读者。后来，强行把他赶出祖国的革命，意想不到地给了秘鲁一个开辟历史新途径的政府，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建筑师贝朗德是个无可非议的正直的人，执著于有点空想的事业终于使他脱离可怕的现实，并使他与深深爱他的人民分开了。

我接受了授予的勋章，这次不是为了我的领事职务，而是为了我的一首诗。此外，这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智利人民和秘鲁人民间还有未愈合的伤口。不仅运动员们、外交家们和国务活动家们有义务尽力把过去流的血止住，诗人们更有理由也应当这么做，因为诗人的心灵中更少些疆界。

就在那个时期，我去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去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应邀的人中有我的朋友阿瑟·米勒 、阿根廷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和维多利亚·奥坎波 、乌拉圭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与会的还有来自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们。

到达时有人通知我，古巴作家也受到了邀请。但是卡彭铁尔没有来，因此国际笔会里有人感到奇怪，要求我把这件事弄清楚。我去找拉丁通讯社驻纽约的代表，他提议我发一封电报给卡彭铁尔。

经由拉丁通讯社转来的回电说，卡彭铁尔不能来是因为邀请到得太迟，赴美签证还没有办好。此事看来是有人撒谎了，因为签证3个月前就已批准，古巴人也在3个月前知道得到邀请并且接受了邀请。我明白，一定是最高当局在最后一刻做出了不出席的决定。

我一如既往，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我举办了我在纽约的第一次诗歌朗诵会，观众如潮，只得在剧院外安上电视屏幕，让几千未能入场的观众聆听和观看。我那些强烈反帝的诗在这些美国群众中引起的反响，使我激动不已。在那里以及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当学生和普通群众表示赞同我谴责帝国主义的词句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亲眼证实了，那些与我国人民为敌的美国佬，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我接受了几次新闻采访。由一些外来的拉丁美洲人主办的西班牙语版《生活》画报，对我的意见加以歪曲和删节。我要求予以更正。他们却不加理睬。不过，删改情况并不严重。他们删去的是我谴责越南战争的一段话，还删去我谈及当时被杀害的一位黑人领袖的另一段话。数年之后，那位报道这次会晤的女记者才证实，那篇文章是经新闻检查机构处置过的。

我在访美（此事要归功于我的同行美国作家们）期间得知，美国作家为了使我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对有关当局施加了不懈的压力。我记得好像他们甚至威胁国务院说，如果还要拒绝批准我进入美国，国际笔会就通过一项决议进行谴责。在一次公众集会上，美国诗坛最受尊敬的人物、许多个月后去世的年迈的女诗人玛丽安·穆尔 获得一个荣誉称号，她发言为我由于诗人们团结一致的努力得以合法进入美国而表示高兴。有人告诉我，她那颤抖的动人言词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然而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的是，我经过这次以最富战斗性的政治与诗歌活动（其中大部分为了捍卫并支持古巴革命）为特征的旅行之后，刚刚回到智利，就收到古巴作家们那封恶名昭著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们就差没指责我奴颜婢膝和背叛了。我的检察官大人人们的措词，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他们都自封为革命导师，自封为理应指导左派作家的准则的教师爷。他们傲慢、蛮横又花言巧语地力图“纠正”我在诗歌、社会和革命方面的活动。我因《马丘比丘之巅》一诗所获得的勋章，我参加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我的宣言和朗诵会，我在虎穴中反对美国制度的言行，上述作家们都竭力加以怀疑、歪曲和污蔑，其实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刚刚来到革命阵营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得到了新的古巴政府公正或不公正的酬劳。

这个伤人的大信封鼓鼓囊囊地装了许多签名，这些签名都是各个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在会议讲坛上令人怀疑地自发要求签的。那些发起人跑遍哈瓦那，去征集音乐家、舞蹈家、造型艺术家协会的全体成员的签名。同时还号召数不清的路过那里的艺术家和作家签名，他们被慷慨地邀请到古巴，住满了豪华饭店。有几位名字被印在那份不公正的文件末尾的作家，后来托人悄悄给我传递信息说：“我从来没有在信上签过名；我是看到我从未签过的名字之后才知道内容的。”胡安·马里内略的一位朋友暗示我，他就遇到了这种事，虽然我从来无法予以证实。我是从别的事情得到旁证的。

这件事像一个线团、雪球或思想意识上的贪污事件，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被张扬得越来越大。马德里、巴黎和其他首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用以大量散发那封满纸谎言的信件副本。这一信件成千封地发出去，尤其是从马德里发出，给每个收信人都寄去二三十封。收到这种信封装饰着邮票大小的佛

朗哥肖像，里面装着指控巴勃罗·聂鲁达为反革命的信，既叫人好笑，又令人感到其用心险恶。

我根本下去打听那次为什么要冲我撒气，我知道政治上的虚伪、思想上的弱点、文坛的恩怨和嫉妒以及许多别的因素，必然导致这场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战斗。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封著名的签名信的热心的起草者、发起者和签名征集者，就是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和利桑德罗·奥特罗这几个作家。我不记得看过德斯诺埃斯和奥特罗什么作品，也不认识他们本人。雷塔马尔倒是认识的。在哈瓦那和巴黎两地，他经常媚态百出地缠住我。他曾对我说，他经常为我的著作写序，写赞扬我的作品的文章。事实上我从没有看重过他，只把他看作我们时代政治界和文学界的一名蝇营狗苟之徒。

他们也许以为能够伤害或搞垮我这个革命战士。但是，当我来到智利圣地亚哥的特亚蒂诺斯街，第一次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及此事时，他们至少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我说：

“这是对我们智利党的第一次攻击。”

那个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斗争。委内瑞拉、墨西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与古巴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争论。后来，玻利维亚人陷入悲剧的境地，也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了。

智利共产党决定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授予我一枚雷卡瓦伦奖章，这是当时新设立并用以授予党的优秀战士的褒奖。这是一种有分寸的回答。智利共产党明智地应付了那个出现分歧的时期，坚持用内部讨论的方法解决我们的意见分歧。随着岁月流逝，对抗的阴影消失了，拉丁美洲两个最重要的共产党之间又有了透彻理解和兄弟关系。

至于我，我仍然是写过《丰功伟绩颂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因为有它，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诗人。我当然明白，革命尤其是参加革命的人，不时会犯错误，还会陷于不公正。从未见诸文字的人类法则，同样影响着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谁也无法避免错误。在伟大的事业里，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

但是，每个人都有其弱点。我就有许多弱点。例如，我不愿意放弃作为立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自豪感。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或者为了我的其他微不足道的弱点，我至今仍拒绝并将继续拒绝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他们仍然认为是诽谤我的那封信上签过名的人握手言和。

十二、既可爱又冷酷的祖国 过激主义和暗探

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转到非常舒服的地位上去，也就是转到无政府资本主义（政治枪手、准左派分子、假独立人士的渊藪）上去；现在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明天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习惯搞镇压的资本主义往往把共产主义者看作头号敌人，它的瞄准很少是打不中的。所有这些捣乱的个人主义者都受到反动派运用机巧和强制手段所进行的种种奉承，他们都被看作神圣原则的英勇捍卫者。反动派知道，社会变革的危险不在于这些个人主义者的捣乱，而在于群众组织和普遍的阶级觉悟。

这一切我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就已洞若观火了。当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军队向马德里进逼的时候，某些反法西斯团体竟在他们面前举行假面庆祝会，我当然不把那些倔强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内，例如杜鲁蒂和他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曾经在巴塞罗那像狮子那样进行过战斗。

暗探比过激分子坏千百倍。受雇于警方、反动党派或外国政府的敌方暗探，不时地混到革命党派队伍中去。他们有些人执行特殊的挑拨任务；另一些人执行耐心的侦察任务。阿泽夫的经历就很典型。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前，他参加过许多次行刺的恐怖行动，并数度受监禁。十月革命后出版的沙皇秘密警察头子的回忆录，详细记述阿泽夫曾经一直是俄国暗探局的暗探。这个怪人的心灵里既是个恐怖分子又是个告密者，他的罪恶活动使一个大公死于非命。

发生于洛杉矶、旧金山及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城市的事件，乃是另一种此类怪事。在发生一系列麦卡锡主义的疯狂事件期间，地方上的全部共产党员都被拘留了，他们共 75 人，都被编上号码，加以管制，连他们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要记录在案。于是，这 75 人结果都成了警方的暗探。美国联邦调查局很不寻常地允许他们同彼此不相识的人创立自己的小型“共产党”，以便以后迫害他们，并把战胜根本不存在的敌人的轰动性胜利归功于自己。

警方用美元收买的一个前共产党员查默斯，把极具爆炸性的国际机密藏在一棵圆白菜里的荒唐事件，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按这种路数炮制出来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其中处决（应该说是谋害）罗森堡夫妇一案，尤令全人类感到愤慨。

智利共产党是个历史悠久、坚持无产阶级出身的组织，这一类暗探想混进去永远是极困难的。拉丁美洲的游击主义理论却为形形色色的告密者打开了闸门。这一类游击组织的自发性和年轻，使发现和揭露各种奸细更为困难。游击队领导人因此总是心怀疑忌，连自己的影子都不得不提高警惕。充斥拉丁美洲的浪漫激情和游击主义的狂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冒险崇拜。这个时期也许已随着埃内斯托·格瓦拉的被害和英勇死亡而告结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支持这一战术的理论家在本大陆到处传播一些论点和文件，实际鼓吹不把人民革命政府的席位分配给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而分配给形形色色的武装游击队。这一论据的缺点是它政治上的软弱——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杰出的游击队员可能也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与切·格瓦拉的情况相同，但这是碰运气的少数情况。一场游击战的幸存者，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最勇敢的人，仅仅因为面对死神时更幸运，或者面对活人时瞄得更准，就能够去领导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现在我要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当时，我刚刚从墨西哥回到智利。在我出席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有个人走到我身边来向我问好。他是个中年男子，时髦的绅士，衣着考究，戴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眼镜——无边的夹鼻眼镜。他显得非常和气他说：

“堂巴勃罗，我从来不敢接近您，虽然我欠您一条命的情。我是您救出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流亡者之一，当时是您让我们乘上了开到智利来的‘温尼伯号’轮船。我是加泰隆尼亚人，是共济会会员。我在此地已有可靠的地位。我的工作担任某公司的保健商品推销专家，这是智利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他告诉我，他住在圣地亚哥市区的一套讲究的住宅里。他的邻居是一位名叫伊格莱西亚斯的著名网球冠军，此君曾是我的同学。他们常常谈到我，终于决定邀请我并招待我。这就是他来找我的原因。

这位加泰隆尼亚人的那座住宅显示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室内陈设精美，金黄色的肉菜饭十分丰盛。伊格莱西亚斯吃午饭时一直跟我们一起。想起特木科的旧校舍，想起校舍地下室里蝙蝠的翅膀拂过我们的脸，我们都笑了。午餐结束时，那个殷勤好客的加泰隆尼亚人简短他说了几句话，还赠给我两张复制的精美照片，一张是波德莱尔的，一张是艾伦·坡的。两位诗人的华美头像，至今确实仍然珍藏在我的藏书室里。

一天，我们那个加泰隆尼亚人突然中风病倒，躺在床上动也不能动，不能说话，也不能打手势。只有他的眼睛在痛苦地转动，像是要对他的妻子——一位历史清白的、杰出的西班牙共和派——说点什么；或者是要对他的邻居伊格莱西亚斯——我的朋友和网球冠军——说点什么。可是，这个人却什么也不能说、一动也不能动地死了。

当这套住宅里到处是眼泪、朋友和花圈的时候，那位邻居网球手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我们知道您和这个故去的加泰隆尼亚绅士有亲密的友谊。他不停地赞扬您。如果您想为纪念您的朋友帮个大忙，请您打开他的保险柜，把存在柜里的小铁盒取出来。过3天我再给您打电话。”

那位寡妇根本不想听这样的事情；她难过极了，一点儿也不想知道这件事。她离开那套住宅，搬到圣多明各路的一家膳宿公寓去。公寓老板是个南斯拉夫人，是抵抗运动成员，是政治上受过锻炼的人。那位寡妇请他检查她丈夫的文件。南斯拉夫人找到那个金属盒子，费了牛劲才打开它。于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怪事。保存的文件透露，死者曾经一直是法西斯暗探。他的信件副本泄露了数十个秘密返回西班牙的流亡者的姓名，他们都已遭监禁或者被处决了。其中还有一封感谢他的效劳的信。加泰隆尼亚发来的一些指示，要纳粹海军把运送军火离开智利海岸的货船击沉。我国漂亮的护卫舰——智利海军的骄傲、航海经验丰富的“劳塔罗号”——就是这种牺牲品之一。战争期间，它载着硝石驶离我们的托科皮利亚港，就沉没了。这次海难牺牲了16位海军军官的生命；他们有的被淹死，有的被烧死。

这些就是有一天来请我吃午饭的一个笑咪咪的加泰隆尼亚人的罪恶业绩。

共产党人

……我入党以来已经过了不少年……我很高兴……共产党人组成一个美

好的家庭.....他们具有鞣制过的毛皮和受过锤炼的心.....他们到处挨棍子.....挨专打他们的棍子.....招魂术士、保皇派、邪门左道之徒、形形色色的罪犯万岁.....没有骨头的含糊哲学万岁.....又吠又咬的狗万岁.....好色的占星术士万岁.大儒主义万岁，虾万岁，除共产党人之外人人都万岁.....贞操腰带万岁，500 年前就不洗那双意识形态之足的保守派万岁.....穷苦人的虱子万岁，义冢万岁，无政府资本主义万岁，里尔克 万岁，安德烈·纪德同他的小科里登万岁，神秘主义万岁.....一切都很好.....人人都是英雄好汉.....所有的报纸都该出版发行.....除了共产党的报纸，什么报纸都可以出版.....所有的政治家都应当不受约束地进入圣多明各.....除了与特鲁希略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大家都应当来庆祝这个血腥的刽子手之死.....狂欢节、狂欢节的最后几天万岁.....有供大家使用的伪装.....有基督教理想主义者的伪装，极左的伪装，慈善机构的女志愿人员和女慈善家的伪装.....但是要留神，可不许共产党人进入.....把大门关紧.....决不能犯错误.....他们没有干任何事情的权利.....让我们为主观的事物，为人的本质，为本质之本质而操心吧.....这样我们大家都会感到满意.....我们有自由.....自由是何等重要！.....他们却不尊重它，不认识它.....自由为本质操心.....为本质之本质的东西操心.....

.....近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爵士乐走了，灵魂来了，我们在抽象画的基本原理上遭到失败，战争使我们震惊并杀害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一样.....或者都不一样了？.....发表了那么多关于灵魂的演说，头上挨了那么多棍子之后，有的事进展不顺利.....很不顺利.....种种如意算盘落空了.....人民组织起来了.....游击战和罢工接踵而至.....古巴和智利独立了.....许许多多男人和妇女唱起了《国际歌》.....多奇怪.....多叫人伤心.....现在，用汉语、保加利亚语、美洲的西班牙语唱起了这首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必须予以禁止.....必须多讲关于灵魂的事.....必须多为自由世界唱赞歌.....必须多打棍子.....必须多给美元.....在打棍子和对赫尔曼·阿西涅加斯 的恐惧之间，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而现在的古巴.....在我们自己这个半球，在我们的苹果的这一半，这些大胡子都在唱同一首歌.....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教士们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就是教士也不能相信.....他们不关心我们的观点.....他们不关心我们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如何频频下跌.....

.....人类在太阳系奋力攀登时.....在月球上留下了足迹.....除了旧制度，一切都在为变革而斗争.....旧制度的生活产生于中世纪的巨大蛛网.....这蛛网比制造机器的钢铁更结实.....但是，有人相信变革，他们进行了变革，使变革取得了胜利，使变革开花结果.....可了不得：.....春天是不可抗拒的！

诗学和政治学

1969 年差不多一整年，我都是在黑岛度过的。从清晨起，大海就进入奇异的上涨状态，像是在揉制一块无限大的面包。被大海深处寒冷的酵母推着涌起的浪花，白得如同面粉。

凝滞的冬天雾霭迷蒙。我们每天用壁炉里生的火，给它增添地方的魅力。海滩上的白沙献给我们一个孤寂的世界，仿佛从前这片土地上有过居民和避暑的游客。但是，不要以为我讨厌夏天的人群。夏季刚刚临近，姑娘们就向

大海走去，男子和儿童小心翼翼地走进波浪，而且跳跃着避开危险。男子面对大海就这样跳起上千年的舞蹈，也许这是人类跳的第一个舞。

在冬天，黑岛的房子都笼罩在夜的黑暗中。只有我的房子亮着灯。有时，我以为对面的房子里有人。我看见灯光照亮的一扇窗子；这只不过是幻景。船长的房子里什么人也没有。是我窗子里的灯光反射在他的窗子上。

那年，我天天躲在那个角落写我的作品。走到那里并在那里呆下来，是不容易的。眼下有件东西吸引了我的两条狗——潘达和乔图，那是铺在这个小房间里当地毯的一张孟加拉虎皮。我在许多许多年前从中国把它带来，它的爪和毛都脱落了，而马蒂尔德和我则防止了蛀虫的威胁。

我的两条狗喜欢懒洋洋地躺在虎皮这个年迈的敌人身上。它们像一场激战后的得胜者，因为打得精疲力尽，一躺下就睡着了。它们横卧在房门前，像是迫使我不走出房间，而继续我的写作。

这幢房子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什么事情。有人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该回答什么？说我不在家。随后又来一个电话，该回答什么？说我在家。

我不在家。我在家。在家。不在家。这就是一个诗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黑岛的遥远角落已经不成其遥远的了。人们——尤其是新闻记者——总是问我，我在与什么作品，在做什么事情。我总是为这种问题的肤浅而感到吃惊。因为事实上我永远在写同样的东西。我从未停止做同样的事。不就是写诗吗？

我在写诗之后过了许久，才知道我写的东西叫做诗。我向来对定义和标签不感兴趣。美学争论叫我厌烦死了。我不贬低坚持进行这种争论的人，但是我对文学创作的出生证明和检尸报告都感到格格不入。沃尔特·惠特曼说过：“任何外部的东西都不能对我发号施令。”文学的装饰品连同它的一切优点，都不能代替朴实无华的创作。

我一年要换好几个笔记本。这些笔记本都是用我的绿色笔迹拴在一起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笔迹，就变成一本本的书，像是从一种变形过渡到另一种变形，从静止过渡到运动，从幼虫过渡到萤火虫。

政治生活加惊雷动地而来，把我从我的写作状态中拉开。我再吹回到群众中去。

人民群众早已成为我的生活课堂。我可以怀着诗人生而有之的怯懦，怀着胆怯的恐惧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一旦投入他们的怀抱，我就觉得自己变了。我是绝大多数的一部分，是人类这棵巨树上的又一片叶子。

孤独和人群将仍然是当代诗人的基本责任。在孤独中，智利海岸上波涛的搏击丰富了我的生活。进攻的海水和受攻击的岩石，大洋里的无数生命，“候鸟”的完美编队，壮丽的大海的浪花，引起我的好奇和热爱。

但是，从生活的巨潮中，从同时注视我的千百双眼睛的温柔视线中，我学会了更多东西。这种信息可能不会传达到所有的诗人，但是听到的人就会把它记在心里，就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发挥。

使诗人难以忘怀并感动得柔肠寸断的，乃是体现许多人的愿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间。

总统候选人

1970年的一天上午，我的党的总书记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我的海滨隐蔽处——我在黑岛的家。他们前来要我当智利共和国总统的暂定候选人，他们要把这个候选人推荐给人民联盟的六七个党派。纲领、政府的性质、未来的应变措施等等，他们全准备好了。到那时为止，那几个党派各有自己的候选人，而且都要支持自己的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总统候选人。我们的立场是支持左翼各党派指定的唯一候选人，这个人也将成为人民联盟的候选人。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右翼的候选人已经提出，而且已展开宣传。我们如果不在共同的竞选目标下团结起来，必将遭致令人痛心的惨败。

共产党人指定自己的候选人，是促进团结的唯一方法。当我接受党提名我为候选人时，我们共产党的立场就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了。我们将支持其他党派对之有好感的候选人。如果不能一致达成这样的意见，对我的提名将坚持到底。

这是逼迫其他党派一致同意的一种冒险措施。我在接受提名时对科尔巴兰同志说，我之所以接受是基于如下的理解：将来当我确信必须退出竞选时，我的退出将同样被接受。要想在一个共产党人周围达成团结一致，那是太不可能了。换言之，所有的党派都需要我们支持他们（包括某些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却没有人肯把我们需要的支持给予我们。

但是，从那天上午在黑岛海边起，我的候选人资格着起火来了。我到处受欢迎。普通人民中的成千上万个男女流着眼泪拥抱我，亲吻我，他们感动了我。我在大雨中，在大街小巷的泥泞里，在使人冷得发抖的南风中，向圣地亚哥郊区的居民、科金博的矿工、在铜矿里和沙漠上干活的人们、抱着孩子等候我数小时之久的农妇们、从比奥比奥河直至麦哲伦海峡以远地方的生活无着的人们，我发表讲话，或朗诵我的诗。

我非常感动和兴奋。参加我的会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妇女也越来越多。我在既迷惑又惧怕的心情中开始想到，如果我被这个相当粗野、问题极难解决、债台高筑，而且可能是十分忘恩负义的共和国选为总统，我要做些什么？那些第一个月被宣布为总统的人，在余下的5年零11个月时间里，将遭到公正或不公正的杀害。

阿连德的竞选活动

阿连德忽然成为全人民联盟可能接受的候选人这一消息，在令人高兴的时刻传来。在我的党接受这一消息之前，我迅速提出退出竞选。我当着一大群愉快的群众宣布退出竞选，阿连德则宣布接受竞选提名。这次群众大会是在一座公园里举行的。在所有看得见的空地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与会的人。树枝间露出人的腿和头。没有任何事物能与这些经验丰富的智利人相比。

我认识这位候选人。我以前曾3次与他作伴，在智利崎岖的无边土地上朗诵诗和发表演说。每6年一次，我的极其顽强的朋友曾连续3次成为竞选总统职务的人。这次是第四次，而且将是获胜的一次。

阿诺德·本涅特或萨墨塞特·毛姆（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一位了）谈起过，他有一次恰巧跟温斯顿·丘吉尔睡在同一间房里。这位大政治家醒来时一睁开眼睛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伸手到床头桌上去，拿来一支很粗的哈瓦那雪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抽起来。只有石器时代矿石般结实的健壮穴居人才

能这么抽烟。

阿连德的耐力把所有陪伴他的人都比下去了。他有堪与丘吉尔本人匹敌的一种本领，那就是：他什么时候想睡，马上就能睡着。有时我们在智利北方无垠的不毛土地上旅行，阿连德竟在汽车的角落里酣然大睡。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小红点；汽车驶近时，这个小红点变成了15~20个携带妻儿、手持旗帜的一群人。汽车停下了。阿连德揉揉眼睛，以便迎上当空的太阳和那一小群唱歌的人。他参加到他们中去，唱起了国歌。然后他向他们发表生动、简短、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一回到车上，我们就继续踏上智利漫长的旅途。阿连德又毫不费力地回到深沉的梦乡。这种场景——人群、旗帜、歌曲、演说和回到梦乡——每25分钟重复一次。

迎着智利成千上万的广大群众，阿连德从汽车换坐火车，从火车换坐飞机，从飞机换坐轮船，从轮船换骑马匹，毫不动摇地完成那令人筋疲力尽的几个月日程。他的随行人员几乎全部累得掉了队。后来，他当上名副其实的智利总统时，他那无情的效率曾使他的四五位合作者心脏病发作。

驻巴黎大使馆

到我国驻巴黎大使馆上任时，我才发现必须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高昂的代价。我没有多加考虑就接受了这一职务，而让自己再次卷入变化无常的生活中去。在一个平庸而爱撒谎的政府统治了那么多年之后，代表一个胜利的人民政府的想法，使我甚感愉快。在我内心深处，能以新的显要身份走进智利大使馆那幢房子，也许是更吸引我的东西，因为过去我在这幢房子里安排西班牙共和派移民我国时，忍受过种种凌辱。在我之前的每一个大使，都参加过对我的迫害，他们都为低毁我和伤害我卖过力。现在受迫害者可要坐上迫害者的席位了，要在他的餐桌上吃饭，要在他的床上睡觉，要打开一扇扇窗子，以便让世界上的新鲜空气透入一座旧的大使馆。

让新鲜空气透入是件极难的事。1971年3月的那个夜晚，当我和马蒂尔德来到我们的卧室，躺到某些大使和大使夫人曾平静或痛苦地在上边故去的精美的床上时，房间里令人窒息的装饰风格使我感到刺鼻和扎眼。

这间卧室适于安顿一名武士和他的战马；其空间足够用于喂马和供武士安歇。天花板很高，装饰精美。家具都是些类天鹅绒制品，其色彩模糊得似枯叶，点缀着难看的缘饰；这些家具的风格既显出富丽的迹象，也显出颓废的痕迹。铺的地毯在70年前可能是很美的，现在已经沾染上人踩过的印记而无法抹掉，以及由谈话和死亡相聚的特殊气味。

此外，等候我们的那个紧张不宁的人，除了那间大卧室的供暖之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马蒂尔德和我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外交之夜，冻得浑身都麻木了。第二天晚上，暖气才开始供应，这个设备已经使用了70年，它的过滤器已经不起作用了。陈旧的系统生出的热空气只让碳酸酐通过。我们无权抱怨头天晚上那样的寒冷，我们却为中毒而心悸和痛苦。我们必须打开窗子，让冬日的严寒进入。先前的几个大使也许已经向一名热中于名利的人报了仇，因为此人既没有官场中人的长处，又没有家族的光荣，竟敢跑来取代他们。

我们想，我们该去找一所房子，在那里可以与树叶、水、鸟儿、空气共呼吸。这一想法恐怕会越来越难以摆脱。我们如同为自己的自由而夜不能寐。

的囚徒，跑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反复寻觅纯净的空气。

对我来说，当大使是件新鲜而又不舒服的事。但是，这一职务含有一种挑战意义。智利已经发生一场革命，一场被人反复分析并引起许多争论的智利式革命。国内外的敌人都磨尖利牙，准备予以摧毁。180 年来，贴有不同标签的同类统治者在我国相继登台，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老百姓衣不蔽体，住所之差令人深感屈辱，儿童无学可上、无鞋可穿，监狱和棍棒成为对付贫苦百姓的工具，这一切都一如既往。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呼吸和歌唱了。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新境况感到满意的原因。

智利外交官的任命需参议院认可。智利的右派经常对作为诗人的我唱赞歌，甚至发表向我致敬的演说。他们显然更乐意在我的葬礼上发表这种演说。参议院投票批准我为大使时，以多 3 票勉强通过。右派成员和某些虚伪的基督徒利用秘密表决方式，投票反对我。

前任那个大使在有壁毯装饰的墙上，在他自己的相片之外，还挂上先前历任大使的相片。除两三人（其中有我们智利的小巴尔扎克——著名的布莱斯特·加纳u）之外，可说是令人难忘的精神空虚人物的荟萃。我吩咐把这些鬼怪似的相片拿掉，换上更站得住的人物的形象：5 帧为智利提供了国旗、国格和独立的英雄们的版画像；3 幅当代人（进步的共和国总统阿吉雷·塞尔达，智利共产党的创建者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以及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相片。这几堵墙现在绝对好多了。

使馆里的秘书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右翼分子，我不知他们想的是什么。百年来反动党派早就占据了国家政府机构。就是一名看门人，如果不是保守派或保皇派，也不会得到任用。至于一直自称在进行“争取自由的革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则显示了类似于旧反动派的贪婪。后来，这种类似使他们转而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路线。

官僚政治这种公共建筑中的群岛，使得到处仍然充斥着右翼的职员、检查员和顾问，仿佛阿连德和人民联盟从来没有在智利取胜，仿佛现在的政府部长都不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要求巴黎大使馆参赞一职，由我的一位朋友、职业外交家和杰出的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充任。他虽然出身于我国最有权势的寡头和反动家庭，却是个无党无派的左翼人士。我最需要的是一名有才智的、熟悉本行并值得我信赖的官员。直到那时，爱德华兹还是驻哈瓦那代办。一些说他在哈瓦那遇到困难的语焉不详的谣言，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知道他是个左翼人士已有多多年，因此我认为那种事情对他无伤大雅。

我的新参赞从古巴抵达时心神不安，向我讲了他的事。我的印象是他们双方都对，又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都不对。豪尔赫·爱德华兹渐渐从精神崩溃状态中恢复过来，不再咬指甲，显然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很忠实地协助我工作。在大使馆那两年的艰巨工作中，我的参赞成为我最好的阴友和官员，他也许是那座大楼里仅有的一位政治上无懈可击的人。

当美国的一家公司企图对智利的铜实行禁运时，全世界掀起了激动的浪潮。不仅报刊和广播、电视对这件事特别关心，绝大多数人民的良知也都再次起而捍卫我们。

法国和荷兰的码头工人拒绝在他们的码头卸铜，以表明他们反对侵犯的

行为。这一崇高的姿态震撼了全世界。诸如此类的团结一致的故事，对我们时代的历史的教训，比大学课堂给予的更为丰富有力。

我还想起一些虽然更感动人却更叫人难为情的情况。在禁运的第二天，法国外省小城有位谦逊的女士给我们寄来她积蓄的一张 100 法郎的钞票，以供保卫智利的铜之用。还有一封热情的支持信，信上有该城全体居民（包括市长、教区牧师、工人、运动员和学生）的签名。

千百位认识和素不相识的朋友从智利给我来信，对我抵抗国际海盗以捍卫我们的铜表示祝贺。我收到一位农村妇女寄来的邮包，包中是一葫芦巴拉圭茶叶、4 个鳄梨和 6 枚青辣椒。

同时，智利出乎意料地受到赞扬，名声大振。我们变成一个现已存在的国家；而以前，我们在众多的不发达国家中丝毫不受注意。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面貌，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敢于否定我们为民族前途而斗争的重要性。

我的祖国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使法国乃至全欧洲激动。群众集会、学生大会、用各种语言出版的书籍，都在研究我们，考察我们，描述我们。我必须抑制每天都想了解一切并想了解更多事情的新闻记者。阿连德总统是一位世界性人物。我们工人阶级的纪律和坚定，是值得钦佩和赞扬的。

对智利的热烈同情，由于把我国铜矿国有化所引发的争端而增强了。处处都有人明白，这在智利新独立的道路上是迈出的巨大一步。人民政府无需任何托词，在为我们的祖国收复铜的时候，就确立了我们的主权。

返回智利

回到智利时，迎接我的是大街上和公园里新绿的植物。我国美妙的春天，已经给树林的叶片抹上了绿色。我们古老的灰色首都需要绿叶，如同人的心灵需要爱情。我饱吸了这初春的清新气息。远离祖国时，我们总是想不起它的冬天。距离使冬天的苦楚、不避风寒的村镇、严寒中赤脚的儿童，都变得模糊了。记忆的本领仅仅把我们带往绿色的原野，黄色和红色的花朵，国歌所歌颂的蓝天。这次我可遇上了曾经在远方多次梦见过的美好季节。另一种植物斑斑点点地散布在城里的墙上；点缀墙面的就是心怀仇恨的苔藓。满是蛮横情绪和谎言的反共招贴，反古巴的招贴，反苏的招贴，反和平和人性的招贴，预言雅加达屠杀的血腥招贴——这就是使城里的墙壁变得可鄙的那种新的植物。

凭经验我认得出那种宣传的声调和意思。我碰巧曾生活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欧洲。全力以赴地撒谎，交替进行威胁和利用恐惧心理，尽力运用一切仇恨手段反对未来，这恰恰是希特勒宣传的实质。我认为，他们力图改变我们生活的实质本身。我不明白，用这种方法伤害我们民族精神的智利人，怎能生存下去。

反动的右派在需要时，会肆无忌惮地采取恐怖行动。智利陆军最高首脑施奈德将军曾反对旨在阻挠阿连德就任共和国总统的政变，是位受尊敬也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把他刺杀了。在他家附近，一群成分复杂的歹徒用机枪从背后扫射他，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名被赶出军队的前将军。这群歹徒是由富家子弟和职业罪犯组成的。

罪行查明后，幕后策划者便被投入监狱，军事法庭判这个家伙 30 年徒刑。但是这一判决被最高法院减为两年徒刑。在智利，一个可怜的穷光蛋因为肚子饿偷只鸡所受的惩罚，比这个杀害陆军总司令的杀人犯所受的惩罚还重一倍。这就是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阶级运用。

阿连德的胜利使这个统治阶级怕得要命。他们第一次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法律可能打在他们自己头上。他们带上股票、珠宝、钞票、金币，逃往一个地方藏匿起来。他们逃往阿根廷，逃往欧洲，甚至逃往澳大利亚。他们对人民的恐惧，也许会毫不费力地使他们逃到北极去。

以后他们是会回来的。

弗雷

时刻严格遵循宪法的智利道路，到处布满了歪门邪道的和合法的障碍。与此同时，寡头政治集团缝补了他们百孔千疮的破衣，并且换上一副法西斯面孔。在铜的国有化之后，美国的封锁变得更加难以缓和。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按照前总统弗雷的意见，使基督教民主党投入新法西斯右派的怀抱。

阿连德和弗雷截然相反的性格，始终使智利担心。也许正因他们是如此不同的人，所以他们在一个没有强权统治传统的国家里，各自成为有自己的目标和精心确定的道路的强有力的领袖人物。

我自认为很了解阿连德，认为他毫无难以理解的地方。至于弗雷，我与正好是共和国议会里的同事。他是个好奇的、老谋深算的人，与阿连德的主动精神相去甚远。不过，他常常会突然大笑起来，发出刺耳的哈哈笑声。我喜欢会哈哈大笑的人（我缺乏这种天赋）。但是，笑声与笑声各有不同。弗雷发笑时神色忧虑、严肃，警惕地守护着用自己政治生命之线缝出的针脚。他的笑声是突发的，有点瘆人，如同某些夜鸟的狐狐叫声。此外，他的亲切举止往往谨慎而且冷静。

他政治上的曲折态度，在令我彻底失望之前多次使我感到压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在圣地亚哥的家里来看我。当时流传共产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互相理解的说法。他们那时还没有叫做基督教民主党，而叫做国家长枪党，这是他们在年轻的法西斯主义者普里莫·德·里韦拉影响下取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之后，他们受马里丹的影响，转变为反法西斯分子，于是就改了名。

我们的谈话是空泛的，但很亲切。我们共产党人有兴趣与怀有善意的一切个人和各界人士相互理解。孤立决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的。尽管弗雷本性喜好躲躲闪闪、含糊其词，我认为他当时显然是个极左派。他辞别时赠给我一声大笑，这种哈哈大笑石块似地从他嘴里甩出来。“我们还要接着谈。”他说。但是，过两天我就明白了，我们的谈话已经永远结束了。

阿连德获胜后，野心勃勃和冷静的政治家弗雷相信，为了重新掌权，他必须有一个反动联盟。这是个纯粹的幻想——一个政治蜘蛛的冻僵了的梦。他的网不可能存在。他支持过的政变，对他毫无好处。法西斯主义不能容忍私下的妥协，而要求服从。弗雷的脸色将一年比一年更阴郁。他的记忆总有一天要面对罪行所应负的责任。

托米奇

从基督教民主党诞生，从它放弃令人无法接受的长枪党那个名字起，我就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了。当一小群天主教知识分子成为研究马里丹-托马斯主义的杰出人物时，这个党就诞生了。这种哲学思想并不让我担心，我对喜好空谈诗、政治和性的理论的人，天生态度冷漠。这个小运动的实践结果，使人注意到它特别的、出人意料的方式。我从战斗中的马德里归来，组织了一个大型集会，我请几位青年领袖到会发表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演说。他们参加这个集会是很不平常的事；教会年老的高级领导人受保守党的怂恿，几乎困解散这个新党。只因一位资深主教的干预，才把他们从政治自杀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塔尔卡¹主教的声明允许这个团体存在下去，后来它渐渐成为智利人数最多的政党。它的意识形态随着岁月流逝而完全改变了。

弗雷之后，拉多米罗·托米奇是基督教民主党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我当议员、参加罢工以及到智利北方进行竞选旅行时期，我认识了他。基督教民主党人那时总是跟在我们共产党人后面，以便参加我们的集会。在产硝石和铜的贫瘠地区，也就是在美洲大陆牺牲最大的工人中，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最受爱戴的人。雷卡瓦伦就来自那里，印刷工人和最早的几个工会就曾诞生在那里。没有共产党人，那里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事物。

当时托米奇不仅仅是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最大希望，他的人品极具吸引力，他的演说也极有说服力。

1964年，当基督教民主党在选举中取胜，使弗雷登上总统宝座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击败阿连德的竞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反共暴力为基础，通过旨在恐吓人民的报纸和广播的警告文章而进行策动。那种宣传令人毛骨悚然，捏造说：修女们会被枪杀；儿童们将被非德尔·卡斯特罗之流的大胡子用刺刀刺穿；女孩子们将被从父母身边拉走，送到西伯利亚去。后来，从提交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证词中得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场可怕的恐怖运动花了2000万美元。

弗雷一就任总统，就送给他党内唯一的劲敌一件居心叵测的礼物——任命拉多米罗·托米奇为智利驻美国大使。弗雷知道，他的政府要同美国铜业公司重新谈判。那时候，全国上下一致要求国有化。弗雷是个变戏法的高手，把这个词换成了“智利化”，并以新协定保证，把我国的主要财富拱手交给肯尼科特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此事的经济结果，对智利是可怕的；此事的政治结果，对托米奇是十分可悲的——弗雷已经把他从地图上抹掉了。在拱手交出铜的谈判中进行过合作的智利驻美国大使，决不可能得到智利人民的支持。在下一轮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托米奇在3个候选人中痛苦地屈居第三位。

1971年初，托米奇在辞去驻美大使职务之后不久，到黑岛来看我。当时他刚刚从北方回来，尚未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我们在政治风浪中维持了友谊，现在仍然如此。但是，那次我们却难以相互理解。他需要一个进步力量的更广泛的联盟，取名人民同盟，以取代我们的人民联盟运动。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参加了有关铜的谈判，政治左派因而认为他没有资格当总统候选人。此外，人民运动的两个台柱——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大政党——已经成熟，有能力使自己队伍中的人当上总统。

托米奇准是相当失望，在离开我家之前，他向我披露一件事。财政部部长、基督教民主党人安德烈斯·萨尔迪瓦给他看过一些文件，证明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已达破产境地。

“我们正在掉进深渊里去。”托米奇对我说。“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几个月。这是一场大灾难。萨尔迪瓦已经把不可避免的破产的全部详情告诉我了。”

阿连德当选后一个月，确切地说，是在他就任总统之前，萨尔迪瓦部长本人公开宣告我国迫在眉睫的经济灾难。但是，这次他把此事归咎于阿连德当选所引起的国际反应。历史记载就是如此；至少萨尔迪瓦之流不正派的机会主义政客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

阿连德

目前，我国人民是最善于背叛的了。从盛产硝石的不毛之地，从海底煤矿，从蕴藏着铜并靠人的劳动（用我国人民的双手）把铜挖出来的可怕的高原上，涌现出一大批解放运动。这种运动使一个名叫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当上了总统，他实行改革并采取刻不容缓的公正措施，以便收回外国所攫取的我国财富。

在那些极其遥远的国度，阿连德总统所到之处都受到各国人民的颂扬，我们不同一般的有多种力量参加的政府也受到赞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见世界各国的代表曾像这次这样，向一位智利总统欢呼。在智利国内，在巨大的困难中，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正在我们的主权、民族自豪感、智利优秀人民的英勇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宪法和法律，民主和希望，都站在我们一边，站在智利革命一边。

对立面则无所不有。他们形形色色的小丑，有带枪和带锁链的恐怖分子，有虚伪的修士和堕落的军人。他们都在办公室的旋转木马上转圈子。法西斯分子哈尔帕同他从“祖国与自由”来的子弟们携起手来，准备粉碎现存的所有头颅和灵魂，以此收复他们称之为智利的这一庞大财产。为了使这出闹剧令人愉快，一个大银行家和舞蹈家同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溅出些许鲜血；伦巴舞之王是冈萨雷斯·魏地拉，他早已使他的党听命于人民的敌人。如今是弗雷，他把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奉献给同类的人民敌人，并且见风使舵；此外，他还同前陆军上校维奥共舞，成为此人胡作非为的帮凶。这些人都是这出闹剧的主要演员。他们早已储备了粮食，枪支，棍棒，乃至昨天在伊基克、兰基尔、萨尔瓦多、蒙特港、何塞-玛丽-卡罗、弗鲁蒂亚尔、上普恩特及其他许多地方杀害过我国人民的子弹。埃尔南·梅里的杀手们已在同本应保护自己记忆的人们一起跳舞。他们装出一副坦然自若的神态在跳舞。他们为“不值一提的细节”而谴责他们深感恼怒。

智利的历史悠久而且文明，革命很少，保守、平庸的稳定政府却很多。渺小的总统很多，只有巴尔马塞达和阿连德两位总统是伟大的。有趣的是，这两人都出身于中产阶层，即富有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这里被称为“贵族”。他们是原则性很强的人，都坚持要使被平庸的寡头政治集团弄得赢弱的国家壮大起来，因而导致了死亡的同样结局。巴尔马塞达因反对把硝石财富拱手交给外国公司，终至自杀身亡。

阿连德把智利地下的另一项财富——铜——国有化，因而惨遭杀害。在这两个事件中，智利的寡头政治集团制造了流血动乱。在这两个事件中，军人充当了鹰犬。巴尔马塞达时期的英国公司，阿连德时期的美国公司，煽起这一类军事行动，并给予资助。在这两个事件中，遵照我们高贵的“贵族”

们的命令，两位总统的住宅都被劫掠一空。巴尔马塞达的居室被斧头捣毁。由于世界的进步，阿连德的住宅被我们英勇的飞行员从空中炸毁。

不过，这两位总统是很不相同的人。巴尔马塞达是个很有魅力的演说家。他的骄横性格使他越来越趋向个人独自发号施令。他对自己目标的崇高确信不疑。他一直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比起他周围的人，他优越得多，也孤独得多，而他终究只能把孤独感埋藏在自己心中。本应支援他的人民还没有形成一股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这位总统以其举止如同一个幻想家和梦想家而受到谴责，因为他的伟大梦想仍然是个梦。他被迫自杀之后，贪婪的外国商人和土生白人议员们攫取了硝石——外国人得到的是所有权和特许权；土生白人得到的是抽头的头钱。他们一拿到 30 块钱，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几千人民在战场上抛洒的鲜血，很快就干了。智利北部地区的工人们——世界上受剥削最深重的工人们，不停地为伦敦生产出巨额的英镑。

阿连德从来不是出色的演说家。作为执政的国务活动家，他采取一切措施都要经过商量。他反对独裁，是个原则性很强的民主主义者，连细枝末节都不迁就。注定由他统治的国家，其人民已经不像巴尔马塞达治下的那么缺乏经验了。他发现了一个深知该干什么的强大的工人阶级。阿连德是个集体的领导人；他这个人虽然不是平民阶层出身，却是那些阶级反对其剥削者的停滞与腐化的斗争的产儿。由于这样的原因和理由，阿连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超过了巴尔马塞达；而且，在智利历史上更是最重要的成就。在他集体性质的政府领导下实现了许多目标，仅铜的国有化一项，就是无比伟大的事业。

阿连德的工作和行动，对国家民族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这些激怒了我们的解放事业的敌人。这个危机的悲剧性象征意义，在轰炸国宫行动中显露无遗。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

置我的伟大朋友阿连德总统于死地的那些不齿于人的事件发生后仅仅 3 天，我就为我的回忆录写下这几行急就章。他的被害是不让声张的；他被秘密埋葬，只有他的遗孀获准陪伴那百世流芳的遗体。侵犯者的说法是：他们找到他有明显的自杀迹象的尸体。外国发表的看法是不同的。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

他们必须利用这么个好机会。他准是被机枪射杀的，因为他决不会辞职。那具遗体被秘密地埋葬在某地。那具遗体被送往墓地的路上，只有一位肩负着世上全部痛苦的妇女陪伴他；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

